

第 一 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第一章 近代贵池社会概况

第一节 封建地主阶级对贵池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贵池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东与青阳、铜陵接壤，西北隔长江与安庆、枞阳相望，西南同东至、石台相连。境内地势南高北低，依山傍水，山、丘、圩呈阶梯分布。南部山区，属九华山脉，山高岭峻，金鸡、太朴、老山、杉山等几十座高山，峰峦重叠。中部丘陵起伏，秋浦河、龙舒河、白洋河、九华河等数十条河流蜿蜒奔流，汇入长江。北部圩区河网纵横，田畴平平，升金湖、乌头湖、西岔河、十八索等大小湖泊星罗密布。气候温和，无霜期长，光照充足，四季分明。

贵池资源丰富、物产众多。其矿藏有、金、银、铜、铁、铅、锌、锰、煤、硫、大理石等；其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林、特产品有木、竹、茶叶、桐梓、鱼、虾、藕、莲等。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近代贵池，村镇林立，人口稠密。古道纵横交错，交通方便。河流众多，水运发达。

贵池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春秋时属吴国地，战国时并于越，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间始建石城县，属扬州之丹阳郡，县治在今殷汇镇石城村，因“东西两石山夹河如城”故名。隋唐置秋浦县，县治先石城后迁池阳。五代杨吴顺义元年（926年）更名贵池县。

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贵池撤县建市，名贵池市。2000 年，撤贵池市为贵池区。自建池州（州、郡、行政公署、专区、行署、市）贵池即为府治所在地，今池州市仍设在贵池。今贵池区辖十一个街道办事处，九个镇，全区面积 2516 平方公里，人口 66 万。

贵池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然而生长在这片富饶美丽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于十九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极度屈辱、极端贫弱的深渊中。终年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劳动财富大部分被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所掠夺。贵池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为了生存、为了自由，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英勇反抗剥削和压迫，谱写下了光辉灿烂的革命篇章。

二、农村地主兼并和掠夺土地

晚清时期，贵池农民受田赋、地租、高利贷的盘剥十分沉重。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集团，不仅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过程中掠夺了大量财富，而且施展各种手段，在安徽各地兼并和掠夺土地。北洋军阀统治和民国期间，贵池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有增无减。贵池乌石村是一个只有 241 户，1089 人的小村，占全村农户 34% 的贫雇农仅占全村土地的 2.9%；官僚地主胡子贞霸占学产、庙产、马房产、芦场、湖场等土地共 4000 余亩。

地主还借天灾人祸，用“典当”（将土地作为借款借物的抵押品，经立约，承典人有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所有权仍属出当者）、“押青苗”（农民将自家土地种植的农作物作价出当，待承当一方

收获后，土地归还原主）、“土地买卖”等手段，从农民手里巧取豪夺土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贵池县沈长有出卖土地立约称：“立杜卖契人沈长有，情因母、兄继逝，丧葬无资，兼之日食难度，愿已名下座落余家洲下地芦地泥滩一片，计七十八亩……，出卖与黄体元公名下为业”；民国38年（1949年），贵池县地主阶级有人口11942人，占全县总人口298590人的4%，却占有土地197000亩（不包括他们在邻县占有的土地），为全县耕地522761亩的38%，地主人口均占有土地约为全县人均占有土地的10倍。这便是贵池近代土地兼并的缩影。

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

近代贵池农村的租佃制度极不合理。当时，土地出租户称东家老板，承租户谓之佃户。佃户向东家缴纳地租，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其地租形态大体可分五类：一为实物地租，即交稻谷。二为现金地租，即交现款。三为粮食分租，一般以四六分租（东六佃四）为主。四为转租，从地主手中租得土地的人再转租佃农，从中渔利，农民年交二租；五为徭役地租，即帮地主做工。此外还以带庄田、押租、永佃制等名目进行盘剥。所谓“带庄田”，即佃农以耕种佃主带庄田的劳力作为租种佃主土地该缴的田租，约期不定，解约后方自由。“押租”，即租佃田地，多由佃户出押板银洋给田东，数额多寡不等。西北圩区垦荒佃农每亩交押金4元才能取得佃权，如无现金支付，按每月5分利息向地主告贷。“永佃制”，即佃农拥有永久佃种权。这种田地常有田面与底面的区别，所以在同一面积的田

地上，常出现二重地主，拥有田底的为正式地主，可收地租，须纳地税；拥有田面的为有永佃权的佃农，仍需按时缴租，但可将这项佃权买卖、抵押，地主不得干涉。近代，贵池沿江客籍农民约占百分之八十，其中以桐城、庐江二县占最多数。他们初来贵池垦荒时，多为单身男子，或佣或贩或为无业难民。等到后来找到可垦的荒地，就托人与地主说合就耕。按当时外来人的佃租办法，分垦荒与垦熟两种，凡垦荒者获得永佃权。初期，永佃制推动了沿江滩地的开垦。贵池清末秀才，士绅钱翰臣于1914年在贵池西北乌沙地区的大片湖滩地带围筑了“三万”、“万兴”圩，招佃垦荒，使一批农民获得了永佃权。后期为取高额地租，永佃制加速沿江农民破产。其后，清末举人、做过几任知县的丁梦松邀法官吴畏民和讼棍陈国栋在白沙州、小矶头围筑民生圩。圈圩后，要垦荒人交纳每亩4—6元押金，将65%的垦荒所得土地上缴东家，才可以取得上缴地的永佃权，但每年夏秋两季的农产品要按四六分成。其圈圩暴租让丁梦松等成为富甲贵池的大地主。

近代贵池，横征暴敛凶于虎狼，苛捐杂税多于牛毛。旧时财政收入以田赋为大宗，征银、征粮并施。鸦片战争失败后，白银外流，银价猛涨。到1849年，一两白银相当三石稻谷。当时纳赋税必须以银计数，故农民“田中所收，不敷两税”。北洋军阀时期，除“平余”（自前清以来，即有随田赋正额带征者，名曰平余。“平余”用于各级政府办公费及供应上级机关的种种费用。辛亥以后，以“平余”作县地方财政收入，用于招募警察、举办学校、实业及一切公

益之需。黑恶的北洋军阀倪嗣冲治皖期间，于1914年规定将此“平余”提归省有。各县失去此款后，每办一件事，必须创一种附加税于田赋项下代征，加征“一五加征”税（随田赋加十分之一五征税称“一五加征”）。清咸丰年间，为筹措军饷，开始设卡征收货物税。最初税率按货物值百抽一，谓之“厘金”。其税种有贾税、盐厘、茶厘、烟酒加税、土药额税、瓷器统捐、牙税、米捐等项。后北洋政府将“厘金”增至值百抽二。倪嗣冲主皖时，又新增收取“厘金”的货物品种，在贵池遍设关卡，持枪强行收税。其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有：开田房契税、牛猪税、花布税、商税、船税、牙贴原额税、茶税、附加税，糟粮、卫赋、学租、芦课、户口、印花、保甲、壮丁费等等，不胜枚举。沉重的赋税，使百姓苦不堪言。

近代贵池，地主阶级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使许多农民破产，沦为赤贫。高利盘剥名目繁多。一曰“稻债”。即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于秋后以田稻履行债务者，谓之稻债。月息为五分，立字到期无法归还，利转本息，叫“滚雪球”。最毒辣的是放稻青，即地主趁青黄不接或农民遇有婚丧之事急需钱、粮，借稻一斗还一石，借钱7角还一元，以高价折合实物放出，又以低价折合实物收回。如桃坡乌石村农民吴必友借地主吴祺珍十块钱，言明每六块钱息稻一石，秋后归还。这年因灾无力偿还，吴祺珍由稻青转麻青、桐籽青，每转一次，利上加利，最终利息达到20倍。不到一年，吴必友5亩4分田转到了吴祺珍手里，倾家荡产。二曰：“麦债”。类似稻债。三曰：“出租耕畜”。农民每租一头耕牛需缴纳拥有耕牛者（地主）

一石五斗至三石租谷。所以靠耕牛出租致富者甚多。四曰：“印子钱”。即借钱一千文，加利钱一百文到二百文。由债权人立一折子与债务人收执，每日晚间债权人向债务人索还利钱四十文，由债权人于该折上打一印子，为该日收讫之证。一般经过 30 天左右，连本息一并付清。此外还有“押板金”、“年礼”、“看租费”、“下庄礼”、“当铺”等各种手段，对百姓进行一本万利的剥削。

近代八十年间，由于军阀的横征暴敛，官府의苛捐杂税，地主的盘剥搜刮，胥吏的欺压、勒索，加之天灾、病疫，贵池广大农民陷入极度屈辱和极端苦难的深渊之中。据光绪九年（1883 年）《贵池县志》记载：贵池县“山稠土瘠垦田不多，一岁之菽不足供半岁之粮”，遇灾年则“饿殍载道”、“民食草木”。又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贵池县“合邑花户，凡四万余家。除世家殷实及黠猾豪横因缘为奸之人不计，其贫窘不能自存者度不下三万家”。至于“饥民乏食，家室流离，而各处匪徒，遂从中捎贩妇女、贪利昧良，不可究诘。沿至今日，若视之为故常”。贵池普遍流传的“镰刀挂上壁，饭就没得吃”，“粒粒皆辛苦，缸无半粒存”；“镰刀磨成银子，衣服拉成裙子，交完地主租子，剩下扁担绳子”等民谣，就是当时贫苦农民的真实写照。

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贵池农民的抗租抗捐斗争连绵不绝。据史料记载：1907 年 7 月，贵池六都湖农民聚众包围“垦殖局”，抗议侵占农田。清宣统三年（1911 年）10 月初，以农民为主体的插香会（又称龙池会），从太平、青阳、石埭进入贵池县高坦、

梅村等地，抗捐抗税得到贵池农民的响应。

第二节 帝国主义对贵池经济文化的入侵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按《江宁条约》赔偿英商六百万两鸦片银中的四百万两转嫁到江、浙、皖三省，贵池人民深受其害。自 1858 年《天津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入侵者攫取了长江航运权、内地通商权和传教权，帝国主义的魔爪开始伸向贵池。1876 年 9 月 13 日，由英国公使威妥玛与李鸿章签订的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中，其中一项是增开芜湖、宜昌、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安徽的大通、安庆等地准许外国轮船停靠（《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1877 年，芜湖正式辟为商埠，池州、大通开始成为外国轮船停泊和上下客商货物的“寄航港”。从此，帝国主义势力直接侵入贵池。

一、帝国主义对贵池经济的掠夺

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贵池后，在攫取政治特权的同时千方百计控制经济命脉，掠夺资源。其一，强夺矿山开采权。贵池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 年）载：“1877 年，一个广州人，前汉口伊文洋行买办，名杨德，组织了一个公司，资本银十万两（每股银百两），获得政府的准许，在大通附近池州府的馒头山（今贵池境内）开采煤矿。芜湖的道台、前海关道，被委派为督办；代表督办的经理有权征收煤的出口税（1877 年定为每吨

一钱)和运煤船只的吨税,税收缴给芜湖海关。此矿对政府不纳报效。”1902年3月,商务局与英商伊德订立了池州勘矿合同。1903年与日本商人订约开采贵池煤矿的中国商人徐安澜的裕通公司又与英国商人订约在贵池开采煤矿。进入民国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贵池煤炭掠夺更甚。其二,控制海关,强行子口半税制度。这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税。子口半税规定:凡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或出口土货运销国外,除在海关(母口)完纳值百抽五的进口或出口税外,再半缴纳2.5%的子口税,便可以替代沿途经过的各地所有关卡(子口)应征的税、捐、厘金,“无论远近,概不重征”。而相反,本国商品却得不到此种权益。在“子口半税保障之下,(外国商品)几乎已经深入安徽及其邻省的每一个角落”(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自然,洋货亦就潮水般进入贵池市场,使得不到“子口半税”优待的国货更难于和洋货在市场上竞争,以致十商九困。其三,帝国主义通过设置在池州(贵池)的一些洋行公司、商店和地方买办,一面廉价收购粮食、油料、蛋、肉、茶、丝、棉、烟叶等农副产品,一面大量推销他们的商品,甚至采取赊销办法倾销洋货,把贵池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之一,同时又使贵池农业生产服从他们的需要。自1876年到20世纪初,英、日两国的商品和金融,几乎控制了贵池乃至池州的市场。在贵池市场较为畅销的洋货主要有:日本的洋布、洋纱、火柴、洋伞、纸烟,其次是英国的洋油、洋烛等。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象一根根血管吮吸

着贵池劳动人民的血汗。

二、帝国主义对贵池的政治文化入侵

帝国主义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后，开始对中国进行政治文化侵略，企图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传教、定居。这无疑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清光绪初（约 19 世纪 70 年代）天主教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笪味德传入贵池，光绪 18 年（1892 年），笪氏在城内九华街购戈姓民宅五间作临时教堂，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在古舜街新建天主教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又建分堂（俗称女堂）。此间，先后在马衙、茅坦、殷家汇、高坦、乌沙、西乡、黄湓、牌楼、梅村、棠溪等地建堂多处，天主教徒发展到两千多人。这些教堂传教士为法国、西班牙人。清光绪元年（1875 年）英国基督教士董戈登和苏淑贞、惠凤英来贵池传教，于城内继武巷建耶稣堂（福音堂）一座，招收教徒 80 余人。后教徒达数百人之多。天主、基督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还创办了善导、达理小学和养正、福音女子学堂，以及圣心医院等。帝国主义利用这些教堂，通过传教办学等手段，宣传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自由”、“上帝是万物的大主宰”，进行奴化教育，以摧毁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心和革命性。他们利用教会医院医病的机会，编造种种“故事”进行欺骗宣传。教会学校规定《圣经》为必修的德育课，凡《圣经》课不及格者，就不准升学、升级。学生无论是不是教徒，每天早晚都要做祷告，三餐饭前都要跟着领祷教员念忏悔词，每星期日要参加做礼拜。并

以毕业后可以直接升教会大学、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做神父等引诱学生信教。企图麻痹中国人民，以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

19 世纪末，随着洋教传入贵池，贵池人民反对洋教的斗争也随之而起。到 20 世纪初，洋教教堂遍布贵池城乡。一些成了教徒的官僚、地主凭借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势力和教会的特权，“以外籍教士为护身符，每多藉端滋事，鱼肉乡里，于是民教争衅踵趾相接矣”，民众在贵池反对洋教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第三节 贵池民族工业和工人阶级的产生

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贵池出现了近代工业，主要是以开采煤矿为主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工矿企业。最早出现的是光绪三年（1877 年）招商局集股开办的池州（贵池）煤矿。这是安徽最早开办的煤矿之一。据 1877 年 8 月 28 日两江总督沈葆楨《开采贵池县境煤矿援案减税摺》称：“煤铁为津沪等处船炮各局所需物料，……安徽池州府贵池县贯口诸山产有煤铁，拟请招商开采。后依经臣与直隶督臣李鸿章往返咨商，飭据前署徽宁池太广道孙振铨会勘明确，并拟试办章程。当即劄委该道等督飭商量认真经理，已于本年 3 月间设局开采”。（《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池州贵池煤矿是曾任

汉口宝顺洋行买办杨德投资十万两银子创设的，由招商局集股开办，并由当时的安徽巡抚道台孙振铨督促管理，“官督商办”。该矿还聘请德国、美国的矿师进行指导，从西方进口了钻探机、抽水机。这表明贵池矿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创了安徽近代矿业的先例。

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贵池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士大夫们，积极发展矿业。贵池知县吴仲候于1899年创办了礼和公司贵池煤矿。1905年8月5日《时报》载：“贵池县分部主事吴君，近拟纠合同志，集股若干，在该县之北乡深漕山开采煤矿，籍可振兴商业”。并禀商务总办“资部颁发矿照，以便兴工开采”。深漕山煤矿是近代贵池官办矿业的一例。

在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近代工业企业的刺激和影响下，贵池的一些商人、官僚和地主，以一部资金投入近代工业，形成了贵池的民族工业企业。据《海关十年报告》、《皖政辑要》载：19世纪70年代贵池资本家徐秉诗在馒头山开采一座新煤矿；绅商王述祖申办同益铁砂公司；王希仲申办晋康煤炭公司；安徽省矿政的华胜公司的定超在贵池县东一保开采八亩田煤矿；安庆公司的沈庆堃在上二保开采杨梅坦煤矿；中益公司的倪鸿在县元四保开采大四山煤矿；日盛公司的焦寿林在县西二保开采煤山壕煤矿；华盛公司的孙发绪在县开采猪形山煤矿、罐窑山煤矿；池裕公司的刘世琛在县下六保、仁一保、馒头山开采的琅山煤矿、梅精山煤矿、陈家冲煤矿、分水岭煤矿。据有关史料记载，1912年

至 1919 年，安徽注册领照并开采出煤的 24 家煤矿公司，8 年间共产煤 322.73 万吨，其中贵池几大公司产量占全省煤产量的三分之一。1916 年贵池“协记”公司生产硫磺，至 1919 年，总产量为 2679 吨。在开采煤矿的同时，具有悠久历史的贵池手工业，如制茶、砖瓦、日用品、土纺土织、食品等，在近代也有不同的发展。贵池民族工业企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发展是缓慢的，有的工业甚至在竞争中日趋破产。

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贵池第一代产业工人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产生和发展。到 1894 年，仅贵池煤矿企业的工人已发展到 500 余人。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在一些地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史载：1899 年，贵池（池州）晋康公司（煤矿业）“整个夏天都在罢工和混乱的状况中”。

第二章 近代贵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在贵池的革命活动

1851年1月1日，洪秀全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在广西金田村爆发。这次革命斗争，先后延续十四年，纵横十八个省，攻克了六百多座城池，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驱。从1853年2月太平军进入贵池，到1861年8月贵池为清军所陷，贵池在太平天国控制下达九年之久，是太平天国稳定的、也是统治时间最长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1853年2月，太平军五十万大军从武昌扬帆东下，翼王石达开率军进入安徽，势如破竹，于2月27日攻占贵池，满清政府的州、县官吏纷纷逃亡。3月2日，太平军攻破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6月7日，太平军挥师西进，又攻占了贵池，于24日离开贵池。

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854年4月，太平军攻占并统治贵池后，开始改贵池县为桂池县，设立乡官，征收钱粮。太平天国的官制大体分朝内、军中、守土乡官三类。守土官以郡总制为最高，其次为州县监军，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六等。其职责：“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

1960年，在贵池马牙四岭水库出土的太平天国帅印，文曰：“太平天国中军桂池县左一营中营右旅帅”，就是属于地方守土乡官之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乡官师帅吴采频领太平军下乡搜索，地主团练将吴采频捉住，缚投水中淹死。其子赴省（安庆）求援，并引领太平军将龙舒河、梅村一带地主团练洗劫一空。是年，石门高地主团练立寨对抗太平军，拒不完粮交税。太平军发兵攻打，太平军从山背后小路攻入寨内，将地主团练全部杀光，以平其愤。据1994年《贵池县志》载：癸好三年11月22日，翼王石达开给贵池县合邑《训谕》，是太平军在安徽的第一个安民告示。以后，便在安徽各县相继安民，设置乡官，建立基层政权。1854年5月，太平军在贵池设官分职，令人民呈户口册。

由于太平天国在贵池建立了各级政权，为巩固根据地，贵池百姓踊跃参军。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六》记载：《太平天国前十三军在营贵池籍士兵花名册》就有：朱玲贵，年三十岁。安徽池州府贵池县池口人，癸好三年正月在大通入营；陈良银，年四十一岁。安徽池州府贵池县殷家汇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营；护殿

天福兼左拾贰承宣沅天燕兼左贰拾捌承宣翟第内兵册：二参军龚相馥，年二十六岁。系安徽省池州郡桂池县人氏，庚申十年在本地入营；战兵李得胜，年三十六岁。系安徽省池州郡桂池县人氏，己未九年七月在本地入营。又据1994年《贵池县志》记载：贵池人胡金祥（1833-1865）清咸丰四年（1854年）率贵池码头雇工30人投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编入国宗石镇仓部，他因熟悉池州、安庆等

地的地理环境，博闻强记，作战勇敢，投军两年后即升为裨将。咸丰六年（1856年），胡金祥的这支小部队被划归皖东全椒籍太平军将领汪海洋指挥，胡深受汪海洋的赏识，二人相处亲密无间。天京事变发生后，胡、汪随石达开部沿江东进，协助天王洪秀全讨平韦昌辉之乱。叛乱平定后，胡金祥因在军中受到猜忌和排挤，被迫从天京星夜出走，到芜湖金柱关大营，他广出告示，号召皖东、皖南、赣北等地太平军随其南下，开辟新地区。此时，汪海洋也举兵会合，二人率部自皖南转战至广西。咸丰十年（1860年），胡金祥和汪海洋脱离石达开部，自桂北万里回师，一直打到湖南道州地区，消灭清军和地方团练3000余人，清将双寿惊呼：“久闻汪海洋为悍贼，今接仗果不其然，其部将‘胡瞎子’尤为凶悍……”，又云：“‘胡瞎子’挥双刀乘马冲杀在前，……马到人到刀到，快若闪电，官军咸畏之”。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胡金祥紧随汪海洋部在浙西湖州边战边退。龙岩一战，胡金祥冲入清军阵地，杀死清将张运兰。战后，被升为朝将，兼左翼长。

同治四年（1865年），胡金祥在广东镇平山区与优势的清军作战，因火炮弹药用尽，兵败被俘，他拒不对清军总兵蒋益丰下跪，英勇就义。时年32岁。从上述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贵池人民追随太平军，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二、池州战役和河东大营的陷落

贵池扼安庆与天京间的咽喉要道，又是天京粮仓芜湖的屏障，在军事上极为重要。太平军占领贵池后，在李阳河拦江矶到荷叶洲

沿江筑营垒驻兵；在殷汇秋浦河东立大营；在池口架浮桥与乌沙地区相连。1855年至1860年，清军多次攻打驻守贵池的太平军，发生大小战斗数十次。咸丰六年，清水师总兵李德麟率军携带火炮攻下荷叶洲，以此为据点，攻打太平军沿江营垒。由于清军大炮威力较大，太平军水师战船大都被击沉，清军攻占了李阳河一带的太平军营垒。

1859年10月底池州（贵池）太平军守将韦志俊降清，并派遣部将刘官芳、古隆贤攻打芜湖的太平军，而刘官芳、古隆贤却联合驻青阳、铜陵的太平军杨辅清部回师贵池，与清军在流坡矶大战一个多月，打死清军千总、外委各一名。12月9日，杨辅清会集徽州、宁国大军2万余人，再攻池州，未攻下。20日，刘官芳等部，分为二队，一队阻挡清陆军，一队攻清水师。杨辅清率部围攻池州（贵池）府城。23日，杨、刘等联军在部分守军接应下攻入城内，夺回了池州（贵池）城，史称“池州战役”。1860年4月，清军切断驻安庆、桐城太平军与江南联系，从水陆两路进攻贵池。清水师总兵李成谋率优势水军攻占乌沙夹，焚毁池口秋浦河上的浮桥。韦志俊亦配合清军从石埭发兵，连下泥湾、灌口和殷汇镇，太平军退守河东大营。河东大营被围后，太平军分两路驰援，青阳太平军由陆路增援，为韦志俊部击退；池州太平军由水路增援，在乌沙夹一带为清军所阻。殷汇河东守军，孤军坚守20余日，因众寡悬殊，最后大营被攻破，承天福等137名太平军将士全部战死。1861年9月，贵池陷入清军之手。自公元1853年到1863年，太平军和清军在贵

池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由于组织完备，虽然有时太平军离去，而地方人民仍然效忠天朝，蓄发反清，数年不变。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贵池人民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斗志却永留史册。

第二节 戊戌维新运动对贵池的影响

1895年，清政府在战争中被日本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严重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逐步成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通过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空前的民族危机，并使自身获得更广阔的发展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早期改良思潮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变法维新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谭嗣同曾涉足贵池推动了贵池思想界和学界的思想变革。

1897年，谭嗣同于浏阳筹建煤矿，因建矿财力、人力不足，遂准备到上海求援，此时正在浏阳协助谭嗣同办矿的安徽籍著名画家黄宾虹的好友萧辰，适时地建议谭会见赞成变法图存共谋大业的黄宾虹。经书信约定，谭黄二人于当年秋分别自湖南浏阳、浙江金华来贵池城内会面。贵池光绪己丑科举人王源瀚（后任民国初国会议员），光绪辛卯科举人高炳麟（后任民国安徽省实业厅长），廪生章兆鸿（后任民国初国会议员）等各界人士迎接谭黄二人。谭嗣同与

黄宾虹等会见后，无时不谈变法维新：“不变化，无以利天下”。在谈到妇女缠足问题时谭嗣同说：“我年幼时看到先祖母和家母头重脚轻的悲怆样子，一直想哭！国要开关，女要放足，只要开关、足放，吾国不强自强”。一年后，谭嗣同虽饮恨都门，但他与黄宾虹的一夕恳谈，在拥护变法维新的贵池各界中，产生了极积的影响。

第三节 辛亥革命在贵池

一、池阳光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举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安徽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安徽巡抚朱家宝被迫与革命党人联络，接受省咨议局的建议，于11月9日宣告安徽独立，脱离清政府。

消息传到贵池，知县桂岩（旗籍）外逃，县自治公所所长胡子正邀集绅商学界开会，决定11月15日在县城悬挂白旗，宣告贵池光复；同时，由胡提议，并经各界认可，公举池州知府李永镇兼任贵池县知事。18日，成立贵池县临事参事会，胡子正被推选为会长。胡子正汇聚全县各界人士，配合县知事，设立府、县团防局，修缮四城门，接征赋税。是年11月29日，贵池县参事会改组为贵池县临时议会，在池州府中学堂办公，胡子正被推选为议长。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在南京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1月3日，胡子正以县临时议会议长

署衔，电贺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6日，县议员在胡子正议长率领下，带头剪去发辫，表示拥护共和的决心。1月7日，县各界在县议会隆重举行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和临时大总统就职大会。各机关，商店改挂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五色指汉、满、蒙、回、藏，寓中华民国五大民族合而为一，全中国统一）。2月12日，清帝退位。通电到贵池，各机关刊印传单并布告各保。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满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二、贵池人民反对黎宗岳的斗争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1911年11月8日安庆宣布独立。15日贵池宣告光复。原清军五十三标标统（团长）、九江都督马毓宝的行军参谋、东进先锋队将领黎宗岳（字坤甫，宿松人），在贵池光复前一天占领大通，擅自组织所谓“大通军政分府”，传檄皖南各府、县归其节制，把大通作为省“临时首府”，并以“安徽大都督”身份，于同年12月3日派人颁送池州府知府关防来贵池。第二天，皖省（安庆）统一维持机关处又派民政部长洪思亮（怀宁人）、委员唐绍傅（桐城人）颁送中华民国安徽贵池县知事之关防到达贵池，造成了安徽“两府”各踞一方的政治局面。

1911年12月3日，驻贵池黎军横行街市，枪杀无辜市民二人，并任意搜查民宅，强征赋税，勒饷索马，奸淫掳掠，县城行人戒途，夜无高枕。12月9日，黎宗岳途经贵池，在贵池高等小学堂召集地方官绅，以武力胁迫拥护大通军政府。其闻新任皖督孙毓筠自上海

西上就职，即在大通附近的长江东岸，倚仗有利地势，袭击护孙西上的淮上军东征先遣队王占一部，阻挠全省军令政令的统一，企图攫取皖督席位。1912年元月10日，黎宗岳派董经奎接任池州知府兼贵池知事。任命黎不为驻池司令官。囊括府属六县军政大权。后又卖官鬻爵，变更军政领导，使贵池全城慌乱，民无宁日。1912年元月31日，黎不调离贵池，将县高等小学堂抢动一空。继后驻池司令官郭伯伦又领兵捣毁了县临时议会，逮捕学生4人，刺伤工友1人，查封两家议员住宅等等。全县绅高忍无可忍，开展了反对黎宗岳的斗争，贵池各界民众怒不可遏，在临时议长胡子正等人支持下，通电全省，推举议员钱翰臣、王静甫向南京临时政府控告，要求平靖地方。得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

三、孙中山发布查究贵池小学损失各物令

贵池县高等小学堂创建于1906年。它是戊戌维新流血斗争的产物，是在废科举、兴新学中诞生的新型学校。1911年11月14日占领大通的黎宗岳部进驻贵池后，强占该校，赶走教职员工。1912年1月31日，黎宗岳派郭伯伦接替黎不为驻池司令官，黎部趁调访之机，把贵池高等小学堂价值2千多元的图书、仪器抢劫一空，门窗家具捣毁无余。事件发生后，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联合通电全省各州县，呼吁声援。池州六邑旅省人士在贵池人高文伯等人的倡议下，在安庆举行联合大会，会上以贵池小学堂被毁为题，列举了黎部在贵池的罪行。后又写成诉讼呈文，推荐方仲举、方友琴等六县代表数人，于1912年2月3日抵达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要求谒

见孙中山。同时将诉讼状分别呈送内务部和陆军部。2月4日，总统的文职秘书接见了池州代表。孙中山大总统悉心了解池州（贵池）发生的一切，又看了呈文，给安徽孙毓筠都督写了“临时大总统令”，并于2月10日以“临时政府公报”发表：“兹据贵池县小学堂呈报损失，请飭查办等因。查军兴以来，戎马云集，其间难免少数不肖军人，蹂躏文府，祸及图籍。然其咎虽在士卒之不守纪律，其责则不能不归诸将领之疏于约束。若不彻底究办，将何以维持秩序而保护教育，合就将原呈发交贵都督。仰即按照各节切实查明究办，以肃军纪。是为至要。此令。‘并将计发贵池小学堂呈报损失请予查办原呈一件’附之于后”（《孙中山全集》第二卷76页）。

安徽都督孙毓筠接令后即派吕希恒会同池州地方代表奔大通，规劝黎宗岳解散大通“分府”，撤出池州（贵池），回九江待命。并要求惩办捣毁贵池小学堂的肇事凶手，以平民愤，但遭黎拒绝。孙毓筠当即派旅长胡万泰率千名军队，冒雨顺江而下，登王家缺，取道池口，趁夜直捣贵池城，活捉了黎的爪牙胡蕴山，乘势进军大通。南京国民政府派驻军浦口的陆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统率水陆两路大军围攻大通和悦洲，并策动黎军内部官员胡聘臣作内应。黎军很快土崩瓦解，大部缴械投降，黎宗岳在混乱中化装逃走。史称“大通之役”。此役胜利后，捣毁贵池小学堂的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国。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安徽兴起，安徽省国会议员王源瀚（字涤斋，贵池马衙人）。

章兆鸿（字逵亭，贵池古塔村人），随反袁议员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柯剑霞（原名柯开云贵池峡川人），不仅率部进军皖南参加“倒袁之役”，后来他还进军津浦路南讨伐张勋。但安徽很快被袁世凯收买的胡万泰制造兵变，致使安徽二次革命失败。在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的掠夺和压迫下，贵池人民又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贵池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的革命情绪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燃，又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第三章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贵池的传播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贵池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贵池人民在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使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清王朝及封建军阀的斗争连续不断。但由于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和先进政党的组织领导，这些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必须要有一个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才能成功。正当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苦苦寻求革命出路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获得启示，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赞成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新文化运动对贵池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1904年3月，由陈独秀发起，房秩五、吴守一参加，在安庆（后移至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为新思想传播起了引导作用。该报以“救亡图存”、“开通民智”为宗旨，开宣传科学与民主之先河，向广大读者广泛介绍新知识、新思想。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思考，认为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

号，以求得“思想解放”。抨击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激励民众奋起斗争。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到了1917年，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安徽俗话报》在池州府及所属贵池等六县均设有代派处。《新青年》杂志也由贵池在外地者带入贵池，可见，《安徽俗话报》、《新青年》在贵池已经有了一批读者，并在贵池社会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二、贵池新式学堂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对贵池的社会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五四运动前，民主与科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开始为贵池人所接受并探索。一些知识分子即倾向于提倡实业，兴办教育，以改良“风俗政教”。他们反对科举教育，开始接受新思想。

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形势，于1901年明令废除八股。官办学堂不得不于1905年最终放弃科举制度下的教学内容。一时，民办、官办新式学校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同时，一个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的热潮也随之兴起。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贵池高等小学堂创立。1907年，池州府中学堂开办。公立、私立学校同时出现，这类学校大都是一些社会贤达个人或共同创办，并得到官方的部分资助。到了民国时期，学堂改称学校，废止读经、讲经课程，提倡男女平等男女均有受教育的权利。1918年贵池创立了女子小学。翌年，部分小学开始男女合校。1919年，在贵池县城，先后建省立六邑中学、贵池县初级中学、师范讲习所、省立蚕桑学校师范

科、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等。由于贵池各种新式学校相继创办，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思维的教师进入贵池各校，贵池各校的发展，使学生迅速增加，因而形成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大得多的知识分子群体。新式学校兴起，为宣传科学文化，开通民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贵池兴办的各类学校中所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有的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三、贵池各界响应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为反对中国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集合于天安门前，示威游行，提出拒绝和约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随后，示威的爱国学生在赵家楼胡同焚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还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学生还到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等。很快，五四风暴席卷全国。

消息传到贵池后，立即得到贵池各界群众的积极响应。首先得到贵池城内学生的积极响应，贵池蚕桑讲习所、安徽省立第七中学、安徽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师范附小、贵池高等小学等学校一致罢课。在县学生联合自治会的组织下，广大师生多次举行示威游行，随后逐步形成以青年学生为主力，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商人，一千多人参加的罢工、罢市、集会、游行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游行手

执小旗，上写“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标语，并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争回青岛”、“拒绝巴黎和约签字”等口号。沿途散发传单，情绪极为激昂悲愤。

五四运动爆发后，贵池受到芜湖、安庆等城市的影响。青年学生还开展了“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宣传活动。通过街头演讲、说唱、小快板等形式，在广大民众面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接着在县学生联合自治会的组织下，一部分青年学生在商店和码头进行搜查，发现日货，立即没收或者捣毁，使之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有一些唯利是图不顾民族大义的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对青年学生们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采取隐藏、私卖、销毁商标等手段，继续暗销日货。为了制止这些商人的行为，一部分学生学会了鉴别日货的本领，以买货为名，实际进行暗查。一旦发现日货，立即派人前往查封、销毁，充分表现了他们爱国热情。贵池已成为全国性革命运动锁链上的一个环节。

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下，被迫让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一消息传到贵池后，学生才恢复上课，工人和市民才陆续开工、开市。这一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在贵池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为后来贵池人民开展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发生后，在外地读书的一批贵池籍学生也积极加入声援五四运动的行列。当时，在安庆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胡养蒙，在

北京大学就读的王世鼎等不仅组织或参与了当地的学生运动，还回贵池帮助成立学联，组织学生运动，推动了贵池声援五四运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在贵池的传播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深入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继组成了革命团体，利用革命刊物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安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地区，与安庆隔江相望的贵池地区，受其影响很大。马克思主义在贵池的广泛传播，是以贵池一大批先进的知识青年为桥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从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贵池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其工人阶级也在迅速增加。其中以煤矿为主的产业工人达三千多人，成为贵池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五四运动爆发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贵池人民立即投身于这场革命洪流之中，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贵池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情绪更加高涨。他们率先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集会演讲，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由于社会各界人士逐步加入斗争行列，特别是煤矿产业工人的参加，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这些斗争的胜利是学生运动与工人、农民、商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为马克思主义在贵池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马克思主义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迅速在贵池大地上传播。其传播大体有五条渠道。

一是赴法、德留学的贵池学子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勤工俭学缘起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旅欧教育运动，从1919年3月17日起至1920年12月15日止，中国青年学生为学习西方民主和科学知识，先后有1500多名学生去法国进行半工半读。其中安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为43人，贵池籍学生董桂阳、王世鼎名在其中。董桂阳，又名董爽秋，出生于贵池马牙老屋董村。1920年成为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生。在留法期间，曾和朱德、徐冰等一起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1927年，董桂阳转赴德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翌年秋回国，曾秘密翻译马克思著作，通过乡人传入贵池。王世鼎，贵池县人。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1919年在北大毕业前夕，参加了五四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后获释。是年秋，王世鼎自费留学美国，获美国爱阿凡大学经济学士和华盛顿大学政治博士学位。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其后，还有一批贵池籍青年学子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热情踏上了留学之路。董希白，贵池马衙人，1929年保送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法科，在留学期间，曾参加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回国后，从事大学教育。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中大学、苏南公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后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包世杰，贵池马衙人。1929年公派到日本留学，取得学士学位。1935年回国，任教员。著有《宪法概要》。

抗日战争时期，拒绝与侵略贵池观前日军合作（任伪职），只身逃往贵池西南山区。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受到乡人称赞；姚介富，贵池姚村人。早年赴美求学，在美国新伦郭电气轮船公司潜水艇制造科和麻省波士顿理工大学机械科学习。回国后，在上海同杨俊生创办上海江南造船厂，为我国早期造船实业家；许传音，贵池九华街人。1903年，由基督教会保送至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深造，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金陵大学。1946年，以主要证人的身份，飞赴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控诉日本战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时所犯的滔天罪行；柯象峰，贵池郭西街人。1927年，留学法国，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兼校教务长，中国著名的人口学专家，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与我国著名社会学学者费孝通齐名，有“北费南柯”的赞语。

二是一批贵池籍早期团员革命活动对贵池社会的影响。1919年考入安徽第一师范学校（地点：安庆）的进步学生胡养蒙（贵池梅埂人），读书期间，参加并组织安庆学生声援北京五四运动。1921年春，就与王步文、许继慎、舒传贤参加了由蔡晓舟、刘著良在安庆怀宁县学官义务小学召开的安徽建团筹备会。同年四月，又参加了由蔡、刘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胡养蒙利用假期回乡之机，向同学和乡亲介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一些通俗的新书刊。1921年官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后又留学法国，继续学习政治法律。著有《罗马法》、

《民法通论》等书。抗日战争期间回皖，在皖南行政干部训练团任政治教官。

三是一批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贵池籍进步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在贵池的工人、农民和师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共产主义种子。贵池里山人凌霄在芜湖职业学校读书期间，即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故乡人民广泛接触，宣传救国救民真理——马克思主义。早期在贵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贵池籍青年还有1926年在广东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贵池人孙佐华；在武昌、汉口、北京等地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贵池人洪人英、洪久儒、吴绵江等。

四是通过创办刊物，介绍新书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由贵池第七中学学生刘恩选、王世琦及在外地读书的一些同学在贵池城内组成了“贵池学生同志会”等，出版小型刊物或会刊。1926年5月省立一师分校校刊创刊号《杏坛》出版。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贵池的省立第一乡村师范进步学生和教师，创办并公开发行不定期的刊物《嚶嚶》、《湖畔》，其中有共产党人参与，并聘请被人称之为“普罗文学家”的教师高莫适指导编辑。在贵池五职就读的李俊柏（中共党员），曾向在贵池县中就读的章难生介绍从芜湖输入的一些进步书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白沙的哀怨》（蒋光慈著）、《白话书信》（高语罕著）等。

五是进步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贵池建党前的进步学生会组织和建党时期的“CT”、“CP”，都把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

宗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除各自研究、宣传外，并举办公开演讲会，报告会。省立七师学生会会长洪久儒在演讲会上号召学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乡村师范校长沈子修曾邀请著名学者曹刍作过国际形势的报告，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等内容，报告唤起同学们反帝的觉悟。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贵池传播的逐步深入，传播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以及《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很早就被在芜湖就学的贵池籍学生争相阅读，尔后，这些书籍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贵池。进入贵池的革命书籍还有《唯物史观》、《社会进化论》、《黑猫》、《拓荒者》等。这些书籍唤醒了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热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传入，象一股春风吹醒了贵池民众，同时也为在贵池建立中国共产党贵池地方党组织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节 贵池群众运动的兴起

贵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并走向社会以后，特别是胡养蒙等个别早期团员的积极活动，以青年学生和教师为主导的群众运动开始在贵池兴起。贵池人民在声援安庆“六二”惨案、反贿选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上，风潮迭起，震撼皖省。

一、声援“六·二”学潮

1921年6月2日，安徽省会安庆爆发了一次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倪氏（嗣冲）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斗争。这天，安徽省学联组织一批学生到省议会请愿，遭到了反动军阀倪道烺、马联甲及其爪牙的血腥镇压，当场打伤学生四十多人。其中，安庆一师学生姜高琦重伤身亡。惨案发生后，安庆各校学生罢课，他们抬着姜高琦的血衣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安徽省教育会、教职员工联合会以及十余个团体组成“六·二惨案后援会”，通电全国。由于这场斗争发起于教育界，所以世称“六·二学潮”。正在安庆一师读书的贵池籍学生胡养蒙是“六·二学潮”的骨干之一，安庆学联派胡养蒙来贵池，得到贵池师生的积极响应。六月三日，贵池蚕桑讲习所、省立第七中学、贵池高等小学等学生三百多人举行了三天的罢课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军阀马联甲，惩办倪道烺”、“为姜高琦烈士报仇！”、“立即补发教育经费！”等口号。在这次斗争中，贵池省立七中校长欧阳孔锐（秋浦县人）因联名反对安徽省督军倪嗣冲、省长吕调元克扣教育经费而被撤职，更激起了贵池学界的愤怒。在“六·二惨案后援会”的领导下，贵池学界深入持久开展活动，有力地支持了安庆学界的斗争。由于全省人民的支持，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迫使安徽当局答应增加教育经费，由七十万元增至一百五十万元。同意教育经费独立，抚恤死难者家属及受伤学生。

二、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的斗争

1921年秋，把持安徽军政大权的军阀倪道烺、马联甲所操纵的

安徽省第二届省议会任期届满，即将举行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倪道烺、马联甲企图控制这次换届选举，他们出资一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通过“公益维持会”贿选出 108 名第三届省议会议员，逼迫省长聂宪藩下令召集第三届省议会会议。安徽教育界人士发动全省各界成立“安徽各公团澄清选举办事处”，进行抵制，并通过《评议报》宣传反对贿选。安徽学联还派学生利用暑假回各县调查选举舞弊情况。贵池在安庆就读的学生暑假回乡，调查军阀倪嗣冲控制下的安徽省第三届议会贿选情况，配合全省统一行动，向省司法机关起诉，迫使贿选议员垮台。同年 10 月，省长许世英根据北洋政府大理司的判决，宣布第三届省议会选举无效。斗争取得胜利。

三、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

曹锟原是直系军阀冯国璋的部下，卖土布出身，识字不多，但野心极大，是个愚昧专横、臭名昭著的人物。1923 年 6 月，他为了谋取总统宝座，竟然不惜用 5000 大洋一张选票的天价，收买国会议员 590 人，贿款共达 1350 多万元。于 10 月 5 日被选为大总统，并准备在 10 月 10 日正式就职。消息传出，全国哗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消息传到贵池，贵池城内各学校 and 各界人士，在五职校长操岱亭及各校校长、学生自治会和商会的主持下，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此时，城内一部分手工业工人也自发地参加了这一斗争。在历时三天游行示威中，约有二千多人参加，每人执彩色小旗或灯笼，上面写着：“反对曹锟贿选”等口号。青年学生还用纸和竹篾扎个大囚笼，里面放着曹锟的模拟像，抬着在大街上游

行。城内大街小巷贴满了“反对曹锟贿选”内容的标语。运动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以张佩峰为首的一小撮代表封建军阀利益的反动帮会，纠集一伙喽啰，企图阻止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准备用开水冲浇游行队伍。这一阴谋事先为工人们发觉，他们手执利斧为学生游行队伍开道，并一路高呼：“谁敢用开水冲浇游行队伍，我们就拆掉他家的房屋！”工人们英勇斗争的气概吓退了这伙帮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这次斗争的胜利坚定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决心，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

第四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贵池

第一节 中共党团员佐助国民党在贵池的发展

一、国民党左派贵池县党部成立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规定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各项原则。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开始，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合作后，安徽一些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春，中国国民党（左派）安徽临时党部在安庆邓家坡成立。后因军阀陈调元在安庆镇压革命，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被迫迁至上海，当年冬又迁至汉口联堡里，并在武昌黄土坡设立“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10月，贵池人洪久儒、朱岳尧、赵林杰等由龙兆云率领前往安庆办理证件后，即赴汉口经光明甫、沈子修、章伯钧等介绍，入校训练。在校期间，他们听取了恽代英、董必武、李达等讲授的共产主义教育课程，参加了1927年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洪久儒并由教官曹钧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贵池，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通过国民党贵池县左派党部的建立及其开展的活动来完成的。贵池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成立较早，但没有公开活动过。直到1927年春季，北伐军第六军程潜部队到

达贵池，始将贵池左派县党部正式挂牌，公开地组织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25年初，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安庆市党部成立，他们及时分赴安徽各县，开展组建国民党县级机构。当时在安庆一师担任老师的黄梦飞（1895-1969年，字树人，安徽绩溪人。1921年任安庆《安徽通俗教育报》总编辑。1926年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国民党中央指派为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后参加南昌起义。建国后曾担任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工商联副主委等职务）是负责皖南各县活动的负责人。贵池籍在安庆工业学校读书的学生龙兆云，思想较为进步，与黄梦飞相处甚为密切，黄即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派到贵池工作。龙兆云利用寒暑假回贵池的机会，与思想较为进步的青年学生纪裕迪、翟长林等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1926年3月中旬在安庆市党部帮助下，国民党贵池县党部（左派）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筹备委员会指派龙兆云、姜良楷、刘昧章、刘仲农、毕国斌、韩次瑜6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于3月中旬，在贵池城内火神庙召开新老国民党员30余人参加了会议，正式成立国民党贵池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下设经济、文书、事务三个股。这标志着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由工人、农民、城镇工商业者共同建立的贵池县革命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27年初，北伐军第六军挺进贵池，在第六军政治部的指导下，国民党（左派）贵池县党部正式成立，党部先设在牌坊街，后迁至

郭西街原县水电局旧址，确定翟长林、朱岳尧、纪裕迪、毕国斌、刘味辛、刘剑冰（女）为县党部成员，龙兆云为指导员。

县党部成立党务委员会。设常务委员 1 人，处理日常事务，由委员纪裕迪担任；秘书 1 人，由吴发祥担任；监察委员 1 人，由翟长林担任。设立七个部：组织部（部长毕国斌）；宣传部（部长汤昌永）；工人部（部长黄耀昆）；农民部（部长刘味辛）；商人部（部长潘钟春）；青年部（部长郎少凤）；妇女部（部长刘剑冰）。除此以外，省党部还派经常往来贵池的武汉干校贵池籍的洪久儒、朱岳尧二人协助工作。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党部下面还成立了群团组织。工会：负责人黄子贞；农会：负责人彭锦璋；商会：负责人方俭停；学生会：负责人王少明；妇女会：负责人方美英。

二、贵池人民声援五卅运动

1925 年初，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殴打和无理开除工人，并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5 月 15 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竟然枪杀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事发后，中共中央当晚召开会议，号召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展开大规模的反帝斗争。5 月 30 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 2 千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马路上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游行中 100 多人被捕并被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数千群众赶到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竟突然开枪，打死学生 5 人、市民 11 人，重伤 10 人，被捕 40 余人，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暴行点燃了国

人郁积多年的怒火，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飚迅速席卷全国。

1926年6月起，贵池人民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发动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场斗争涉及面之广，参与者之多，规模声势之大，在贵池历史上是空前的。首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贵池省立五职、高级中学、高等小学和县通俗教育局等单位于六月初组织了四百多名学生罢课五天，上街游行，他们手执小白旗，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同胞顾正红报仇”；“打倒英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收回上海所有租界”。他们还将五卅惨案的真相编成话剧，在街头演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接着，商人罢市，声讨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同时，成立贵池“对日外交后援会”。后援会由省立五职发起贵池各界人士组成，设总务、文书、交际、庶务、会计、调查、登记、省核、宣传、编辑等十股。在后援会的统一领导下，运动很快由自发到有组织的统一行动。宣传股组织了六个宣传大队：第一队五职，出发东乡；第二队初中，出发西北乡；第三队附小，出发西一乡；第四队一高，出发东南乡；第五队平民，出发南乡；第六队女校，在城内附近。以上均演讲五卅惨案的真相，以唤起民众。商会每日派十六人参加调查股，严防日货进口。声援五卅，抵制洋货，不久市场上的洋货几乎绝迹。第三，开展对日外交后援会的活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贵池对日外交后援会发表了反帝宣言，出版了“时事简报”，宣言最后商定的口号是：“一，打倒破坏东亚和平的日本帝国主义；二，反日的精神要热烈，反日的

手段要和平；三，实现对日的经济绝交；四，抵制日货，坚持到底；五，一致为国民政府向日交涉的后盾；六，要求国民政府向日严重交涉，一面继续北伐，完成国民革命；七，誓死为济南死难同胞复仇；八，对日外交胜利万岁。”并由后援会发起成立了“救济上海工人及其家属的捐献站”，各界人民积极响应，捐款四千万元汇上海总机关，救济在五卅运动中的死难家属。五卅运动向贵池人民宣传了反帝爱国思想，唤醒了人们的觉悟，坚定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决心。

三、贵池县代表出席国民党左派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3月初，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随北伐军迁回安庆。3月6日决定3月22日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国民党（左派）贵池县党部于1927年3月18日接到安徽省党部从安庆发来的急电，谓须从速选定出席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赴安庆参加大会。县党部随即召开了紧急会议，选定毕国斌、翟长林、刘剑冰三人为出席安徽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于当晚出发，水陆兼程，次日一早到达安庆向大会报到。三位代表住进省党部对面的宣城旅馆。3月22日，贵池县代表刘剑冰、毕国斌、翟长林参加了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由于蒋介石从九江来安庆后，提出一些要求致使代表大会临时休会。

蒋介石于21日到安庆，强令国民党左派同投机革命的军阀陈调元妥协，并同国民党右派合作成立省党部。遭到国民党左派临时安徽省党部的拒绝。3月23日，在蒋介石的纵容和支持下，其特务

处长杨虎与劣绅潘怡然等收买一批流氓，打着“鲁班阁”伪总工会的招牌，伙同西山会议派、安福系余孽等反动分子，捣毁了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等机关。欧打省党部职员及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当日晚，左派省党部主要负责人在城外秘密开会，起草通电，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暴行。事后，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和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这就是历史上的“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出席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贵池代表翟长林在驻地遭到流氓袭击，幸得旅馆好心工友说翟长林是住旅馆的生意人，方才解脱。翟后见省党部一带戒严，毕国斌、刘剑冰又无处打听，认为代表大会不可能再开，只身绕道乘小船回到贵池。刘剑冰代表3月23日早晨去省党部拜会旧友严子静（省党部工作人员），哪知这一去，竟遇流氓正在捣毁省党部，她被击成重伤还被剥去上衣，押上大街游行。严子静也同时被捕。二人经郭沫若的出面斡旋，才被解救。后国民党省一大会议被迫移往武汉继续召开。刘剑冰、毕国斌参加了会议。会后成立了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任执行、监察委员的正式安徽省党部。

四、国民党左派贵池县党部被捣毁

继“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布所谓“清党”。4月18日安庆国民党右派勾结地方军阀、流氓恶棍以庆祝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为名，大肆搜捕

屠杀革命分子，龙兆云在大渡口被捕。贵池以张佩峰为首的反动势力造谣攻击县党部，说县党部有共产党。因此，第十军王天培部队到达贵池时，解散了左派县党部，逮捕了工作人员。洪久儒、汤昌永、胡宪文出走。左派党部解散。革命统一战线破裂。

1927年7月13日，国民党（右派）安徽省党部派宋本、吴必德、胡衍、梅少春、孙子湘等组建国民党贵池县改组委员会。一时间徐传友、胡萃九反动势力等又趁机活跃起来，他们向人民反攻倒算，搜捕革命者。还有一些投机革命的人也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致使当时的贵池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第二节 北伐军进抵贵池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开展

一、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挺进贵池

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9日在广州兴师北伐，其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至11月初便打垮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和江西。在攻克武汉、南昌后，分三路继续北伐，中路军沿长江东进，其中由程潜为总指挥，林伯渠、李富春分任政治部主任的第六军和第二军作为主力组成江右军，集中于九江、祁门一带沿长江南岸东进，直指南京。

1927年2月间，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北伐第六军从江西推进到安徽。大军即将挺进贵池的消息，传到

贵池城内。贵池县国民党左派临时党部在北伐军踏上贵池县境时，特推选毕国斌、翟长林两人前往距县城 60 里的殷汇镇迎接。北伐军到达殷汇镇时，当晚露宿殷汇镇外毛屋街，未进殷汇镇街区。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百姓称赞。先头部队到达贵池之日，贵池城内张灯结彩，各大小机关还派出了三十多位代表，连同一百多名学生，五六百名市民一齐集中在西门外夹道欢迎北伐军第六军十七师（师长杨杰）的到来。不久，贵池县在桃花山召开由数千群众参加欢迎北伐军大会。在欢迎大会上林伯渠主任讲了话。北伐军进驻贵池期间宿营于各学校、各庙宇、各祠堂、各机关、各公所等处。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林伯渠率政治部人员进驻贵池省立第八中学。未进街上百姓家。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部队纪律严明，不扰百姓，“百姓惊叹为仅见”。

二、贵池人民积极支持北伐

北伐军节节胜利，激励贵池一批热血青年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当 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在广州出师北伐后，贵池一些青年在外地或本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共产党员贵池人凌霄、中山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贵池人孙佐华在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

贵池五职学校方国华等七名职工于 1927 年加入北伐军，方国华被编入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方国华将军 1983 年 4 月 13 日写的回忆录记载：“北伐军到贵池时，只记得有一次开群众大会，批斗县长。会上有共产党代表（姓耿）讲话。他的讲话对我影响很

深，教育很大，（我）懂得了穷人要翻身求解放，只有拿起武器闹革命。于是我就暗暗的串联人去投北伐军找党代表，两天时间我们联合了七个人（其中一个叫余子宽，其他人名忘记了），费了很大事，追到了安庆，部队又开走了，走了差不多快一个月，追到芜湖太平府找到耿代表，这时才知道，这个部队是江右军第三军。就这样我开始了革命生涯”。“大革命时期，贵池乌沙人纪澹诚在安庆参加第六军王天培部北伐军，任少将参谋长随军北伐”（《贵池县志》）。

在革命风暴的影响下，贵池一些地方的群众武装自发地投入袭击军阀（孙传芳部），打击土豪的斗争行列。1927年3月，东流人朱富润与八位好友在东至檀村胡家庙，歃血结盟，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于年底在朱家村起义，打起“天下第一军”的旗帜，提出“铲富济贫，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朱部为穷人掌腰，将白荡湖交给穷人管理。1927年3月，正是北伐军兴起时，这支队伍从东流境内向贵池境内殷汇镇进军。打下殷汇镇时，轰动安庆省城。富绅大贾闻风丧胆，相继潜逃，一时威震四方。进入殷汇地区后，直接打击当地的地主豪绅，继而向祁门徽州方向进军。他们沿途向群众宣传“条牛担种家里晒，平头百姓不过问；穷哥儿们不好混，就跟着我朱富润；要想儿孙不吃苦，快来拥护朱老五；贪官污吏定杀掉，土豪劣绅决不饶。”因此得到群众响应。这些自发的地方武装的斗争，有力地配合北伐军的行动，策应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三、北伐军帮助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开展工作

北伐军帮助国民党贵池县左派党部开展工作。1927年2月间，北伐军江右军程潜第六军进入贵池，帮助建立了贵池国民党左派临时党部。北伐军第六军进驻贵池的晚上，即在赵家大楼（今人武部旁边）召开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大会，会议由政治部秘书长李世璋（李系中共党员）主持。到会的有信奉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龙兆云组织的左派；有叶衡山等人组织的西山会议派；有刘恩选上海法政大学组织的一派；另有在四乡局挂着国民党党部牌子的孙子相等。李世璋指责了西山会议派，要他们今后必须服从左派的领导，不得自行其事。又指出刘恩选等人应与左派合作。同时宣布龙兆云为首的国民党贵池县党部是合法的。第二天，以纪裕迪为首的贵池县党部正式成立。

解散“五十四人团”和“自由职业会”。赵家楼会议后，国民党贵池西山会议派深感恐惧，自行解散。但是伪装积极，企图打入左派实为右派的俞根石、王士琦等人对龙兆云左派掌权心怀不满，企图成立新的县党部，以便取代左派。因此，他们拼凑帮底，组织所谓“五十四人团”。此外还有以张佩峰、方福堂、姜良楷等为首的地方劣绅及流氓商人也组织了所谓“自由职业会”。这些人表面上不敢公开反对左派县党部，但背地里则千方百计地进行捣乱，从事破坏活动。并散布“要斗争27家半土豪”的谣言，妄图拉拢一些人反对左派。为此，北伐军政治部强令将这两个组织的名册交给贵池左派县党部。并立即解散了“五十四人团”和“自由职业会”。巩固了左派县党部的地位。第六军离开贵池时，留下安徽省党部的

随军代表朱子帆、纽玉书，帮助贵池左派县党部开展工作。

斗争国民党右派县长徐传友。当时贵池的县长叫徐传友，表面上信佛，实际是反动军阀的走狗。他同地方的土豪劣绅相勾结，老百姓十分痛恨他。因此，北伐军一到贵池，就有无数的状纸送到六军政治部，政治部接受了百姓的要求，在桃花山欢迎北伐军的大会上斗争了反动县长徐传友。到会的群众有一千多人。首先由政治部宣布了徐传友的罪状，接着由龙兆云代表国民党县党部发表演说，号召贵池人民，将打倒北洋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次会议申张了正义，大长了人民的革命志气。由于当时左派缺乏斗争经验，被徐传友预先布置的爪牙扰乱了会场秩序，以致不得不提前结束。大会结束后，徐被押送至北伐军政治部听候处理。

四、国民革命运动在贵池蓬勃兴起

1927年上半年，在北伐军第六军政治部的支持下，国民党左派贵池县党部成立后，领导和建立了工会、农协、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组织，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兴起。

“1927年2、3月间，国民党安徽省左派临时党部遂选派了桐城、贵池、安庆等地的二十四名青年，前往毛泽东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3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同年3月8日，薛卓汉以省党部农民部长的身份在安庆召集各县农运代表，举行“安徽省农民协会筹备会”成立大会。贵池有代表参加。该会成立后，贵池亦成立了农民协会，由苗圃一主任担任负责人。当时贵池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是在省农协的统一领导下，根据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一月）进行。在政治上“引导农民，使之成为有组织之民众，以参加国民革命”，“排除妨碍农民利益之军阀、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等”；在经济上“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减少雇农作工时间，增加雇农工资”，“取消苛税杂捐及额外征收”等；在教育上“厉行农村义务教育，及补习教育”等。贵池梅埂人胡萃九利用反动官僚势力，依仗其弟胡仲山早年参加反动军阀倪道烺组织的“公益维持会”，二十年代初当上了安徽省参议员并兼任贵池省立第七中学校长的权势，在贵池称霸一方。1924年，他伙同王静甫等士绅以圈大同圩为名，强占农民土地。圩堤圈成后，自任大同圩公司经理。向农民强行收取所谓地佃金，趁机中饱私囊。还将搜括来的钱财，在贵池城内牌坊街强占地盘建造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大楼，人称胡家大洋房。早年开发大同圩的江北移民江应魁、吴有德、施开顾等人的土地被胡萃九强占，于是他们成立新公司与胡对抗，并联名向各级官府告状。胡萃九对此恼羞成怒，纠集地痞流氓组成圩务警察队，土匪钱华为圩警队长，捣毁了江应魁新公司，枪杀了农民王在强。农民的抗争被镇压下去。1927年初，在北伐军的支持下，农民协会组织农友们查封了胡的房屋，清理了胡家的财产，分掉了胡家的粮食。农会在贵池县左派党部和北伐军政治部的支持下，在桃花山开大会，斗争恶霸地主胡萃九，使胡萃九威风扫地，有力地打击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斗志。贵池农民运动迅速扩张到

四乡，使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当年六月，国民党右派陈世奇惊呼：

“街谈巷议谓共产党复活，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实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1927年3月中旬，安徽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后，即派员赴各地帮助建立工会。工会制定了章程，其要点为：1、保证工友起码三年内不得无故停工；2、保证工友不受东家欺侮；3、保证工友一律增加工资；4、保证工友生灾害病不扣工资；5、保证工人婚丧事由东家辅助费用；6、保障学徒两年内拿到工资；7、每年所得的利润，工友提成分红；8、每月初一、十五发工友两斤猪肉，不得以油条代替；9、保障工友、学徒不受东家毒打；10、保障学徒进店不请投师酒。贵池县总工会在左派县党部和北伐军政治部领导下开始公开活动。工会负责人为黄子桢（漆匠）、龙老五（即龙兆云的哥哥）、陈文思（木工）等，成员约百人。当时，一些劣绅妄想混入国民党贵池县党部，窃取领导权，为达此目的，纠集一伙地痞流氓兴风作浪，冲击左派县党部，工人们闻讯携带器械保护左派县党部，声称谁敢冲击县党部，就叫他头破血流，吓得土豪劣绅不敢妄动。工会领导工友同东家谈判协商，落实“省工会制定的章程”，保护工友的利益。还发动工人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不法劣绅胡某将旧北街到天主教堂一段空场四周砌起高墙，据为己有。工会有组织有计划分段将围墙拆除，将地面让出作盖民房之用。在工会领导下，贵池工人运动从城内向馒头山工矿区发展。

北伐军的到来，池州的妇女运动也进入高潮。2月下旬，贵池

县妇女协会成立。负责人刘筱秋。国民党贵池左派党部分工由刘剑冰领导妇协工作。刘剑冰，就读上海大学期间，接触到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一批共产党人，受到革命的熏陶。她和上海大学师生一起参加了五卅运动，受到了锻炼。1926年冬，上海大学放寒假，刘剑冰回到贵池，参加了由龙兆云发起的国民党左派党部，任委员兼妇女部长。北伐时期领导了贵池妇女运动。贵池妇协经常开会，对妇女进行宣传，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鼓励妇女放足，提倡女权运动；有时还组织妇女参加游行和集会，这对当时妇女思想解放有一定的影响。

北伐军到贵池后，在国民党贵池县左派党部和北伐军第六军政治部李世璋秘书长的领导和支持下，于1927年春成立了贵池县学生联合会。学生会主席兼总务部长：王少明，组织部长：李祖印，宣传部长：谭传福，工农部长：严云梯，委员由吴典经、方杰、胡畏等人组成。学生会成立后，组织青年学生欢迎北伐军挺进贵池，参加桃花山对贵池县反动县长徐传友的斗争，支持农协、工会斗争土豪劣绅胡萃九。同时还领导了市民驱赶县长王寿乐的斗争。一天，警察局长朱炳坤不知为何事与群众闹起来了，朝天放枪，威胁群众，市面动荡引起群众憎恨。群众纷纷上县府要求县长王寿乐将朱炳坤撤职。然而，朱不但未被撤职，反而对群众更凶。学生会闻讯后带了数百名群众到县府向县长请愿，县长用武力关门，不予理睬，致使学生十分气愤。为此，在学生会的推动下，贵池各界人士罢市，贴出“王不出城，店不开门”的标语，并上书第八行政公署，致使

县长王寿乐离开贵池。

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顺乎潮流，合乎民意。国共合作期间，贵池国民党左派组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群众运动蓬勃开展，推翻了封建军阀在贵池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贵池城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致使全国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安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通缉、追捕，左派国民党各级党部被解散。贵池“清党”之后，国民党左派党部被改组，工会和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被解散。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屠杀，并通令禁止人民集会、请愿、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剥夺人民一切民主自由权利。同时国民党还实行“连保连坐法”，加强城乡统治。大革命的失败使贵池又处于国民党右派政权统治之下，人民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共产党从失败的痛苦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重新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土地革命的道路。

第 二 编
土 地 革 命 时 期
(1927.8—1937.7)

第五章 中共贵池地方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加上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全国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法西斯政权，对内压迫、剥削人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无数共产党人被捕，惨遭杀害，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使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自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之后，共产党又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等。其中对贵池发生直接影响的是方志敏领导的江西弋横起义和中共潜山县委领导的请水寨暴动。同时宣城、芜湖、上海等地的党组织也派来共产党员，到贵池播撒革命火种。特别指出的是，1928年春，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凌霄由于身份暴露，奉命从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回到家乡贵池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利用亲戚关系，先后联络从京、沪、汉等回乡在县初级中学任教的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知识青年，鼓励他们革命到底，

并历经艰难，终于寻找到党组织——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受命在贵池发展党的组织，点燃了贵池熊熊的革命烈火。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贵池建立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过去旧军阀的统治，其性质完全一样。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白色恐怖。国民党贵池县政府成立后，建立了联保制度。贵池县长王漱六，十分反动，专门欺压百姓，随意抓捕民众。此时，贵池地方势力也十分强大：一派是以国民党县党部朱明勋为代表的青帮派；一派是以地方士绅丁西斋为代表的老一派。这两股势力同国民党政府勾结起来，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力，使贵池人民处在白色恐怖中。

第一节 贵池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一、贵池早期共产党人及其革命活动

在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贵池在外地求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积极投身于当时的学生运动。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些在外地求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贵池籍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为以后贵池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

贵池里山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凌霄，1920 年考入由安徽早期共产党人高语罕、刘希平为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在芜湖商界的支持下

创办的工读学校。学校设在赭山脚下，学校不收学膳费，半工半读。学习期间，青年教师利用上课和晚上时间，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以提高其觉悟。当时，新文化运动在芜湖已广泛传播，各种书刊和社团相继出现，凌霄深受影响，积极参加了在芜湖兴起的学生运动，较早地接触了早期在芜湖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高语罕、卢仲农、刘希平等。通过阅读进步刊物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思想认识大大提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党派凌霄去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学习，同时到广州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于1928年2月奉命回到故乡贵池开展革命活动。

贵池牌楼人孙佐华，1926年10月在广东大学（后为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由黄冲伯、凌霄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加入北伐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离了党组织，从广州回到贵池经商。1928年春，在凌霄同志不懈的宣传、鼓励下，又点燃孙佐华的革命热情。6月，孙佐华同凌霄一起去安庆找到了中共怀宁中心县委。其负责人耿成、刘柏枝、焦竹青接见了他们，并指示他们回贵池后尽快“开荒”，发展党的组织。并确立以县立初级中学为基础，首先在县立初级中学发展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教师入党，并以此为基础开展革命活动的思路。

贵池里山人洪人英，早年就读于武昌大学，1927年5月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辍学回贵池任教。在凌霄“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宣传鼓动下，1928年初冬在贵池县立初级中学参加党的组织

——直属小组。并进行革命活动。

贵池马衙童铺人刘恩选，1927年在上海法政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贵池并在城内任教。1928年冬，成为中共贵池直属组织成员。积极组织贵池县中的倒胡（胡珩）拥俞（俞根石）学潮。

贵池桃坡乌石人吴绵江，在北京平民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乡并在贵池城内任教。1928年冬，成为中共贵池直属组织成员。

贵池流坡矶人洪久儒，1926年10月经周新民、光明甫、沈子修、章伯钧介绍进入汉口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左派）党务训练班。在学习期间聆听恽代英、董必武、李达等讲授的共产主义理论。并经曹钧、郭诚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洪久儒奉命返皖与龙兆云秘密组建国民党贵池县左派党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贵池白沙铺小学任教，后创办了贵池流坡矶小学。在凌霄的宣传启发下，积极投身革命。1928年冬，中共贵池特支成立大会就在他创办的流坡矶小学举行的。

凌霄以他炽热的革命热情，坚定的信仰，联络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返回贵池的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为组建贵池地方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二、中共贵池特支成立及凌霄的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以后，安庆陷入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统治之下，他们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庆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

党员暂时分散隐蔽，革命处于低潮。1927年8月，坚持在安庆斗争的周新民、姚佐元、葛文宗等二十多个党员又恢复了一个党支部，接着，又将支部改为区委。9月，中共安徽临委派王步文来安庆，把区委扩大为怀宁临时县委。开始由王步文兼任书记，后由葛文宗担任书记。领导安庆、桐城、潜山、太湖、庐江一带党的斗争。当时县委机关设在安庆太平寺十一号（今太平寺街十九号）。

9月，王步文向县委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作出了夺取敌人武器，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的决定。会后，王步文回到家乡潜山响肠、衙前等地和王效亭一起组织农民斗争。发展组织。1928年5月，中共怀宁临时县委改为怀宁中心县委。

凌霄回贵池后，常到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贵池县立初级中学，利用关系在县立初级中学立住了脚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讲革命道理，同县中、贵池城内的省立第五职业学校青年教师广泛建立了联系。1928年6、7月间，凌霄、孙佐华同赴安庆，几经辗转，终于与中共怀宁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1928年冬，根据怀宁中心县委关于在贵池建党的指示，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流坡矶（今属江口流坡村）洪久儒创办的小学内成立了中共贵池特支。书记凌霄（后为孙佐华），副书记孙佐华，委员洪人英，组织、宣传委员分别由凌霄、洪人英兼。参加中共贵池特支成立大会的还有刘恩选、吴锦江、洪久儒等。特支始属怀宁中心县委，1929年6月以后隶属中共安庆中心县委。中共贵池特支是贵池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从此，在中共贵池特支的领导下，在贵池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正当凌霄领导贵池人民广泛开展革命斗争的时候，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30年2月，凌霄同志受安庆中心县委派遣，化名严宽，前往潜山参加清水寨起义。

1929年11月，中共潜山县委决定在农运基础较好的天堂地区组织农民暴动，由王效亭任总指挥。12月份农协会员纷纷拿起武器，成立持枪小组，组建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积极准备暴动。1930年1月29日（农历除夕）中共响肠支部书记储翰平等3人被县反动自卫团捕杀，已经暴露革命身份的人员被迫到清水寨深山老林中隐蔽，上寨人数很快达千余。为避免泄露起义计划，王效亭决定提前举行暴动。2月4日，各地领导人以串亲拜年的形式赶往清水寨，宣布暴动。将原组织的秘密武装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后为红三十四师），王效亭为师长，陈履谦任政委，凌霄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数日内建立了一支有统一番号的700余人的正规部队和2000余人的游击队、赤卫队。先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30余次；开辟了以天堂寨为中心约1500平方公里，人口15万的革命根据地。对巩固、扩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

身为副师长兼参谋长的凌霄，积极协助王效亭同志组建部队，制订作战计划，不久，取得了水吼岭战斗的胜利。接着同兄弟部队一道，先后攻破英山、霍山，在战斗中，凌霄亲自上战场冲锋陷阵，迭摧强敌。这一连串的胜利也未能改变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丢失根据地的失败。在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下，安庆中心县委错误地认为：全国革命有日益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安庆居于长江中

游，是保障争取以武汉为中心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提。为了与全国革命形势相配合，提出潜山等县扩大游击战争，加紧发动城市工人斗争，并把工人斗争、士兵斗争和农民的武装斗争相结合，首先夺取一个和几个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向安庆方向发展。在这种冒险计划指导下，潜山县委提出了“先打梅城，后打安庆，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于是集中红军主力攻打潜山县城，久攻不下，损失惨重。1930年7月红三十四师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根据地丢失。王效亭率主力前往湖北，凌霄率领近百名战士化整为零，分赴皖南各县，开辟新区。不久，凌霄同志回到贵池，任中共贵池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开始了新的斗争。

三、首届中共贵池县委成立及成立前后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中共贵池县委是在贵池特支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中共贵池特支成立后，决定迅速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动员和教育群众，开展工、农、学、兵运动，并逐步创建革命武装。将中共特支直属小组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城关、白洋、梅埂、馒头山等地区，革命活动亦日趋激烈。1930年8月，经安庆中心县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共贵池县委，书记洪仁英，委员孙佐华、凌霄、刘恩选、周孔思、洪久儒、农时。县委工作机构及人员分工：组织孙佐华，武装凌霄，宣传刘恩选，青年周孔思，工运洪久儒、农运农时。机关（秘密）设在县城大井头屠宰税务所。同时确立四个活动区域负责人。城关区：周孔思负责；馒头山区：洪久儒负责；白洋区：农时负责；梅埂区：胡宪友负责。贵池城区及

周边的革命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1930年前后，贵池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工业极为落后，工人人数也极少。城内仅有手工业者、搬运工人以及馒头山煤矿矿工。生产方式落后，搬运工人肩挑背驮，所得报酬少得可怜，如从池口或齐山等地运往城内，稻谷每担仅一分钱工钱。煤矿工人挖煤用的是原始工具，大工每月工钱12.5元，小工每月9元。矿井条件差，工人的生命得不到保证。工资每年只逢春节、中秋、端午才予发放，加上工头贪污，资方盘剥，工人生活十分贫困。中共贵池县委成立后，决定扩大工人运动并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是以谈心的方式提高工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罢工，同资本家作坚决斗争。由于城内工人大都是手工业者和搬运工，人员较分散，因此党组织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馒头山煤矿。

馒头山煤矿位于贵池县东北部，现属江口境内。有协记、六合、裕记、民生四大公司，是贵池唯一的工业区。每个公司设有总办一人，矿司二人，监工三人，大工头三人，小工头九人。工人共有一千余人，居住较集中。党组织确定馒头山为工运区，并指定家靠近馒头山煤矿的洪久儒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煤矿中多数工人子女在他的小学读书。洪久儒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多次以教师身份进行家访，围绕矿工劳动强度大，生活待遇差的现实同工人进行谈心活动。进而分析资本家为何不劳而获，工人们累死累活为何得不到温饱，以启发工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经过多次宣传和教育，工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受苦受累的根源是什么，认识到自己才是矿山真正的主人，

工矿的主权应该属于工人自己。要改善目前非人的劳动条件，提高生活待遇，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1930年2月，在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日趋强烈之时，凌霄、孙佐华同洪久儒一道再次来到矿区，进一步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向工人明确指出：要增加工资光靠口头要求是不行的，只有团结全矿工人实行罢工，跟资本家作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们列举了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的事例，以增强工人们斗争必胜的信心。几天后，协记、六合两大煤矿约900余名工人在党的号召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六合煤矿的熊天喜、何金祥在罢工前秘密召开工人会议，决定向总办和矿司要求每月增加工资2元，不答应第二天就罢工，并向大家宣传：“我们每月给资本家争一千多元，而他只给我们这一点”。协记煤矿领导这次罢工的是胡季康，胡季康是一个爱憎分明、打抱不平的人，深得工人们的信任。这次罢工明确提出了：（一）缩短工作时间。即由每天12小时减到8小时（实行三八制）。（二）改善生活待遇，由每月12.5元提高到15元。由每节（五月节、八月节、年节）发工资改为每月发工资。工人们不怕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罢工进行了三天三夜，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们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运动是在党的影响下，由工人自动组织起来的。通过斗争，工人们认识到了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党在工人中的威望也得到了提高。接着洪久儒在六合、协记矿区工人中建立起工会。

中共贵池特支领导的农民运动首先是发动和组织民生圩佃农抗租反霸斗争。民国初，贵池劣绅丁梦松（前清举人，做过几任知县）、吴畏民（法官）、陈国栋（讼棍）等勾结官府，打着“开辟地利以裕民生”的旗号在池口对岸白沙洲、小矾头这片土地圈筑圩堤，号“民生圩”。丁梦松等人用欺骗和暴力夺取了原在白沙洲、小矾头农民的土地，激起了圩内农民的不满和愤恨。1929年暑假，时在安庆读书的进步学生胡达生来到民生圩串连，支持深受丁梦松压迫的胡立矩、章得义、胡满良、唐玉贵、汪润田等一批佃农进行抗租。同时，胡达生、胡立矩等还到安庆省府请愿，控诉丁梦松的不法行为。省政府虽派员到贵池调查，但处理意见迟迟不下。秋收将至，丁梦松又要勾结县府组织武装收租。胡达生、胡立矩一时无计，就找到他的本家胡宪文，胡宪文推荐正在贵池进行革命活动的同乡、中共党员凌霄（化名林萧雨）到民生圩协助工作。凌霄因势利导，发动和组织贵池民生圩千余佃农，于旧历九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示威活动，游行人员手执红旗，高呼“要求政府实行减租政策”、“全免历年欠租”、“要求政府严惩丁梦松”等口号，游行队伍途经丁梦松住宅，挺进县府，绕城一周。与此同时，凌霄还深入民生圩佃户中，训练青年拳术并组织起一支一百多人抗租行动队。当丁梦松派遣总会计刘六，率枪兵队到民生圩公司包围胡立矩的住宅，强迫交租时，早有准备的抗租行动队在凌霄的指挥下，迅速包围了征租枪兵队，在短兵相接中，击退了枪兵队。将丁梦松的爪牙刘六捆绑起来。通过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历年欠租全免”、“当

年二五减租”、“圩内副业收入东佃分享”。

党组织开展以白洋为中心的农民运动。1929年下半年，凌霄和刘金山以走亲戚的形式，来到白洋镇吴金生（吴系凌霄舅父）家，以白洋镇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凌霄、农时、刘金山利用同农民亲戚、朋友的关系，深入乡村，秘密串连，和农民兄弟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在农民群众中宣传土地革命的思想，在劳动中宣传革命道理，分析农民贫穷的原因，揭露地主发财的“秘密”。指出农民只有打倒地主，才能获得土地，有了土地，才能不受穷。经过不懈地努力细致的工作，白洋地区的农民觉悟得到了提高，发展了吴金生、方有根等一批农民入党。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民运动，在白洋成立了以方有根为首的农民团。农民运动开展得有生有色。1930年秋，党在白洋一带领导农民开展了一次抗租抗税和减租的斗争。党组织根据不同的剥削对象提出了不同的减租方法。如对残酷剥削农民和最反动的地主豪绅，颗粒不交；对较为开明的则实行“二五”减租。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分化瓦解反动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待，能使他们自身觉悟起来，影响其阶级立场。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豪绅地主在强大的群众面前，不得不让步，实行了不交和“二五”减租。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930年秋，中共贵池县委被破坏后，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尽管以后党组织遭到多次破坏，但革命火种不灭，为后来梅埂、白洋、丁香树、郑村、源头、棠溪、刘街等地农民革命运动的

开展奠定的了群众基础。

贵池的学生运动有悠久的历史，中共贵池特支成立后，由于其成员都是知识青年，开展学生运动比较有经验，学生运动开展得更是有声有色。他们一方面发动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宣传革命的真理；一方面领导学生配合运动，进行罢课斗争。

1929年春，党组织在县初级中学领导了一起“倒胡（胡珩）拥俞”（俞根石）的学生运动。胡珩是国民党贵池县党部的执行委员，言行反动，尤其惯于迫害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在贵池上层中较有声势，百姓恨之入骨。俞根石虽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但与国民党政府有矛盾，对政府的倒行逆施不满。原校长姚恩锡离职时，胡珩依靠国民党势力，谋取了校长职位。这件事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党组织及时抓住时机，作出了“倒胡拥俞”的决定。并由教员、共产党员刘恩选、吴锦江、洪人英具体组织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师生罢课罢教，紧密团结，坚持斗争达四、五个月之久。同时，党组织策动五职师生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答应师生们的要求。“倒胡拥俞”运动取得了胜利。通过这场斗争，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依靠了一大批先进青年，争取了中间学生，打击了反动势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锻炼了干部，教育了群众。先后有章难生、周晓中、周孔思、周克中、杨诗俭、章新木、吴启香、张少寅、农时等表现积极的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并在县中和五职设立了党小组，分别由章难生、周孔思负责，以便更

好地领导学生运动。

1933年春，在党的影响下，省立第一乡村师范进步师生创办了不定期的《嚶嚶》刊物，揭露现状，寻求光明，为农民服务。一些进步教师在课堂上提出了“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等正确思想。这些进步言论对学生影响很大。在以后历次革命斗争中，都不断有该校学生加入共产党，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党逐渐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1930年春，中共贵池特支成立后，凌霄曾设想利用贵池帮派矛盾夺取县自卫团长的职位，以掌握武装，但没有成功。不得不改变计划，决定利用官与官、官与兵之间的矛盾开展兵运工作。并分工由周孔思、周克中等负责。当时贵池的武装是县自卫团。团长黄亚庭克扣军饷、贪污腐化，士兵们深恶痛绝。他与自卫队队长钱炳富（桐城人）为争夺团长职位而矛盾重重。党组织一面派周克中利用同乡关系去做钱的工作；一面派人深入到士兵中去，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鼓励他们脱离国民党军队，站到人民一边。经过周克中的工作，钱炳富带了自卫队从驻地丁香进入县城，杀死了黄亚庭，除了一害。许多贫苦出身的士兵们在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下，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到同年秋天，争取县自卫团15名官兵自动携带武器待命暴动。再一个办法是打进去，到国民党自卫队当兵吃粮。家在桐城汤家沟的许伯侯，于1927年8月入党，1929年8月通过私人关系来到梅埂自卫队（属贵池自卫团）当兵，周克中与他接上了关系后，于1930年2月（古历）即在梅埂自卫队发

展了中共党员五人，成立一个党小组。许伯候（后叛变）任小组长。

1930年，凌霄从潜山回到贵池。在梅埂发展胡章武、胡宪友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贵池县委还布署了在梅埂一带准备武装暴动。由于“左”倾盲动，使“白洋暴动”流产，并使贵池县政府对梅埂金家冲一带加强了军事力量和对县委领导成员的搜捕。“暴动计划”被迫取消，转移农村。依靠自卫队武装暴动“早产”了。

贵池党组织成立以后，不仅注意开展工运农运学运，向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1930年贵池闹春荒，人民生活很苦，有钱也难买到米。而贵池城内的一些米商、地主则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一时间，贵池城内居民人心惶惶。为帮助百姓，党领导人民向不法米商、地主作了一次抢米渡荒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市场，假惺惺要米商开市，但米商采取迟开门早收市的办法，一天只营业几个小时，又只准每人每次只能买几升米（米粮一天一个价）。因此，买米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米店前购米的人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哭叫声时起彼伏，情景凄惨。中共贵池县委决定由周孔思、周克中两人负责，领导百姓进行抢米斗争。斗争是复杂的，一是城内居民既没有组织基础，也不好进行思想动员。二是国民党县政府同米商沆瀣一气，打着维护秩序的旗号派兵替米商站岗。经过认真考虑，一天中午周孔思、周克中等化装成穷苦百姓，假装购米者挤到米店最前面，站岗的士兵阻止他们前进，两方争执起来，周孔思乘机一掌将士兵打倒，带头冲击米店，群众也蜂涌而入，将米店仓内大米搬运一空。搬了这家米店又到另一家

米店，连“抢”了五家大米行，仅朱同昌米店一家就被群众搬走了三百多袋米。城内的穷苦人家全部参加了“抢”米队伍。此时，县政府许彦飞县长带兵前来阻止，但因群众人多势众，又怒火万丈，只得退回县衙。后来打听到是贵池中中共分子带的头，许彦飞又带领了一个排20多个武装来到贵池中抓人。县中学生集体当面向县长申诉，抨击其勾结米商，从中渔利的事实。许彦飞无计可施，只得离校而去。这样党领导这次规模浩大的“抢”米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紧密配合各项运动地开展，党在宣传方法上，灵活多样，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经常宣传的形式是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短小宣言等。主要内容是向广大群众揭发反动统治的黑暗和对人民的残酷压迫的真相。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方针、政策、土地法大纲，以及介绍苏区人民的政治、生产和生活情况。从1929年春至1930年秋，曾多次在城关各街头巷尾、城楼、机关、学校甚至在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等处张贴共产党的宣传品。使国民党县政府惊恐不安。中共贵池党组织还利用各种关系，将标语张贴到县常备队、县机关的办公桌上。将传单放进自卫队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口袋里。梅埂的党组织还将宣传标语从梅埂街一直贴到五步沟。15华里都有革命标语，影响很大。大通和悦州也能经常见到共产党的宣传品。这些标语、传单均是在中共贵池县委机关所在地屠宰税务所刻印的。此时，宣传非常活跃，声势浩大。

四、“左”倾路线的危害

流产的白洋农民暴动。党在领导贵池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士兵运动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这时党的路线正处在立三“左”倾路线的时期。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中央占领了统治地位。他们不顾客观事实，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了三、五个人都要举行暴动的错误口号。安庆中心县委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认为贵池的暴动时机已经成熟，要求贵池县委召开一次党组织扩大会议来大造声势，广泛宣传和组织力量，并派曹逸心专程来贵池指导。使贵池白区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1930年秋的一天，中共贵池县委选择了在组织上比较坚强的白洋（距贵池城三十多里）作为会议地点。史称“白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全体人员和农民代表40多人。会议决定在白洋举行武装暴动的同时，各地要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工运区进行罢工，农运区开展抗税抗租活动，城区学校要罢课罢教及开展士兵运动等等。会议还就武装暴动的时间（具体日期不详）等具体要求作了说明：农民全部带锄头钉耙，托关系买一些硫磺做土炸弹；梅埂小学的方华棠老师负责夺取自卫队队长的枪支；在前期计划实现后夺取贵池县城。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一夜。

白洋虽系革命组织发展较好的地区，但国民党势力亦很强大，如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胡珩、胡雪艮、张子樵等老家均在白洋。会议不保密，有意造声势，尤其在尚未召开会议之前，就到处贴标

语、发宣言等等，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省保安团调四个连兵力到贵池加强防范。“白洋会议”召开不久即被国民党县政府获悉，第二天深夜大批武装军警分头包围了中共县委各领导人住地和县委工作机关（大井头屠宰税所）。省保安团在白洋乱捕乱杀，白洋农民首领方有根、吴金生惨遭杀害，使“白洋暴动”流产。其余的同志由于及时转入乡村而幸免。

第二节 中共贵池县委、临委在江南省委、宣城特委领导下重建及其革命活动

一、中共贵池县委在江南省委领导下重建及革命活动

1930年秋，由于“左”倾盲动，致使贵池县党组织被暴露，革命形势由高潮变为低潮，革命活动陷于停顿状态，一部分主要领导人因声誉较大而被通缉，少数党员脱党。“左倾”盲动，使党脱离了群众，挫伤了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

同年10月初，中共桐城县委领导成员钱新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江南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接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主要内容是纠正立三“左倾”路线。安徽设立蚌埠、芜湖、安庆三个特委。安庆特委负责人张国威将贵池党组织资料交给了钱新嘉。会后钱新嘉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贵池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并在金家冲（贵池郭港村）“小观园”召集、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玉成、陈晓中、胡宪友、王达仁、凌霄、洪人英等，

会议传达了江南省委的政治决议。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反对“立三路线”，反“富农路线”，领导群众由日常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等等；会议还产生了新的中共贵池县委。书记胡宪友，组织陈晓中，宣传王玉成。城区负责人周孔思、周克中；白洋、梅埂农运区负责人农时、王玉成、王达仁；馒头山工运区负责人洪久儒。同时建立了中共梅埂区委，有党员 50 名。书记王达仁（后方老五）；中共乌冲支部，约有党员 40 名，书记舒景山。由于梅埂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展，使地主惊慌失措，纷纷逃往贵池城内。隐蔽在梅埂的凌霄积极发展党的组织。1931 年 3 月间国民党政府对梅埂金家冲有了注意，除了梅埂原来的一个自卫队中队外，又派钱炳富带 20 多自卫队员坐镇梅埂，并加紧搜捕被通缉的中共贵池县委领导人。王玉成、左国志、方华堂等人被捕入狱，县委机关被彻底破坏，少数党员分散活动，有的被迫潜逃。身份暴露的凌霄、洪人英遭到国民党县政府通缉已于 1930 年底离开贵池转向铜陵汀洲。凌霄到铜陵后，发展党员，创建了中共铜陵特别支部，凌霄任书记。铜陵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建立的第一党支部。它的成立，揭开了铜陵革命史上新的一页。

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前后，中共梅埂区委领导大同圩农民开展了一场有影响的抗租运动。1928 年受党派遣，共产党员王达仁来到了其父王鉴如教书的梅埂大同圩五步沟小学。王达仁以大同圩五步沟为基地，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了一些斗争性强的贫苦农民青年入党，建立了五步沟支部。同时举办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接

着成立农民协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并请来桐城东乡有名武术教师章仙芝、王光前等人为青壮年佃农教习武艺，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中共贵池县委改组后，王达仁任梅埂区委书记。1930年11月，大同圩公司的股东地主老财们，在天寒地冻、佃农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派出武装10人，挨门逐户地向农民逼租并要写代种字据。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梅埂区委的领导下，农民协会组织了800多农民游行示威，赶走了反动武装，并包围了地主合营的大同圩公司。迫使地主在东佃关系上作了某些让步，宣布把代种字据改为无种字据，使几万佃农获得了永佃权。在这以后的数天里，“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土豪劣绅”、“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等革命标语贴满了大同圩到大通的道路两边。大同圩农民的斗争，使国民党县政府惊恐万状，立即派常备队到大同圩进行搜捕，当地劣绅咬牙切齿地咒骂：“王达仁不是办学校，是办共产党”。

1931年，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指示贵池县委归新桐县委领导。

二、中共贵池临委在宣城特委领导下重建

中共宣城特委是在中共宣城县委的基础上建立的。1931年2月，中共宣城县委在孙埠成立。谢某、倪合台、江干臣先后担任书记。县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暴动区域的党组织，发展党员，同时做好矿工工作。1931年8月，县委改组，刘文龙任书记、江干臣、汪老三为委员。县委除负责本区域工作外，同时指导泾县、宁国、旌德、郎溪、青阳、太平、铜陵、贵池等县的工作。1931年12月，宣城

县委改称宣城特委。1933 年 12 月，特委交通员叛变、领导人被捕，特委（县委）遭破坏。

1932 年 1 月，中共宣城特委派韩琦到贵池帮助恢复党的组织，在贵池东乡成立了中共贵池临时县委。韩琦、胡连发、祝某为负责人。同年 2 月，韩琦在芜湖被捕。另一位负责人胡连发出走，因此，临时县委与宣城特委失掉了联系，同年 11 月，宣城特委曾派出同志前往贵池恢复，但未获结果。

第六章 贵池西南部山区党组织的建立 和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从城市斗争转向农村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武装割据时分析其原因所说：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的问题。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特点，阐明了建立红色政权的重要及其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武装割据（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

贵池党组织在毛泽东同志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伟大著作中，得到了莫大的启发。其近在咫尺的方志敏、邵式平同志开辟的赣东

北革命根据地和徐向前等开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直接经验，使凌霄等同志清楚地认识到，贵池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敌我力量特别悬殊，必须作暂时退却，转向农村，因此，贵池县委除了领导城内的基层组织进行革命斗争外，将重点转入县与县交界的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边缘的贵池西南部山区的棠溪、留田、丁香、牌楼、占大山区，领导广大农村的广大农民广泛地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

第一节 贵池西南部山区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斗争

一、贵池西南部（棠溪）地区概况

贵池西南部山区（棠溪）距贵池县城近百里，东与青阳接壤，南与石台相连，与徽州、祁门为邻。是贵池、石台和青阳三县交界的偏僻山区。其境内有九华山、陵阳山、高宝山、七井山、杉山、牯牛降、仙寓山等崇山峻岭。只有山道与外界相通，即石门新岭至石台六都、石门白沙至青阳南阳湾、石门低岭至青阳南阳湾、留田杉山至石台高宝山、花庙至石台七井山、西山至梅村、曹村、刘街、贵池。流经棠溪的龙舒河，可达贵池西南重镇殷家汇。这个地方是开展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想地方。

大革命失败以后，取得了政权的国民党在贵池西南部建立了联保制度。其保长、联保主任大都由地方恶霸或地主担任。他们是地方反动势力的代表。贵池西南部山区，特别是棠溪有乩坛等反动道

会门组织，主要在石门和百安一带活动。坛主利用宗教迷信欺骗和压迫贫苦农民。山区文化落后，消息闭塞，在国民党统治一时尚未渗入这个偏僻山区时，当地豪绅地主和反动道会门一起，鱼肉人民，掌握着对农民生杀予夺之权。国民党在贵池西南部山区建立联保制度后，不仅派捐征税、抓壮丁，而且还同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使棠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这里的群众受苦最深，但又是宜发动革命的地方。

贵池西南山区虽说处处崇山峻岭，其沟、涧、溪流纵横，山上森林茂密，山下田地肥沃，但土地、山场大都集中在少数地主劣绅手里。如石门高村共有 220 多户，土地 1920 亩，其中 20 户地主、富农即占地 1600 多亩，而 140 多户贫苦农民只有 130 多亩土地。由于土地高度集中，80%的贫苦农民只得当长工、打短工，或者租种地主的土地，以维持生计。其地租多半以实物计，一般好年景亩产不到四百斤，但是每亩交租要二百五十斤，租额达产量 65%以上。地主乘春荒放高利贷，借给农民一担稻，秋后净利竟达 200%。这个地区的农民常年处在半饥半饿中。政治上压迫，经济上的剥削，激起了山区农民的仇恨和反抗。贵池西南山区广大贫苦农民渴望革命，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人吃人的旧世道。

二、棠溪地区党组织的发展与中共贵池县委的重建

棠溪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开辟这一地区，创建红色根据地，为中共党组织所共识，纷纷派共产党员到棠溪进行革命活动，一时间棠溪地区风云际会，各地来到棠溪的共产党人走到一起，创建

了棠溪地区的党组织，领导棠溪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

（一）中共棠溪第一个党支部成立

中共贵池首届县委派檀炳光回棠溪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冬以凌霄为代表的贵池早期共产党人在贵池创建了党组织，领导城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棠溪在贵池读书的檀炳光结识了凌霄，在凌霄的教育培养下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檀炳光，又名作章，贵池棠溪留田万子人。农家子弟，从小聪明好学。1928年到贵池读书。在贵池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如《唯物史观》、《新青年》并参加当时贵池的学生运动。1929年上半年，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凌霄同志决定派檀炳光回家乡棠溪开展工作。接着又派共产党员翟少坤去棠溪留田，到檀炳光父亲开的杂货店里当朝奉，秘密进行革命工作。

吴介唐等到棠溪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5月，凌霄介绍从潜山、岳西方面过来的吴介唐、王道荣、储希文等同志到马衙、棠溪、梅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三人先到马牙后，王道荣在马牙章木新家以打长工、放牛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章木新是贵池五职中学学生，1929年秋加入共产党，1932年被捕，后自首叛变）。随后吴介唐、储希文到了留田，以塾师身份进行工作。王道荣同志的革命活动引起当地乡绅的怀疑，为隐蔽革命力量，凌霄同志得知消息，又将王道荣介绍到棠溪吴化甫家打长工。这样檀炳光、吴介唐、王道荣、储希文等人在棠溪、梅村进行革命宣传，发展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棠溪一带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先后有一批先进

分子檀周贵、柯天六、檀加兴、吴淡甫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子高到棠溪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张子高从江西来到棠溪柯进行革命活动。一开始以教书为掩护，到大地主柯玉山办的私塾任教。他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学生和青年农民都喜欢听他演讲，他又会行医，经常给贫苦百姓免费治病，深受群众欢迎。后又结识了庄村姚小学校长、进步知识分子姚佐堂，经与长谈数夕，结为莫逆之交。遂聘为西席。庄村姚小学成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站。姚佐堂以校长和保长身份，配合张子高进行革命活动。张子高以教书为掩护，发展该校教师柯坤祥入党，使该校成了撒播革命火种的根据地。与此同时，又与檀炳光、李家海取得了联系，积极筹建中共棠溪党组织。

中共棠溪党支部的建立。经过檀炳光、吴介唐、王道荣、张子高共同努力，在棠溪积极发展党员，团结了一批力量，从而推动了棠溪革命斗争的开展。1930年经中共贵池县委批准，由檀炳光、檀周贵、柯天六、李家海、吴淡甫（后叛变）等人组成中共棠溪第一个党支部。活动于留田、西山、茶园、古裕、魁丰、肖坑等地。当时主要工作是秘密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前的酝酿工作。

党支部决定派檀炳光到留田和坎上柯一带；柯天六到茶园和轧车口一带；檀周贵到西山一带开展活动。他们利用亲戚朋友关系，采取一起劳动或串门闲谈或秘密集会等方式，向贫苦农民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告诉群众：“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要是不革命，还在棺材里。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通

过他们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迅速觉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组织。

（二）中共贵池县委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檀炳光千里寻找上级党组织。1930年10月，中共贵池县委被破坏，凌霄同志又转移到铜陵县去了。大部分同志也设法隐蔽起来。由于棠溪远离贵池，虽然棠溪党支部没有损失，但由于贵池县委遭到破坏，棠溪支部中断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使活动陷于停顿。为了取得上级党的领导，党支部决定派檀炳光到安庆等地去寻找党组织。1930年10月，檀炳光离开棠溪到安庆、潜山等地，由于同样原因，安庆党的组织也遭到破坏，结果未能找到上级党组织。后来听说皖南党组织属江西方面领导，檀炳光又南下江西，因过去与江西党组织没有联系，也无法找到。1931年春，檀炳光返回棠溪。

中共贵池县委在棠溪成立。为了加强党对徽州工作的领导，经芜湖中心县委批准，于1931年11月在秋浦县的雁落坡成立了中共徽州工作委员会。主要领导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党组织工作，书记先后为储峻滨、鲁国储、朱晓村（金式城）。1932年10月工委进行了调整，机关从秋浦迁到歙县小练村。1932年芜湖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后，7月，工委隶属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1932年12月，中共赣东北省委派宁春发到徽州，将中共徽州工委改为中共皖南特委。

1932年上半年，棠溪党支部与徽州工委接上了关系。在徽州工委领导下，棠溪党支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革命力量。到1932年底党员已发展到51人，基本群众有92人。为适应革命形势

发展的需要，经徽州工委批准，在棠溪操家冲（又名轧车口，今棠溪双桥村），成立了中共贵池县委，檀炳光任书记，柯天六、洪小牛、檀家兴任县委委员。正当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国民党贵池县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开进留田，身份被暴露并遭国民党县政府通缉的县委书记檀炳光奉命调离棠溪到徽州地区工作。檀炳光走后，中共贵池县委进行了改组，檀周贵任县委书记，洪小牛任组织委员，柯天六任宣传委员。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徽州工委改名为皖南特委后，贵池县委在皖南特委领导下工作。1933年下半年遭到破坏。

1934年2月重新恢复了贵池县委，李家海任县委书记，洪小牛任组织委员，柯天六任宣传委员。县委机关仍设在操家冲。下设三个区委：第一区委设在留田，柯大狗任书记（后牺牲），活动范围在留田、坎上柯、花庙和高宝山一带；第二区委设在西山，曹金苟任书记（后牺牲），活动范围在西山和茶园一带；第三区委设在庄村姚，徐长清任书记，活动范围在庄村姚、裕丰、古裕和棠溪柯一带。同时还成立了贵池县共青团，书记周永兴。共青团贵池第一区，书记柯大狗；共青团贵池第二区，书记檀秋光；共青团贵池第三区，书记姓名不祥。各区还配有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和通讯员。但不久县委机关又遭到破坏，部分同志转向太平、石埭边境。至同年下半年，县委组织活动基本停止。其下属组织均转入秘密活动。

（三）中共贵池县委的重建及其下属组织的建立。

1934年11月，由赣东北省委派来一批干部到皖南工作。这时凌大英，率领周炳德一支二十几人组成的短枪队返回棠溪留田，集

合散失人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恢复了中共贵池县委，凌大英任书记。委员檀家兴、赵海波、檀炳光。组织：檀家兴；宣传：赵海波；军事：周炳德；肃反委员会主席：方茂楷。同时建立了中共贵池第一区委，区委机关驻地留田，主要活动区域为留田、花庙、高宝山，坎上柯等地。书记：檀金斗（先）、吴玉庭（后）、翟少坤（再后）；中共贵池第二区委，区委机关驻地在西山，主要活动区域为西山、茶园、西园等地。书记方晓东；中共贵池第三区委，机关驻地在庄村姚，主要活动区域为棠溪柯、裕丰、古裕等地。书记：储金福（先）、李家海（后）；中共贵池第四区委，机关驻地徐村柯，主要活动区域为源溪、长垄、太和章、徐村柯、太平曹、港口吴、姚街等地；中共贵池第五区委，机关驻地肖坑南阳岭，主要活动区域为梅村、会山、肖坑等地。书记：柯天六（先）、万玉坤（后）、徐云端（再后）。在县委领导下，各种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成立了共青团贵池县委员会，书记周永清（江西人），各区也建立了团组织，五个区共有团员 500 多人。

区下面还以自然村为单位，设立农民团，每个农民团辖 3—5 个小组，每组 5—7 人不等，当时棠溪全地区参加农民团的共有 5000 余人。同时，有的区还成立了妇女解放会、儿童团等。上述组织的建立为武装暴动提供了组织准备。

第二节 中共贵池县委领导棠溪地区武装斗争

一、深入群众，宣传革命

为使土地革命的道理深入人心，中共贵池县委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一是在红军独立团到棠溪时，只要经过的地方，夜间都张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反动派，就地闹革命”的标语。二是在发展农民团时，进行口头宣传，说红军，讲土改，用通俗易懂的道理宣传教育群众：“地主、豪绅好比是一头牛，我们老百姓就象是稻草，稻草是被牛吃的；如果我们把稻草搓成绳子，就可以把牛捆起来。”使群众明白团结就有力量的道理。三是传唱编写的红军歌谣，进行革命宣传。棠溪地区有唱民歌的习俗，通过红军歌谣的传唱，土地革命的道理深入人心。现选“红军歌曲”和“五更小调”抄录如下，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当年棠溪地区进行土地革命如火如荼的景象。

《红军歌曲》：“什么东西甜如蜜？分田分地甜如蜜；什么东西大如天？阶级情谊大如天；什么东西坚如铁？红军纪律坚如铁；什么东西红如血？苏维埃旗帜红如血”。

《五更小调》：“一更里，劝劝我亲人，劝亲人，出外干革命，做事要认真。莫贪财，不怕死，才算真革命。二更里，劝劝我亲爱，劝亲爱，去捉反动派，对敌别慈心。打倒反动派，才无这障碍。三更里，劝劝我知心，劝知心，去打土劣绅，切记莫留情，分地勤耕种，穷人好安身。四更里，劝劝同胞们，劝同胞，去打白匪军，大家团结紧。打倒新军阀，天下才太平。五更里，劝劝我的妹，劝我

妹，在家莫着急，安心勤劳动。革命成了功。才有幸福日”。

这些红色歌谣，唱出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心声，也鼓励着千万农民走上了闹红的征程。

二、建立武装，扩大游击区

中国革命的武装同土地革命是不能分开的。棠溪红色根据地是交通阻绝的农业区域，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们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棠溪的土地状况与全中国没有什么两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种土地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所在，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中共贵池党组织正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皖赣红军的支持下，开创了武装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一）驳壳队和县游击队的成立

长期的斗争实践，使棠溪地区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武装起来，掌握枪杆子，才能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1934年，太平中心县委根据方志敏“苏区转为游击区”的指示，将太平柯村红色根据地一部分红军和武装力量分散到皖南各县，积极发展各地的革命武装，扩大游击区。1934年10月，李家海与独立团取得联系，独立团派周炳德、毕六安两同志到太平柯村建立了驳壳队。周炳德任队长，毕六安任副队长，队员有，李家海、程开发、赵海波、方晓东等人组成。率先进入贵池棠溪地区进行革命活

动。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在驳壳队的基础上，建立了县游击队，队长周立本，指导员朱文贵，有步枪 9 支，各区建立游击小队共 100 人左右，土枪 40 支及其他武器。

（二）惩办恶霸檀孔修

革命斗争蓬勃开展，地主豪绅十分仇视。炼剑村保长，恶霸地主檀孔修，不仅平时残酷剥削农民，而且经常向国民党县政府告密，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效劳，得到贵池县保安队的赏识。1934 年 4 月间，他跑到贵池哭诉棠溪已被共产党赤化，要求县政府派兵镇压。并亲自带保安队七、八十人回棠溪搜捕革命同志，致使檀周贵、黄三矮子、檀圣恩、江村等同志被杀害。檀周贵等同志的牺牲，激起了广大群众对檀孔修的愤恨，纷纷要求惩办他。4 月 27 日晚上十点左右，县委书记李家海带领十几个党员伪装卖猪的来到檀孔修家门口（檀孔修家开猪肉铺），设计抓到了檀孔修。李家海宣布他的罪行后，代表党和人民把他处决了。后贵池县保安队进山搜捕，李家海、程开发等有关人员已撤到太平柯村红色根据地。保安队扑了空。

（三）驳壳队智除恶霸檀维珍

1934 年 10 月，周炳德率驳壳队一到棠溪，就接到了许多贫苦农民对恶霸檀维珍的控诉。檀维珍是留田街上一霸，占有田地一百多亩，又开了好几个店铺，自当了棠溪八保联保主任后，常常派出密探四处搜集红军情报，指使保安队搜捕革命同志。为了破坏红军活动，竟强迫农民在一些交通要道（杉山到石台路口）筑碉堡、设哨卡，对红军活动妨碍极大。驳壳队决定除掉他。根据群众反映，

檀维珍前几天带着县保安队的李副官和三个士兵到杉山去检查碉堡，过一、二天就要下山的消息。驳壳队决定采用“放饵钓鳖”的方法，捉拿檀维珍。驳壳队察看了地形，决定在留田江家冲小坞设埋伏，小坞地势险要，两山之间只有一条小道，是杉山到留田的必经之路，只要檀维珍一行进入，就无退路。同时，两边山排树木茂密，便于隐蔽。第二天，李家海装出肚子疼的模样，在江家冲通往杉山庙的小路等待。约莫中午，从留田方向来了一个“挑夫”，挑着东西往杉山方向去，李家海认得此人，故作疼痛状，呻吟不止。那人一看是李家海，就飞奔杉山庙而去。檀维珍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和李副官带了三个士兵下山捉拿李家海。他们赶到江家冲，见只有李家海一人，便迅速围了上去，企图活捉李家海，李家海和他们搏斗起来。这时，埋伏在两旁的驳壳队员猛冲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檀维珍如梦方醒，急忙掏枪顽抗，被周炳德一枪打死。其余四人被连夜押送去了太平柯村。

（四）驳壳队消灭“壮丁队”

刘街长垅桂地主余金武和侄儿余炳楼一向仗势欺人，鱼肉百姓。他们得知檀维珍被杀的消息后，立即建立起一支有四十多人的“壮丁队”，由余炳楼当队长，妄图镇压人民的反抗，消灭红军游击队。驳壳队得知这一情报，决定消灭这支“壮丁队”。1934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炳德率驳壳队来到长垅村，包围了余金武的屋子。除掉了哨兵，向屋内正在吃半夜餐的壮丁队发起了攻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周炳德大声指挥：“一班向左，二班上房，三班

跟进!”周率先踢开大门，冲了进去。“壮丁队”员们摸不清头脑，不知来了多少游击队，一个个举手投降。驳壳队员迅速缴了余炳楼和队副的武器。同时发现余金武不在，从俘虏嘴里得知余金武在河对岸老屋里，迅速包围老屋，活捉了余金武。释放了贫苦壮丁队员。后发现余家库房，粮食都烂掉了，而这年棠溪一带大旱，广大农民挖野草充饥，令人气愤，在群众强烈要求下，驳壳队员将余氏叔侄就地镇压了。游击队在惩处恶霸同时，缴获了武器，武装自己，使自己迅速发展壮大。

除掉了檀维珍、余金武，为民平了愤。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围剿。国民党县保安队一百多人从贵池赶到棠溪，进行搜捕，驳壳队人员早已撤离。由于叛徒出卖，使隐蔽在野猪棚里的地下游击队员檀炳义被捕杀害。保安队虽然围剿，但红军驳壳队仍然转战棠溪留田一带，出其不意地打击保安队。县保安队撤离棠溪时，留下一个中队驻扎在留田街上。

三、中共贵池县委领导的“年关留田暴动”

贵池棠溪“年关留田暴动”是皖南特委领导下的贵秋东武装暴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2月，北上抗日先遣队进驻皖南柯村苏区，方志敏改组了中共皖南特委，并调红十九师（原红七军改编）政委聂洪钧任特委书记，以加强对皖南地方工作领导，准备发动年关暴动，配合红军创建根据地。

（一）留田暴动

1934年底，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准备在年关举行暴动，并在棠

溪留田举办了骨干训练班。由于同年 11 月份，方志敏率部北上，红军第七军团由太平到达青阳南阳湾，遇到了周炳德的驳壳队。方志敏当即决定分兵两路，一路向石台七都方向挺进柯村，一路由红十军参谋长匡龙海组成一个独立团，由驳壳队指引进入贵池开展斗争。此时贵池棠溪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而驻扎在留田街上贵池保安中队有近百人。他们任意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面对这一情况，贵池县委决定率先暴动。攻打留田街，消灭保安队，扩大革命成果，建立人民政权。周炳德根据县委指示，写信给独立团首长，汇报情况，介绍国民党在留田的军事部署，并请求派部队来帮助解放留田，建立新政权。独立团根据当时中共贵池县委决定，参加攻打留田街保安队。腊月初一，独立团团长江龙海和参谋长檀炳光率领 400 多名红军战士，加上老百姓有一千多人，从石台经花庙、棠溪柯，向留田进军。当日下午三时左右先头部队进入留田街的北边，住在这里的保安中队看到成千红军包围上来，吓得丧魂落魄，纷纷丢枪逃命。后有红军跟踪追击。前有驳壳队阻击，近百人的保安中队全部成了俘虏。留田保安中队被消灭，为棠溪地区的革命活动向纵深发展扫除了障碍。棠溪解放，老百姓扬眉吐气，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逃亡。

从腊月初一晚上到初三，独立团又带领群众先后在留田街、刘街和梅村等地打土豪分浮财。没收了王庆和、刘源顺、刘泰和和桂旺美四个大土豪的全部财产，焚烧了桂旺美的地契。通过这些斗争，摧毁了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困难，深得人民的

拥护。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道理，提高群众觉悟，把群众组织起来，中共贵池县委决定在留田召开群众大会。开会这天，会场上红旗飘扬，标语满墙。花庙、棠溪柯、万子、老屋坛等地的贫苦农民都赶来参加大会。下午，大会开始，县委和红军独立团的领导先后讲了话，讲革命道理，号召大家积极配合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广大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投身于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中。

（二）贵池县游击大队的扩建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中共贵池县委同独立团领导决定，由独立团派出一批军事干部，扩建贵池县游击大队，檀炳光任大队长，周炳德任军事部长，并将从保安队手中缴获的一部分枪支弹药交给游击队。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县游击大队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各区也相继成立游击中队，五个区游击队员约二百多人。有力配合红军独立团作战，有时主动出击，打击保安团。这支游击队处决了向国民党告密，使张子高、姚佐唐等许多革命者惨遭枪杀的恶棍棠溪柯大地主柯玉山；镇压了国民党暗探徐胜、徐日恒，消除了隐患；处决了叛徒王玉才；攻打了孙开美的保安队，缴枪八支、子弹四箱，抓了十几个俘虏，壮大了县游击大队的声威。县游击大队还取得攻打杉山庙和击溃国民党军队一个营的战绩。

攻打杉山庙。杉山庙位于棠溪、石台交界处，国民党县政府为了围剿红军，在杉山庙旁还建了一座碉堡。看守碉堡的县保安队和来往的国民党军队全部以杉山庙为大本营，在杉山庙吃住。杉山庙里有和尚 20 多人，房子也有几十幢，每年向农民收稻租一百多石。

当家和尚传道（法号）与国民党军队军官称兄道弟。国民党军队利用深山老林里杉山庙作为围剿和消灭红军、游击队的据点。杉山庙里的和尚倚仗国民党军队势力，残酷地剥削农民，双方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县委和红军独立团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拔掉杉山庙这个据点。1934年腊月24日，檀炳光带领红军和游击队共五百多人，半夜从棠溪苗竹柯出发，清晨赶到杉山。首先消灭了留守在碉堡里的县保安队，炸掉了碉堡。接着部队分成四路包围了杉山庙，很快占领了庙宇。当家和尚传道逃走，红军给其他和尚发给路费，交待政策，叫他们另谋生路。县游击队将庙藏二百多石大米等物资，统统拿出来，分给周围贫苦农民。为了消除后患，县游击队将杉山庙放火烧掉了，使国民党军队在杉山无法立足。正当红军撤离杉山时，国民党军队一个营尾追而来。檀炳光派一个排掩护大部队转移。在阻击战中，红军阵亡五人，国民党军死了二十多人。

毛岭岗击溃国民党军。梅村毛岭岗的一个游击队员侦察到国民党军队一个营四百多人要偷袭驻在霄坑的红军独立团，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檀炳光。檀炳光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并及时召开独立团和游击大队干部会议，共商对策。会议决定集中全部武装力量，形成优势兵力，全力歼灭这支国民党军队。会后，檀炳光将红军独立团，县游击大队和各区武装中队一千多人埋伏在霄坑亭子里到西山高塘的两边山头上。全然不知情的国民党军队一进入包围圈，红军、游击队猛烈的火力将国民党军队打得乱作一团，未作任何抵抗，就狼狈逃命。经过半天追击，国民党军队伤亡很大，红军游击队缴获

了大批枪支弹药。游击队自成立起，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在中共贵池县委的领导下，为革命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为分田分地进行土地改革赢得了时间。

四、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

组建革命群众团体开展土地革命。“年关留田暴动”胜利后，中共贵池县委立即组织群众，巩固革命成果。中共贵池县委迅速建立了县、区组织。立即分头深入各村庄，建立农民团、青年团、妇女解放会和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由于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发动，几天之内各种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了，主要有农民团。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贫苦农民都可以参加。农民团组织一般是一个自然村为一个团，设农民团支部书记一人，农民团支部直接受区委领导。农民团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和游击队打土豪、除恶霸；站岗放哨；供应和安排往来的游击队员和红军战士的吃住；递送信件；红军打仗时，随时救护伤员。当时，棠溪五个区农民团人数发展到最高峰时约五千人。青年团：先进青年组织，每个区都建有团区委，有青年团书记一人。青年团大部为游击队员，未参加游击队的主要搞好宣传发动工作。儿童团：主要由16岁以下贫苦农民孩子组成，负责站岗放哨，几个邻村成立一个团，设儿童团长一人。妇女解放会：区委将妇女组织起来，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其主要职责是为红军洗衣服、做鞋等。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以后，县委通过形势分析，认为展开土地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人民唱着《土地革命歌》：“革命，

大家向前进，工农兵联合，万众同一心，除军阀，惩贪官，土劣要肃清。打倒反动派，消灭白匪军，铲除官僚资本家，丝毫不留情。帝国主义齐打倒，土地革命成。可恨地主们，剥削我穷人，霸土地，享现成，横行各乡村。农民团结起，土地拿来分。建立苏维埃，领导有工农。封建势力一齐扫，土地革命成。”棠溪地区的百姓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还忙于分田分地。（摘自 1994 年《贵池县志》724 页）

在县委的领导下，各区都成立了土改部，开始了土地革命运动。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和缴契委员会。负责土地分配和搜焚契约等工作。土地分配的基车原则是：①以乡为单位分配；②按人口平均分配；③好、坏土地相搭配；④照顾军属和贫苦无劳动力户；⑤农民自耕土地不动。分配的方法是：先由土地委员会将人口、土地评议计算好，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出榜公布，再插牌为标志。

第二区根据县委指示，派出干部到西山村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同地主作斗争，烧毁了地契，将地主霸占的土地和公堂土地全部没收，按人口进行分配。第五区的干部也到高宝山，领导那里的人民开展土地革命。他们将地契烧掉，将土地按份插上牌子，分给贫苦农民。

由于国民党八十八师对红色区域一再疯狂围剿，致使一、三、四区的土地改革没有来得及进行，即使二、五两个区域搞得比较好，但很快也被破坏了。

贵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935 年元月 29 日（腊月二十三）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领导了郑家村（现属石台县）为中心的农民暴动，

暴动取得成功后，在贵池留田苗竹柯村建立了贵池县苏维埃政府。国民党贵池县政府闻讯后立即纠集丁香树、牌楼、高坦等地保安团武装，在安庆独立营的支持下，围剿根据地。九天后，在贵池西南部湖山坑，革命武装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扑灭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失败了。

五、党领导贵池西南部山区人民坚持斗争

棠溪地区武装暴动发生后，很快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国民党 88 师、78 师补充团、贵池县保安大队和地方上的清乡队从四面八方围剿留田、刘街等红色区域，企图消灭红军独立团，一举扑灭革命烈火。

中共贵池县委和红军独立团得到情报，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暂时撤离棠溪地区，以避锋芒。于是红军独立团迅速转到石台县七都，县游击大队和区中队转移到高宝山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1934 年腊月初，国民党军队赶到棠溪留田，扑了空。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军队就大肆收捕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土豪劣绅也纷纷回来，进行反攻倒算。白色恐怖笼罩棠溪。

腊月初九，游击队员张长庆、刘观友、胡继旺三人由于来不及隐蔽，不幸被捕。国民党军队强迫他们带路追击朝高宝山方向撤退的游击队。为了诱骗红军，国民党军队押着他们走在队伍的前头，张长庆为避免战友们上当受骗，他一路走，一路大声喊，战友们得救了，张长庆等三人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

腊月十四，国民党八十八师包围了高宝山。柯以德、柯凤阳掩

护其它同志转移，不幸被捕。柯以德早年参加革命，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和保长，被捕后，国民党联保主任谢万道劝其自首，许以保长之职，被柯以德拒绝，并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军队立即将柯以德、柯凤阳枪杀了。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还枪杀了潘子钊、胡高春、周长方、曹金苟、郑松等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

1935年2月，国民党八十八师，十一路军补充团又来到棠溪清乡。他们扶植成立了以高宝林为主任的“清乡委员会”，并组成了“壮丁队”。推行五户联保制，五户中如有一人参加红军，五户同罪。国民党还利用叛徒，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一座山头一座山头进行所谓拉网式的搜捕，周炳德、柯天六、程开发等同志被捕惨遭杀害，并挂尸留田街头，檀炳光参谋长在率领独立团转战祁门时不幸中弹牺牲，革命根据地丢失。

国民党军队先后多次闯进革命根据地，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在杉山见到老百姓家的鸡就抓，值钱的东西就拿，见猪就杀，临走，还放火烧了二十多处住房；在高塘和肖坑地区，枪杀了十多名红军家属，抓走了一批群众，放火烧了二百多间民房，造成了十室九空，许多人无家可归。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也反映了革命的艰巨性。

棠溪地区这次暴动为什么很快失败呢？其原因除了敌强我弱外，还有其特定的因素。其一，这一地区虽然红军活动较早，但一直是游击区，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政权。其二，对于武装建立重视不够，没有扩大和加紧训练农民团，在暴动之前领导骨干牺牲过多，

加上少数不坚定的分子叛变投敌。其三，暴动后，没有对局势可能恶化作退一步打算。忘记敌强我弱这个总形势，使隐蔽的革命过早暴露。其四，中共贵池县委领导的“留田年关暴动”后，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领导的“郑家村暴动”，仅仅是以执行皖南特委“密切配合红军北上抗日牵制敌人的兵力，发动群众打击敌军，迎接北上抗日选遣队”为使命，仓促举行暴动，对建立根据地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选遣队在潭家桥失利后，主力红军撤回赣东北。起义的农民队伍失去主力红军的支持，形势急转直下，“郑家村暴动”被国民党军队围剿失利后，棠溪留田暴动，就失去了依靠。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也就随之失败了。血的教训告诫人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革命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无畏的精神，又要审慎、周密的计划。

自从腊月初六，国民党八十八师、七十八师和县保安队联合围剿以来，红军和游击队仍坚持在棠溪一带进行斗争。并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在西山张村、杉山的关岭、青阳的杜村桥、梅村的凤凰岭等地打了十多仗，由于红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使国民党军队在清剿中处处挨打。

1935年2月，红军独立团撤走后，周炳德、程开发、柯天六、李家海仍留在棠溪一带继续带领群众进行斗争。周炳德率领的驳壳队曾袭扰进驻留田的保安队，使保安队坐卧不安；五区区委书记万玉坤叛变后，当上了清乡委员会壮丁队队长，经常搜捕红军和游击

队，柯天六知道后，立即带了两个游击队员，在月黑风高的一个晚上突闯万玉坤家，处决了这个叛徒。

由于“郑家村暴动”的失败，贵池“留田年关暴动”也失败了，许多共产党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播下的革命火种永远不会熄灭。

六、凌霄在贵池英勇就义

请水寨暴动失败之后，凌霄（化名严宽）、储德民、刘震、刘仲希等 60 多人，受党组织派遣到祁门地区开辟根据地。1930 年冬至 1931 年春，他们先后分四路来到祁门县西南的南坑、黄坑、黄土凸、大桥头、西坑、石番村、雪坑、渚口、高源、南乡的柯塘、东乡鳧坑、小开源及祁门城内，以教书、打短工，卖小货、行医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931 年 11 月，在凌霄、鲁国储、朱晓村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共徽州工作委员会，地点在秋浦县雁落坡，鲁国储任书记，朱晓村分管组织，凌霄分管军事。下辖贵（池）、秋（浦）、东（流）、祁（门）、黟（县）、休（宁）、太（平）、石（台）、旌（德）9 县，后来又增加了浮梁县，属芜湖中心县委领导。

1932 年，正当祁门党的组织发展关键时期，徽州工委领导人鲁国储在芜湖不幸被捕，打入国民党军五十七师策动兵变的刘仲希因事败被捕，秋浦县委李鸿鸣遇害，徽州工委机关被迫由秋浦迁往徽州歙县小练村。此时，国民党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凌霄当时正在祁门、贵池、宣城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与工委失去联系，但他毫不气馁，千方百计寻找组织和幸免于难的同志，转入地下，隐蔽待命。

1933年5月，国民党对凌霄的追捕日益加紧，到处是白色恐怖，凌霄只得化名胡新华到泾县，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该县翟村小学任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秋，由于叛徒的出卖，凌霄在泾县不幸被捕。并将凌霄从泾县押解到宣城，不久又移解到贵池。在狱中，凌霄面对国民党的“殷勤”丝毫没有动摇共产主义的信念，在酷刑下，表现出共产党人铮铮铁骨，在给战友的信中，写道：“大将军不在枪下死，就在刀下亡”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国民党对凌霄恨之入骨。贵池劣绅胡熙甫，国民党贵池县党部书记吴必德，设计科长程柱国，极力主张杀害凌霄。吴必德曾在县党部会议上说：“凌霄不死、江南不宁”。1935年1月的一天，第八行政公署专员向乃祺最后一次提审凌霄说：只要你凌霄答应从今往后不在我的辖区之内活动，就可以作为免除死刑的条件。凌霄回答到：“革命不是我的私产，我无权拍卖。要杀就杀，杀了一个凌霄，千百万个凌霄会踏着我的血迹起来斗争。”说罢，高呼：“共产党万岁！”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贵池第八行政公署大院附近的棚树林里（今城关粮站屋址）。凌霄是一个播火者，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熊熊的烈火；他又是一名勇士，为人民群众的解放，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他更是一面旗帜，迎风猎猎，召唤着人们，前仆后继。

1949年8月，池州地区党政军民为凌霄烈士隆重立碑纪念。

第三节 中共秋浦县委领导的祁秋边暴动

中共秋浦县委的成立。1930年，潜山清水寨暴动失败后，该地的一批共产党员转移到皖南地区。先后来秋浦县（今东至县）的有李鸿鸣、金步蟾等十余人。他们以教书、行医、经商等职业为掩护，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931年11月，中共徽州工委书记鲁国储来到南坑，由李鸿鸣、金步蟾主持，在李万保家召开了有黄道开、李汉璋、吴家荣、黄炳炎、黄筱山等全体党员参加的会议。鲁国储在会上作了指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南坑支部，李鸿鸣任支部书记，金步蟾任组织委员，汪清流任宣传委员。中心支部有党员二十人。1932年2月，九都、姚黄支部陆续成立。这样，三个支部共有党员六十余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进展顺利，源头一带积极分子达百余人。1932年3月，在鲁国储的指导下，中共秋浦县委在南坑成立，选举了李鸿鸣为县委书记，金步蟾为组织委员、汪清流为宣传委员，县委机关设在仙寓山庙内。县委成员进行了分工，李鸿鸣负责莘田、源头、占坡；金步蟾负责九都、板桥等地；汪清流负责祁门汪家河一带工作。到1932年7月，中共秋浦县委共辖四个区委，十四个支部，拥有党员一百九十四人，群众骨干达三百四十多人，还建立了一支六十余人组成的游击中队。同时成立了儿童团、农民团、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组织。

秋浦县委领导的祁秋边暴动。贵秋东边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使得大批的群众自发起来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甘爵的群众以“皖南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向恶霸地主李钟玉筹借粮、款，闹得李

钟玉寝食不安。秋浦板桥的群众自己组织砍伐队，到地主的山场进行砍伐。有的地区还开始起来烧毁地主的地契，有的地方地主开始逃亡。国民党秋浦县政府束手无策。秋浦县委认为领导群众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到来。

1932年7月，鲁国储来到南坑，给秋浦县委带来了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的指示。九月，秋浦县委在葛公水磨下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讨论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最后决定9月20日举行贵秋东边区暴动。县游击中队为暴动的骨干力量。组织贵池的丁香树、九步、资田、汪村、源头（现属石台县）；秋浦的九都、姚黄、板桥；祁门的汪家河；东流的迭山、青峰岭等地的少先队、互济会（农团民）成员二千八百多人共同暴动。暴动的具体步骤是：1、开辟新区，分兵三路夺取贵池的栗阳街、洪石潭、丁香树；东流的洋湖镇，秋浦的葛公镇、板桥孔家。2、夺取国民党地方乡勇武装及土豪劣绅组织的自卫队武器，武装自己，继而攻占秋浦县城。暴动的目的是消灭反动势力，发展革命武装，巩固和扩大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会后，进行了紧张的各项准备工作，收集了大量的大刀、长矛、土枪武装农民。

在暴动即将举行的时候，县委书记李鸿鸣的刀枪伤复发，暴动决定推迟一个月，于10月20日进行。由于时间仓促，交通不便，推迟暴动的通知没能及时送到姚黄地区的暴动组织者手里，储效鲁在姚黄如期发动了暴动，在汪家河打了两家土豪，打乱了整个计划。在这种极为被动的情况下，秋浦葛公小碑支部的王金荣叛变，将暴

动计划向源头大地主李少波告了密。国民党秋浦县政府立即对暴动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并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搜捕。县长夏邦济带自卫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到处搜山。11月，李鸿鸣、金步蟾先后在源头被捕，汪清流逃脱，国民党秋浦县自卫队又从金步蟾住处火桶里搜到了共产党员名单，在国民党军队疯狂的围剿下，中共秋浦县委被破坏。之后，地主武装又对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强迫群众自首，贵秋东边区一片白色恐怖。不久，夏邦济将李鸿鸣、金步蟾秘密杀害于秋浦南门岭。贵秋东边区的革命暴动，就这样被扑灭了。这次革命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却为以后的革命播下了种子，同时激发了群众的阶级斗争的觉悟，增强了人民群众推翻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决心。他们要求革命的愿望仍然象烈火一样在胸间燃烧。为第二次贵秋东起义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中共贵池支部领导的革命斗争

中共皖南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及其领导下的斗争。1930年湖北黄梅县农民暴动失败后，一部分中共党员撤到了江西和安徽的皖南山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黄梅县的早期党员岳子樵、胡永授等辗转到了青阳境内的凌阳镇，以帮助湖北同乡程象贤家放牛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展党员工作。到1932年，便先后发展了宁坤山、张钧贵、程象贤、陈若愚为党员。还以行商为名活动于泾县、石台、太平、贵池等地，同时发展了一批党员，但均未成立组织，没有上

级党组织的领导。1933年6月，岳子樵、胡永授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取得了联系，上海中央局派程智仁到青阳，岳子樵、胡永授向程智仁详细介绍了他们在青阳、泾县、贵池等县发展党员及党员分布和活动情况。接着程智仁召集青阳同志开会，传达了上海中央局的指示，使青阳地区党的发展工作更加迅速，不到半月，仅陵阳地区就由原来的几名党员发展到20多人，并成立了党小组。1934年元月，在程智仁的主持下，建立了中共陵阳支部，由宁坤山任书记。接着，岳子樵在庙前主持了中共庙前党支部的成立大会，向彩华任书记。此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1934年2月，经上海中央局批准，成立了“中共皖南工委”，程智仁任工委书记。岳子樵负责宣传，宁坤山负责农运，张钧贵负责组织，陈若愚负责青运，曹耐寒负责妇运。“中共皖南工委”组织活动方式是秘密隐蔽的，规定每个党小组以3人为限，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还规定了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等负责人的职责范围。“中共皖南工委”成立后即在各地开展革命活动。领导了庙前和木镇的抢粮斗争；组织了木镇农民砍伐地主的树木变卖钱款买粮度荒；在木镇组织八家油坊工人罢工。1934年国民党开始修筑殷（家汇）屯（溪）公路，国民党修筑这条公路的目的是为对中央苏区发动新一轮“围剿”。皖南工委组织了“七县民众反对修路大同盟”，动员七县民众一夜之间将修路用的测量标记等全部毁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扩大。1934年7月，国民党青阳县政府和驻皖南的国民党八十八师孙元良部，对反对修筑殷屯公路群众进行镇压。由

于叛徒告密，工委领导先后被捕，到1935年4月“中共皖南工委”活动终止。

中共贵池支部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1932年春，胡永授、孙济安等奉上级党组织指令到休宁，后经皖南特委派遣先到青阳陵阳镇，再到贵池境内的茅坦、刘街、海形冲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一批党员，建立组织。胡永授以教书为掩护，在茅坦海形冲发展了丁少明、杨光辉、老程等人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青阳陵阳成立了中共皖南工委以后，1934年3月，成立了中共贵池支部，胡永授为书记，杨光辉、丁少明为委员。直属皖南工委领导。同年7月，皖南工委被破坏，胡永授于年底携眷回湖北，贵池支部活动停止。

第五节 皖南（柯村）红色根据地的建立 推动了贵池棠溪地区的革命斗争

1933年冬，国民党蒋介石调动十万兵力部署在闽浙皖赣苏区周围，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苏区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以方志敏为书记的闽浙赣省委制定了“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卫基本苏区，同时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区”的基本战略方针。1934年1月24日，闽浙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白区工作发展苏区的决议案》，动员全省党组织加紧开展白区工作，在2月至4月的3个月中，全省计划发展150个新的秘密区委，皖南特委要建立40个秘密区委，各县委要在规定的期限完成任务，为开辟新苏区作准备。

1932年年底，赣东北省委派宁春发到皖南，加强皖南党的工作。将徽州工委改为中共皖南特委，归闽浙赣省委（由赣东北省委易名）领导。1933年6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小练惨案”，皖南特委机关遭破坏。但下属的党组织仍在坚持秘密活动。1933年冬，皖南特委重建，李杰三任特委书记。在屯溪上街合记春药店建立特委秘密机关。1934年1月，闽浙赣省委举办白区工作训练班，为迅速打开周边白区工作局面培训干部。训练班结束后，刘毓标、陈直斋等一批苏区干部被派到皖南，加强皖南的领导力量。在创建新苏区的方针指导下，皖南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34年初先建立了石青太中心县委，辖太平县委（书记韩锦侯）、青阳县委和石台毛坦河区委。1934年6月，在石青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了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刘毓标），辖石埭县委、泾县县委和黟祁县委，党的组织有大的发展。在贵秋东地区，于1934年春建立了贵秋东中心县委，发展组织领导贵秋东地区革命斗争。在闽浙赣省委的领导下，皖南土地革命掀起了高潮。

1934年7月，中共太平中心县委决定在祁门、石台、太平、黟县边界地区举行暴动，并得到闽浙赣省委同意。由于消息走漏，中心县委决定争取主动，提前举事。暴动指挥部设在太平县委所在地拜祭堂，韩锦侯任总指挥。8月21日晚，太平柯村（今属黟县）附近农民举行武装暴动，镇压土豪，摧毁国民党乡政权和武装。接着，在暴动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柯村周围纵横百余里区域的农民纷纷响应，掀起暴动高潮，参加的农民达3200余人。9月1日，中共

闽浙赣省委一支 300 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和一批干部到达柯村，支持暴动，建设新苏区，不久，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宁春生任主席。

皖南苏维埃红色根据地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贵池棠溪地区革命步伐。1934 年元月，檀炳光来到皖南苏区，在苏区进行政治学习，1934 年 6 月，柳真吾、王丰庆、周成龙、匡龙海等率领的挺进师，转战皖赣地区后，组织了赣北特委，柳真吾为书记。同年秋，领导了浮梁的小源武装暴动。暴动后，赣北特委改名为皖赣特委，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皖赣分局，周成龙为司令员，下辖一个独立师，王丰庆为独立师政委，匡龙海为师长，檀炳光为参谋长。这次暴动不久，国民党集中了几个主力师和地方保安团进攻小源苏区。挺进师主力大部分於 35 年初撤出苏区，转到贵秋东和都湖鄱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辗转于皖赣之间坚持斗争的周成龙、匡龙海、王丰庆最后在至德山区与欧阳斌、倪南山部汇合，将部队整编为江南红军独立团，团长匡龙海。1935 年 1 月，由红军独立团团长匡龙海、参谋长檀炳光率领的并配有轻重机枪的 400 余人，来到留田，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红军一到，群众情绪十分高涨，革命声势大振，地主豪绅异常恐慌，纷纷逃入贵池、青阳城内躲避。各区组织了几千人参加暴动，并从农民团中抽调一批骨干，组成“扁担队”（因他们都是携带扁担而得名），配合打土豪。使贵池棠溪年关“留田暴动”成功。

第六节 方志敏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

促进了贵池棠溪地区的革命斗争

方志敏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继续入侵热河和长城各口，进犯察哈尔、冀东，威胁平津。面对日寇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面对日寇的侵犯退让妥协，一面加紧镇压工农革命武装。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围攻中央苏区。面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新变化，1934年6月下旬，中央决定将红七军团部及所辖第十九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偏远的浙皖赣边创建新的苏维埃区域，一方面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一方面到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

北上抗日先遣队全军共陆千余人。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栗裕，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7月7日从瑞金出发，经福建、浙江两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9月25日抵达皖南。10月8日，先遣队与皖赣分区率领的皖赣红军独立师在浮梁程家山会师。10月底，先遣队全军将士南下，冲破国民党军两道封锁线到达赣东北苏区的德兴县重溪。

1934年11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军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11月18日，中

央军区电令，为加强大部队外线作战的领导，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 5 人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同日，红十军团出征皖南。后蒋介石获悉红军先遣队集结汤口，急调浙皖赣三省军队“会剿”，红十军团在转战谭家桥战斗中失利，取道旌德庙首、泾县茂林、太平新丰、青阳陵阳，石台雍溪一线行进。12 月 18 日，部队到达皖南苏区的中心柯村休整。方志敏在柯村召开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总结谭家桥战斗的教训，布置皖南工作。决定留下近千人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加强皖南，聂洪钧任皖南特委书记，红十军团侦察营与皖南地方红军武装组编皖南红军独立团坚持皖南游击斗争。休整三天后，部队在皖南与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 年 1 月 9 日，红十军才决定先遣队全军南返，月底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围攻失败，方志敏被捕后牺牲，粟裕率 800 多名红军将士突围到浙南开展游击斗争。

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促进贵池棠溪地区的革命斗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青阳南阳向太平柯村苏区行进时，遇到棠溪红军驳壳队，方志敏当即决定分兵由红十军参谋长匡龙海组成一个独立团，由驳壳队指引进入贵池开展斗争。这支由匡龙海（红军独立团团长）、檀炳光（参谋长）领导的红军独立团，在棠溪地区打土豪、惩恶霸，烧地契，协助中共贵池县委建立恢复区、乡党组织、群众组织，组建游击队，指挥攻打留田保安中队，取得了“年关留田暴动”的胜利。凡独立团所到之处，都留下了革命火种。“条牛担种我不问，田地没有跟我混。打倒土豪分田地，气死地主和劣绅；保

甲长、颈子痒，红军到，头要掉”……这些革命歌谣，正是当时贵池这块热土革命斗争的写照。

方志敏在柯村曾指示皖南特委“这里的苏区离中央苏区太远，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单独搞个苏区不合适，要把苏区改为游击区”。根据这个指示，部队最初任务，在柯村周围活动，然后，再向青阳、东流、贵池、泾县等地开展工作，扩大游击区。1935年初，周成龙、王丰庆、匡龙海率领皖赣分区下辖的独立师，与抗日先遣队的江天辉在江西婺源山历山居口汇合之后，6月又转移到贵秋东地区，会合了在这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的黄翠山、倪南山、江从新等人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贵秋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成功领导了贵秋东第三次武装暴动。史称“中秋暴动”。

第七节 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领导的郑家村暴动

贵秋东中心县委的建立。1930年，参加潜山县清水寨暴动的储希文、储宏家、储奎成、方慕儒等共产党员来到丁香、小河（当时均属贵池县）一带，分散隐居在偏僻的小村庄里，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初，他们聚在一起建立了中共郑村支部，并进行了分工。储希文以教书为职业，住红石，负责在红石一带开展活动；储宏家以缝纫、做纸为业，住存田，负责在存田、象鼻石一带开展活动；储奎成以教书为业，住井边，负责丁香树、井边的工作。1930年5月，吴介唐来到郑村，与储希文等取得了联系。当时，丁香树一带帮会

势力很大，其中贫苦农民多数参加了青红帮。为了解情况，发展党员，支部决定储宏家、储奎成、方慕儒分别打入青帮、红帮。不久，在帮会中发展了胡绍箕、闻宗周入党，并发展了积极分子周结喜、胡双喜、李中信、王根炎等二百余人。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存田、井边也建立了党支部，这样三个支部共有党员十六人。同年11月，工作开展到了棠溪、留田、栗阳街、小河和秋浦的高山、九都及东流的迭山青峰，并与原秋浦县委的九都支部取得了联系。同月，在郑家村成立了区委会。区委书记吴介唐，委员储宏家、储希文、储奎成、闻宗周。1932年初，吴介唐到芜湖与芜湖中心县委接上了关系，从此，在芜湖中心县委指导下，于1932年2月，建立中共贵秋东县委。吴介唐任书记，储希文任组织部长，储奎成任宣传部长，储高佩、储宏家、储茂华为委员。县委下设丁香、留田二个区委及张家滩特支。

不久，贵秋东县委与芜湖中心县委联系中断。但在贵秋东县委领导下，组织工作仍进展顺利，8月，党员发展到三十余人，基本群众达三千人，并组织了九个农民团、两支游击队。1932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储奎成被劣绅胡可权带团防队抓住杀害，储宏家在葛公被捕，惨遭杀害，吴介唐等人转入地下。年底，吴介唐、储希文先后到石青太地区工作，贵秋东县委停止了活动。

贵秋东中心县委领导的郑家村暴动。1934年3月间，闽浙赣省委派省总工会干部夏金良和黄天贵等一批干部到皖南工作。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贵秋东地区党的组织和活动地区有了扩大。同年下

半年在中共皖南特委的领导下，将过去在贵池丁香树郑家村成立的贵秋东县委改称贵秋东中心县委，夏金良任书记，黄天贵任副书记。建立三个区委组织：第一区地点在钱坑，所辖莘田坂、红石潭、郑家村等地（今属石台），区委书记闻宗周；第二区地点在项铺，所辖张家村、项铺、小河等地（今属石台），区委书记查某某；第三区地点在十里坂，所辖丁香树、十里坂等地（今属石台），区委书记刘某某。

这年古历年底，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在留田（今属贵池棠溪镇）举办骨干训练班，作暴动准备，并决定选择土豪劣绅忙于过年的时机行动。腊月 22 日，夏金良从留田来到钱坑，向闻宗周传达了上级同意暴动的意图，并说这次暴动将得到皖南黄山红军的支持。闻宗周也当即向夏金良汇报：他们准备腊月 30 日晚上，将当地十大户劣绅一网打尽的暴动计划。但叛徒彭根炎泄密，有的劣绅闻风逃跑，并扬言带队伍捉拿他们。夏金良听后当机立断，决定“先下手为强”，提前举行暴动。

同年腊月 23 日，在贵秋东党的各级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一支八百多人的农民队伍，携带土枪或刀、矛，于腊月 25 日聚集在郑家村祠堂内，树起一面大旗，宣布暴动。他们首先将电话杆砍掉，马上抓获土豪柯茂林，缴获长短枪 20 余支。腊月 26 日，农民队伍在莘田坂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闻宗周在会上号召大家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当天，国民党军队闻讯后，立即到洋湖碑（今东至县）进行“清剿”。闻宗周等即同夏金良研究，立即

将队伍转移到了陈山寨。当天晚上，国民党军队尾追至莘田坂，暴动队伍又转移到柳河边，并抓住叛徒彭根炎，就地处决。1935年2月1日（腊月27日），皖赣红军独立团来到这里，打了一些国民党军队武装据点。闻宗周等人闻讯后，辗转查立坑、丁香树，于腊月28日与红军独立团在大井边会合。这一天，农民团一、两千人以郑家村为中心，包括虎山胡家、东岗、红石潭、高山、九步岭、石岭、钱坑、安平小河、十里坡等地，纵横六十余里，把境内地主、豪绅、乡长、保长大部分都抓了起来，并且把他们家里的粮食和年货分给贫苦农民。后由檀炳光（红军独立团参谋长）自贵池境地内带20多名红军战士和农民团武装及大批群众，两次到桐坑（今石台）打土豪、分浮财。将当地土豪彭子豪、彭子春、彭白熙、彭南仲等家的粮食一万五千斤分给了贫苦农民，还活捉了土豪彭英豪。在这次暴动中，贵池南部一带，处决了少数地主、恶霸，分了一些地主、士绅浮财。以郑家村为中心的暴动取得成功之后，在留田苗竹柯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苏区各地开始烧毁田契。有些地方着手插牌分田，如来田、喜田、松亭、西山等村都进行了这一工作，但因国民党军队清剿，没有分成。

然而，丁香树、牌楼、高坦等地方武装和贵池县县中队陈鼎彝率领的保安队，在安庆独立营的支持下，疯狂反扑，尾追不舍。这时，皖赣红军独立团西进到贵池高坦附近，又被国民党军队拦阻。因此，暴动队伍内部慌乱起来，农民团于正月初二在栗西坑被打散。中心县委书记夏金良不知去向，闻宗周外走。历时九天的郑家村暴

动最后在贵池西南的湖山坑被镇压。贵秋东中心县委领导的郑家村年关暴动，有力的支持了棠溪地区的革命斗争。而先于皖南地区的郑家村年关暴动的贵池棠溪“年关留田暴动”应该是皖南地区郑家村年关暴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家村“年关暴动”的失败，又是导致贵池棠溪“年关留田暴动”失败的直接原因。

第八节 贵东、贵秋县委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继续领导留在南方遍及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4月，从皖赣苏区转移到贵秋东的周成龙、匡龙海、王丰庆以及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余文先、江天辉和坚持在贵地秘密活动的欧阳斌、黄天贵、江从新、黄翠山、倪南山等三方面组织结合在一起，共同创建了以高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六月，建立了中共江南特委、贵东县委、贵秋县委和贵祁县委，组建了江南红军独立团以及各县游击队、赤卫队。在贵秋东边区举行了中秋节暴动，推翻了当地反动政权，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部分力量，支援了坚持南方地区红军的游击战争，为开展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

一、高山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第二次贵秋东暴动失败后，红军在皖赣之间周转了几个月，最后选择贵秋东边的高山建立根据地。高山地处长江南岸，离安徽省府安庆七十公里，距第八行政公署贵池八十公里，到至德县城四十公里。高山方圆八十五公里，横跨现在的东至、贵池、石台、祁门的一部分。由于地处省县交界，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境内层峦叠嶂，河流纵横，交通不便，对红军开展活动较为有利。

高山地区人民长期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反动军队的摧残，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强烈的反抗精神。自大革命以来，这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1932年和1934年，这里举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暴动，并建立党政军组织。即使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受挫折，贵秋东中心县委领导的年关暴动失败的1934年底，这里的红军游击队仍然坚持游击战争。高山地区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烈火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良好的条件，使展转皖赣之间，寻找党组织的周成龙、江天辉部与高山当地的黄天贵、倪南山部汇合，共同创建了高山根据地。

二、高山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的建立

（一）建立和恢复祁秋贵中心县委、贵秋东中心县委

1935年初，从皖赣苏区转移到贵秋东的周成龙、匡龙海、王丰庆等，在婺源的营笋山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来的余文先、江天辉的部队汇合后，又与在当地秘密坚持活动的黄天贵、倪南山、欧阳斌、江从新、黄翠山等取得联系，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省县交界的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高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以高山为中心，通过向四周扩大游击范围，发展党员，使原来的党组织得到了很快的恢复与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先后在黄村、姚村、青峰岭、丁香树、炼丹石成立了党支部。

1935年2月，由周成龙主持，在姚黄召开祁、秋、贵、东四县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祁秋贵中心县委，恢复贵秋东中心县委。黄南山任祁秋贵中心县委书记。县委驻姚黄后转移到祁门炼丹石。黄天贵继续任恢复后的贵秋东中心县委书记。会议同时决定，力争五月底前，把贵、秋、东、祁的工作全面推进。两个中心县委的建立和恢复，促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大，从而为江南特委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共江南特委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1935年4月，由于江西方面的国民党军队，正忙于尾追红军主力，“清剿”苏区，一时无暇顾及皖南。“清剿”皖南红军独立团的国民党安徽保安旅楚团到芜湖调防，途中互相倾轧，团长楚某某遇刺，内部矛盾激烈，一时也不能回防。在贵秋东这块土地上，国民党的兵力薄弱，空隙很大。祁秋贵和贵秋东两个中心县委和部队负责人乘机扩大游击根据地，使高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为了统一领导，更快推动贵、秋、东、祁的革命斗争向前发展。1935年6月，在闽浙赣省委常委、保卫局长滕国荣的帮助下，在高山成立了中共江南特区委员会，先后由周成龙、王丰庆、欧阳斌、黄天贵、余文先、倪南山、江从新等人组成。周成龙（原闽浙赣省委委员，工农

检查部部长)为书记,王丰庆(后余文先)为组织部长,黄天贵为宣传部长,王丰庆为军事部长(兼),马加全、余文先、黄天贵(后)为白区工作部长(兼),江从新为财政部长,何少奇为少共书记,江小妹为妇女部长。中共江南特委成立,对原有党组织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取消了贵秋东和祁秋贵中心县委,先后成立了贵秋、贵东、贵祁三个县委。接着,江南特委统一了军事指挥,将活动于皖赣边区的三支红军队伍,即长江游击大队,皖赣游击大队、皖赣红军独立团部分人员共五百七十多人,整编为江南红军独立团,团长杨艳溪,政委王丰庆,参谋长杨春标。为了发展地方武装,特委从独立团抽调五十多人分配到贵秋、贵东、贵祁三县中组建游击大队,归各县委直接领导,统一称为江南红军第一、第二、第三游击大队。游击大队成长很快,到1935年底已发展到150人。在发展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 贵秋、贵东县委的成立

在中共皖南特委的领导下,1935年7月上旬,在高山成立了贵秋县委。县委书记余文先(兼),下辖五个区委,其基本活动区域均在今东至县和石台县境内,县委设有组织、宣传、军事、财政、妇女等部。其中第五区委部分活动区域在今贵池县境,五区区委书记檀接根。

贵东县委与贵秋县委同时建立。地址设在东流青峰岭附近的罗汉塘,县委书记黄天贵(兼),组织部长陈某,宣传部长陈某,军事部长朱西如,内务部长洪如生,妇女部长操海花。下辖八个区委,

其中一、二、四、六、八区设在东流县（今属东至），三、五、七区设在贵池县（今贵池区）。第三区委书记吴吉，区委机关设在桥头湖。该区辖中共洪坝乡支部（书记：陈文长）、中共石坡乡支部（书记：汪月和）、中共八角亭支部（书记：张保玉）；第五区委书记张炳南，区委机关设在贵池县一里张村；第七区委书记汪子凤，区委机关设在贵池唐田乌子山。

三、贵秋东中秋暴动和江南特委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暴动前的军事活动

江南红军独立团和游击大队成立后，积极向外出击，不断打击敌人。如在九都伏击国民党保安队，几战皆捷，缴获甚多。皖赣独立师在匡龙海师长率领下，积极向贵、秋、祁、浮等县边区行动，给各地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其中红军独立团在贵池殷汇地区斗争的胜利，影响最大。

丁冲伏击战。1935年古历7月，红军在牌楼的竹塘丁冲消灭了一股国民党军。战斗前就活捉该区区长1人，缴获手枪1支，步枪5支。并得知国民党一个连带领牌楼等地的土豪劣绅返回牌楼，红军独立团政委王丰庆，利用丁冲两山夹一洼的有利地形，把部队埋伏在两边的山上。国民党军辛连长带领200多人（其中100多土豪劣绅），来到冲中，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独立团发起攻击，国民党连长首先被击毙，其余乱成一团。红军猛冲猛打，很快结束战斗。国民党军队除被打死30多人外，其余大部分被俘。缴获步枪32支，子弹500发。独立团领导考虑国民党军队一定会来报复。于是，派

一个连的兵力埋伏在茅岭头，做好迎战国民党军队的准备。一会儿，几十名国民党士兵在其军官的指挥下向红军茅岭头阵地进攻。红军居高临下，打退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国民党军队死伤惨重，红军却无一伤亡。

奔袭殷家汇。殷家汇为贵池首镇，距省城安庆、县城贵池各60华里，又是沿江进入徽州地区的门户。同年8、9月间，红军独立团在王丰庆政委率领下，从高山石门口奔袭贵池殷家汇。歼灭1个保安中队，烧毁碉堡1个，缴枪45支，还缴获很多布匹、西药、鞋袜等。这些战利品全都运到了苏区。此次奔袭，影响极大，威胁了贵池县府，震动了安庆省城。

巴茅田突围战。1935年9月间，红军独立团行军到贵池巴茅田时，由于引路人告密，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红军独立团领导当即决定，实行轻装，集中火力，选择突破口，战斗打响后红军独立团领导亲自端起机枪，开辟突围通道。红军战士奋力冲杀。打得国民党军队四散逃命，终于撕开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冲出了重围。但有十多个红军战士英勇牺牲了。皖赣独立团冲出重围后积极向贵、秋、祁、浮等县边区进军，给各地国民党军队和保安队以沉重打击。红军独立团和县游击大队、民兵相互策应、配合，为贵秋东地区的农民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该地区武装保安队有的被消灭，有的被赶走，豪绅地主都逃进县城或国民党军队据点。江南特委乘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建立党团组织。扩大根据地。

（二）培养和训练骨干，宣传和发动群众

暴动前，除军事活动外，江南特委还认真总结贵秋东前二次暴动失败的教训。为取得暴动的成功，当务之急是培养和训练干部。从1935年7月开始，特委举办了骨干训练班，主要对象是区委负责人，支部书记和积极分子。分两期进行，每期15—20天，人数60—80人，男女兼收。地点高山东坑，后转北山四房，再迁马乌石。课程有：党的建设——支部工作、白区工作及方式方法；政府有关政策——土地分配法、婚姻法；群众工作——怎样走群众路线；《工农民主专政大纲》等。训练班由欧阳斌负责。周成龙、王丰庆、余文先、欧阳斌等领导人当任教员轮流讲课。同年8月，特委还在贵池小南坑培训了20多名妇女干部。在训练骨干的基础上，特委、各县委主要负责人先后召开干部会、代表会和群众大会，号召“穷苦农民起来革命”、“公开起来暴动”，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分配”等口号。在宣传发动的同时，组织好农民武装。除建立游击大队外，各乡村还组织赤卫队和农民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上名字”，使参加农民团的群众遍及贵秋东广大地区。

（三）建立隐蔽区，作长期坚持准备

江南特委认真总结了前二次贵秋东暴动的经验教训，在秋浦的老山陈家，贵池、秋浦县委领导下的第三区没有安排农民武装暴动，目的是有计划保留一个秘密工作区。以防止国民党军队封锁时，可以通过秘密工作区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便于从那里向外购买必要的物品。为长期坚持斗争作准备。

(四) 中秋暴动

1935年农历八月十五(1935年9月12日),在中共江南特委领导下,贵秋东地区爆发了第三次农民武装大暴动。史称“中秋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农民近五万人,起义风暴席卷了以高山为中心,东起贵池狮茅岭,西至东流白水张家,南从秋浦鸡头岭,北到贵池济公岗纵横七八十里的广阔区域。武装农民推翻了根据地及其周围的国民党基层政权,解除了自卫队武装,使以高山为中心的贵秋东边区的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随着中秋暴动的胜利,根据地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建立起来。1935年9月15日,在北山欧四房村建立江南特委苏维埃政府。主席欧阳斌,肃反委员会主席倪南山。特区苏维埃政府设有土地部、交通处、煎硝处、制服厂、医院等机构。紧接着成立了特区总工会、妇女会、共青团、互济会等群众组织。

四、贵东县委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一) 贵东县委领导下的早期革命活动

贵东县委领导下的早期革命活动。早在1934年底,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在领导郑家村为中心暴动的同时,就委派聂介石到贵池唐田徐家坡以帮人打铁为掩护做秘密工作,从事革命工作。先后动员了张炳南等三十多人参加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后在贵东县委领导下,配合红军独立团攻打唐田街和吴田铺,在唐田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1935年5月,唐田、牌楼一带发动农民“上名字”,唐田、牌楼群众以不同方式积极报名,一户一人,有的一家父子、弟兄同

时报名，组成了数十个农民团。红军独立团匡龙海团长率队攻打牌楼、殷家汇等地时，贵东县委指示该地区的农民团予以积极配合。这支农民队伍从八一、佳山、牌楼、丰收、狮茅岭，一直打到殷家汇，烧了恶霸陈鼎彝的店屋、油坊和牌楼乡公所、丰收地区的土豪劣绅的房子，并处决了一个土豪和一个伪保长。农民团的兴起为以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贵东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及其革命斗争

“中秋暴动”胜利后，1935年9月贵东县苏维埃政府在茅岭许家冲（今属东至县）正式成立，主席张士其，肃反委员会主席周作仁，财政部长何开元，交通部长陈得金，土地部长洪简伢。同时，成立了江南红军第二游击大队，队长陈狗汉，团委书记殷普旺，儿童团长蔡春苗。贵东苏维埃成立时，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敲锣打鼓，呼喊口号，纷纷送匾祝贺，上面写着“赤化江南”、“拥护苏维埃”等内容。妇女会还送了花生、玉米、蚕豆和鞋等。会上还喝了鸡血酒，誓言是：“以苏维埃政府为领导，打倒土豪劣绅，创立贵东县苏维埃政府”。在牌楼大南冲、东冲、烈山、北山、四房村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特委、县委负责人发表了演说，会后立即行动，矛头直指土豪劣绅。

贵东县苏维埃政府下辖8个区苏维埃政府。其中一、二、四、六、八区苏维埃政府在今属石台县、东至县境内；三、五、七区苏维埃政府在今属贵池区境。

在八一大坑岭（今属唐田镇）成立了三区苏维埃政府。苏维埃

政府主席汪月和。下辖洪坝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孙荣春（先）、孙子福（后）；石坡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新民；八角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姓名不祥。

在一里张村（今属唐田镇）成立了第五区苏维埃政府。在乌子山（今属唐田镇）成立了第七区苏维埃政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贵秋东地区的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地主武装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贵东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土地委员会和贫农团进行土地分配工作，分配时以区或乡为单位，将土地分为四类：一类田是最好的，分给红军和雇农；二类田是比较好的，分给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贫农；三类田为一般的，分给较富裕的中农和生活比较好的农民；四类田为最次的，分给地主、富农和已处决的反革命家属。山场分配的原则：在山分山。凡原来种山或靠山生活者，在土地分配时又不愿意种田者，可以多分山，少分田或不分田。至于油坊、糖坊、酒坊、麦坊等，统由苏维埃政府经营或指定专人经营。

按照这种方法，使绝大多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山场。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更加拥护共产党，信赖红军。在特委的领导下，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毁神庙，唱土地革命歌，与旧的封建势力作决裂，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许多青年妇女剪短发、放大脚，到处是欢歌笑语，山区面貌焕然一新。根据地人民得到了解放。

贵池境内的三区、五区、七区所辖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队伍浩浩荡荡的开往扬名村打土豪，将大地主汪开文家的粮、油、猪、

田一起分光，接着又开往牌楼大地主赵恩和家，分了他家的田，许冲地主的田也被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并且都在田头插上竹牌子，写着分得土地农民的姓名。土豪劣绅纷纷逃亡外地。贵东县委在贵池境内还领导红军和农民团围攻牌楼店上国民党的土围子（同时围攻张溪国民党土围子），围了一多月，11月12日正当国民党土围子里的军队准备将枪支棚起，缴械投降，并准备杀猪打开围子迎接红军时，三区的游击队长叶荣海、大队副朱家恒、营长郑金金等叛变，先后将贵东县军事部长、攻打店上土围子的总指挥朱显玉、三区区委书记吴吉和四区区委书记严忠良等同志抓到，送交国民党当局邀功。这些同志立即被国民党军队杀害。致使农民团围攻店上土围子战斗失利。由此，贵东三区、五区、七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受挫。

五、贵秋县委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贵秋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及其革命斗争。“中秋暴动”后，贵秋苏维埃政府于1935年9月在高山成立，主席欧阳斌，财政部长黄时贵，肃反委员会主席晏望宝，江南红军第一游击大队队长毕禄望，少共贵秋县委书记苏宏法。下设五个区苏维埃政府。其中第五区苏维埃政府现属贵池境内，其余均属东至、石台县。在贵秋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贵秋地区各级政权进行土地分配。极大地调动农民的革命热情。“中秋暴动”后，正是高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红色区域扩大到东起丁香树，南达雁落坡，西到高低岭，北抵殷家汇，纵横百里，人口数万，横跨贵（池）、至（德）、东（流）、祁（门）、石

（台）五县的广大地区。江南特委机关从高山顶上迁至地势较平坦的马坞施。

六、保卫根据地的斗争

高山革命根据地是在主力红军长征以后，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军队不断“清剿”的严峻岁月里创建的。

正当根据地土地分配进行时，1935年冬，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调集两个团的兵力，向高山苏区进行“清剿”。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保安旅从东流县城向张家滩、侯家店推进，攻占贵东县苏维埃政府，得手后向高山苏区逼进。二路是保安三团由尧渡街向洋湖、葛公、项街推进，向高山逼进。企图在高山消灭红军。193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围攻马坞施，不久，贵秋县委书记余文先、贵东县委书记黄天贵负伤在东流地区被捕，马坞施失守。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江南特委以高山附近的老山村，火龙坑为中心，成立高山中心区委，江天辉任书记，继续领导贵秋县开展工作。同时，红军部队配合农民团在牌楼、塘埂、丁冲一带，击溃了保安一、二团的进攻，并取得了“金塔”保卫战的胜利。十月底红军在赆田伏击战中失利，江南特委撤至高山石门口。紧接着，国民党调集十路军陈营、楚营和安徽的保安旅，进行更大规模的清剿，红军和游击队伤亡严重。1936年初，国民党军队攻占高山。许多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党员干部被杀害。高山革命根据地全部丢失，周成龙离开了高山去找皖浙赣省委。特委机关和红军独立团分散游击。国民党武装镇压的同时，还派遣特务、叛徒、密探，进行收买引诱群众。同时发布七“条”

禁令：通“匪”者杀；窝“匪”者杀；见“匪”不报者杀；替“匪”通风报信者杀；替“匪”送粮带路者杀；替“匪”宣传煽动者杀；当“匪”者杀全家。进入高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焚毁房屋一百余间，数百名群众惨遭屠杀。1936年3月，江南红军独立团，特区保卫队和游击队、赤卫队，重新组成江南游击总队、江南游击大队。这两支不足千人的红军分别由王丰庆、江天辉率领，先后两批“洒着热泪，撤出了高山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江西彰公山找皖浙赣省委。至此，在贵秋东这块富有革命传统的土地上，屹立了四个月之久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宣告结束。

不久，先后从高山撤出的江南红军独立营（营长黄国太、政委江天辉，特派员倪南山）、江南红军挺进纵队（由杨春标率领）、江南红军挺进大队（王丰庆率领）共五百余人，在彰公山找到了闽浙赣省委。从此，他们与关英、刘毓标率领的皖赣红军独立团会合，共同在武山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2月，陈毅来到祁门舍会山，这支队伍接受整编，改称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三营，又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第 三 编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第七章 贵池沦陷与抗日救亡

第一节 贵池沦陷与日军的罪行

一、贵池沦陷的经过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二十九路军）发动攻击，第二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从此开始。经过充分准备的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继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北平、天津先后被日军占领。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3个月后攻占上海。12月，占领中国首都南京，接着攻占芜湖。1938年初，日军沿长江西进，力图扫清长江两岸中国驻军的阻止，以图占领武汉，摧毁中国抗战重心。贵池素为引荆楚、控吴越的江左军事重镇。1937年8月，上海淞沪会战后，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四后方医院迁贵池，驻池州师范学校（校址：城西杏花村）。淞沪国民党战场大批伤兵运到贵池。此时贵池成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后方。日军势在必拔。1938年7月13日至15日，日本侵略军每天出动飞机二十多架次对贵池县城和沿江乡镇轮番轰炸。贵池县城重要街区一片火海。郭西街至丁家巷商业区街

面建筑物、西门外高大建筑群西庙、池州师范校舍（杏花村）悉数被毁。平民伤亡严重。大火数日不息。7月15日至16日，贵池殷汇镇连遭数十架日机轮番轰炸，千年古镇房屋被毁，血流成河，浓烟烈火四起，数日不息。

在日机的轰炸下，贵池县城、殷汇镇及沿江的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亡里山、白洋、灌口、高坦山区。

1938年8月1日，日军第六旅团一部乘七艘军舰突然从贵池的仰口、马踏石、李阳河一带大举登陆。

驻防安徽沿江南岸西部的江防部队是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一军所属五个师两个旅的四川部队。该军驻防池州的为一四五师（师长孟浩然，副师长许之白）、一四七师、新七师和配属该部的少量炮兵。

当时驻防马踏石、李阳河的是国民党一四五师和新七师各一部，见日军登陆，奋起阻击，击溃入侵日军，重创日舰，迫使日军退走。但日军不甘失败，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中国军队不敌后撤。接着日军进攻乌沙夹、高脊岭，国民党军新七师二旅孟承仁部在乌沙夹、高脊岭一带与日军相峙，大小战斗十多次，营长樊德昌等30多名官兵殉国。

日军在马踏石登陆的同时，又在江口附近牛形山登陆。牛形山濒临长江，扼长江航道，驻有国民党军一个营。日军为保长江航道畅通，进犯牛形山，遇到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交战十多天，双方死伤都很多。久攻不下的日军又出动飞机轰炸，扫射牛形山中国驻

军阵地。山上守军伤亡严重，减员很多。一天早晨，日军以为牛形山上没有中国军队了，几十名日军乘一艘汽艇，在洪家冲（今江口同义）登陆，准备占领牛形山。当日军快到山顶时，守军重机枪突然响起，几十个日军立即毙命。日机再度侦察，发现山上人数确实不多，又开来两艘汽艇日军，向牛形山进攻。由于众寡悬殊，中国军队弃守牛形山。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中国军队又增派三个连队复夺牛形山，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几十名驻守日军被消灭。牛形山又被夺回。直到长江防线全部南撤，牛形山才陷落。此战中国四川军队虽弹药紧缺，兵力不足，孤军作战，但在日军面前并未示弱，坚持与日军浴血奋战，坚守阵地。

1938年10月22日，日军由牛头山经殷家汇向东进犯，贵池抗日民众自卫军两个中队在队长彭萌清、张建武的率领下协助国民党军（四川籍）据守青峰岭、百牙山、猫儿山（一二七高地）等前沿阵地，指挥所及配属炮兵阵地设在齐山。是日，日军调集3个联队向贵池城外围进犯。中国军队据险抵抗，设在齐山的一四六师炮兵营炮击日军，日军未能得手，退往李家山。次日，日军强攻贵池城，向青峰岭、猫儿山、百牙山发起猛烈进攻，出动飞机轮番轰炸。中国军队新七师与日军进行拉锯战，持续5昼夜，贵池城外围阵地失守。此次战斗，中国军队伤亡100余人，1名副营长负伤，2名连长牺牲；日军伤亡40余人。

10月27日，日军三路围攻县城，中国守军新七师某部半夜炸毁南门通济桥，南撤。28日，日军占领贵池城，贵池县城沦陷。

同年底，梅埂、江口、馒头山、马衙、池口、乌沙夹、殷家汇、唐田等 19 个乡镇先后为日军占领。沦陷区人口计 135729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50%。1939 年 12 月，县境殷屯公路以北地区全部沦陷。日军占领贵池沿江地区后，在贵池境内设立了 50 多个据点。从此，日军开始了在贵池沦陷区长达 7 年之久的法西斯统治。

二、贵池县府的三迁

从 1938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一百多架次轮番轰炸贵池县城开始到日军 10 月 28 日占领贵池城，驻贵池国民党二十一军的一四五、一四六（师长刘北蔡）、一四七师（师长机国祯）等部分部队，虽在贵池民众支持下，奋起抵抗，但终不敌日军，退守本县南部山区。在日军进攻贵池之际，七月，县长张权、县党部书记吴必德同几百名县常备队随国民党县政府迁到南部山区新开路（今属梅街镇）。县府南迁后，贵池县各界奉令疏散。居民中的清贫者，一般逃往清溪、里山，富户逃往桃坡、乌石山，有钱阔老逃往峡川、元四等安全地带。商民分散在白洋、潘家桥、梅街一带做小生意。县立小学、中学也随迁南部山区。

新开路离贵池城仅 45 华里，由于遭受日机空袭，国民党贵池县政府在此仅作了两个月的停留，二次南迁至离县城 80 余华里的刘街，刘街离第八行政专署较近（1938 年 7 月，第八区专员公署由池州迁青阳县南阳湾），到达刘街后，在这里着手恢复建制。

1940 年 4 月，青贵战役爆发。青（阳）贵（池）战役是国民军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在皖南地区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较大的

一次战役。其范围涉及到南陵、贵池、青阳等县。1940年春，日军一架轰炸机自南京起飞轰炸武汉返航途中，被中国军队高射炮火击中，在贵池刘街附近上空坠毁，机上两名驾驶员跳伞落地受伤，被驻地国民党军包围后，举枪自杀。驻池日军闻讯后，为夺回这两名驾驶员的尸体，更为打通青贵交通线，从芜湖、安庆、大通等地调集4000多日伪军，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于1940年4月25日两路向青阳、贵池境内进攻。一路由铜陵、大通集结，沿公路攻青阳县城，越东堡、凌阳、直取太平甘棠镇。一路经贵池的曹溪、灌口、刘街到九华山、凌阳，直指太平甘棠镇。当时驻池州山区防守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有两万余人。其中在贵池刘街一带防守的是国民党一四五师四三四团、四三五团，兵力约5000余人。他们毫无准备，临战张惶失措，仓促应战，一接即溃。4月26日，日军一路攻占了清溪苦竹畈、桃坡、梅街、刘街。27日攻占庙前，进犯九华山。另一路日军攻占了青阳、南阳。进攻日军沿途烧毁民房、庙宇不计其数，任意枪杀农民、侮辱妇女，抢掠财物，所到之处，火光冲天，血腥遍野。29日，国民党第三战区为防日军进攻腹地，才匆匆调整部署，在牛吉岭一线阻止日军，日军无进展，主力于次日经公路返青阳至大通分别转至贵池、安庆、芜湖驻守。青贵战役失败后，第三战区二十三集团军于5月1日在葛林桥、陵阳镇、高坦一线，组织反攻。2日将南陵、青阳、高坦等地相继收复。3日，青阳县城日军向源桥溃退。至此青贵战役结束。计歼日伪军2千余人，国军死伤更为惨重。

青贵战役期间，由于国民党一四五师，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刘街失守，国民党县政府又不得不进行第三次南迁。迁至离贵池城 120 华里的棠溪柯（现棠溪镇棠溪居委会）。县党部、国民党兵团也迁至该地，财政机关、银行迁至曹村，田粮处、邮电局等部门分散在上、中、下留田办公。此次迁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从国民党县政府三次南迁，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的节节败退。

三、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贵池抗击日军

（一）驻贵池国民党军抗击日军

1938 年，日机轰炸贵池沿江地区时，国民党军队除在贵池沿江地区布置陆上防御阵地外，还出动空军、炮兵、袭击日军舰艇，攻击日军长江运输线。

中国战区轰炸机在贵池江面炸沉日舰。1938 年，日军占领安庆后，就积极准备 30 万大军进军武汉，并于 8 月开始了武汉的外围战。长江中来往的日舰非常频繁。是年古历 6 月底，日军 5、6 艘铁甲运输船，正溯江而上。驻守在江口馒头山附近地支庵的国民党炮兵，一次一炮击中其中一艘，当即爆炸起火，其余的运输船仓皇逃跑。第二天日军 10 多架飞机前来报复，在馒头山周围，轰炸扫射一整天。1938 年 4 月 19 日，国民党空军在贵池至大通段江面击沉日军巨型舰 1 艘。1939 年 2 月，中国轰炸机在贵池江面炸毁日舰 1 艘。1943 年 8 月 28 日，日本大型客轮“大贞号”在县境前江口被美机炸沉。根据国民党二十一军参加沿江截击将士回忆：1938 年 8 月至 1941 年 12 月，3 年 5 个月的时间里，炮兵及水雷部队炸沉、

重创各种日本舰艇数十艘。这个材料数据虽不完全可信，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军队在贵池段长江江面上对日军的各类舰艇的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驻贵池国民党军队三攻贵池城。1938年10月，日军占领贵池城后，城内及郊区居民被日军抓去当苦力，在刺刀皮鞭驱驶下，砍树木，建碉堡，筑公路，劳瘁饥渴，鞭笞枪击之下死者不可胜数，铁蹄所至，虽白发黄口亦难幸免。1939年3月起，驻贵池县国军一四五、一四七师，先后三次攻打贵池城，全体官兵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第一次进攻贵池城。1939年9月。驻守贵池城的日军大部分去安庆，只有十几个日军留守。驻守上清溪的国军侦察到这一情况，决定进攻贵池城。一天晚上十时左右，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一路从里山出发，经南湖直抵贵池城下，隐蔽待命；一路从清溪、双桥出发，按预定计划，在包围十里岗日军据点之后，即分兵取道十里岗，借沿途林木掩蔽，向城西一带运动。被包围的十里岗据点（在现苗圃一带）有日军1个排，由于事前剪断了电话线，切断了日军城防与据点间的联络，同时当地有常给日军做苦力而熟悉地形的吴文魁（一说张良高）带路，国军得以迅速铲除岗哨，向据点进攻，当场击毙日军3名，日军向贵池城溃逃。与此同时，经十里岗先期到达西门城下的国军，获知城内日军熟睡后，迅即除掉岗哨，一举攻入贵池城，与城内日伪军展开了巷战。其时，城南一带隐蔽待命的国军，亦奋起攻城，日军凭借明碉暗堡，负隅还击。此时，十里

岗据点突围溃逃的日军，正好逃至城下，城上日军误认作攻城的国军而拼命扫射，使溃逃的日军纷纷中弹倒毙于城下。此次攻城，缴获十里岗日军据点战马 50 匹以及弹药和全部军用物资，缴获城内日军大量弹药及军需品。

第二次进攻贵池城。1939 年 10 月左右，贵池城外南湖水干。国军以一个团兵力，在一天夜里分三路进攻贵池城。一路攻齐山，一路攻十里岗，主要兵力布置在南湖小官山（现在福利工厂边），隐蔽等待发起攻击。日军常驻贵池是一个大队。城里驻一个排（现实验小学），齐山和十里岗各驻一个排。国军第一次进攻后，日军加强了戒备。齐山、十里岗据点都配备了大炮。南门、西门、城墙上配备了十几挺重机枪。拂晓时日军发现了国军偷袭行动，城内外的日军枪炮齐发。国军发现日军早有准备，迅速撤退，在日军密集的枪炮下，国军伤亡 300 多人。

第三次进攻贵池城。1939 年 11 月，国军发起第三次攻城战。其时城内日军已有准备，城墙上、一二七高地（即猫儿山）和范家圩一带山头上都加强了防守。一日清晨，当国军乘大雾进入战斗位置时，天气突然变化，晨雾提前消散，而后续部队正从南湖开阔地带向城边运动，攻城部队全部暴露在日军有效射程以内，日军见状，立即开火，国军伤亡惨重。

1938 年底，驻齐山、斗龙山、牌坊山到青阳源桥一线的国民党军向驻青阳陈家大山的日军发起进攻，后由于国军内部派系倾轧，战斗失利，五十军军长郭勋祺因“不能相机救援”被撤职。

1941 年秋，国民党军在殷汇地区发起进攻日军大团山据点的战斗，因隐藏在国军内部的汪伪汉奸炮手向国军开炮，使战斗失利。营长负伤，伤亡惨重。后汉奸炮手被处决。

在贵池抗战初期，驻贵池国民党军（主要是川军）面对凶残的日军，不顾武器装备的落后和军响的不足，为民族大义所驱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虽未能取得明显的战绩，几乎以失利而告终。但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二）苏联援华飞行员在贵池坠机牺牲

1937 年 10 月的一天，苏联飞行员哥利亚捷夫，奉命飞往芜湖袭击日舰，中午返航时，在贵池上空，遭到三架日军歼击机的猛烈攻击，不幸中弹起火。机身急剧下降。接着，机上俩人跳伞降落在南湖北侧（现杏花村农机厂正南离湖岸约 300—400 米处）。飞机坠毁在南湖南侧（现在的里山街道齐山村潘家垄西侧宜冲山上）。当时驻扎在杏花村师范学校（现杏花村农机厂）的国民党第四十四后方医院的士兵们，随即跑向降落伞着陆点。医院士兵们不知道是苏联友军，立即冲上去，缴了两个外国人手枪。两个外国飞行员随即从衣袋里掏出印有“中华助战洋人，军民等一律保护，不得伤害”的护照，这才弄清是来华助战的苏联人。当即带到第四十四医院院长办公室，归还手枪，喝水休息。国民党池州第八专员公署闻报立即派人将两位苏联飞行员接到专署。第二天，在副专员陪同下，两名苏联飞行员骑马到宜冲山察看现场，对哥利亚捷夫同志的牺牲表示哀悼，据跳伞的联络员和射击手说，哥利亚捷夫原可以跳伞，但

飞机就会坠毁到贵池城内，将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于是，他打开机舱，命令我两人迅速跳伞。他自己则镇静地拉动操纵杆，向南滑行，坠毁在长满松树，四周无人居住的小山上。随后遗体 and 飞机残骸被收集起来运走了。当时贵池县国民政府还召开了追悼会。

（三）林遵在贵池布雷

1941年9月，重庆国民党统帅部为了打好第二次长沙会战，切断日军的长江水道补给线，特给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下令，扩充屡立战功的布雷部队，在敌后鄂皖赣沿江地区建立两支精锐的布雷大队，以对付日军舰队和补给船队。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校、第一大队长林遵（民族英雄林则徐之孙），与第五大队长程法侃挑选出36个布雷官兵，冒险钻入贵池沿江山林地区，进行侦察活动适时布雷。日本海军舰队在1938年夏秋之交经过贵池一带长江江面时，曾吃过中国布雷部队的苦头，多艘军舰被炸沉。为确保江上补给线的畅通，日军增兵贵池沿江设防，严加戒备。1941年9月28日，林遵和程法侃带领布雷队员，从贵池的岭上舒村出发，冒雨抢渡秋浦河，寻找民船以便在江上施布水雷。但民船多被日军烧毁。无奈，林遵率全体布雷队员泅水推雷进入江中布放，因水流湍急，自下游驶向上游来的日舰又在舰体外加置防水雷铜燃网，结果未炸中日舰。他们泅水返回南岸时，担任警戒任务的国军一〇一师一个营的部队已撤走。林遵、程法侃等人被闻讯赶到的日军包围在离江边不远的山林中。这时陈绍宽总司令下令该地区的海军谍报人员全部出动，探查林遵等人下落。第三战区长官部严令一〇一师那个营务必将这批

布雷队官兵救出。10月2日，三战区一支精锐的突击部队经急行军，强渡贵池秋浦河，与日军争夺江边据点。林遵、程法侃等人趁机突围，其中12人脱险，26人下落不明，估计牺牲了。林遵于1946年升为海军少将，担任国民党海军长江舰队（又称第二舰队）司令官。1949年4月23日，林遵将军在中共地下党策动下，率舰队起义。同年10月，他作为起义将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以后，他担任过南京海军军械学校副校长及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

四、日军在贵池地区的罪行

日军在统治贵池期间，疯狂轰炸，残暴屠杀，凌辱妇女，放火抢劫，扶植汉奸政权，进行经济掠夺，实行奴化教育。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有关档案文献资料不完全统计，有200多个村庄，8000多间民房被毁，伤亡数千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日军在贵池地区犯下的罪行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屠杀与凌辱贵池民众

1938年7月，日军为扫清阻止其西进夺取武汉的长江沿岸中国驻军，于7月13日至16日对贵池展开军事进攻。首先对贵池县城，殷家汇镇及沿江乡镇进行狂轰烂炸，大肆屠杀中国军民。每日二十多架，轮番轰炸，至使贵池县城郭西街至丁家巷，城外西庙、杏花村池州师范校舍等建筑被毁，死伤200多人，烧夷弹引起的大火，数日不息。殷家汇遭日机轮番轰炸，其街区数百间房屋被毁，死98人、伤数百人。在日军占领期间经常出动飞机协助其清剿中国军队，肆意轰炸贵池城周边乡村。1939年，云山乡（今墩上街道）；马衙

桥联乡黄家店、四房孙、桥联、汪圣高；白洋联乡象山韩村；吴田乡石溪村；牌楼乡竹塘、店上村；灌口、后溪方等地均遭敌机轰炸，死 70 余人，伤百余人，房屋被毁千余间。

1940 年至 1941 年，特别是在青贵战役期间，日本飞机继续对贵池乡村进行轰炸。新梨乡元四章村，清溪乡江桥村，太朴乡前村，殷冲姚村，桃坡乡舒家村，吴田乡会云保，高坦东坑街，刘街、曹村、梅村等地均未幸免。民众死 100 余人，伤 40 多人，毁房数百间。罗城乡上前村章新才背部中弹片数块，背驼不能伸直，终身残废；高坦东街一仓库数十担桐油、布匹、杂货，价值数万元（银元）财产被炸毁；元四章村、刘街、姚村、曹村共 14 座宗祠被炸毁。使数万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日军对贵池展开军事进攻时，对无辜的民众展开了野蛮的屠杀。1938 年 8 月，日军进攻三万圩受挫，又改道进攻烟墩陈村，强行集中全村百姓，谎言“皇军”要训话，待村民一排坐定，日军用机枪突然对准集中人群疯狂扫射，顿时血流成河，当场死亡 92 人，仅一名叫陈改儿的 10 岁小女孩在成人尸体的压伏下幸存。日军这次残绝人寰的屠杀，使烟墩陈村家家断后；1938 年 8 月，日军在乌沙马踏石登陆后，捉住 3 个路过的手艺人，要他们挑运子弹箱，此 3 人因体力不支，拒绝为日军搬运，日军将 3 人捆绑在一起，推入一个土坑活埋了；日军占领乌沙白果树村，纵火使村头一棵数丈围老白果树及参天古树数棵被毁。杀死村民 8 人，焚屋 20 间。有一汪姓老妇被日军活埋，至此白果树村幸存者别迁，村庄不复存在；

同年日军占领乌沙董村用刺刀捅进一个四岁小男孩的臀部，高高举起，任孩子在刀尖上狂叫乱抓，围观的日军狂笑不止。

1939年某日，4名日军，在杜湖追逐侮辱妇女，遭国民党便衣队阻击，数日后，百余名日军自十里岗营地出动到杜湖，杀平民33人，烧屋130余间；2、3月间，日军宪兵不问青红皂白将城西米行店员周小检等2人抓捕，先用铁丝将两名被害人从锁骨处穿通，栓在一起，然后用烧红的铁片烫头部、面部，并撬开2人的嘴、灌以大量的开水，直至被害人死去；6月，时约三更，日军数10人突然闯入马衙乡大路村，焚屋1823间，74人遭杀害，伤10人。有七旬王姓老妇，被日军刺中小腹，血流如注而死。有一韩姓孀嫂被日军捆绑，用刺刀乱戳，直至气息奄奄，日军继则满屋纵火，复将韩姓孀嫂拖入火中烧死；11月5日，一股300余人日军突然向清溪潘洪村进犯，百姓尚未起床，却惨遭杀害和掳夺。受害20户，死15人，伤5人，掳走4人，烧洪氏宗祠3幢，民房23间；12月28日，天气严寒，一股日军进逼黎家店佳湖村，强令全村50户人家全部出村，当场杀死3人，然后将全村50余幢房屋全部烧毁，使该村360名老少百姓，无家可归。

1940年1月3日，日军一联队，由清溪渡河，突然进攻里山莲峰山、双峰庵的国民党驻军阵地，周边村庄百姓闻风而逃。日军一路焚烧里山一带百余户民房，烧死老年妇女2人，枪杀1人，伤5人，村民之粮食、财物均成灰烬，计400余口无家可归；4月，一股日军进犯大湖莲花尖，认为当地保长金耀宗办事不力，被掳去，

先用刀割其舌，后挖去双眼；5月13日青贵战事期间，日军沿江部队进犯九华山，路过西边赵村，难民董玉兰回村提取用具，进村后有日军10余人将其屋包围，抓住董玉兰，在其家中搜到其子在学校受军训的照片，认为董藏匿当中国兵的儿子在逃，遭酷刑审讯，5月25日，日军用刀砍掉其四肢、挖鼻、割耳。最后用刺刀戳死。其状之惨，乃举世所未闻；1940年，驻黄湓日军怪三（外号）领两日军窜至石山村口，追逐侮辱一叶姓青年妇女，遭该女用石块抗击，继之用牙咬日军，被日军环刺10余刀，抛尸水塘；7月16日夜，日军百余人夜袭国民党驻军阵地老鸦尖、罗汉排一带，四面包围了麒麟村（今墩上街道境内），村民37名被杀害，4人受伤，10名被抓，一岁男孩刘小孩和二岁男孩周根生，均被日军用刀戳头部、腹部而死；村民何启才，先遭刀戳眼部，后被枪杀，另有钱姓十岁男孩，被日军用火活活烧死。

1941年，日军封江禁运，某日，驻池日军在池口发现一只小船，当即派舰艇拦住，将船上27名枞阳生意人全部用刺刀刺死，然后推入水中；12月18日，日军扫荡清溪乡管家村，冲进该村国民小学，见该校布置与日伪要求不符，即纵火将该校学生课本、教员行李及教具全部焚毁；12月20日拂晓，日军300余人进犯碧岩，焚房45幢，枪杀3人，伤5人，百姓逃亡。

1943年2月28日，汉奸朱德明向观前区汪伪区公所要钱，未得满足，一气之下，在观前、茅坦一带抓走村民杜祖汉、柯可荣、杜含芳等42人，解至贵池，驻贵池日军武田当即决定将此42人绑

至东门外三阳墩集体杀害。

1944 年，汉奸章荣高、李少白相互倾轧，株连 18 人，驻贵池（池阳镇）日军武田将此 18 人捕获，立即在西门外猫儿山脚杀害。

1945 年 3 月 14 日，有数 10 名日本兵，闯入齐山莲峰山下的村庄，抓走正在田间劳动的 18 名青年农民，押至贵池城内，用各种酷刑逼他们承认是“中国兵”，最后用绳索串起，押至齐山东大拐，日军先逼他们每人挖一个坑，18 人中，有一个名叫李育芳的农民，见势头不对挣脱绳索逃脱，日军当场开枪将其余 17 人打死。

贵池民众在遭到日军生命威吓的同时，还受到凌辱。1938 年，日军占领贵池城后，一队日军在城南桥头遇一男一女，立即蜂涌而上，动手扒女子衣服。男的反抗，即遭杀害。野兽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那位妇女进行了轮奸；同年，驻在城西的井下角村日军，将 20 多名群众逼至村外，分男女各站一排，然后逼迫他们脱光衣服，一丝不挂，供野兽们狂笑、取乐。1943 年 3 月 3 日，一股日军和汪伪军，窜扰五岭村，烧屋 30 余幢，有两名妇女被 8 个日军奸淫致死。

日伪统治贵池时期，在日本宪兵队和宣抚班的支持下，贵池城内先后在九华街、市心街、鸡鹅巷建有日军随军妓院，郭西街“爱宝”、“财喜”妓院公开挂牌“接客”。日伪维持会，还强征青年妇女充当妓女，供日军蹂躏，为日军官伴夜，中国妇女稍有不愿就遭毒打。由于日军的暴行，城外的青年妇女根本不敢进城，城内的青年妇女吓得不敢出门。

贵池汪伪政权在日军、宣抚班的命令下，强迫沦陷区居民领取“良民证”，作为沦陷区人民身份及通行证件。如若不领取“良民证”，以中国兵论罪（杀头）。日军在贵池县城四门设立岗哨，由日伪军站岗，检查行人“良民证”和携带物品。行人走进岗哨，须立正鞠躬，日军挥手认可才能离开。稍不注意，则耳光、枪托齐下，有时连打三四次，头不准偏，脚要站整齐。有时要举双手直立，或要跪在砖块上，极尽侮辱摧残。日岗哨对行人稍有怀疑，即押送宪兵队或特务机关，被杀或遭酷刑致死时有发生。驻贵池日军在贵池犯下了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贵池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血和泪的历史。

（二）扶植汉奸政权和特务组织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防御阶段。日本的侵略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后来，在日本军部的策划下，于1940年在日本占领区凑成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贵池沦陷后，日军在其占领区域网罗少数民族败类，胁迫与欺骗民众，竭力拼凑伪组织，建立伪政权，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

罪恶阴谋。1939年初，日军第六旅团一部在贵池县城继武巷设“联络官事务所”，组织“贵池县维持会”，扶植吴克初任会长。“贵池县维持会”属汪伪“安徽省政府办事处”管辖。“县维持会”后改名为“县自治委员会”，会长改称委员长。下设五个科。不久，在殷汇、乌沙、观前等地成立“维持会”组织。

1943年1月，汪伪贵池县政府成立，设秘书和4个科。下辖4个区公所（翌年改名区署）；第一区（城关）辖1镇3乡；第二区（观前）辖3个乡；第三区（乌沙）辖4个乡；第四区（殷汇）辖5个乡。从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先后任汪伪贵池县长的有：宋植旃、徐祖康、李旭生3人。1944年，日伪省政府将沦陷区划分为八个行政督察区，贵池属第八行政督察区。

日伪为巩固其统治，在贵池沦陷区全面驻军。日军第十六师团某部（师团长签源）自1938年10月就入驻贵池。观前乡祠堂包村驻一个团（团部所在地），辖大通、观前一片。梅埂驻一个中队直属祠堂包村的团部。城内驻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大队长先是杜边，后为河儿、黑田，辖乌沙、池口、齐山、十里岗四个中队。乌沙中队队长名下村，辖高塘埂、洋闸两个小队；池口中队辖仰口、江口两个小队。殷汇镇驻一个团部（日酋龟山一郎），辖北面山、八卦山、姜家山、小团山、王家岭、笔架山等六个小队和大团山一个中队。铜山乡方村驻一个大队，辖新河坝、李阳河、前江口、黄湓等四个中队。上述日军据点都构筑了碉堡，兴建了工事。1943年日军向芜（湖）大（渡口）公路南侧推进，占据檀婆山、莲花尖等

制高点，并构筑了工事。后日军撤走，由伪警察驻守。

日伪在县城驻有日本宪兵队和宣抚班（日军特务机构），雇用查春台、朱德明等兵痞流氓充当特务。成立了伪保安大队（先称自卫队），大队长陈家翼、副大队长陈正奎。下设两个中队，一个特务排。一中队长陈体高，驻牌坊街；二中队队长戴中华，驻乌沙；特务排长洪根森，驻城内。同时，成立了伪警察局，局长汪国卿、副局长夏某，下辖警察团，团长桂复臣，有警察 100 多人。

卖身投敌的贵池伪政权特务组织及其军队在日军的指挥下，为保障长江军运和实现其沿芜大公路向南进犯的目的，在贵池沿江东西近 100 公里，南北 20 至 30 公里的地区，设立大小据点 50 处。强迫沦陷区百姓充当“苦力”，挖战壕建碉堡，修筑公路，使碉堡、据点相联，互为依角。百姓苦不堪言。外围据点驻守的日伪军是直接残害沦陷区人民的魔爪。这些日伪军警，任意向当地居民摊派军响，敲诈勒索，拦路搜腰，无恶不作。1940 年 4 月，日伪县警察局巡官韦春荣，带领伪警 10 余人，打着“反共和平救国”字样的青天白日旗，窜至峡川柯村，借所谓“安民”之名，行抢劫勒索之实。企图胁迫难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回城；1940 年 4 月中旬，国军强攻县城失利，有士兵 100 余人潜入城西吊桥两边荷花塘中，借荷叶为掩护，待机后撤，不幸被汉奸罗登才发觉告密全遭杀害。

这些伪军，在城乡大肆搜捕新四军和抗日进步人士，配合日军“清乡”、“扫荡”，参与对贵东、贵西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2 年春，新四军地下党员陈永庭（在城内的合法身份是日伪

保长)，为抗日根据地运送食盐、火柴、药品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日本宪兵先将其衣服扒掉，指挥军犬乱咬，继而坐老虎凳、上顶杆，折磨审讯3个月后，解至晓福塘杀害。

1943年10月，新四军贵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一名战士在大湾村站哨，被汉奸朱德明侦悉，报告日军，被捕后在燕窝垅被日军用火烧死；10月10日，日军一小队在汉奸带领下搜索新四军梅埂游击队，情报员刘某不幸被捕，被众多日军当靶子打死。

1944年某日，新四军贵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一名战士被驻殷家汇日军抓住，解至宋村，日军驱赶数条军犬，将新四军战士活活咬死。这些日伪军警实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三）日军对贵池经济掠夺

为掠夺资源，日本侵略者在贵池县城、殷汇、观前等地建立一批“洋行”，同时强迫人民使用日本“本票”和汪伪“储备”纸币。

日军侵占贵池后，设立伪地方税局，开始征收田赋、契约税、营业牌照税、学租、地方税收附加等苛捐杂税。同时，实行田赋征收实物，控制食盐专卖。对居民的食盐实行配给（每人每月半斤），商店经营食盐，要由特务机关批准。如不遵守，就当“资敌”论罪。日军利用食盐，通过经济侵略机构，强行换取粮食或物资。盐作价很高，粮食、土产及一切工业原料，作价很低，用中国的盐来换取中国出产的粮食和军工原料。其利润在二十倍以上。

1938年11月，贵池馒头山煤矿被日军占领。1943年汪伪南京政府组建官商合办的馒头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由汪伪实业部长兼

董事长。招募工人近 200 名，利用原六合公司的机械设备，开采馒头山煤矿。2 年内共产煤 15220 吨，全部运往南京。日伪当局对矿工剥削压迫极为残酷，1943 年 11 月至 1944 年 9 月间，仅矿区管理部门记载的矿工伤病就达 2194 人次，平均每天 7 人次，死亡事件经常发生。

1944 年 4 月，国军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叛国投敌，经日军驻安庆第六旅团长多田认可，号称“皖南独立方面军”，挂起“皖南特别行政长官公署”的招牌（其总部设在南陵）。并开设皖南企业公司贵池分公司，疯狂掠夺山区桐油、皮油、土漆、中药材及苎麻等土特产。又从外地武装押运食盐、煤油、布匹、卷烟等物资来贵池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致使贵池商业萧条，资本枯竭。抗日战争前，贵池城内拥有万元（银元）以上绸布店 8 家；5 千元（银元）以上杂货店 10 家；有望华、状元两家酒楼；有糕饼作坊店 70 多家；城内的七街八巷中小型摊点林立。抗战结束时，贵池商家仅以在街上摆地摊、“跑单帮”为生。从中可窥视日军对贵池经济掠夺所造成的市场萧条、经济衰败的景象。

（四）日军抢劫文物和实行奴化教育

日军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进行殖民统治，更是疯狂地破坏文化设施，并实行奴化教育，旨在灭我种族。1938 年，日舰炮击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具有三百八十四年历史的流坡矶下清溪塔，毁坏三十余处。日军飞机轰炸，使贵池数十座历代宗祠毁于战火。1938 年 7 月 16 日，日机轰炸杏花村、杜公祠，使千年古村古祠被毁。1938

年7月13至15日，府衙、县学、城隍庙均遭日机轰炸被毁。1938年10月，日军占领齐山制高点，拆除始建于唐代的齐山绣春台，用于构筑工事。1940年春，日军进犯低岭庵（九华山第七丛林）。拆除庙宇，毁林约三华里，主持僧善青流亡他乡。1940年汉奸陶荣圃勾结自治会会长吴克初，将县沦陷区内珍贵木材，打家俱、制棺材，运往外地出售，发国难财。日军还大量掠夺贵池县地方志书和珍贵文物资料，其中有国内孤本明万历四十年刻本《池州府志》一套，今仍藏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现已静电复制回国）。

为配合日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进攻及经济文化上的掠夺，日伪政权还在贵池推行奴化教育。他们在城关、殷汇、乌沙、老屋鲍等沦陷区先后建立两所完小，三所初级小学。其教育宗旨，就是训练中国人的奴化思想。课程完全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设置，将“国民道德”课改“建国精神”课，集中宣扬“日汪提携”、“东亚联盟”、“东亚共存共荣”、“和平反共建国”等，强迫学生拥护“大东亚圣战”，并把日语列为学校重要科目。由日军翻译或日军讲授。汪伪学校还按照日本特务机关批准的《统治学生思想方案》的要求，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课外活动进行严厉的管束和监督。汪伪贵池乌沙下村小学就是最好的例证。

下村小学是1941年秋，由乌沙夹日伪维持会举办，以日军驻乌沙中队长下村正雄的姓为校名，由乌沙镇维持会负责人陈善夫任校长，校址在乌沙慈云阁。该校主要教授日语，宣扬“王道乐土，共存共荣”，日军对学生施以糖果诱使听课，小学生稍有逾矩，即

遭毒打，有的学生被打成重伤，造成残废。教育经费由当地区、乡行政组织从征收“良民证”费、税捐附加款、治安保甲费中支付。

（五）种植鸦片毒害民众

日伪时期，日本为达永久占领，使中国人永远成为东亚病夫，日伪汉奸们依仗日军之势，大量种植罂粟（鸦片）。自治会会长吴克初、楼山街汉奸余长生、巡官王平山等，在郎山冲和城北五棵松种了十多亩。反共自卫团中队长张佩峰，在新圩种了三亩。日伪保长刘文龙在王屋、大屋种了四亩。不仅如此，日军白泽洋行勾结汉奸，公开贩卖鸦片，牟取暴利。同时在贵池城内、殷汇等处开设烟馆十多处，供吸食者吸食。闻名的郭西街李高源烟馆、陈大婊子烟馆，一天都要接待烟客上百人。

日伪统治时期，贵池沦陷区“毒、黄、赌”俱全，人民饱受蹂躏之苦。

第二节 贵池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一、贵池各界人士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最高当局不得不改弦更张，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行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贵池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8年2月，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进犯，征集大批民夫，彻

底破坏贵池县境内公路。1938年3月，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后改称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六安成立。下设各县分会。6月，新四军进入皖南前线围绕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群众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他们深入街头和四乡八镇，以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在各地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戏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张贴标语，办墙报，把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7月，贵池县民众抗日动委会成立。青年、学生纷纷参加抗日宣传队。

同年底，以迁往南部山区的贵池县城进步学生为主组成贵池抗日宣传队，在元四章、杨村、铁门、刘街、罗城等地上演《三江女子》、《放下你的鞭子》、《傀儡皇帝》等抗日剧目。10月间，贵池茅坦塾师杜含芳自编黄梅戏《难民自叹》上演，很快流行于贵池全境和沿江两岸许多县份。该剧字句通俗，内容生动。以男女对唱的形式，揭露了日军惨无人道屠杀中华同胞的罪行，哀叹沦陷区难民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苦楚。这在当时对于激励人民的抗日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43年农历三月初三，杜含芳等42人不幸被日军抓去在贵池城东门外三羊墩遭集体屠杀。为再现贵池民众八年抗战的苦难，牢记这段历史，将当年杜含芳先生的遗作《难民自叹》全文附后，以飨读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外地的贵池籍人士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贵池人方国华奉命随八路军115师赴华北抗日，参加过“百团大战”等对日歼灭战。同年，贵池人姚克佑，参加革

命，投身抗日洪流，历任八路军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冀南军区师政治委员，空军航校政治委员、校长，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55年授大校军衔，后晋升为少将。1967年在北京病逝。1938年，正在湖北、山西等地读书的贵池人罗白桦、詹宗毓、洪东山、董玉清，吴苏辉相约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9月结业后分别被派往南宣芜抗日前线和家乡工作。4月，上海三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贵池人董希白毅然投笔从戎，从上海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后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和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过领导工作。解放后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国际法律研究所所长。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38年，在西南联大执教的贵池人董爽秋曾率宣传队赴滇缅公路边境进行抗日宣传。

二、方瑛领导的抗日武装大队

方瑛（1904—1941），又名科堂，乳名六星、铁梅，贵池县梅龙村人。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20岁毕业于贵池县立中学，后入金陵大学就读，两年后因经济拮据辍学回乡，筹办宗山庙小学，并在该校任教。其时，方瑛结识了中国共产党贵池县委成员王玉成，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

1938年，日军占领梅龙，驻梅龙日伪大队长吴志和曾出面劝方瑛投靠日军，被方瑛断然拒绝。不久即遭吴逮捕，押解至日军营地观前祠堂包村。后经其父亲多方托人保释，始获出狱。方出狱后，公开打出方瑛抗日武装大队的旗号，在郭港村率领武装小分队与日伪展开斗争。是年冬，日军突然包围方瑛大队部，方部猝不及防，

遭受挫折。事后，方瑛离妻别子，带领全队赴江北无为县牛埠镇坚持抗日。方的队伍一到牛埠，便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无为县国民党政府为扩大势力，派特工人员与方接洽，以县长的交椅笼络方瑛，被方拒绝。

1939年，方瑛部来到桐城东乡陈瑶湖地区，在沿江一带进行抗日活动，队伍发展到近百人。次年5月，方瑛抗日大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桐怀潜中心县委的领导，与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方瑛任大队长，鲁生（中共桐庐县委书记）任教导员。同年7月，林维先带领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到桐东，方瑛部编为第二大队，方瑛任大队长。同年8月，第二大队在新四军挺进团团团长林维先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一举歼灭国民党顽军章淦部一个中队，缴枪数10支。接着又重创土顽江子龙部，缴枪70余支、战马2匹。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200多名从皖南突围的干部、战士辗转来到桐东陈瑶湖。2月14日，桐庐无县委和新四军挺进团首长正在开会，突然接到紧急情报：日军以为新四军军部从铜陵过江，于是与国民党军配合，在老洲、大通、汤沟等地，调集大批部队并配备4架飞机和4辆坦克准备扫荡陈瑶湖根据地。当时，挺进团一、三大队转战外地，唯方瑛二大队留守在桐东地区。桐东地区方瑛二大队和桐庐无县委警卫队加在一起仅200余人。团长林维先、政委张友来立即命令方瑛派第二大队四连一个排到横山警戒，两个排到营口镇警戒，五连去龙王嘴监视日军，派方瑛亲率六连与皖南来的

干部、战士，从龙王嘴与戴山坳之间转移。

2月15日拂晓，日军兵分两路，在炮火掩护下向桐东根据地进犯。其中一路经老洲湾、汤家沟出动，直插水圩湖。方瑛亲率的六连和皖南新四军干部、战士与日军浴血奋战。杀至青山嘴时，天已大亮，六连正准备向周潭山区撤退时，已被日军包围。方瑛组织全部火力反击，使皖南干部、战士突出重围并派部队护送至周潭山区，转移至无为县委控制的安全地带。此时，方瑛仍未撤出战场，不幸在陈瑶湖旁青山东嘴头（今枞阳县普济圩农场龙王嘴北）中弹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方瑛警卫员何长生同志。

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1952年12月，贵池县观前区钱龙乡（后为梅龙乡）政府在梅龙（今梅龙水文站院内）为方瑛、何长生修建了烈士墓。永志纪念。

第八章 中共贵池党组织的恢复和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第一节 贵池党组织的恢复及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一、中共贵池地方党组织的恢复

日军侵占贵池后，以渡边为司令的日军某部除以重兵集结于县城外，还在东起大同、茅坦，西至黄湓、三万圩的贵池沿江圩区和丘陵地带，设立几十个日伪据点。此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八督察行政专员公署和贵池县府机关，已分别向南部山区逃迁。贵池为国民党军队第三战区所管辖，其所属第一四四师、新七师某部、第五十二师和第一九二师，屯兵于东（流）至（德）、青（阳）、贵（池）交界处，其中一部分驻扎于贵池境内。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1年期间，贵池虽未建立中共党的组织及其武装部队，但抗日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贵池东部地区，从1942年底开始，中共桐（城）、庐（江）、无（为）县委在这里发展一批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了党的支部；1943年3月，铜青南县委指示青北工委，在青贵边区发展了一些党员；这年下半年，在贵东的观前建立了以吴文瑞为书记的中共贵东工委，统一领导贵池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不久即改为中共贵东县委。

1944年1月，又改为中共桐（城）贵（池）青（阳）县委。县委机关设在观前附近的四房包等地。先后归属沿江地委、沿江中心县委领导。

在贵池西部地区，从1942年4月开始，中共桐庐无县委派员在三万圩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支部，但不久便被破坏。1944年初，沿江地委和中心县委指示桐庐县委、桐怀潜县委、桐贵青县委抽调干部共同开辟贵西。1944年4月，成立中共贵西临时工委，与桐怀潜县委发生纵的关系；同年四五月间，成立中共贵西工委，直属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领导。这年11月，在沿江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将贵西工委改为中共贵桐县委。

三年间，中共党组织领导贵池人民积极进行抗日战争，发展了两支县游击大队，建立了一大批区、乡“三三制”政权，形成了东西相联、彼此呼应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实现皖江区党委部署的打通七师与五师区域联系的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在军事上严守自己，在政治上坚持反击。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坚持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表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8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全军改编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新四军第七师，由原新四

军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及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合编而成。师长张鼎承（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新四军七师担负着开展皖南、皖中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194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致电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指示：“皖南应派人过江，指导残余力量，仍在芜湖一带抗日，在一年内逐渐聚集一个两三千人枪的支队，联系地方党准备将来向黄山赣东北发展。不要全部过江，已过江的待生息一时期后，仍可考虑派他们回到芜湖一带去。”根据这一指示和部署，曾希圣、黄骥等相继派遣杨明、彭琮率领部分干部和武装，重返江南，开展斗争。拉开了开辟贵池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序幕。

1941年3月，彭琮、杨明率部重返铜陵。根据七师和皖江区党委指示，重返铜陵的部队与中共铜陵敌前工委会合。成立铜陵敌前行动委员会，后又改为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何志远为书记，杨明为副书记。为加强对皖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领导，1941年在无为白茆洲重建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副书记黄耀南，属中央华中局（后改为中共皖鄂赣区党委）领导。下辖芜宣、泾旌太、徽州三个中心县委，铜陵敌后、敌前临江县委，宣当芜、芜湖县委和繁昌、繁无工委。皖南特委于1943年3月改为中共皖南地委。1943年3月，铜青南抗日武装有了新的发展，敌前、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因此，上级决定撤销铜陵敌前、敌后两个县委，成立铜（陵）青（阳）南（陵）县委，由皖南地委组织部长张伟烈兼任县委书记，杨明任副书记兼铜青南大队政委，朱农任组织部长，陈爱曦任宣传部长，

许章法（又名许达抱）任县委委员。铜青南县委积极开辟贵池东部地区。

1942年4月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皖鄂赣边区委员会（通称皖中区党委）。书记何伟，副书记兼组织部李步新，负责领导新四军第七师活动地区的党的工作，初辖皖南特委，巢无庐、巢合庐、和含、桐庐无中心县委和桐西、彭宿望工委。桐庐无中心县委（书记贾世珍）决定渡江开辟贵池东部地区。

1942年4月，根据新四军七师指示，其五十八团，团长傅绍甫、团参谋长李德安受命（为方便工作，李德安任桐庐无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贵池东部地区属桐无庐县委活动区域）率部向贵池东部进军。

1943年3月，中共皖鄂赣边委员会（皖江区党委）决定在无为县尚礼岗成立中共沿江地委，书记林维先，副书记黄先，下辖：白湖中心县委，书记桂林栖；桐怀潜中心县委，书记胡继庭；沿江中心县委，书记黄先。沿江中心县委亦于同年3月在无为后垅成立。委员傅绍甫、方琦德、胡昌耕、何志远，辖五个县委。沿江地委成立后其工作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抽调大批干部到沿江贵池进行开辟工作。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及其领导的沿江团由江北向贵池挺进。

在皖江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七师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贵池周边的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和武装自1942年初，不断向贵东、贵西地区进行开辟工作，重建贵池地方党的组织和武装，创建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开辟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区

1943年初，皖江区党委和七师为了打通七师与五师之间的区域联系，就必须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完成这项战略任务，沿江地委派杨友华、朱述华、林志超三位同志到贵池东部建立地方党组织。1943年3月，杨友华、朱述华、林志超到贵东后，以做小生意（卖黄烟）为掩护，先后到贵池东郊江口流坡、燕窝等地，这些地方因离日军据点太近，难以开展工作，只得转到背山面水的茅坦。一面侦察日伪动态和观察地形；一面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用单线联系，发展组织。先后吸收了茅坦的金万胜、胡少甫、左丙根、谢金水等同志加入党组织，建立了塔桥党小组。5月，建立了游击队，队长童道元，指导员左大钧，支部书记林志超。该队归桐庐县大队指挥。为增强游击队的军事力量，湖东大队特派一个侦察班充实游击队。游击队活动范围也逐步扩大到梅埂、郭港、老屋董、东边赵、西边赵、茶叶山、馒头山一带。

1942年4月，新四军七师党委指示，将挺进团和桐西独立团合并为五十八团，傅绍甫为团长，彭胜标为政委，叶树槐为副团长，李德安为参谋长，曾宪忠为政治部主任。八、九月间李德安率部到桐东，与桐庐县委书记贾世珍汇合。当时，桐东形势比较紧张，日伪顽势力活动猖狂，桐庐无县委决定，向长江南岸发展。李德安于1942年11月率领两个侦察班十几个人，从桐东出发奔赴贵池东部。部队从梅埂五步沟上岸，然后在建华、茅坦、观前一带活动，在观前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不久，李德安又重返这一地区侦察日伪军情、建立情报点，镇压个别罪大恶极的坏蛋，还搞了临时税收。

到1943年3月前后，在观前周围建立了几个乡临时政府。4月，五十八团撤销，成立沿江支队，下辖三个大队，李德安任桐东大队长，张振任副大队长，张尔庆任政治指导员。桐东大队继续在大江南北开展活动。

桐庐无县委在开辟贵东的同时，于1942年4月派桐东部队某连指导员张琴（又名鲍克武）到贵池西部三万圩，利用同乡关系在三棵树（地名）站住了脚，以卖烟土生意为掩护进行活动。发展了章文祥等一批党员，并且成立了三万圩第一个党支部。不久，被伪乡长钱季才发觉，向日伪特务告密，致使章文祥被杀，张琴被捕。在审讯中，张琴反告钱季才通新四军并私藏武器，结果日军在钱季才家搜出了武器，杀死钱季才。张琴获释。此后，张琴留桐怀潜县委，在贵西地区隐蔽下来，发展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43年春，沿江地委抽调童道元、朱旭华、朱顺生、徐日云、洪光烈等九人，组成一支小型精悍游击队。童道元任队长，朱旭华任指导员。任务是：深入贵东地区发动群众；摸清日伪活动情况；配合掩护地下党工作；做好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为开创游击根据地打下基础。3月中旬，他们从桐东出发，经老洲头到沙包，夜里横渡长江，在吴坊沟与梅埂之间上岸，进入茅坦，在渔民王起和家住下。后为打开局面，包围了茅坦镇，抓到了伪乡绅杜栋臣、杜润堂等人，将这两人带到桐梓山对面下洲鱼鳞圩，要他们写信给伪乡长杜润千和伍田（日军小队长）的翻译鲍建国俩人，指定地点保释他们。杜润千接信后和鲍建国到鱼鳞圩同童道元队长会面，答

应做新四军的情报人员，杜栋臣、杜润堂被释放。从此，新四军在茅坦的活动自由，开辟工作有了很大进展。1945年后董道元领导的这支游击队成为贵东（金塔）游击队主力。

1943年春，桐青南县委领导下的青北工委在童铺成立，书记许章法，副书记尹彬，委员肖须和、闻鲁生。1943年3月，青北工委在茅坦发展了一批党员。工委书记许章法还率队深入茅坦、大同、梅埂等地，配合贵东抗日武装斗争。在革命日益发展的情况下，1943年4、5月间，中共沿江地委又派吴文瑞同志到贵东，成立了中共贵东工委，书记吴文瑞，副书记黄建华，统一领导贵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工委隶属沿江中心县委领导。

（二）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日军日益陷入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局面，为了摆脱这一窘境，以集中兵力进攻华南地区，1943年秋开始，驻皖中日军开始有计划地撤离一些据点，因此使皖中地区抗日斗争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

根据这一情况，遵照新四军军部指示，皖江区党委和七师确定沿江地委和沿江支队担任开辟沿江地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1943年底，中共沿江地委、沿江独立团机关率领主力部队约一千人从江北桐东渡江南下到达贵东地区，对贵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领导力量加强了，而且武装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地委根据新的情况，确定原属于桐庐县委管辖的桐东地区和原属铜（陵）、青（阳）、南（陵）县委管辖的青贵区的

童铺、茅坦划归贵东县管辖。将贵东县委更名为中共桐贵青县委，县委机关设在贵池观前附近山区。吴文瑞任县委书记。朱旭华、王亚中、许章法为县委委员。下辖三个区委：河西区委（书记朱旭华）、河东区委（书记金光华）、桐东区委（书记史风）。1944年5、6月，又成立了敌前委员会（后改为太朴区委、书记王亚中）。同时建立了四个区级政权，二十五个乡级政权。河东区，下辖茅坦、香山、东湖、观前、祠堂、大同、梅埂七个乡；河西区，下辖馒头、江口、流坡、老屋董四个乡；敌前区（区长：包西树）下辖太朴、马衙、石琅、白洋四个乡；桐东区（区长：姜溪）下辖无梁、洋河、原头、老洲、青山、水圩、周潭、四虾、吴桥、河防10个乡（现属枞阳县）。后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贵东行政办事处，包西树任主任，左大钧为副主任。1944年1月，成立了贵东货管分局。

从1943年开始，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到1944年初，游击队已发展到近百人。桐贵青县委决定，将贵东游击队和桐东游击队合并，成立桐贵青游击大队。章开如任大队长，吴文瑞兼大队政委，王亚中任副大队长，左坦任副政委，下设一、二、三三个中队，分别由郭某某、洪光烈、刘百根任中队长。每个中队辖二个排。县游击大队总兵力达300人，拥有枪支200余条。同时建立了两个区中队，有些乡还建立了游击小队。

贵东局面基本打开以后，根据皖江区党委的部署，沿江中心县委指示江北的桐庐县委（又叫湖滨县委）、桐怀潜县委和江南的桐贵青县委，1944年底抽调一批干部到贵池西部开辟新区。其目的是

完成皖江区党委打通新四军二师、七师、军部之间的联系。

早在1942年2月间，沿江团团长傅绍甫与桐西大队领导徐绍荣、张尔庆、彭高研究，决定派张有道去贵西侦察了解情况后，再决定是否派部队去。张有道率六人侦察小分队，在贵西两同志带领下，从枞阳下游方家墩上船，在乌沙至前江口中间的地方登岸，经三万圩、万宝圩、后村，继续侦察殷家汇（附近）、吴田、唐田后回到三万圩。再返回桐庐根据地。通过此行了解到日伪军、国民党新七师兵力布置和贵西沦陷区人民盼望新四军早日来解救他们的情况。任务完成后，回到桐南花山向领导作了汇报。

1944年初，沿江中心县委指示桐怀潜县委（书记黄瑛）要积极开辟江南根据地。桐怀潜县委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工委，由马守一任书记，张伟群、张柳溪（原名张尔庆，沿江独立团的三营教导员）为委员，开辟贵池县西部地区。1944年4月2日晚，马守一、张伟群、张柳溪及张有道带领沿江团八连的一个排乘船到达贵池以西的三万圩；杨杰、王南山、高南山等人从广济圩的长河口乘民船过江，夜间抵达三万圩的三棵树。接着与在殷家汇活动的杨友华、在大农圩和高岭一带活动的王武秀（又名许诚）取得了联系。沿江团到江南后，先后镇压了五个国民党、日伪特务分子，对日伪顽震慑很大。同时开展上层士绅工作，分化争取伪保长，使他们成为两面政权的代言人（称为白皮红心）。隐蔽而又积极的活动，日伪军不知新四军虚实深感恐惧。不久，三万圩公司，晏塘桥镇、高岭镇等几个伪军小据点都被迫撤走了。于是新四军就在这一带站稳了脚跟，建立

了税收机构。

1944年4月，沿江中心县委机关迁达贵西（晏塘桥），从桐贵青县委抽调许章法，从贵东办事处抽调左大钧等，从桐庐县委抽调何晓东、张福海、钱新民、章嘘云、周暮樵、周南、陈希文、周燮衡等先后到达贵西，同年5月，沿江中心县委宣布贵西临时工委改为贵西工委，马守一任书记，许章法任副书记，张尔庆、谭兆屏任委员。下设三个区委：一区委书记周暮樵，二区委书记杨友华，三区委书记王武秀。从此，贵西工委直属沿江中心县委领导，不再与桐怀潜县委发生纵的关系。此时，沿江团部队在沿江支队副队长兼沿江团团团长傅绍甫、副团长周亚龙，支队副政委彭胜标，政治部主任何志远的率领下，分批来到贵东，接着团直属卫生所和被服厂也进入贵东（马衙岱岭一带）。随后，全团千余兵力活动于贵东、贵西、东流、至德沿江一带，成了这一地区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在沿江团的有力配合下，1944年8、9月间，贵西工委先后开辟了蛟口、八都湖区。蛟口区由周南任书记兼区长、张福海任副书记，同时调贵西税务局长叶诗贵参加区委。八都湖区由马本农任区委书记（后王武秀任书记），何东初任区长（后唐曙光任区长）。1945年9月，桐南区（靠近枞阳和铁板州一带）划归贵西，叶树森任区委书记，江一波、周军任委员；广济圩的前圩、乍尖山、长丰镇一带划为广济圩区，也属贵西管辖，储怀玉任区委书记。到这时止，贵西工委已经管辖7个区，除铜南、广济圩为隐蔽区外，其余5个区都建立了区级政权。晏塘区区长周暮樵（兼），其间，何晓东曾一度

担任过该区书记，并增补肖文为副书记，路世英、王南山、田国儒为区委委员；洪铺区区长张国平；高岭区区长王渐石，1945年4月以后由冯力群担任，副区长为左大钧。这三个区群众基础好，是贵西的中心区，普遍建立了乡政权，各乡设有指导员、乡长。

1944年10月，沿江行政办事处和沿江财经分处在贵池西部的风口陈成立，桐东、贵东财经督导处改为桐东、贵东行政财经督导处。各地普遍建立了税收机构。成立了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在这个时期，贵东民主政权控制区域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使东西两大游击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了对日伪控制区的包围态势，日伪政权及其统治的地盘逐渐缩小。贵东、贵西分散的游击区已经基本形成一条线两大片的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三）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

中共贵桐县委的成立。1944年11月6至10日，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在贵西召开扩大会，沿江办事处、沿江财经分处、桐怀潜县委、桐贵青县委和贵西工委等负责同志出席。会议由黄先主持。在分析形势，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今后斗争的主要任务：“加强敌后与敌顽之间的工作，两个地区的配合是坚持沿江地区的基本问题”。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会上还决定将贵西工委改为中共贵桐县委，马守一任书记，陈定一任副书记，许章法为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黄绍臣、马数鸣为县委委员。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之后，各地都进行了认真地贯彻。11月13日，中共贵桐县委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当前两项主要工作：“组织地方武装和减轻人民负担”。会议决定将

原桐南四中队和贵西本地创建起来的五、六中队，合编为贵桐游击大队，黄绍臣兼大队长，马守一兼政委。由于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到北撤时贵桐游击大队的三个中队有 21 班兵力。其中第四中队（队长钱剑丰、指导员叶树森）拥有 9 个班；第五中队（指导员向项雨）拥有 6 个班；第六中队（队长章旺、副指导员吴江）拥有 6 个班。桐南区还有一个警卫队，晏塘、洪铺、高岭区部分乡都有一定的武装游击队，其它区、乡也有少量枪支。区、乡党政组织也日趋健全。

贵西、贵东游击根据地的发展。1945 年后，根据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贵桐县委将重心转到唐田、吴田、蛟口一带，向西发展，在贵西一区（晏塘）、二区（洪铺）、三区（高岭）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各区的领导。工作委员会属贵桐县委领导。书记胡昌耕，委员张格、马数鸣。在中共贵桐县委领导下，贵西地区到 1945 年 9 月，已建立七个区：①晏塘区（区长周暮樵），建立了三万（乡长：张武）、晏塘（乡长：王中）、江店（乡长：周全太）、前江（乡长：刘永）、长林（乡长：何万盛）、仙姑殿（乡长：周介）、杨店（乡长：贾宏开）、江心洲（乡长：钱江川）8 个乡民主政权。②洪铺区（区长：张国平），建立了殷桂、石城、双桥、清溪、檀婆五个乡民主政权。③高岭区（区长：冯力群），建立了高岭（乡长：杨定发）、龙江、天城、仰口、古塔（乡长：韩琪）、农民（乡长：王自平）、驻驾 7 个乡民主政权。④蛟口区（区长：周南），建立了吴田（乡长：钱某）、唐田（乡长：周忠）、五里（乡长：王一善）、

冲里（乡长：钱某）4个乡民主政权。⑤八都湖区（在今东至县境）。⑥桐南区（在今枞阳境内）。⑦广济圩区（今安庆市境内）。

在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的同时，贵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有了较快发展。1945年初，因河东区的区域范围扩大，改为茅坦区。建立了茅坦、香山、东湖、观前、祠堂、大同、梅埂、大王庙8个乡民主政权；同时敌前区也有发展，改为太朴区。建立了太朴、马衙、石琅、白洋4个乡民主政权。后来，这个区又成立敌前工委，向青阳方向发展；河西区建立了馒头山、江口、流坡、老屋董4个乡民主政权；桐东区政府下属有10个乡民主政权。到北撤时，桐贵青县已经建立起4个区政府和26个乡级民主政权。

1945年初，桐贵青游击大队已发展到500余人，400多条枪，还拥有一门小钢炮和3挺轻机枪，并配有比较充足的弹药。

在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内，约有200个日伪保级基层组织，其中相当一部分伪保长假心于敌，真心于我，成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军民团结，共同创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形成、发展中，在同日军进行的斗争中，新四军沿江团同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军民团结是创立发展和巩固扩大敌后抗日游击根据的重要保证。

从1942年至1945年，新四军沿江团同沿江中心县委在创建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期间，受到贵池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帮

助，凡是驻有新四军沿江团部队的村庄，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新四军战士赶做军鞋、洗衣服、筹集粮食、经费；协助新四军抓土匪、特务；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新四军战士。1943年春，新四军刘爱杰在开辟贵东白沙乡时，当地贫农柯启才、柯满堂、洪华春三人秘密掩护刘爱杰乡长进行革命活动。刘爱杰每天的住宿和活动时间，他们都能秘密地作出具体安排，有几次日伪军扫荡，都是靠他们的掩护，提前转移让日伪军扑了空。他们成了刘乡长开辟白沙根据地得力助手。1944年冬沿江团支队领导黄先和傅绍甫率一个营，路经白沙乡，急需军粮500多斤，他们三人得知，不仅将自家的粮食全部献出，还动员附近几户人家借出粮食，及时解决了沿江团的困难。1945年夏，国民党一名特务潜入白沙一带收集新四军沿江团活动的情报，被在外做篾匠的柯满堂发现。觉得此人形迹可疑，立即同几个农民将其抓获，押交给贵桐青游击队，经县委审讯，结果敌特属实。

1944年7、8月间，洪铺区区长汪国平率区警卫班抓到两个国民党特务，关在一个老太婆的房子里，因哨兵在门外打瞌睡，两个特务乘机将房门托开，夺路向山上逃跑。当地群众闻讯后，立即上山将两个特务抓到。经地委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同年，洪铺区两农民兄弟带一支土枪协助贵西游击队抓一名逃犯，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正当他们靠着大树休息时，逃犯将土枪偷去。兄弟两冒着生命的危险，一路追寻并与逃犯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擒获了逃犯，夺回了土枪。

1944年7月，沿江地委在九房朱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开会的同志迅速离开九房朱村。此时，晏塘区委书记周暮樵因重病无法行动，住在该村朱老奶奶家休息。不料殷汇、方村的日军，当夜突然袭击九房朱村。半夜，听到狗叫，白发苍苍的朱老奶奶轻声叫醒周暮樵，说：“鬼子来了。”“村庄被包围了”。周暮樵醒来，立即爬起，要冲出去。朱老奶奶一把拉住周暮樵说：“你不能冲，快躲起来。”朱家系低矮草房，实在无处可躲，朱老奶奶指着锅屋稻草堆，将周藏在里面。不一会儿，两个鬼子进屋，拿着手电筒在屋里东照西照，见朱老奶奶在床上颤栗并不断呻吟着，鬼子怀疑朱老奶奶患了伤寒病没问就走了。过了多一会儿，朱老奶奶满头大汗将稻草掀开说：“鬼子走了，你赶快走吧。”她叫人用竹床抬着周暮樵到三万圩，使周安全脱险。1952年，周暮樵同志到贵池还曾到九房朱村去看望朱老奶奶，谈起往事，大家都不禁开怀大笑。

1944年4月，沿江团二营侦察战士章传斌在青阳茗山冲接受送情报到枞阳老洲找地下党联络员老周同志的任务。当章传斌辗转来到五埠沟渡口，上了船正准备过江时，正逢巡逻队封锁渡口，盘查行人，每条船，每个人都要查问。日军上了船，正在这危险时刻，素不相识的船老大对着章传斌喊了起来：“还不快去摇橹，还在这磨蹭什么？”自己迎上船头，应付日军。日军用怀疑的眼睛盯着，船老大沉着地说，这是他雇的伙计。日军未发现破绽，只得下了船。章传斌顺利过了江，完成了任务。

1944年春，贵东县委书记吴文瑞率十几个人在黄木冲（现观前

园林村)开明士绅傅道南家吃午饭,刚刚吃完,得到报告,有一大队日军进了村。吴文瑞决定率部冲出去。傅道南说:不能硬闯。强要吴文瑞率队从后门撤离。游击队刚出后门,十几个鬼子就从大门拥入,叽哩呱啦,杀气腾腾,傅道南镇静地应付日军的提问,并拿出好烟和糕点热情招待日军,鬼子一再盘问,没有看出破绽。日军见傅家高门大院,富丽堂皇,不像通新四军贫苦人家,就离开了傅家。后来,傅家成了吴文瑞打游击的落脚地。以上事例,在创建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时可以说举不胜举。新四军沿江团和贵东、贵西游击大队用极简陋的武器装备,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穷乡僻壤创建了沿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终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这里的关键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如果不是人民的军队和当地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联系,要在沿江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中长期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军民互相支持,互相配合,鱼水相依,使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一天天扩大,一天天的巩固。这充分体现和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致理名言。

1945年初,皖中解放区的沿江江北向东延伸至江浦,江南向东延伸到芜湖、当涂、宣城、南陵,向西延伸至青阳、贵池、东流、至德及江西彭泽县境。根据这一形势的发展,中共皖中区党委决定,将皖中解放区改为皖江解放区,皖中区党委改称皖江区党委。从此,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皖江解放区的一部分。到1945

年8月，贵桐、桐贵青两县，已经建立起11个区，55个乡抗日民主政权，控制地区人口已达50万，控制区域范围长约200华里，宽约50华里。

第二节 新四军在反摩擦斗争中坚持抗日

一、国民党顽固派在贵池制造摩擦

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贵池，日军和国民党军各守其境，很少发生战斗。为收复更多失地，新四军沿江团与贵东、贵西游击队及民兵紧密配合，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国民党贵池驻军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经常挑起事端。国民党贵池县长公开声称：“防共（指共产党、新四军）重于防敌（指日伪军）；除奸（指共产党、新四军）重于安民”。自抗战以来，驻贵池国民党军队不仅节节败退，其军队还同日军相勾结，纷纷投降日军。1942年国民党军驻贵池某部连长吴源海在贵池丁香树率部投降日军。1943年秋，国军一四四师回防铜（陵）青（阳）南（陵）和贵池地区，因师长易人，其师四三〇团以团长张昌德为首的军官拒不服从第三战区的命令，推荐张昌德为该师师长，李志千、黄克立为副师长，3月19日公开投敌。投敌后，被汪伪改编为“皖南独立方面军”。1945年，“皖南独立方面军”，在贵池设立办事处，组织绥靖军，由张昌德的姻兄邓士奇任司令。邓收罗安庆“青红帮”头子江登潮，委以第五支队长。江在安庆周围收罗了广西军的散兵游勇和贵池的

地痞流氓、汉奸和叛徒，分驻乌沙峡、晏塘桥、三万圩一带。晏塘桥原新四军税收员纪得胜叛变投降日伪，其父纪安然作探收集新四军党、政、军活动情况，并带日伪军扫荡贵西根据地，袭击新四军机关、部队，很多群众受其害。为此，晏塘区民主政府根据群众的反映，对这些投降日伪的皖南独立方面军贵池绥靖军给予坚决打击，对其特务分子如纪安然予以逮捕，公布其罪状坚决镇压。国民党顽军不仅公开投降日军，还派遣特务进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1944年，新四军在半里铺破获一个专门破坏根据地工作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16名成员，处决了首恶分子胡林旺和汪效忠。使顽军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国民党顽军不仅如此，还故意挑起事端。甚至派出大批顽军向新四军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公开进攻。对于国民党顽军制造的摩擦，新四军沿江团部队及贵东、贵西游击大队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摩擦斗争。为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二、新四军沿江团及游击队在贵池的反顽斗争

（一）打击制造事端的国民党贵池县保安大队

攻打在白洋的贵池县保安大队部。国民党贵池县保安大队部设在距贵池城二十多里的白洋镇。这些保安部队不抗日，到处伏击新四军。如果不扫清这些障碍，新四军沿江团就无法开展活动。因此，1944年6月底7月初，沿江团团长沙绍甫率领一营一、二连和三营八连，从塔桥驻地出发，夜奔白洋镇保安大队部。到达山岭后，傅团长命令一连连长朱建忠率队从西边直插保安大队驻地，八连从东

南边包围，不让保安队跑往大山里。八连在张有道率领下快速前进，途中巧遇三个游击队员，在游击队员的带领下，跑步包围了保安大队驻地。一连、八连同时冲进去，正在酣睡中的保安大队士兵，被一、八两个连缴了枪。接着搜查残敌，在一大瓦屋内搜到一间存放枪支、弹药的仓库。新四军一枪未放，就俘获了驻白洋镇的一个大队部和警卫排，缴枪 50 余支并缴获很多弹药。从此以后，国民党贵池县保安队害怕被新四军袭击再也不敢在白洋镇居住了。只好跑到山岭上修碉楼居住。

攻打国民党贵池县碧岩（密安）土顽碉楼。1944 年 8 月份，傅绍甫团长率领一营三个连队和二营八连及手枪排欲攻打碉楼，碧岩碉楼座落在斜坡山梁上，两边山崖陡峭，上山只有一条路，进攻时兵力难以展开，进攻数次，未能得手。这时国民党川军一个营和贵池县保安大队三个连来此增援碉楼。傅团长见情况有变，立即将部队带回。在途中，击溃了国民党军一个连的堵截，全团安然返回驻地塔桥一带。从此，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带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拔掉河边姜村国民党军据点。1944 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在河边姜村，设一个据点，驻一个排的兵力。这对新四军沿江团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十分不利。贵东大队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一天，由大队副王亚中率三个中队，奔袭河边姜国民党军队据点，经过短暂的战斗，俘虏六人，缴枪八支，取得胜利。从此，国民党军队再也不敢到河边姜村了。

攻打梅村据点。1944 年夏秋之际，梅村据点的国民党贵池保安

大队三中队不抗日，专门同新四军作对，警告几次全当耳边风。于是沿江团决定拔掉这个据点。沿江团八连和手枪连在夜深人静，保安队防守松懈的情况下，由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带路，突然袭击梅村据点。歼灭保安队两个排，缴枪 30 多支，并把保安队设在该处的枪械所设备全部缴获过来，搬进了根据地。几个技术熟练的工人也被带到了根据地，经教育后，他们愉快地为新四军服务，后来一直随军工作。

攻打梅村区公所。1945 年 3 月，国民党在梅村区公所对管区抓来的一批壮丁进行训练。为解救被抓的贫苦农民，沿江团一营一连在贵东大队配合下，由连长朱振中、指导员梅豪率领攻打了梅村区公所。战斗打响后，区公所人员东躲西藏，到处乱窜，只有个别人拿枪抵抗，战斗很快结束，缴获步枪 30 余支，俘虏区丁 30 余人，经教育后，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发路费让其回家。

消灭童溪桥常备中队。童溪桥南边的山脚下，驻着国民党贵池县常备队一个中队，专与新四军作对。为扫清这个障碍，1944 年 4 月，沿江团一营一连奉命前往消灭这股保安中队。一连在连长朱振中、指导员梅豪的指挥布置下，从江家桥附近出发，拂晓前到达童溪桥，一排在南边山头堵击保安中队，防止他们往山里跑，二、三排主攻。战斗打响后，保安中队闻风而逃，在沿江团一连两面夹击下，除少数保安中队士兵从山沟里逃掉外，大部分被歼灭。缴获 60 条枪和大量弹药，俘虏了 70 多人。从此以后，新四军自由来往于童溪桥，保安队再也不敢与沿江团为敌。

（二）摧毁境内的反动道会门组织和土匪武装

消灭石山大刀会，击毙开坛师。1944年冬，石山村一带，大刀会活动猖狂，附近很多农民参加大刀会。大刀会受劣绅操纵不打日军，专和新四军游击队作对。游击队了解到：大刀会曾缴获川军周连长两条步枪和一些子弹，石山乡民主政府派人要他们交出枪支弹药，供抗日使用，大刀会不仅不交，反要石山乡民主政府人员投降；大刀会绑架了新四军税务员陶某某，在石山乡娘娘庙桥头由刀徒章厚培用铁锹砍死；一次在老屋章村，大刀会堂主章裴然指使刀众将石山乡负责人刘爱杰和通讯员胡长久捆绑起来，关押在外屋章祠堂的稻仓内，扬言要开堂杀头。面对穷凶极恶的刀匪，贵东游击队决定消灭这股会道门。石山乡民主政府武装配合贵东游击大队第一中队，分兵二路：第一排攻打滨坎村分坛；二、三排攻打外屋章村总坛。战斗打响后，战士们猛打猛冲，打死了开坛师章开烈，活捉了一些小头目。缴获了大量的大刀、长矛。游击队牺牲两人，被大刀会抢去步枪两支。战斗很快结束。当天晚上，大刀会派代表到游击队驻地谈判，结果大刀会方面表示愿意归还抢去的枪支弹药，并由他们买棺材收殓安葬两名牺牲的游击队员，凶手章厚培予以处决。石山乡民主政府决定，对一般群众只要坦白交待，悔过自新，概不追究；大刀会组织解散；所有武器交游击队。猖狂一时的石山大刀会就这样被消灭了。

取缔反动道会门。1944年，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晏塘一带，一贯道、大刀会活动猖厥。晏塘民主政权建立后，在群众中进

行广泛教育，揭露一贯道是欺骗群众的害人道，号召群众慎防上当。对一贯道首约法三章，不准继续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但三万圩公司一贯道首刘贵斌，畏罪潜逃安庆四个月后，又潜回家中，继续聚众烧香磕头，散布谣言，迷惑群众。说什么天下这样大乱，真龙天子快要下凡。为此，晏塘区民主政府将刘逮捕。并在晏塘镇上召开公审刘贵斌大会。各乡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审判会后予以镇压。这一行动，影响很大，信道群众，纷纷主动到乡民主政府登记退道，使民主政权更加巩固。

突袭江心洲，击毙匪首。怀宁县广济圩马家窝魏得胜三兄弟均系国民党特务，1944年上半年，在广济圩一带活动。魏得胜受国民党桐城练潭特务组织委派担任武装特务队长，丁某某当副队长。为了破坏新四军声誉和军民关系，阻碍新四军向南发展，练潭特务组织派魏得胜等到贵西，纠合广济圩的特务和少数流氓分子，假冒新四军绑票抢人，使贵西缸窑、牛头山、黄湓一带老百姓、来往客商都不敢接近新四军。为此，贵桐县委和沿江团决定消灭这股武装匪徒。贵桐县委许章法和沿江团八连连长张有道，经过侦察和访问，得知魏得胜约二、三十名武装特务在牛头山对江的江心洲活动。一天晚上，许章法、张有道找了10几条小划子，将八连战士从升金湖送到长江边，到达缸窑，再穿过日军的碉楼（日军在前江口，黄湓设有碉楼）登上帆船，向江心洲南边驰去，利用茂密的柳树丛遮掩，登上了江心洲。天亮后，由一名姓高的商人带路，跑步将魏得

胜特务的驻所包围。战士们冲进去，不见魏得胜的踪影。接着抓来保长、保丁追问，保丁见身着军装的新四军，吓得不行，告之了魏得胜等人的驻地。但又告诉张有道，江心洲离黄湓日军碉楼很近，日军在碉楼上用望远镜可以将江心洲看得一清二楚，为了百姓不被日军报复，请求新四军抓魏丁两人要换便衣进行。八连张英等8名战士换上便衣，在保丁带领下，跑步到魏得胜住夜的人家。张英一进门，踢开房门，将魏得胜、丁某某甩趴在地上，并迅速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支手枪。当魏、丁二人被带到门外时，魏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票子，又把手表、金戒指取下来递给张英，拔腿就跑，张英举枪就打，魏倒地而死。这时，维持会来说日军已上江心洲，部队立即转移到有利地形，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日军正向八连防地走近，江心洲维持会长、保长、绅士一伙人，提着好几篮子鸡蛋、鸡、鱼等，缠阻日军前进。日军问了问，提着鸡、鱼、蛋回黄湓了。由于日军捣乱，耽误了新四军对魏得胜的特务搜逮，其他特务分子从洲北逃走。下午，沿江团召集江心洲五个保上层人士开会，由许章法宣布，将丁某处决。魏、丁二人被除，江心洲五个保长答应将江心洲作为新四军秘密后方，伤兵可在此养伤，提供日军情报，愿交纳一定数量的捐税，帮助新四军到安庆购药等。江心洲成了新四军的游击区，第三天晚上，许章法、张有道率八连返回贵西根据地。

突袭江心洲，击毙魏得胜一举，恢复了新四军在贵西的光荣名誉，群众对新四军的态度由冷淡变为热情，由害怕转为亲近，军民关系恢复了正常。

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成绩，受到沿江团傅绍甫团长的表扬，但同时也受到团长严厉批评。批评贵桐县委领导许章法、八连连长张有道，不向上级汇报冒险行事，更不应该在江心洲住上三天，要是被日军发现，八连有被日军歼灭的危险。这种冒险军事行动今后一定不能再发生。这一回功过相抵。说得许、张二人眼含泪水，连连点头。

（三）抗击国民党顽军进犯游击根据地

鸡山保卫战。1945年6月，德国法西斯已经投降，日本帝国也日薄西山，无力再战下去。这时沿江团和贵东、贵西游击大队集中在河边姜（今马衙街道境内）进行休整。为防备国民党和日伪军袭扰，保卫根据地，新四军沿江团在河边姜、鸡山（制高点）构筑了工事，日夜监视敌人。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沿江团部队在河边姜向排以上干部传达学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和毛主席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由于沿江团陆续拔掉了一些日伪据点，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时时想袭击根据地。河边姜是沿江团的后方基地，又是与师部联系的必经之路，更是七师五师联系的通道。1946年农历五月初二，国民党贵池保安队串通国民党新七师一个团，共二千一百多人，分两路向根据地发起了进攻。

沿江团事先得到情报，将沿江团和贵东、贵西游击大队主力迅速转移鸡山，鸡山纵卧江边，面山背江，是个天然屏障，于是决定在这里阻击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赶到后，立即向沿江团阵地发起了进攻，在机枪和大炮的掩护下，两天内，连续六次进攻，都被沿江团击退。第三天，国民党又调来飞机进行轰炸，地面部队又发动连续攻击，但仍无法突破沿江团阵地。国民党先后发起了二十次冲击，一连激战七天七夜未能攻下沿江团阵地，最后丢下两百具尸体而败退。战斗中地方游击队和群众为部队送水送饭，抢救转移伤员，夜间袭扰顽军，很好地配合了这次战斗。金鸡山保卫战的胜利受到新四军七师的通报表扬。

在反摩擦斗争中，贵池根据地游击大队和新四军沿江团部队，认真执行皖江区党委指示：对国民党四川部队，分化上层争取中下层，不轻易刺激与发生摩擦。对土顽，要集中力量予以打击，同时不放弃争取。对刀会，要弄清背景，镇压首要分子，争取下层。沿江中心县委，在反摩擦中坚决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团结抗日派。使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在反摩擦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赢得了胜利。

第九章 贵池军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

第一节 新四军沿江团战斗在贵池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争就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日军倚仗优势兵力，强势向前推进时，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二是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到了抗战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兵力不足，在大片沦陷区中，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而敌后的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国民党政府在这些地区原有的统治机构在日军进攻时已经瓦解，一时形成无政府状态。沦陷区的广大群众是坚决要求抗日的，除少数汉奸外，各个阶级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都要求抗日，所以敌后抗战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敌后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怕敌人严密封锁。由于这些条件，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锤炼的人民武装进入敌后地区，便成为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能够动员和组织强大的人民武装，创建起抗日民主根据地。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正是新四军沿江团挺进贵池后得以巩固发展和扩大，使贵东、贵西根据地联成一片。

一、新四军沿江团挺进贵池

抗日战争时期，为在皖中地区粉碎蒋介石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恢复无为根据地，开辟桐（城）庐（江）无（为）边区的官山，准备接应新四军军部过江，组建了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1941年3

月改为新四军七师挺进团，挺进团下设三个支队。团长林维先，政委张友来，政治部主任何志远（后为彭胜标）。开辟了桐（城）、潜（山）、怀（宁）、舒（城）、岳（西）游击根据地。1942年2月，经新四军七师决定以挺进团为基础与桐西独立团合并编为新四军七师五十八团。团长傅绍甫、政委彭胜标，参谋长李德安，政治处主任曾宪忠。1942年4月，中共皖鄂赣边区党委成立，1943年2月，皖中区党委为进一步加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分别建立了含和、皖南和沿江地委。与此同时，新四军七师师部和皖江军区也相应调整了下属部队建制，分别成立了含和、皖南和沿江三个支队及三个军分区。支队和军分区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林维先任沿江支队长（沿江支队由五十八团与沿江地区游击队合并而成。成立时，共有一千六百余人，枪七百余支），傅绍甫任副支队长，彭胜标任副政委，王培臣、胡继亭先后任参谋长，何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七师沿江支队将师属独立团，桐东、桐西三个大队合编为沿江团，团长傅绍甫、政委黄先，沿江团约有一千四百多人，下辖三个营，一营长夏云，二营教导员钟大湖，三营长张尔庆，每营下设三个连，还有一个特务连和手枪连。1944年黄先、傅绍甫、何志远率领沿江团团部挺进贵池地区，从事开辟与拓展工作，重开五、七师交通线。

二、沿江团在贵池打击日伪军

早在1942年，新四军挺进团、沿江支队就曾派部队同贵池抗日军民一起参加贵东、贵西的开辟工作，创建了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武装。

沿江团到达贵池后，不断扩大战果，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一）殷汇奇袭战

1943年，新四军沿江团配合沿江地委，在青阳、贵池、至德、东流等县，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盘据在殷汇镇北头的一个伪中队，队长桂世和，非常反动，经常领着伪军和日军下乡“扫荡”，烧杀抢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恨透了他，强烈要求民主政府除掉他。洪铺区指导员查根有夫妇俩，从事抗日活动，不幸被桂世和抓去，严刑拷打，惨遭杀害。为了除掉桂世和，1944年中秋节前几天，沿江团团长傅绍甫找来地下党负责人杨友华同志，共同对殷汇镇的日伪情况、地形进行了认真研究。一致认为，这个据点设在殷汇一条小街上，一边靠水，一边靠山包。主要通道旁建有小型土碉堡防守。而且距殷家汇日军中心据点只有两华里，若强攻稍微拖延时间，日军就会出来增援。如是决定，利用中秋节出入殷汇镇人多，化装平民混入镇内潜伏，进行偷袭。中秋节这天，傅绍甫团长带领手枪连三十多人，分别化装成农民、手艺人、商贩，利用人多混进街里，在杨友华、龚大毛（系桂世和家长工，我地下工作人员）安排下，分头隐蔽到群众家里，晚上在指定地点集中。午夜时分，团参谋长李务本带着手枪连的同志，由龚大毛带路，直奔桂世和家。龚大毛以送青苞为名，敲开了桂世和家的大门。此时，桂世和同小老婆斜躺在床上抽大烟，龚大毛一个箭步窜上去，抓住桂世和。桂正要顽抗，被侦察班夏班长一枪击毙。枪响，沿江团五

个号手，同时吹起冲锋号，潜伏在殷汇镇沿江团战士突然间向伪军土碉堡发起了袭击。龟缩在殷汇镇的日军不敢出动增援，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结束了战斗。打死了 10 几个伪军，其余全部被俘虏。缴枪 30 多支，子弹数千发，款物若干。第二天，消息传开，殷汇镇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二）袭击大叶村乡公所

1943 年下半年新四军沿江团一营八连驻后村，一天上午地方工作的同志告诉八连：大叶村乡公所来了 10 多个伪警察，背着枪，在大叶村山沟里活动。得知消息，八连迅速作出决定，消灭伪警察把枪搞到手。当晚，由地方同志带路，从后村出发，两个小时就赶到伪乡公所驻地小山村。八连立即兵分两路将伪乡公所包围。这时，伪警察已发觉被包围，开始从后门逃往山上，有的还未来得及跑，八连一排迅速从正面冲进屋里，其余战士围捕逃跑的伪警察。伪警察吓坏了，没有开枪就缴械投降。10 几个伪警察全成了俘虏，缴了 11 条枪，1 千多发子弹，20 几个手榴弹。将俘虏带到 3 里外的地方，对他们宣传政策后，给予释放。为了更好地支持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八连将战利品中的六条枪（每枪配发 20 发子弹），留给了地方，组建了三万圩第一支游击队，活动在后村。三万圩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贵西游击大队。

（三）攻打清溪日军据点

1944 年 6 月，沿江团一营一连、手枪连，在一营长梁斌带领下，活动于梅埂一带。贵东下清溪有一个小煤窑，驻着日伪军三十多人，

他们强迫劳工挖煤，供应贵池城内日军的燃料。日伪军不断在这一带扫荡。这里是贵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后方，不拔掉这个日伪据点，新四军在这一带就无法进行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日伪据点建在一座小山上，在山顶上筑了碉堡，四周挖了战壕，战壕外还有一道铁丝网，日伪军的头目带着小老婆住在碉堡旁边的房子里。沿江团一营一连奉令拔掉这个日伪据点。一天夜间三点多钟到达据点附近，剪断了铁丝网，摸了进去，将碉堡和房子包围起来，四面攻打，不多时就攻破了这个据点，伪军头目刚从被窝里爬出来，还未弄清方向，就成了俘虏。这次战斗共俘虏伪军三十多名，缴获三十多条长枪、一支手枪和一部分弹药，解放了劳工，这个小煤窑也收归抗日民主政府所有。

（四）与国军合作布雷

1944年7月间，国民党新七师十九团三营驻牌楼部队一位连长带两名士兵到吴田铺北边王家湾，通过乌趾山“小老大”，找到沿江团八连连长张有道，要求会面。张有道立即带两名战士，到王家湾与川军连长会面。该连长说是接到上级命令，要其部队到长江布水雷，请求新四军配合。八连同意配合。并决定在具体布雷前，联系地点为石龙章保长家。七、八天后，收到石龙章保丁送来信函，信上讲：“明夜十时布水雷，请求你们担任对殷家汇日军的警戒，并在江边布置几只小船”等。八连长回信：“同意你部方案，按时布置，适时进入阵地不误，请放心。”当晚张有道找到蛟口区委负责人和许章法同志共同商议，由区委负责人派人到江边布置小船；

八连适时进入阵地——铜山口一带，对殷家汇日军警戒，并派出少数人到殷家汇观察日军动静。第二天黄昏时，新七师十九团三营到吴田铺背后山岭驻扎，一个连直插石龙章。利用夜幕，从石龙章前江口的西边，黄湓到牛头山东边乘小船将 18 颗水雷运到江中投放。布雷任务完成后，天已破晓，布雷国军部队被日军发现，日军向新七师三营发起进攻，沿江团立即侧击日军，使新七师布雷官兵得以安全撤离。不久，国民党小报报道：这次在长江布水雷，所以能胜利完成，是由于新四军在江边配合的结果。这本是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军事协作，但国民党小报刊登这则消息，其目的就是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不久，日军从尧渡街、安庆出动 1 千余人，由西向东，对新四军活动的地区进行大扫荡。由于新四军沿江团事先有所准备，日军扑了空。根据地未受损失。

（五）拔除杨家店、凤口陈伪军据点

1944 年 9 月间，沿江团一营八连住在关密。一天下午一个自称是从杨家店伪军碉楼里跑出来的伪军到八连驻地，讲述他的苦闷和希望。八连从而得知：日军要将驻高岭、凤口陈、杨家店等地伪军调到安庆整训，伪军们当心，如果真的调到安庆，日军就可能不让他们回来了，很多人，为此事发愁。他们私下里希望新四军把枪给缴了去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不去安庆整训了。他们已接到命令，明天就要开拔去安庆，希望今夜行动。根据这个情况，连长张有道和指导员杨俊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这是贵西工委会工作的结果，没有理由怀疑情况是假的。八连根据兵贵神速的道理，在来不及请示上

级的情况下，拟定了作战方案。夜幕降临，杨俊同志带领一、二排向杨家店进发。在离杨家店三里的地方，找到熟悉的保长，要他筹集一些鸡、鸭、蛋等物品，用篮子挑着走在前面，一排派两名战士跟在后面，走到碉楼不远的地方，就听到里面喝酒划拳闹哄哄的声音。这时一、二排暂停前进，保长和两名战士走向前去，没走多远，遇一伪军哨兵。哨兵问：“那个？”保长回答：“是我呀，我是保长。”哨兵又问：“保长，你这时来干什么？”保长说：“听说你们明天要走啦！特地为你们送点礼物，慰劳慰劳！”哨兵说：“好！你过来吧，我看看什么礼物。”正当哨兵弯腰将篮子里的“慰劳品”装入腰包时，两名战士趁势把哨兵按倒在地，不许他喊叫，哨兵连说：“是、是、是”。这时，一、二排战士乘机冲进碉楼，大声喊道：“不准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就这样，将杨家店的一个排伪军缴了枪。张有道带三排去风口陈，十二点钟左右才到，迅速包围碉楼。其哨兵正躺在碉楼门口的凉床上打酣，当新四军战士拿掉其枪，四个战士跨过凉床进入碉楼后，哨兵才被惊醒，旁边的战士顺势将他按在凉床上，小声喝道：“不许动，你要叫喊，就干掉你！”哨兵躺上凉床上不敢吭声。三排的战士迅速悄悄地进入了碉楼，缴了伪军枪支，睡梦中的伪军才被惊醒，个个目瞪口呆，当了俘虏。战士们不费一枪一弹，解除了两个伪军据点。

（六）巧击日军机帆船

1944年9月27日，沿江支队肖光耀站长，老交通员彭家发和阮学甫三人，带领沿江团八连一个班共计17人和4位挑药品的民

工将部分武器送到桐南大队驻地枞阳铁板洲，乘木帆船返回江南时在乌沙太子矶遇一艘日军机帆船。肖光耀站长迅速指挥用柴草伪装好船仓，这时日船接近，机帆船的日军命令木帆船停止前进，靠上他们的大船，并甩出缆绳，将木帆船挂在机帆船后，准备向乌沙方向拖去，机帆船上五个日军和三个伪军，跳到了木帆船上。这时老船工拿着缆绳向他的儿子（也是船工）递了一个眼色，小伙子迅速操起快斧，跃到船头将缆绳砍断，木船摆脱了日机帆船的控制。五个日本鬼子和三个汉奸，正弯腰爬进船舱，肖光耀站长一声令下，战士用随身携带的石灰包向日伪军甩去，迷住了日伪士兵的双眼，在木船上，战士同鬼子扭打起来。战士们用手榴弹、斧头将日伪军砍砸至死，推下水去。船上的日伪军全完了。民工用扁担帮助划水，加速木船航行。机帆船上的日伪军发觉木船有变，向木船开火，船上也集中火力还击。日伪机帆船上的驾驶员被击中，船在江上打转，只好停止射击。此时木船已划到太子矶东岸，八连战士和民工登岸后沿着玉米地快速前进，顺利地将四担药品送到支队医院。这次巧击日军机帆船，缴获 8 支步枪，歼灭日伪军 8 名。

（七）偷袭殷家汇，义释马老八

贵西的日军和顽军对贵池到殷家汇的公路控制很严，新四军税收人员在这条路上，经常被日伪军和顽军杀害，影响扩军、征粮、税收工作的开展。沿江地委和沿江支队决定打通贵池至殷家汇这条公路。

当时，池州汪伪保安团团长马老八有 700 多人（枪），势力较

大。他对日军不满，特别是高脊岭一战，日军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马老八身上，追究了马老八的责任，处决了马老八手下人员多名，使马老八忠于汪伪政权的思想动摇，对日军更恨。掌握这一情况后，林维先和傅绍甫研究决定，争取马老八投降起义，经过几次试探接触，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1944年9月27日，沿江支队得到情报，马老八要到住在殷家汇的三姨太家中过中秋节。马老八有三个老婆，大老婆、二老婆住在贵池，大老婆没有生孩子，二老婆生了一个女儿，三姨太生了一个儿子，当时1岁多。马老八喜欢三姨太，小儿子更是命根子。当天下午沿江支队首长林维先、傅绍甫立即通知交通情报总站站长余子英，下窑分站站长肖光耀和许志方、刘伯宽、彭家发、刘谓民到支队接受任务。傅绍甫讲：“我们用偷袭殷家汇的办法将马老八‘请’出来。劝其改邪归正，争取过来为我们工作。但是，殷家汇有日军100多人、伪军100多人驻守着，力量很强，用硬攻办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只有组织少数精干人员秘密进入殷家汇，才能将马老八‘请’出来。这个任务由你们来完成。”于是，在支队首长直接领导下制定了行动方案。

28日，担负潜伏任务的沿江团15个同志，化妆成挑柴的、卖鸡蛋的悄然进入殷家汇，与殷家汇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很快弄清楚了马老八三姨太家的住址和周边的情况。随即分成4个战斗小组，由彭家发率其小组捉马老八，将其“请”出殷家汇。其余三个组配

合行动。农历八月十五日早上六点肖光耀等 3 个组分别在殷家汇前街、后街、中街鸣枪，一时，枪声大作，整个殷家汇乱成一片。彭家发从屋顶进入马老八三姨太家，打开大门，其余三个除掉了两名卫士进入其屋。随后四人一起推开房门，这时，马老八和三姨太还睡在床上刚刚被惊醒，游击队员用枪指着马老八的脑袋：不许动，不许讲话。同时，递上传绍甫给马老八的信。马老八看完信，没有反抗。彭家发告诉他，随我们过镇后洋桥，保证平安无事。说着将马老八双手反铐，并将准备好的一件日本大衣，披在马老八身上。4 名游击队假装卫士，紧随其后。马老八的三姨太和孩子由交通员送到事先准备好的船上。从水路护送到游击根据地。彭家发押着马老八走到洋桥鬼子岗哨时，受到二个鬼子和二个汉奸盘问，一个鬼子有所警觉，彭家发抱着马老八快跑，其余三人甩出石灰包，迷住哨兵眼睛，随着快跑，等鬼子岗哨开枪，游击队已越过封锁线。接应的游击队员立即烧火为号，镇里的 3 个组见到火光便撤出了殷家汇。事后得知，镇内 3 个组的游击队在乱枪中竟打死日本鬼子和伪军十多名。

经过教育、谈话，马老八写了悔过书和保证书，决定协助新四军抗日，同意将三姨太和儿子留在根据地。为了避免日本鬼子和伪军猜疑，新四军对马老八使了“苦肉计”，用竹条将马老八的脸打肿、打破，并对马老八胳膊打了一枪。农历八月十八日早晨天还未

亮，马老八假装逃跑，游击队几个战士紧追其后，一边叫喊，一边鸣枪。洋桥的鬼子伪军出动接应，马老八“逃回”殷家汇。鬼子相信了马老八的“忠诚”，并将他送到安庆医伤。以后，马老八暗地里多次给新四军送情报、送枪支、保护税收人员安全。日本投降后，马老八参加了新四军，并随军北上。

(八) 罐窑伏击战

1944年10月初，沿江团团长傅绍甫等，带着团部和一、三营营部及一部分连队驻在关窑一带。新四军沿江团八连驻在罐窑，在半里铺方向放了监视哨，监视日伪军动态。一天下午两点左右，从半里铺东边两里多路的山边来了五十余人，身穿杂色便衣，新四军哨兵问：“你们是哪部份的？”他们不但不回答，反而开枪射击，并趁势冲过来。新四军两哨兵迅速钻进茂密的常青树林，跑回连部报告，八连连长张有道一面向三营营部报告，一面指挥部队抢占山头，作好战斗准备。日伪军在树林里搜捕哨兵，距八连阵地五十余米远时，八连连长令号兵吹冲锋号，一时间，机枪、步枪、手榴弹便一齐向树林里射去，日伪军惊恐万状，抱头逃窜。日军溃退时，连长张有道看到一个手拿着指挥刀的日军，在一块田畍上躺下，接着有两个日军把他架起拖着跑，张有道立即指挥追击。八连战士猛追下山，一直追到半里铺日军碉楼前。这一战，缴获枪三支，打死日军三人。还打断了日军队长的一条腿，后据说那个断了腿的队长被日军活活地烧死了。第二天，日军出动了一千余人到罐窑、洪铺等地进行大规模清剿，寻找三具日军尸体。

(九) 炸毁日军汽车

1945年1月，天气寒冷起来，殷家汇日本兵急需棉衣棉被过冬。此时，贵桐县委书记马守一、支队办事处主任马寿民率一个警卫班前往殷家汇横埠支队干训班参加开学典礼。这一行人走到离殷家汇10多里地的李子坑碰到日伪军一辆运送棉衣、棉被的汽车。就地隐蔽观察，汽车在被破坏成大一个坑小一个坑的公路上，艰难地爬行，并不时停下来，车上12个日军和4个伪军大部分下来推车。马守一和马寿民当即决定，炸掉汽车。于是派彭家发、阮学甫在李子坑一木桥下安放一捆手榴弹。彭、阮迅速隐蔽起来。当日伪军推车上木桥时，彭家发用力一拉引绳，只听得“轰隆”一声，汽车被炸，倒在桥下沟里，部队冲上去，歼灭日伪军12人。

(十) 激战高脊岭

1945年6月间。沿江团首长派八连到乌沙江边一带，掩护地方工作人员开展税收工作。八连到高脊岭附近执行任务时，突接群众报告：“日军来了一个连，一百余人。”八连迅速决定转移到离高脊岭不远的一片树林里隐蔽。时值中午，天气很热，日军也直向树林走来。八连的同志心急如焚。怎么办？走，后面是一片茫茫稻田，毫无隐蔽。只有打，八连做好迎战准备。眼看日军叽哩呱啦来到林边，各自散开，找荫凉处乘凉。八连乘机，突然开火，猛烈扫射，日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日军指挥官，手握战刀，嚎叫着带领士兵，冲进树林，一时间，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一日军把一挺机枪架在新四军四班长右侧十几步远处，向树林里乱打。四

班长（名字不详，外号菩萨，无为严家桥附近人）一个箭步冲过去，一刺刀刺死了日军，夺得了机枪。刚要走时，两个日军冲过来，四班长不幸中弹倒下，机枪被日军夺去。三班长（姓杨，外号杨孬子）眼捷手快，一枪一个，打死了两个日军，又把机枪夺了回来。突然又有三个日军，向三班长扑来，三班长把机枪踩在脚下，大吼一声：“杀……”与三个日军拼开了刺刀。一班长听到了喊杀声，立即带领四名战士冲上去打死了三个日军。但三班长身上已八处受伤倒在血泊中。打了半个多小时，日军指挥官被二班长打死，日军溃败。八连同志乘胜追击三里多路，又打死打伤一些日军。战斗刚打响，沿江团领导，考虑八连力量薄弱，立即派一营两个连队从塔桥跑步增援。赶到时，战斗已胜利结束。这次激战，八连伤亡二十余人。日军伤亡更为惨重，缴获日军机关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步枪十余支。不久，沿江团在洪铺区（现涓桥附近）召开庆功大会，邀请当地群众参加，并把缴获的日军武器，在会场上展示，群众很受鼓舞。新四军七师司令部给八连传令嘉奖。

（十一）罗城保卫战

罗城，位于墩上，是山区和圩区的交汇点。是贵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门户。1945年上半年，日军在沿江团和贵东游击大队的打击下，将观前牛形山的日军驻点撤离，但躲在后方的国民党第一一师，打着收复失地的招牌，乘机攻占贵东游击根据地的门户罗城。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45年上半年，日军士气低落，贵东地

区观前牛形山日军驻点有两个士兵，一个叫文子叔（朝鲜籍，他的父亲是朝鲜劳动党党员），一个叫丹田，他们被日本当局强征入伍，到中国后，目睹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因此对长官不满。贵东游击大队长章开如得之这一消息后，立即布置观前牛形山章保长（白皮红心）留意牛形山鬼子的动静，要求他利用保长的身份，主动接近据点日军士兵文子叔和丹田，还请章保长将中共领导人在延安发表的“日本向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这是非正义的战争，注定要失败……全体日本军人只有向中国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等文章送给他们看，并请转告这两位日本兵：新四军是讲信誉的，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送他们回国和家人团聚。通过章保长的工作，这两个士兵终于同贵东游击大队取得了联系。一天晚上，文子叔和丹田两人乘别的日军外出的机会，就带了一挺机枪、两架小钢炮、两支大枪、四支大盖子枪、两大包日军军装向贵东游击队投诚了，并且要求参加新四军。这两个日本兵投诚并被编入贵东游击队警卫排后，对驻贵池日军震动很大，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日军将观前牛形山这个驻点撤掉了。新四军沿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这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才有了前文提到的国民党军一一一师乘机进攻罗城。

如果罗城被占，新四军沿江团后方基地就完全暴露在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的面前，同时新四军沿江团和贵东游击大队在马牙、灵芝、元四章这一带活动就难以展开。为此，新四军沿江团和贵东游

击大队决定保卫罗城，在罗城地区同国民党一一一师展开了争夺战。整整战斗了十二天，终于打败了国民党一一一师的多次进攻，迫使其退出战斗。这次战斗，缴获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15 挺，步枪 200 多支等。取得了罗城保卫战的胜利。

沿江团在贵池敌后以奇袭、伏击等军事手段，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日伪军。拔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分化、瓦解了一批伪军和伪政权，以小胜集大胜，使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节 中共沿江中心县委与新四军五、七师 区域联系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中共皖江地委领导下的沿江交通联系网的建立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第七师和皖中区党委，除了要打通与二师的联系，以便与军部取得联系外，还要打通与五师的交通，以便五师能通过七师与军部取得联系，实现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战略意图。七师成立后派部队向西、南、东北三个方向扩展，开拓地域，扩大根据地。沿长江两岸，即是向桐城、贵池、安庆、东流、至德、彭泽方向发展，其战略目的是沟通与新四军五师的交通联系。

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央决定在江南重新开辟一条从无为经桐南或桐东至贵池、东流、至德、彭泽，再至湖北的“沿江走廊”，以便保证五、七师的交通联系，使皖江抗日根据地能迅速

地巩固和发展。

1943年3月，皖中区党委改为皖江区党委，同时成立了沿江地委，地委书记林维先，副书记黄先。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沿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书记黄先。沿江地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打通和保持新四军七师与五师的交通线，开辟和发展桐、庐、贵、无、东、至等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3年春，皖江区党委成立了区党委联络部，沿江地委成立了交通联络总站。站长黄先兼任，副站长郑子贞。各县委也相继成立了交通联络大站，大站站长分别由县委书记或县长兼任。在根据地交通线上和敌伪封锁线上设立联络分站或隐蔽的交通联络点。从而，形成了区党委，沿江地委到县委至区委一级的完整的交通联络网络。

沿江地委向沿江地区开辟交通线，建立了从无为土桥出发，经施家湾、青山、双河口到水圩，由老洲头过江到梅埂后，再回到老洲头，经桂家坝到铁铜，经大王庙、罗垾到花山、柏子山，再经海口洲南埂过江到杨家套（或陈家墩）、白龙桥、泉水塘、香隅的交通线。为使沿江地委、沿江支队与所辖各县委、区委之间保持联系，黄先指派吴达为此线长途交通员。

二、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领导下贵池交通联络站的建立

1942年底到1943年春，桐庐无县委、桐青南县委派部队到贵东进行抗日武装活动。这年夏天成立了贵东工委，吴文瑞任工委书记。工委属沿江中心县委领导。随着斗争的发展，不久便成立贵东

县委，吴文瑞任书记。同时，在县委驻地四房包设立了交通联络总站，站长陈某，总站不仅下设梅埂、水村梅等分站，还设立了桐东至无为，梅埂至茗山冲两条交通线，分别由交通员梅斌、章开如负责。从而保证了县委与沿江中心县委以及本地区内的交通情报联系。1943 年底，贵东地区斗争局面基本打开，沿江地委副书记兼沿江中心县委书记黄先，率领地委机关及沿江团分批移至贵东的梅埂一带，在此期间，左大钧担任桐贵青（贵东）县委联络站站长，并配五、六个人协助其工作。主要是准备船只，以接应江北根据地党、政、军人员渡江南下。1944 年春，接应任务完成，联络站相继撤销。县委将梅埂交通站改为县委交通大站，站长吴清兰，从此梅埂交通站担负着江南至江北，县委至沿江地委以及中心县委和县距间的情报联系，人员、物资等护送工作。同时，除保持原水村梅、茗山冲、流坡矶等交通分站外，又增设汀洲交通联络分站，进一步加强了交通工作。

为发展抗日武装斗争，以利打通新四军党、政人员南北通道，上级决定开辟桐南地区。是年五月，陈定一（后任贵桐县委副书记）奉命至桐南，经工作后建立了六百丈、唐河、铁铜等交通站，任务是掩护长江南北新四军人员的来往。交通线为花山至铁铜、贵西一线。

1944 年初，沿江地委派齐平（桐怀潜中心县委委员）同志到至德工作，4 月初建立了彭东至工委，书记孙纪正，副书记齐平。他们首先在跳儿口设立秘密联络点，逐步向马田、长安一带发展。先

后在长安铺、谢家大屋、马田、阳边沈等地设立了地下交通站和若干交通联络点，形成了地下交通网，沟通了马田与八都湖的联系。马田交通站站长由郑立生担任。至此，从香隅跳儿口至马田，从马田到贵西蛟口，或从马田经长安铺到八都湖，均只有六、七十华里，步行一个晚上就可以赶到，既方便了大部队行动和物资的运送，又有利于文件和情报的传送。1944年5月，贵西工委又在此线的广济圩、江心洲、洪铺、八都湖建立了四个交通站，初步打通了到彭东至地区的交通联系。1944年8、9月间，贵西工委先后开辟了蛟口、八都湖游击区，形成了由彭泽入境，经白湖嘴、香隅、梅沙港交通联络站和跳儿口联络点，至马田、坦埠联络站到蛟口至贵西；或从马田经过往北经长安铺交通站至余桥交通站，小叉保、杨树湖联络站到贵西联络站的交通联络网。这样，五、七师在东流、至德、贵西境内的地下交通线就完全打通了，从贵东至彭泽的沿江交通全部控制在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手中。此时，沿江地委长途交通站站长吴达，经常由江北渡江至梅埂经贵西的乌沙、牛头山、八都湖到彭东至的瓦龙桥。为了进一步保持和巩固开辟的新四军第五、七师交通线，发挥交通联络站作用，1944年9月沿江中心县委在吴家嘴设立了交通总站，总站站长余子英，并将土桥、茗山冲、汀洲、水村梅、梅埂、流坡矶、下窑、蛟口、白云、坦埠等交通站，划归沿江中心县委的交通分站管辖。10月，沿江办事处公安局对贵桐县委境内的日伪情报收报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决定由所属的各区委负责同志负责这方面工作，总指挥是沿江中心县委交通总站站长余子英。各

区有情报要及时送到总站。至此，五、七师交通线完全打通。五、七师区域联系的重大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

中共沿江中心县委交通联络站不仅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搜集传递情报，传递党政军命令、指示；传送文件、信件；护送过往军政人员，掩护革命干部；为部队运送物资，为部队和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等），而且为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沿江交通联络站为贵东、贵西根据地的 建立和巩固发挥着特殊作用

1944年春，贵东汀洲交通站侦察到，大通日军和白沙岭桐村日军据点共一千五百余兵力，即将东西两路对贵东的茅坦、香山、观前、梅埂、大同五个乡进行“清查”、“扫荡”。该站将情报立即送达桐贵青县委书记吴文瑞。县委立即通知上述地区党政军人员做好转移隐蔽工作，使进犯日军扑了空。贵东游击大队还在大通附近老镇设下埋伏，一举击溃了七十多名“扫荡”回归的日军，致使大通日军三个月不敢出来。

1945年夏季，日伪皖南独立方面军，在贵池设立办事处。成立了第五支队。分驻乌沙，经常到江店、晏塘、三万一带抓丁抢粮。并常配合日军到乌沙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扫荡，使根据地日夜不宁。此时，沿江办事处主任张格正在这一地区活动。由于在江店连住了数日，引起了日伪的注意。1945年6月18日，当日伪军袭击江店时，沿江办事处张格一行数人来不及转移，致使张格主任、史

平之粮食科长、协进会主任汪秀璋等同志一起被日伪军抓走。张格的警卫员许某经不起日军的恐吓，随即叛变，将上述同志的真实身份告诉了日伪军。几天后，史平之同志在乌沙被杀。张格、汪秀璋押解安庆监狱。中共华东局敌工部获得消息，竭力营救。因当时只有钞票而没有黄金，日伪相关方面不同意放人，致使营救计划落空。因日本投降，张乘混乱之机逃出安庆，在大渡口被新四军联络站救起，送至新四军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由于当时的复杂局面，根据地党组织和部队经常分开活动，没有固定地点，给交通员递送情报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交通员在送信件时，一般采取秘密的单线联系，采取隐蔽接力的方式，伪装成各种职业人员一站一站的传送。有时要经过日伪几道封锁线。为保证信件、文件的安全，交通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1943年，吴希成同志在贵东猪公嘴搞地下工作，一天，将重要信件托“好朋友”方绍凯送给贵东大队，请黄绍臣、王亚中带游击大队到猪公嘴，打击国民党特务。方绍凯拿信后，没有去贵东大队，而是把信送到上清溪国民党乡公所。国民党贵池保安队立即派一个连到猪公嘴，将吴希成杀害。交通员传递情报稍不注意，就可能酿成杀身之祸。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后来，新四军处决了方绍凯。

第三节 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一、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党的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沿江团和铜青南、桐庐无等县委派出武工队，在贵池敌后开辟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自 1942 年开始，就在贵东、贵西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的组织。到 1944 年底，在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领导下，桐贵青（亦称贵东）县委成立；贵桐（亦称贵西）县委成立。同时贵东成立了河东、河西、太朴、桐东区委；贵西成立了晏塘、洪铺、高岭、蛟口、八都湖、桐南、广济圩等十一个区委和 55 个乡级党支部（不包括八都湖、桐南、广济圩区委领导的乡级党组织）。到抗战胜利前夕，根据地共产党员总数达 300 多人。县、区委比较健全，乡建立了支部，每个支部下设若干分支，党的组织遍及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都有了新的进展。

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1944 年 4 月 19 日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提出下述宗旨：“广泛播撒党的种子，创造点线，使组织工作逐步发展到面。”三个月后，新区发展了一百多名党员。为纯洁党的组织，到 1944 年 7 月底又提出整顿的方针。要求一方面“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中不放弃整顿组织与巩固工作”。中共沿江中心县委于 1944 年 10 月明确提出各县党组“在工作中主要加强乡一级，应注意培养干部和教育干部”，在同年 11 月的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上，黄先书记对开辟工作的干部提出了许多严格而又具体的要求：第一，要大胆、有勇气、有信心、有毅力，不怕碰钉子，不怕失败。第二，工作要踏实，求内容不求

表面形式。第三，埋头苦干不出风头等等。要求对干部“从数量中求质量”，“从利用到教育到使用争取少数特殊干部转为可靠干部”。同时，对领导干部提出，“应多跑腿，抓具体工作，多给干部以具体帮助与指示；多开会，利用会议的形式经常教育干部，以提高干部工作能力。”同年10月，中心县委在贵西洪铺区举办了3期训练班，由宣传部长胡昌耕具体组织。晏塘区委副书记肖文、民政科长王文正任教员。训练班学员大都来自贵西地区的党员、干部或积极分子，每期四、五十人不等，时间3个月。训练班有两种形式，一个叫“军事训练班”（王文正负责），一个叫“干部训练班”（肖文负责）。地点是流动的。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要政策化的号召”和华东局关于“我们七师要以政策胜人”的指示。主要内容：党的基本知识、二五减租减息、征粮政策、“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锄奸政策、“打击土顽，争取川军抗日的军事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军民兼顾”的财政经济政策等等。

在中共沿江中心县委的统一布置下，贵东县委1944年在祠堂包附近举办了三期“党员和干部训练班”，集中训练贵东地方党员、干部。训练班由督导处主任左大钧负责（兼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朱旭华负责组织工作。训练班主要是解决干部作风问题，提高政策水平，特别是提高新同志的工作能力。经过训练提高了根据地广大干部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政策水平，保证了当时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武装建设

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支抗日武装，利用这支武装发动和组织民众，战胜敌人的进攻；二是要发动并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在斗争中发动民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中共沿江地委（前为皖江地委）和新四军七师沿江团在开辟贵东、贵西游击根据地时，以主要精力抓“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即正规军沿江团、游击大队、群众精干班三结合武装力量。在扩军中，提出“不强迫、不收买、不欺骗”，坚持“成分好、来历清楚、身体健康、甘心情愿当新四军”的口号。根据地先后向沿江团输送了近千名战士；并组建了贵东、贵西两个游击大队。贵东游击大队，政委吴文瑞（兼），大队长章开如，下辖三个中队，主要活动于青阳、九华、观前、马衙、流坡等地。在贵东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经历了大小几十次战斗，巩固和发展了贵东游击根据地，保证了党、政工作的顺利开展；贵西游击大队，又称桐贵游击队，政委马守一（兼），大队长黄绍臣，下辖四个连。主要活动地区：贵西唐田、乌沙与东至八都湖一带，贵殷公路两旁。贵西游击大队配合沿江团，积极开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打通七师与五师的联系，配合沿江团粉碎了日军对三万圩的扫荡。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贵东、贵西游击大队已达500人，枪支400多条。北撤后成为十九旅的主力之一。根据地还组织了有几千人的民兵队伍，各区、乡民主政权都有自己的区、乡游击队。正是这支三结合的武装队伍，先

后拔除了牛头山、扬小店、凤口陈、上江口、馒头山等日伪据点、炮楼或哨卡；在高脊岭与日军一战，打击了日军气焰；袭击殷汇镇，击毙伪军头目桂世和；摧毁了茅坦、高坦、清溪乡自卫队据点；攻打国民党县政府在留田和密岩附近的县土顽大队；击败了鸡金山、分水岭、青山岭顽军的进犯。使根据地的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在发展武装，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的同时，根据地党组织注意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争取了观前牛形山等日军据点日军携械向新四军投降。对伪军“又打又拉”迫使伪军三三两两起义、投诚，主动向新四军提供日军情报。对土顽以拉为主，尽量避免武装摩擦，还同川军新七师三营合作布雷。在根据地，依靠游击队抓日伪、国民党特务，打击反动道会门、土匪等日伪顽的社会基础，安定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

三、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

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不仅依靠雇农等贫苦大众，而且还要团结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日，组成统一战线。

（一）团结知识分子，动员他们抗日

1943年4、5月间，铜青南县委委员兼青北工委书记许章法，来到茅坦，邀请茅坦杜村的一位塾师（曾任过西北军少校书记官）到根据地涧北冲设馆教学。在新四军抗日救国行动的感召下，该塾师愿意与许章法同志见面商谈。见面时，这位塾师竟以斯文相交，许欣然应允。杜先生出一上联求对：“章程为革命，终朝秣马厉兵，试问几时成大器？”许即对道：“法则救群黎，连岁披星戴月，唯

希一德助新民。”许章法同志还巧妙地利用杜先生上联首字“章”，以“法”为下联首字，把自己的名字嵌进去。杜先生大为折服。后来，许章法同志率领游击队到茅坦活动经过他家，杜先生又出联求对，上联是：“贵地遇贵人，率领贵军幸此地，”许对道：“池荷映池水，好教池鲤跃深荷。”这副对联三嵌“贵池”二字，费尽巧思。新四军里竟有如此文思敏捷，才华照人的“秀才”，杜先生唏嘘感叹不已。后来，杜先生不仅到根据地任教，还与许章法成了知己，许章法以直言相告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革命宗旨，杜先生更加热爱抗日救亡工作，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许章法还通过茗山村的一些党员，利用社会关系，在茅坦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茅坦党支部。

1942年冬，贵东工委管启明、钱根银，以做生意为掩护，经常出入马衙玉田汪村，发现地主汪怀荣家的私塾先生刘爱杰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对日寇憎恨。以后，在他俩的启发教育下，刘爱杰加入了共产党，并被派到沿江地委（普济圩）受训，回来后，被派往白沙乡任乡长，开辟了白沙游击区。

1944年，在开辟江北广济圩时，中共贵桐县委书记马守一首先与广济圩乍尖山当地的知识分子（士绅）芮仲平先生交上了朋友，经过工作，芮仲平先生愿意帮助新四军，在马守一率队开辟江南，到达贵池后，芮仲平帮助新四军购买军用品。又通过他，做安庆日伪和三番子（青邦）工作，设法营救出广济圩事件中（1944年9月，一支新四军游击队渡江到广济圩剿匪，在江中突然与日军汽艇遭

遇，结果枪支全部沉入江底，人员全部被俘，酿成了广济圩事件。事件发生后，沿江中心县委加强了城市情报工作，马守一同志兼任沿江中心县委城工部部长，另派储玉怀负责安庆的日伪情报工作。）的被俘人员。

1944年，中共洪铺区委书记杨友华在桂家滩与当地塾师钱国让交上了朋友，在新四军抗日救亡政策的感召下，钱先生教育的好几个青年学生都参加了民主政权的工作，影响很大。

1943年，贵西工委许章法、周暮樵经常登门拜访一些回乡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次得知胡家嘴胡翠祥（地主）在浙江大学读书的弟弟回乡探亲的消息，他们立即去胡翠祥家拜访，对其兄弟晓以民族大义，使胡氏兄弟同情和支持抗日。晏塘区区委书记周暮樵还动员了青年知识分子林自伟投身抗日活动。江心洲的祖先莹（大学生）经新四军启发、教育，积极宣传抗日，并动员他的大舅子高某把埋在地下多年的一支德造手枪交给晏塘区长周暮樵，又动员亲友高仁山参加区干队。正因为贵池抗日根据地重视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使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

（二）团结拥护抗日的士绅地主，团结他们一道进行民族解放战争

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建立过程中，遵照毛泽东主席“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41页）的教导，在沿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团结、教育、改造了一大批开明士绅、地主、富农，促使他们参加伟大的民族战争。从而巩固和扩大

了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1943年，为人正直的日伪维持会晏塘乡乡长汪秀璋，经中共贵西工委书记马守一、晏塘区长周暮樵的帮助和教育，积极为新四军工作，动员其堂弟汪龙全为新四军游击队带路、送信。1943年，新四军沿江办事处成立。10月，汪秀璋被沿江办事处任命为“协进会”会长。他在任职期间，能准确及时地向抗日民主政府提供日伪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不拘形式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沿江办事处决定，利用汪秀璋日伪乡长的公开身份，打进三万圩公司任经理。汪任经理后，实行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改善了万成、万生、万宝三个圩区的农民生活状况。同年6月18日，汪秀璋与沿江办事处主任张格不幸被捕，解至安庆监狱，不久押送南京，在雨花台英勇就义。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对汪伪基层政权，也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进去、拉出来，争取化敌为友。这“一打一拉”使统战工作收到成效。乌沙区汪伪区长陈敬之（原为贵池中学教员，贵池沦陷后，当了区长。）是个很重要的统战对象，但一时难以接近。为打开局面，1943年，贵西工委周暮樵同志来到贵西乌沙，通过其家乡士绅陈佩先沟通了同陈敬之的联系。接着，又相约陈敬之见面。见面后，周暮樵同他讲抗日救国，晓以大义。并宣传新四军是打鬼子、打铁杆汉奸救中国，救黎民的队伍。他听后很感动，即表示：一不会带日军向新四军进攻；二是日伪军有什么情况便迅速奉告；三是互相保持联系。由于周暮樵同他建立了联系，后又使新四军同乌沙镇伪警察吴启太建立了关

系。吴启太多次掩护周暮樵进入乌沙镇了解日伪情况。

1944年，贵东、贵西根据地同日军占领区的伪军建立了各种联系。在贵西，日伪情报主任大多被新四军所掌握。新四军沿江团及游击队，可以经常出入日伪盘据的贵池城、殷汇镇购买新四军急需的枪支、子弹、药品、食盐等。如1944年，贵东根据地派钱振同志到日伪占领区贵池城购买枪支弹药。首先通过内线，在日伪那里搞到“良民证”，又同“白皮红心”的伪军建立了秘密关系。钱振同志利用自己“良民证”的特殊身份出入贵池城，购得枪支弹药后。立即出城，送往根据地。当时枪五千元一支，子弹伍元一粒。还有一次钱振同志进城执行贵东县委书记吴文瑞交办的任务，提取了一名伪军提供的情报，使鬼子偷袭新四军的计划落空。

（三）团结、教育，改造日伪基层政权工作人员为新四军服务

日伪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也是我党教育、团结、改造的对象，只要他们是赞成抗日，拥护共产党的，就要团结他们，把日伪政权改变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或“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有利于新四军开展游击斗争。

1943年贵东白沙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刘爱杰同志任乡长。但日伪任命的乡长章龙翔（是当地较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对新四军态度诚恳，年事又高）和下属五个保即外边曹、胡村章、毛竹园、赤岭潘洪、花庙郭的保长经民主政府教育既应付日伪，又为新生民主政权服务，是地道的两面政权。这些乡、保长成为新四军的眼线，大大方便了抗日工作。湖章村章中柱保长，主动为共产党、新四军

多办事，办好事。他按照白沙乡民主政府的要求，把本保各个伪甲长分别编成联防小组（当时群众叫地步哨）负责站岗放哨，通风报信，日伪一有动静，就提前向新四军报告。由于情报准确，根据地从未受过日伪的袭击。有的保长还积极为新四军筹粮，使新四军随到随有。对态度恶劣办事不力的保甲长，新四军先采取口头警告，不听则拘留悔过自新，不轻易处决。1944年，毛竹园伪保长对筹粮工作有意拖延，经教育仍无悔意，白沙乡民主政府报告了桐贵青游击队将其抓起来，经教育认错后予以释放，继续为新四军服务。

贵东开明士绅（地主）姜源达（曾是国民党员，担任过伪保长），为人正派，抗日热情高，在贵东建立童溪乡民主政权时，因他被贵东县委任命为民主政权童溪乡乡长。当贵东游击大队副队长王亚中、中队长管启明、指导员钱登伍登门将任命告诉姜源达时，姜感谢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信任，欣然受命。并于当天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场填了表），后经上述三人介绍正式加入了党组织。由于姜源达的努力，该乡党政工作都开展得比较好。历史往往不尽人意，1945年新四军北撤，姜源达考虑到自己身份已暴露，应当随军北撤。但根据当时的情况，组织安排姜源达留下来坚持斗争（当时党组织对外是保密的），姜服从组织安排，坚持在童溪乡开展活动。解放后姜源达因“历史问题”被关押坐牢，其子姜用和因其父牵连而于1958年亦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直到1964年因当年的老战友钱登伍到贵池办事，得知此事，反映给贵池县委。经核实，姜源达系受党派遣坚持对敌斗争的中共党员。贵池县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四）争取、瓦解顽军，壮大抗日队伍

贵东、贵西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区乡民主政权以后，发展迅速，顽军势力处于极端孤立之中。在“大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部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为壮大抗日力量，始终未放弃对顽军进行统战工作。

1942年，盘据在太朴山的国民党贵池县自卫队有100多人，自卫队队员主要是马衙、观前的本地人。这些队员抗战前大多数系贫苦农民，因国民党抓“壮丁”而参加了自卫队。在抗战中，目睹了日寇对其家乡的蹂躏，同时他们又被新四军沿江团在贵东抗击日伪军的斗争所感动。贵东党组织和沿江团的领导在分析上述情况后，便派人与贵池自卫队队长章开如面谈，在“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感召下，自卫队100多人起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东游击大队，章开如任贵东游击大队队长。章开如，枞阳县周潭乡山边章人，少时为屠夫，会武术，江湖客，民国间搞了几支枪，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曾经活动在贵池、青阳沿江一带。后被国民党收编，任桐城第五中队长。1942年冬，广西军感到桐东南一批地方武装不可靠，在一次“围剿”桐庐地区后，将章开如、江子龙、丁沛生等部队缴械。章开如带了十余人、枪来到了贵东，进入了国民党贵池自卫队。起义后被发展为贵东县委书记吴文瑞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

国民党贵池县自卫队起义，对顽军震动很大，从此，贵池观前、马衙、元四章一线的顽军不敢到贵东根据地附近骚扰。贵东县委为

了更好地团结争取顽军共同抗日，在太朴地区成立了敌前区委，专门派了一批干部去做发动群众和顽军的瓦解工作。

1944年贵西的灌口、八卦山一带驻守为国民党一四四师，该师全是四川人。该师不是国民党嫡系，装备比较差，加上背井离乡，士气低落，反共和抗日都很消极。为了团结这支国军一致抗日，沿江地委将桐贵青游击大队黄绍臣（四川人）调至贵西，以便进行政治瓦解这支国军的工作。1944年5月间，日伪军集中300多人，向八卦山国民党川军一四四师大举进攻，沿江团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出部队在中途阻击日伪军，使日伪军还未进到一四四师阵地，就溃不成军。解救了害怕被日伪军打击的国军。这支国军看到了新四军真心抗日的行动，尔后一四四师有30多名士兵带了武器投奔沿江团，壮大了抗日的队伍。

（五）惩办汉奸保证统一战线的顺利实现

新四军在贵池为开辟、巩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打击日伪军，团结、教育、改造日伪政权人员的同时，对那些顽固不化的汉奸坚决予以镇压。从而保证了统一战线的顺利实现。

嵩湖锄奸。嵩湖保（今建华村）东沿西汉、北临大同圩，是日军驻梅埂据点通往茅坦香山据点的交通咽喉。1942年冬，新四军派朱旭华、左坦到嵩湖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嵩湖临时支部。1943年，贵东游击大队在这一带活动，与百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开创了抗日新局面。但嵩湖保长许宗旦甘心当汉奸，把贵东游击大队王亚中的警告当耳边风。一次向驻守燕窝垄的日军密交了一份私通新四军

的群众名单。日军得到密报，一天拂晓，出动 30 多人先后包围了谢村许、孙家冲、五步沟等村庄，按名单挨户搜捕群众。谢村许有一农民叫许福源，因良民证上的姓名与共产党员许福源相同，当场被日军捆绑，在燕窝垄杀害。五步沟游击队精干班队员鲍大变被日军抓去后活活烧死。嵩湖群众纷纷要求河东区抗日民主政府除掉汉奸许宗旦。1944 年 9 月，贵东游击大队侦察班周班长带领 4 名战士发现许宗旦夜宿姘妇家，立即堵住前后门。周班长叫门，说贵东县委书记吴文瑞请许保长有要事商量。许披衣开门，借买烟想溜走。周班长说：什么不要带，马上就回来。押着许宗旦来到鸦雀港（现陆家冲冲口湖边）偏僻无人处，周班长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许宗旦勾结日寇的罪行，并判处许犯死刑立即处决。嵩湖百姓闻讯后，拍手称快。鼓舞了群众抗日斗争的信心。

三万圩除害。1944 年 3 月，中共贵西工委副书记许章法在三万圩一带开展工作，遇一余姓伪乡长，为争取这位伪乡长抗日，贵西工委决定致函余姓的伪乡长，对他晓以民族大义，为抗战做点工作。谁知他秉性反动，竟将贵西工委信件送给日军邀功。并吓唬乡民，不准接触新四军，如有违抗者，从严惩处。工委考虑这个乡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开辟这个地区，势在必行。而对争取伪乡长工作已做到仁至义尽，为此决定派出武工队除掉这个汉奸乡长。一天，武工队在其住居地段遇上了从城内回家的余乡长，立即发问：“是谁？”他大声答到：“我是余乡长”。武工队员将其捕获，就地枪决。并公示其简要罪状。此害一除，这个乡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各项

工作都有较大进展。

在锄奸保卫工作方面，贵西县委副书记许章法同志总结了两句话“不杀无威，乱杀无信”。如1943年新四军在铜陵涧北冲捕杀了一个安庆青帮坏头头张某，确实震慑了一方。但对大同圩董事王奚伯，采取了教育、争取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王奚伯是梅埂地方豪绅，有不少武装，驻梅埂，锁住了江南至江北的交通要道，1943年被新四军沿江团抓住，并在铜陵涧北冲与其面谈。要求他做到如下三点：一是我方人员和部队通过梅埂、五步沟一带，要保证安全。二是随时向新四军报告日伪情况。三是负责通知伪乡、保、甲长接受新四军领导，如有不听命令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撤换或镇压。上述三条，他同意接受，后经教育释放。

四、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制度

沿江地委和沿江中心县委在政权建设上，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一）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二）实行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容纳多方，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三）共产党在政府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政策的正确、党员的模范作用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四）在政权建设中，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党员必须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倾听他们的意见，遇事共同商量，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五）政权的施政方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

各抗日阶级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政策。在贵东、贵西根据地开辟中陆续建立了“三三制”政权。由于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一大批民主人士成为根据地基层民主政权的领导。

由于沿江中心县委重视政权工作，1944年10月，沿江行政办事处在贵池西部的凤口陈成立，张格任主任，马数鸣任副主任。到1945年9月贵池沿江根据地已建立起十一个区、五十五个乡政权。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过程中，争取了一批当地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例如，日伪晏塘维持会会长、士绅汪秀璋先生担任沿江办事处“协进会”会长；高脊岭区塾师王渐石任高脊岭区副区长，并出席了皖江区参议会会议；茅坦乡原日伪保长姜云汉任童溪乡民主政权乡长（后光荣加入共产党，1945年随军北上途中光荣牺牲）；蛟口区绅士吕亚东任堤委会主任。根据有关材料统计，在贵东、贵西约二百个乡、保长中间，有相当一部份假心于敌、真心于我的“白皮红心”乡、保长，为抗日做了有益的工作，支持了根据地不断发展。到1944年底，贵池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形成了对日伪包围之态势。

五、组织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敌后抗战，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抗日战争的主体，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发动群众并适当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也适当地保证

佃权。执行这个政策，虽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仍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这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贵桐县委书记马守一于1945年在三万圩农协大会上提出了：第一农民受些什么痛苦？第二农民为什么受苦？第三今后怎样办三个问题。号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家乡；彻底减租，增加生产；拥军拥政。强调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是党和民主政权群众工作的中心环节。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减租减息政策。

贵西地区沦陷后，地处贵西的三万圩公司的大股东虽逃往大后方，但仍旧通过公司继续索取租利。另一方面，逃往贵池南部山区的国民党县、区政府仍通过特务人员控制公司继续榨取租利。如逃到百里之外狼坑的国民党乡长陆士愕，还到三万圩公司要救国捐；逃到密岩贵池西北办事处的戴老五，竟霸占了乌头湖的鱼利。再一方面，三万圩公司还要应付日伪人员。不要说农民，就连小地主、小股东也得不到租利。中共沿江办事处和沿江中心县委了解上述情况后，召集当地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临时董事会。并改变了过去按股份分配权力的做法，实行不论大小股东，每人只有一票选举权。新董事会成员大都是贵西本地人，也是新四军民主政府能够争取的小地主。接着改组三万圩公司，派进步士绅汪秀璋出任公司经理。从而摆脱了大地主的控制，阻止了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三万圩的侵夺，为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万圩一带有大批江北移民，露宿野外，无地可耕。贵桐县委和晏塘区委了解这一情况后由农民协会名义出面，同三万圩公司董事会代表谈判，解决了租佃土地、借贷种子和生产工具等问题，开垦了属于三万圩公司的 800 亩芦苇湖田。上述做法，调动了三万圩农民的革命热情，三万圩成为民主政府的核心区。1944 年，沿江办事处成立后，贵西各区、乡民主政府普遍组织了农民协会，妇救会，调解委员会，还有儿童团，这些组织当时都很活跃。1945 年春，晏塘区委在凤口陈祠堂召开农会成立大会。会员们穿着新衣，敲锣打鼓，扛着彩旗，喜气洋洋进了会场。把一个陈家祠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会议选举了九房朱朱某任会长。高岭、晏塘区有 80% 的农民加入农会，这些基层农会曾于 1944 年领导贫苦农民减租减息，让租让息。农会建立巩固后，全面地开展了二五减租，方法是：以保为单位，成立评产委员会，小保设委员 3—7 人，大保 7—9 人。参加的成员是佃户占三分之二，开明绅士、地主占三分之一。在秋收时先进行一次评产。在评实产量的基础上进行二五减租，在评产中如发生争执，则由乡评议委员会解决。

民主政府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对逼其农民退还减租部分的不法地主，经教育不改者坚决镇压，如对洪铺区一恶霸地主即就地处决。青黄不接时，民主政府帮助借粮，改善和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心向共产党，热爱新四军，积极响应抗日救国运动号召，三万乡一次就动员三四十人参加沿江团八连。

农民协会为当好民主政府的得力帮手，还设立民事调解委员

会，请一些公正和有威望的士绅担任委员，如江心洲的鲍四先生，仙姑殿的纪大先生，三万圩的王景章，为调解群众之间纠纷，促进地方团结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妇救会成立后，号召妇女放足，送郎送子参军，做军鞋。由于当时党组织和党员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许多农民组织领导实际上是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如万宝圩农会主席程金水，桐店农会副主席贾宏开。

农民有了组织就有了力量，它不仅向地主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而且还在巡逻放哨、传递情报、扩充兵源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六、发展生产，围湖造田

“围筑合作圩”。由于梅埂、江口一带农民连年遭水灾，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正如民谣说：“麻布料，本姓方，前通湖，后通江，三粒大麦没有地方藏”。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完成中共沿江地委交给的税收任务，坚持抗战而又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中共桐贵青县委和河西区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距日伪统治区贵池城不过 20 华里的地方兴建“合作圩”。

从菊花嘴（现梅龙街道郭港村）到康家山（现属江口街道）二十多华里一段江堤称“合作圩”。1943 年前，菊花嘴到康家山，沿江二十多华里的七八十个大小冲口，仅有四个小圩，即保兴、复兴、中圩和合兴圩。圩埂单薄，十年九不收。1943 年新四军河西区委书记兼区长的朱旭华找到查村保长方日升，同他商量发动群众筑圩、

发展生产，并请他出面维持。方日升因害怕未能应允。事后不久，方日升接到新四军沿江团送来信函，请他到河西湖村，在河西，桐贵青县委书记吴文瑞接见了。吴文瑞书记诚恳要求方日升出面维持围圩事宜，方日升应允出面维持。7月，民主政府乡长左建候和方日升、吴占之等做了近一个月筑圩的路线测量工作。9月，朱旭华、左建候同志在汪冲堪（今属江口查村）召开筑圩会议。左建候同志作为新四军的代表参加合作圩办事处工作，地方上由方日升、吴占之出面联系。经过宣传、动员、发动后，民工纷纷上堤挑圩，最多一天达千人以上。新四军为了保证筑圩，针对日军在西边赵和观前的两个据点，设了瞭望哨，同时加强了对“黑头鬼子”的监视。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合作圩终于筑成。因圩是新四军和地方（指开明乡绅）在原四小圩的基础上加固的，所以取名“合作圩”。合作圩建成后，地主收租时必须执行二五减租。1944年和1945年，虽江水不小，但合作圩庄稼连续获得了好收成，增产粮食二百多万斤。改善了河西人民的生活，增强了河西人民抗日的信心。当时百姓有歌谣：“日寇是条狼，奸淫烧杀抢，有了共产党，爱国保家乡，悲惨变幸福，恩人共产党”。民主政府乡长左建候同志在建圩中为排除日寇扔下的手雷，不幸牺牲。

围筑万兴后湖圩。1945年，中共贵西蛟口区委书记兼区长周南到张家大屋住了三天，主要是发动民众（佃农）围筑万兴后湖圩。并在此召集了当地士绅崔田福、叶竹哉、吕亚东、胡国瑞、何月桥、张志宏、许少瑶及农民代表开会研究围筑万兴后湖圩事宜。由于深

受日伪压迫，同时又受水害的黄盆百姓更是急切盼望新四军、共产党解决他们多年来想修而没有修成的万兴后湖（今牛头山小河吕村）圩。所以当周南倡导筑圩时，众人一致同意。在中共蛟口区政府领导下，于1945年5月成立了万兴后湖圩修堤委员会，堤委员会主任由进步士绅吕亚东担任。新四军派了一个区委委员参加。还出台了围圩政策：（1）谁围、谁种、谁收入（当时规定一个劳动力挑到三十方土，能分到一亩田）。（2）东佃双方自由交涉，但要合理。动员蛟口区黄盆一带农民参加，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万兴后圩建成，开垦了五千亩田地。极大地改善了黄盆地区群众的生活，增强了民众抗日信心。

1944年，沿江行政办事处成立不久，为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成立了水利委员会，办事处主任张格任主任，士绅汪秀璋任副主任，在水利委员会领导下，动员民众将从殷汇到乌沙的堤埂增高三尺以上（分区段和危险区）。战胜了洪水灾害，使这一带农民获得了丰收。

七、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创建敌后文化商店。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和贵西县委不仅重视根据地党的建设、武装建设、统一战线建设，同样重视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44年4月，新四军沿江团和贵西游击大队在拔掉日伪据点后，建立了乌沙、晏塘、高脊岭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2月沿江行政办事处（政府）就委托思想开明的私塾先生章仲伯（章与贵西县委马守一、周暮樵同志交往甚密）在商业兴盛的晏塘镇开办了一家文化书店，书店设在纪姓一家临街的房子

内，聘任一名专职营业员。在中共贵西县委马守一、周暮樵同志直接倡导下，在有关进步人士的支持下，经营进步书刊，房子内三个橱架上摆满了十多种近八百册《苏联文艺》、《大江时报》、刊物及小学课本。书店里每天读者、购书者不断。课本大都无偿发到农村，供根据地农民扫盲用。书店采取灵活的营业方式，日伪来我就藏，日伪走我就开，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创办敌后晏塘乡三嵎小学。为了发展教育事业，使根据地的孩子有书可读。1944年7月抗日民主政府晏塘区区长周暮樵亲自将九房朱、燕窝朱、四房朱三所私塾合并成一所学校，取校名“晏塘乡三嵎小学”。周暮樵同志兼任校长，教师有朱绍普等三人，有学生四十多人。教师年薪三十担稻谷。课桌凳学生自带。周暮樵时常到校讲课（宣传抗日），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等抗日歌曲，学校办得生动活泼。

八、根据地严禁种植鸦片

征收特种税。日军在大通镇（今属铜陵市）盘踞，为了掠夺和毒害周围地区的人民，强迫大同圩群众种植鸦片。1944年春，全圩种植鸦片达200多亩。桐贵青县委为了揭露日军这一阴谋，县委书记吴文瑞同志教育惠中、惠许两保长钱尔璋和徐嗣和，向他们指出种植鸦片的严重危害性，要他们从国家民族的大处着眼，告诉群众不要种植鸦片。同时，宣传抗日民主政府要征收特种税。特种税税额极重，征收额达100万元储备票（折合大米二万斤）。其目的就是要达到窝禁于征。这样，不但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斗争，也使大同

圩人民群众在党的政策教育下，觉悟过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大同圩鸦片种植，几乎绝迹。

1944年至1945年，日伪在贵西收购鸦片，加工后再贩卖到烟馆。当时贵池、殷汇、乌沙都有日伪开的烟馆。为阻止鸦片种植，杜绝鸦片毒害人民，1944年刚刚成立的中共沿江行政办事处就发出布告，严禁种植鸦片，受到根据地人民的普遍赞誉。布告全文如下：上款沿江行政办事处布告：“照得鸦片一物，原自英印输入。为时已愈百年，殃民而且害国。国际早已禁止，妇孺都知其毒。只因民违官祀，始终不能绝迹。倭奴入寇以来，公然保障种植。粮产固属减低，毒风因此更炽。沿江新复河山，民主政权建立。救国同时救民，禁烟必先禁植。今后如种鸦片，实属罪大恶极。仰我同胞周知，毋再追求利欲。如有故抗本旨，决予严格惩处。”落款：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主任张格、副主任马数鸣。

九、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皖江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党政军人员也不断增加，所需军事经费和行政经费也日益增多。为解决根据地的经济问题，皖江区党委在1941年5月就成立了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货检处和税务局，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1943年春，皖中实现一元化领导，皖中财经会并入皖中行政公署，成立行署财政经济处。叶进明任处长。属区党委和行署双重领导。财政经济处下设粮食总局、货物管理总局。为加强对税收工作的管理，根据日伪据点和商人流通情况，下设6个税务处，处以下设分局和征税小组。一种是固定的，

另一种是流动的。不仅要征收货物进出口税，还要开展进出口货物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1943年12月底，中共沿江地委和沿江独立团机关、直属分队奉命进入贵池敌后，开辟和建立贵东、贵西游击根据地的同时，沿江货管局机关也随之进入贵池。

同年，为统一领导贵东地区的财税和后勤工作，在中共沿江地委领导下，成立了贵东货管分局。该局直属沿江货管局，同时也受桐贵青县委领导。朱振武任局长、夏坦成任副局长、阮万钧任会计，统一领导贵东地区的财税和后勤工作。贵东货管分局下辖茅坦、梅埂、江口三个货管所，每个所下辖2至3个货管小组，每组设组长、填票员、检查员三人，有的组设2人（组长兼填票员或检查员）。分局机关共有干部、战士35人。1944年底，贵东货管分局改为茅坦分局，分局只有朱振武、阮万钧两人。1945年3月，朱振武叛变投敌，上级指示阮万钧临时代理茅坦分局局长。

贵东货管分局坚决执行皖江根据地制定的税收政策。①对遵守税法，照章纳税的商贩采取保护的政策。只要交纳一次税，发给纳税票证，就可以在新四军活动的游击区通行无阻。对偷税漏税的奸商，一经查获，除批评教育按章补税外，还要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处理。②征税标准。当时贵东主要税源是征收过境税，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纸张、布匹、日用品等），一般征收3%至5%。奢侈品一般征收10%至15%。③征税方法。武装征税。由于当时经常发现敌情，货管局人员多数携带武器向过境的商贩征税。贵东货管分局下设货管所，一般以组为单位开展工作。大多采取固定和流动征税

形式。④制度建设。为保证税款安全上缴，防止浪费和贪污，建立“现金管理制度”、“会议制度”、“供给制度”。由于制度完善，税收人员努力，贵东的梅埂、贵西的三万圩成为皖南山区很多商人的商品过境必选之地。贵东货管分局使贵东抗日根据地要人有人（动员群众参军、动员民工支前）、要钱有钱（税务机关保证了财源）。据1944年统计，贵东地区全年税收约1200万—1500万元，彻底改变了过去党政军人员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打资敌”的收入维持，供给无保障的状况。贵东货管分局税收不仅保障了贵东地区党、政、军人员的供给，而且还有余额上交金库，支援其它兄弟部队。

在成立贵东货管分局的同时，还在贵东成立桐东贵东财经督导处。1944年冬沿江行政办事处成立后，桐东贵东财经督导处奉令改为桐东贵东行财督导处，主任赵平，副主任魏放（兼桐贵青县委行政委员会书记）。成员有姜礞溪、包明曙。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各区乡、各分局和贷管所征粮完税，收买枪支弹药。公粮征收标准为每亩8斤，1944年贵东地区约征粮50万斤，贵西地区征粮70万斤。当年10月一个月的税收就达200万元（旧币），保证了我党政军人员吃穿用，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节 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

本政府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在华日军 128 万人向中国投降。贵池及皖南境内的日本侵略军全部被缴械。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贵池大地到处张灯结彩，爆竹喧天。国民党贵池县政府在棠溪举行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新四军沿江团在驻地（马衙横排赵）举行了庆祝会，各区乡相继召开庆祝大会。

1945 年 8 月底，日军驻安庆旅团司令石田，拒绝向安庆周围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投降。经过新四军的严正交涉，也被迫派出代表到贵池马衙和新四军沿江团及游击队代表谈判，无条件的交出武器，释放新四军、游击队和干部群众。

在抗日烽火中，贵池党组织领导人民坚持斗争，党的力量由小到大，人民武装由弱到强，贵池敌占区发展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五年多的英勇斗争，贵池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贵池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人员奉命北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两手。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的准备。为了使重庆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中国共产党作了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其中让出包括皖南在内的 8 个解放区，并将上述地区的人民军队分别撤至长江以北或陇海铁路以北地区。1945 年 9 月 19 日，中

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加紧篡夺抗战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形势，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成立华东局。原华中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统一为一个解放区，成立华中分局。同时对华中新四军各部队作了重新部署，要求皖南、苏南主力立即撤往江北。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指示皖南及苏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和党政机关全部撤退。华中局接到中央电报后，就北撤工作作了部署。九月中旬后，根据皖江区党委和皖南地委的指示精神，贵东、贵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沿江中心县委、沿江办事处、财经处、沿江独立团和贵桐县委、贵桐大队全体有组织、有计划分别从晏塘河坝、乌沙、梅埂、乌龟墩沿江渡口乘船告别了贵东、贵西根据地的父老兄弟，先撤至无为新四军七师根据地。

第 四 编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1945. 8—1949. 9)

第十章 新四军回师皖南和创建贵池游击根据地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贵池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转变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面临着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恢复战前那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样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消弭内战，迫切需要和平与安定，以便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彻底摆脱以往苦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忠实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在七大上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并为战后的和平建设，成立联合政府，力避内战而积极努力。但是，长期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蒋介石集团，依仗美国的援助和在抗战中保存下来的 400 多万军队，以及收缴的 100 多万日军武装，加上接收和掠夺沦陷区的大量资财，加紧准备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继续实行独裁统治，把中国人民重新推入黑暗的深渊。由于解放区力量的壮大和国际国内强烈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舆论，蒋介石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困难。因此，蒋介石集

团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装出和平的姿态，表示同意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为揭露蒋介石反动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为争取和平途径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毛泽东主席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亲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了长达 43 天的谈判，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为争取国共谈判成功，避免内战发生，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南方一些国民党势在必争的解放区，将南方八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撤到陇海路以北，即苏北、皖北解放区。9 月 20 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部署北撤，要求在撤退前布置好以后的工作，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武装。从 9 月 28 至 10 月 3 日，驻皖南、皖中的新四军七师、皖江军区部队和中共皖江区委、皖江行署等地方党政干部奉命撤退到苏北淮阴地区。

一、国民党军政当局在贵池争夺日伪财产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国民党迫不及待地多方调兵遣将，布置在日军占领区接收事宜。国民党军政人员受命接收日伪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为全国内战作准备。

早在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机关、沿江团所属部队以及桐贵青县委、贵桐县委领导下的各级党政军人员北撤之前，对抗战一直存在观望态度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品仙部，就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新四军敌后抗日军民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成果。1945 年 8 月 17 日，退缩在青阳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开始向贵东抗日根据地步步逼近。同时，国民党第六十二师政治部派人前往大通、贵池县城等地与日军秘密接洽，抢在新四军沿江团之前，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贵池县政府和安徽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分别从贵池的棠溪柯和石台县的乌石陇迁回池阳镇原专、县旧址（专署在今人武部、县政府在今水电局宿舍），国民党四十四军军部也相继进驻贵池。

国民党进城以后，根本不管贵池民众因日军侵略所造成的极其贫苦的生活，不遗余力的忙于对日伪资财的接收。最后变接受为劫收。并按权利大小、财物多少，进行瓜分。国民党四十四军将日军经济部和日军洋行所属大批财物独吞。国民党贵池县政府曾于1945年9月24日发布《训令》：“命俞根石（县府秘书）接收伪县政府及保甲委员会。汪松培（指导员）接收公管会及税收机关。高雄鹤（池阳镇长）接收伪区署、镇公所、杏花村公所。董道源（指导员）接收民教馆、镇中心小学及合作社。田传书（马衙乡长）接收乌沙小学。柯軼群（殷汇镇镇长）接收殷家汇小学。包爻吉（观前乡长）接收观前小学。保安队及警察局、各乡警察所应如何接收，俟军事接收之官员到县再作决定”。“如有其它伪组织及公物公产等项，由县长临时派员接收”。在接收贵池过程中，由于分赃不均，各方矛盾突出，国民党四十四军凭借武力接收，地方官员敢怒不敢言。

二、国民党加强贵池的统治

新四军沿江中心县委、沿江团，桐贵县委绝大多数党政军人员北撤后，国民党调遣重兵进驻贵池及沿江一带。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四十四军军部进驻贵池，军长王济浚叫嚷“三个月消灭共军”。同时进驻贵池的还有五十五军、九十六军、二十军十三旅共

三千多人。这些军队向人民大打出手，对没有北撤的新四军战士及为之工作过的群众疯狂反扑，实行“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走一人”的法西斯暴行。

国民党为加强在贵池的统治，积极组建地方武装。安徽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贵池县政府迁回池阳镇的同时，将公署保安团、县自卫队（后扩充为一个团）、警察大队、收编的汪伪汉奸部队，改编为国民党贵池县第二大队，同时成立了“第八区保安司令部清剿指挥部”。地方部队的整合和扩充，强化了国民党镇压人民的力量。

建立反共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国民党党政军机关返回贵池后，在贵池县进行掠夺性接收的同时，加强法西斯专政，制造白色恐怖。为加紧反共活动，镇压人民群众，首先恢复和建立了乡、保政权和反动武装。贵池全县先后建立了 29（后为 31 个）个乡（镇）公所，283 个保，2765 个甲。每个乡（镇）公所都有自卫队、乡警队，一般约有 20 至 30 支步枪，2 至 3 挺机枪，下属保公所也拥有步枪、手榴弹等武器。

1947 年 7 月以后，国民党不断加强国统区的统治，进行防共、反共、铲共，各类反共组织多如牛毛，诸如“动员戡乱建国委员会”、“党政军特种汇报委员会（队）”、“反共行动委员会”、“绥靖团”、“铲共团”、“同盟反共社”、“中国青年反共团贵池分团部”、“肃奸组”、“锄奸组”等，共达十余种之多。中统、军统人员遍布全县各地方、各阶层、各部门。全县均在中统、军统严密监视之中。

强奸民意，大搞“肃反”、“策变”。国民党为进行“清剿”巩固其统治，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特务组织。贵池县党部建有“肃反调查室”，内设肃反专员，由叛徒张少寅担任。全县各区建立“肃反辅导组”，各乡（镇）建立了中心组，各保还建立了保训组。肃反组织遍布城乡。这些组织成立后，即大搞“肃反”、“策变”等活动。他们一面抓人、杀人，严刑逼供；一面在各乡挂出“自首办公室”牌子，对参加过新四军以及为之工作过的人逐个进行登记造册，拍摄照片，威逼他们写自首书，强行送到县城受训三个月，进行政治说教，即所谓“洗脑”。先后胁迫一千多人办了自首。

大造反共舆论，欺骗人民。国民党为了欺骗人民，大造反共舆论，毒化人民。贵池先后办了十三种反动报刊杂志。如国民党第八专署办的《新民日报》，1949年2月刊发所谓《共匪杀人，残忍四法》的报道；编造所谓“窜扰大龙山残匪，向丁香溃逃”、“《股匪今晨窜扰高坦，我军兜剿后立即溃败》”的假新闻，混淆视听，欺骗民众。

三、贵池国统区人民的灾难

战后的贵池，已是田地荒芜，百业凋零，经济萧条。然而，国民党不但无视八年抗战的经济创伤，而且拼命进行反共“清剿”，发动全面内战，以至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不聊生。

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据资料记载，贵池1946—1947年度财政预算总收入为360万元，按当时全县235855人计算，平均每人仅15元。而总支出中军事经费就占12%，下一年度增至25%。

迫于内战的需要，国民党当局便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增加税收，搜刮民财。如农民除了繁重的田赋，还有什么户口捐、水利捐、屠宰税、保甲费、壮丁费；地主组织反动武装还要农民出保卫费、枪支费等等；工商界除了营业税、行商税，进城后还要交招牌税、货物税、出口税、进口税、管街费、商会费等等。更为奇特的是各家各户还要额外摊派一种“费子”，根据家庭情况论“点子”（每“点子”折合人民币约2元多）月月收，最穷的，即使是要饭的，也要摊上二“点”，拿不出钱的就用粮食、芝麻、菜籽或家俱等实物抵交。例如1946年7、8两个月，池阳镇开支的办公费1272.54元，米贴50担零28升，均按等级摊派。此时池阳镇人口仅9948人，而政府官员、军宪警察、豪绅巨贾、保甲长、乡保丁等户，皆不承担，全部落在贫民身上，负担可谓重矣！县学门外贫民刘亚从，在苛捐压榨下，家贫如洗，被迫在南门外二道桥旁捞菱角菜充饥，不幸溺水而死，遗下妻儿，惨不忍睹；南门外贫民王仁和等十户茅棚，被大火付之一炬，老幼数十人，流离失所。警察每天查旅社栈房，也要向来往旅客勒取“灯油费”。至于粮差、警卒，狱吏之辈，则趁“催钱粮”、“送传票”、“探监”之机，索要“草鞋钱”、“烟茶费”、“见面礼”等等。更有甚者，城内手工业者、搬运工人、船工、客栈、酒馆、茶房等劳动者，还要深受帮会的压迫剥削之苦。这些帮会在抗战前为肖老四掌握，胜利后又为青帮头子张佩峰把持。他们胁迫各行各业人员不仅“拜先生”、“开山门”，还必须按时向“先生”、“小老大”等人侍奉“孝敬”钱，否则难以立足。搬运公司董

事长、把头朱少白，人称“地头蛇”，对外地来贵池谋生的挑夫车夫也不放过，加倍克扣力资，稍有违抗，一阵拳打脚踢，轻则伤人，重则丧命。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骇人听闻。1945年9月底，城内中等粳米每市担法币855元，至1946年9月，增至43330元，上涨51倍，到了1947年12月，猛增至13万元，两年上涨153倍。尤其是1948年“八·一九”大限价之后，物价更是扶摇直上，每上涨一次都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计算。一天时间本来早上1.5万元就能购买的货物到当晚就需3万多元方可购得到。是年8月，当局发行金元券，每二元折合银元一元，按一比三百万比值，强行回收法币。到1949年解放前夕，金元券三亿元只兑换银元一元，8个月贬值竟达一亿五千万倍。

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之下，小本经营者纷纷停业关门，受害至深者尤为贫民，而一些官僚买办则乘机发财、垄断市场。当时，贵池的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内，规模较大的有棉布店、麻行和五洋商店三家，国民党的一些地方要员均有股份。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章难生即在棉布店投资二股，在练剑开设油榨坊一所，年终均按股分利。合资经营的五洋商店，国民党县参议员韩天池就占了一半股份。麻行为国民党县参议员方学汉（其父系贵池一大绅士）独资经营，同时兼营布店，出租住房、田地等，每年租金高达亿元，租稻两千余担。由此可见其它店铺资本之一斑。

反攻倒算，民不聊生。土豪劣绅依仗权势进行反攻倒算，如长

晏乡洪湖保的纪树怀勾结乡长陈直庭，要百姓退还抗战时上缴给民主政府的公粮，弄得一些农民彻底破产。一些土劣加重剥削，强迫农民退回二五减租时的租谷。其实当时地租已普遍加至五成，佃农除了牛犁种子，所剩无几，多数农民是“镰刀挂上墙，家中断了粮”，又不得不向地主借贷，借贷利息大都加五加六。地租加高利贷，农民饥寒交迫，痛苦不堪。

国民党的军、特人员和地方官僚政客相互勾结，大肆蹂躏人民。例如 1945 年底，国民党贵池第二大队抢占长晏三万圩一带后，与地方职员串通一气，以捉共产党、新四军为名，大抓老百姓，仅三、四天时间就抓了四十余人。这些被抓群众，不是被勒索钱财，就是遭受严刑拷打。1946 年 6 月，驻军大增，食米不济。县政府书面向在城内大小米行借了三万斤大米之后，数月不还，弄得商民怨声载道。乌沙等沿江一带的国民党驻军，干脆就地要粮要柴，索猪索鸡，不顾百姓死活，硬性摊派。为筑碉堡，将乌沙乡、牌楼镇一带树木砍伐殆尽。为赶修工事，民工稍有怠慢，便拳打脚踢。1947 年底至 1948 年初，五十五军军长曹福元率部驻防以后，强住民房，霸占民女，使沿江一带鸡犬不宁，百姓深受其害。

1947 年，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开始，国民党到处损兵折将，为补充兵源，强迫百姓当兵。当时名曰：“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要是当上壮丁，大多有去无回。为逃避壮丁，许多穷人不得不变卖家产，致使许多穷人倾家荡产。牌楼佳山村至今尚有 7、8 人杳无音讯。抓夫子，服劳役更是家常便饭。

四、贵池国统区的民主浪潮

国民党在贵池卷土重来，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激起了贵池人民的愤怒，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浪潮。

抢米风潮。1947年青黄不接之际，米价暴涨，“法币”贬值，米商非银元莫祟。家住城内大井头的戴曾铸（诨名戴老五，原任国民党贵池县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黄湓圩务主任），囤积很多大米，乘机高价出售，而且要清一色的“大头”（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5月某日上午，五十多名穷苦百姓照例到戴家店前排队，等候祟米。稍顷，大门打开，戴老五“太太”板着面孔，声称有“大头”就卖，纸币一概不收。顿时人群骚动，被激怒的小鱼贩子陈兆尤（绰号陈大和尚）冲进大门，振臂一呼：“穷人饿肚子，戴老五有米不卖，我们抢！”话音一落，人们一拥而上，把其店里粮食一抢而空。附近贫苦百姓，闻讯赶来，纷纷加入了抢米行列。接着，又抢了大井头黄记砻坊、牌坊街姚记砻坊、陈记砻坊，一直延续到下午三、四点钟，国民党县政府派军警赶到，驱赶百姓，事态才得到平息。

怒斥国民党中统特务。1947年某日夜晚，国立八中两名学生从南湖划船游湖后返校，路经九华街中统肃反专员肖庸才门前时，打电筒照了一下肖家窗户。肖庸才大耍淫威，大骂学生“瞎了眼”，“你知道老子是什么人！”该两生憋了一肚子气。翌日有三四十名学生赶到肖家门口，指名道姓要肖庸才出面答话。并高声斥责“我们知道你肖庸才的后台老板是张佩峰（中统特务），你是他的干儿子。我们不怕，今天来就是要和你们碰碰！”肖庸才吓得胆颤心惊，从

后门鼠窜而逃。迫使其老母和家人赔礼讨饶，口称“下次不敢”。

学生临行前，还严厉警告张肖之流，今后不许欺压老百姓。

青年学生围堵第八专员公署。1947年10月，第八区专署在贵池举办秋季运动会，有贵、至、东、青、石、太六个县的学生代表队参加比赛。运动会在原东门大操场举行，搭了司令台。入夜有四盏汽灯照明。由于万米决赛评奖不公，引起学生群起抗议。几百学生拥向专署大院（现人武部所在地），要当面质询专员程中一，直吓得程中一跳窗越墙，溜之大吉。学潮一直延续到深夜，学生打掉汽灯，砸烂司令台。国民党当局连夜出动军警，在专署大门口架起了机枪，企图镇压学生运动。事后，第八专署于是月二十八日召开整顿学风会议，通过所谓“严禁学生擅自集会酝酿学潮”的决议案。

砸顺成杂货粮行。顺成杂货粮行坐落在城内郭西街，是1945年下半年由吴戴荣等三家从峡川柯返贵池后，合股开办的。1947年12月，粮食奇贵，该行乘机大斗买进，小斗卖出，老百姓怨声载道。国立八中学生闻讯后，某日清晨聚集了四五十学生，把该行的货架、玻璃柜台全部推倒，砸烂了大秤小斗，老板伙计逃避不迭。约一个多小时后，经疏通才由八中一名教师把学生带走。事后，县商会会长方藻清出面赔礼道歉，责成吴戴荣写悔过书在街上张贴。经过调解，停业几天后，方允许营业。这次学运，打击了奸商盘剥老百姓的非法行为，群众拍手称快。

驱逐贪赃枉法的国民党乡长。1947年7、8月间，贵池县长晏乡暑假回乡学生姚鼎勋、孙学本等十多人，在了解到该乡乡长汪乃澄

贪赃枉法、横行乡里、强占民女、捆吊乡民，并利用抽壮丁之机，乱抓乱捕群众，进行敲诈勒索等罪恶后，感到非常气愤。他们于是联合起来，展开了驱汪斗争。于某日上午九时许，以回乡学生举行联欢茶话会为名，派代表将汪乃澄诱到晏塘桥何家大屋（茶馆）作“指导”，当即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学生列举汪乃澄十多条罪证，闻讯赶来的数百名群众将何家大屋围得水泄不通，部分受害者更历数汪乃澄罪状，汪吓得浑身发抖，直打哆嗦。汪虽百般抵赖，但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逐条签字。随后被赶出了晏塘乡。当时的《池阳报》惊叹：“异党分子组织煽动数百名歹徒暴动，捣毁长晏乡政府，绑架乡长。”

青年学生投奔革命。贵池各地人民采取不同的形式，同国民党贵池当局作斗争，有的青年组织进步团体，还主张革新。1948年秋，国立八中学生唐生泉、钱树武等发起成立了有五十余人参加的驻驾乡学术研究社，提倡教育改革，创办学校，反对劣绅横行乡里霸占私塾，曾一度取得该乡进步塾师的支持。1947年秋，八中因教育经费聚减，不少靠助学金读书的外地学生无以为济。一天早晨，校内出现一条标语：“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此后，有的学生不辞而别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贵池农民反抗斗争越演越烈。1946年6月贵池大农圩1000多垦民联名发出呼吁书，抗议国民党县参议会剥夺其万余亩垦地耕种权。指出县参议会此举是“谋夺垦农之血汗所得，以为豪绅之私产”。1948年端阳节，乌沙区烟墩乡警强抓农民夏正发、夏云桥兄弟俩当壮

丁。行至前夏村时，被一群愤怒的百姓围住，人们一面与乡警说理，一边按住其枪，终使夏正发兄弟二人乘机逃脱。乡警怕激起众怒，不敢轻举妄动。总之，国统区的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生存权利与国民党当局开展各种各样的斗争。

人民群众反抗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敌后游击活动区域，表现得更为普遍与彻底。1946年，汪河、杉山、肖坑一带已成为敌后游击活动区域，富有光荣传统的山区人民除了掩护新四军开展游击活动外，还自动组织起来，参军参战，配合新四军同国民党军队及土豪劣绅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1947年4、5月间，汪河地区就有40余人参加共产党组建的民兵中队；徐村柯、金坑一带则有80余人组成了民兵大队，并先后有100余人参加了游击队。同时，汪河一带还建立了若干妇女小组，为部队做鞋、缝衣服等。有些群众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还开展了同地主富农进行拖欠租税、借粮借债的斗争。虽然国民党对这一地区进行数次的残酷“清剿”、血腥屠杀，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直到解放前夕，游击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

第二节 新四军回师皖南及创建贵池游击根据地

一、新四军回师皖南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后，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9日和10月28日作出指示，命令山东部队主力及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

动，华东新四军主力由南向北转移，以集中力量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期间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北撤部队中少部分返回了皖南。

（一）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返回皖南

1945年9月下旬，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及其县、区、乡党政机关干部、贵东、贵西武装组织和铜青南县委及所属党政军、区、乡干部、游击队北撤。为了继续坚持沿江地区斗争，皖南地委决定在铜（陵）青（阳）南（陵）地区留下张士良、尹彬、姚生、朱荣生、张亚东率领约40人的武装，在铜（陵）繁（昌）芜（湖）地区留下王文石、王安葆率领的约40人的武装分别以铜陵和繁昌为依托，继续坚持斗争。同年10月上旬留在皖南、沿江的两支部队，很快同北撤南返的部队汇合，开创了皖南地区的新局面。

1945年10月初，皖南支队在白茆州接到新四军七师和皖江区党委的指示，要皖南支队派出部队立即返回皖南，坚持斗争。皖南支队黄耀南政委决定抽调三团的团部警卫连、二团七连、三团七连，共297人，由三团政委杨明、营长查富德、教导员钱秋育、组织股长周坚凯、宣传股长马文杰等干部率领重返皖南。南返部队于10月4日乘船南渡，当晚在铜繁交界的十里场登岸。次日在石佛山（现属铜陵钟仓乡）与朱荣生、姚生率领的留在铜陵坚持斗争的武装人员会合。10月6日到达顺安城山冲。

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率领的干部大队北侧到巢湖散兵镇时，接到皖江区党委的电报：鉴于我军撤离皖南之后，国

民党反动派正加紧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地方得力干部率领返回皖南，坚持斗争。并告之杨明等人已返铜陵。张恺帆同志接电报后立即派朱农、陈爱曦、陈尚和等 10 多人从巢湖的散兵镇经无为的江心洲到铜陵圩埂头，很快赶到城山冲与杨明同志汇合。这时，返回皖南和北撤时留下的铜繁武装和干部，共 400 余人。派出一部分兵力回师皖南，坚持皖南地区的斗争，这是上级党组织根据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中共皖南山区中心县委坚持皖南斗争

为了坚持皖南的斗争，早在 1940 年“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作出皖南新四军北移决定的同时，要求皖南特委转变斗争方式，重新组织了秘密的皖南特委，黄耀南为书记，胡明为特委委员兼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转入地下坚持斗争。这为后来在皖南事变后，皖南革命星火迅速蔓延，武装斗争迅速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指示：皖南秘密特委必须发动游击战争，坚决以武装斗争回击敌人。坚持于黄山地区的秘密特委由秘密转向公开，对日伪和国民党顽军开展武装斗争。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泾、旌、太中心县委改为中共皖南山区中心县委，书记胡明。下辖三个县委：以洪林同志为书记的泾县县委；以刘贵生同志为书记的太平县委；胡明同志兼任书记的旌德县委。中心县委驻地位于旌德和绩溪交界的黄高山（属黄山山脉）山区的王家庄。同时成立了皖南中心县委游击队，又称黄山游

击队。队长刘奎、指导员李健春。接着由泾县洪林、尹德光等同志组成了第二支游击队，由太平县刘贵生等同志组成了第三支游击队。“皖南事变”躲过国民党军队搜捕的唐辉同志也来到了王家庄开展游击活动。他们在新四军七师、皖江区党委和皖南特委领导下，执行“长期坚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各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努力，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创建了以黄山为中心，横跨皖、浙、赣十几个县的皖南游击根据地。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时，皖江区党委曾希圣同志指示：“皖江新四军北撤，留胡明所率游击队继续在皖南坚持斗争”。

（三）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成立

1945年10月9日，杨明、朱农、陈爱曦诸同志在城山冲汇合。根据中共华中分局指示，决定由杨明、王文石、朱农、陈爱曦组成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杨明任书记、王文石任副书记、朱农任组织部长、陈爱曦任宣传部长，领导皖南铜（陵）、南（陵）、青（阳）、繁（昌）、芜（湖）等沿江数县的政治军事斗争。10月10日在铜陵顺安城山脚下的雁门肖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杨明、王文石、朱农、陈爱曦、陈尚和、查富德、钱秋育、周坚凯、马文杰、查彬等近2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杨明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正式宣布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成立及组织人员分工；综合情况，分析形势；讨论和决定坚持沿江斗争的方针、任务和行动部署。

会议认为皖南沿江一带，由于新四军主力北撤，国民党军队忙于抢占大中城市，一个月内可能平静。一旦待他们接收完毕，了解

新四军南返情况，就会向新四军根据地扑来。因此，会议提出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为：坚持隐蔽斗争，加紧积蓄力量，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迅速与胡明同志取得联系，背靠山区，面向平原发展。为贯彻这一方针，会议决定：第一，在集中领导，分散坚持的原则下，将沿江地区分为3个县级单位，一是铜青南县委，由朱农、陈尚和、陶刚、尹彬组成，朱农兼书记；二是南繁芜县委，由王文石、马文杰、王安葆等组成，王文石兼书记；三是泾青南地区，由陈爱曦率领警卫武装开辟泾县和青铜交界的宾山、后岸等地，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打通与胡明部的联系。第二，部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形式，分兵发动群众，迷惑敌人，发展自己。第三，征粮征税，筹集物资，建立隐蔽根据地，以防局势变化。会上还着重介绍了胡明坚持山区斗争5年多的生动事迹和经验，极大鼓舞了大家的斗争信心。

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是皖南沿江地区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统一了皖南沿江地区党政军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了沿江地区党的领导，统一了沿江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指挥，为坚持皖南沿江地区的斗争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对领导和团结皖南沿江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皖南人民自卫军的建立与整编

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后，为便于开展对国民党的斗争，整编所有留在沿江地区的部队，部队番号定为“皖南人民自卫军”，

设总队部，查富德为总队长、钱秋育为政治处主任、杨明兼政委。为了便于部队统一指挥，灵活机动的坚持分散斗争，将部队编区分队，每区队约五、六十人，编有第一、三、五、七、九、十一6个区队。经过整编、学习和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除抓紧重建和调整区、乡党的组织及政权机构外，还抓紧进行为挺进山区坚持斗争的物质准备。正当筹集经费，补充和改善装备等工作即将准备就绪之际，国民党正规军就向皖南沿江各县扑来，妄图形成一个包围圈，将刚刚返回皖南的人民武装一举歼灭。

1945年1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及人民自卫军总队部率领主力区队乘国民党军队尚未完成包围态势之前，巧妙地从小股国民党军队空隙中撤离了沿江地区，向山高林密的黄山地区挺进。在主力部队转移时，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根据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的方针，决定派区队长左秀东、副区队长柯斌、指导员吴志英及所率的三区队50余名指战员留在中共铜青南县委活动区域，坚持铜青南地区的游击斗争。正是这支区队，较早地进入贵池棠溪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创造了贵池南部山区的游击根据地。

1946年1月1日，杨明率沿江中心县委主力部队与皖南山区中心县委书记胡明部在樵山会师。2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指示，将沿江和山区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皖南地委，胡明同志为书记、杨明、刘奎、唐辉、洪琪为委员。沿江部队取消了人民自卫军的番

号，改为新四军沿江总队。不久，在苏南地区坚持斗争的熊兆仁、倪南山等同志到达樵山，和江南部队胜利会师，至此武装部队达到了约八百人，极大地鼓舞了皖南人民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为开创江南游击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斗。

二、在困境中创建贵池游击根据地

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一六二师和第八保安团及青、石、贵等县保安队武装，向沿江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清剿”。为此，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决定，将沿江地区划为两个县级单位，铜青南县委和南繁芜县委。中共铜青南县委在青阳宾山就地坚持，负责包括贵池在内的沿江一带的开辟工作。从1946年初开始，党组织和武装部队分两路逐步进入青贵地区，进行开辟根据地的活动。一路是铜青南县委先后派左秀东、柯斌、孙举东（又名胡克南）等率部队进入青阳、九华山一带和贵池汪河、滴水岩等南部山区，另一路是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的沿江总队，根据皖南地委决定的隐蔽坚持，相机发展的方针，派沿江总队政治部主任钱秋育率部分武装部队秘密进入贵石边区的贵池杉山、龙须坑、肖坑等地。

（一）中共青贵区委及汪河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中共铜青南县委。1945年底，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根据当时情况，铜青南县委决定由孙举东率领游击队到青、石、贵三县交界地区开展活动。孙举东为了解青贵边地区情况，第一次仅带一名随行人员，由青阳地下党张某作响导，侦察了九华山、庙前、

黄石溪和贵池境内的汪河、姜村、小麦岭、徐村柯、金坑等地情况。为后续开辟这个地区打下了基础。1946年初，铜青南县委一方面隐蔽坚持青阳宾山、茗山，秘密进行游击战争，另一方面积极准备，着手开辟青贵边区。再次派苏家冲的蒋某（贵池人）去青贵交界的刘街、庙前侦察情况。3月，县委又派大队副左秀东带游击队去贵池地区了解情况。4月就派遣了柯斌、邢排长带游击队到汪河、小麦岭开辟游击根据地。游击队由盘台山出发，夜里赶到西峰岭，住在较隐蔽的山村人家，第二天部队顺利到达汪河村，立即封锁消息。汪河地处青贵交界，山连峰叠，比较偏僻，村子不大，群众不多，生活困难，群众基础比较好，国民党军队一般不到这里来，是理想的游击根据地。部队到达后，就在这里搭起山棚安营扎寨。并决定以汪河一带为基点，不断地向其周边地区活动，开展青贵边的工作，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游击队安营后，很快熟悉了情况并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站住了脚跟。

中共青贵区委的成立和汪河游击根据地的开辟。1946年4月间，铜青南县委在大格里苏家冲召开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将铜青南县委改为铜贵青工委并调整组成人员。工委由朱农、孙举东、王克祥、孙林等四同志组成，朱农同志为书记。会上同时成立青贵区委会，由孙举东、曹汉清、柯斌、查春四同志组成，孙举东任书记。青贵区委成立后，配备了一个班的武装。5月，孙举东率一个游击分队12人，携7枝步枪，1支手枪，开赴青贵地区与柯斌领导的游击队汇合。在开辟游击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首先动员部队访贫问

苦，扎根串联，接着开展统战工作。在扎根串联中，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吸收了张继文、杨文斗、汪启立等 7、8 人入党，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在开展统战工作中，充分利用国民党基层政权为新四军所用。当群众发动起来后，罗城乡国民党乡长姜某私下找到青贵区游击队查春说：罗城乡 11 个保，除姜村（乡长所在保）外，其余十保，游击队可任意活动。游击队乘机扩大影响，镇压恶霸地主，打击反动保长，使该地区一些苛捐杂税就无形的取消了，这样一来，当地的贫苦山民无不乐意接近新四军。民兵队伍也组建起来了，游击队发展到 6、70 人。此后，青贵区委领导一支 30 人的游击队武装活动在贵池罗城一带的龙池山区，开辟了以汪河为中心的一小块游击区域，并建立起新合、罗城、晚口、长垄 4 个乡政权及民兵组织等。由于汪河地区距第八行政公署驻地贵池县城仅 20 公里，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安庆省政府国民党保安团和贵池的一些土顽联合起来，立即到小麦岭一带“清剿”。国民党军队进驻汪河村祠堂，游击队和地方党政干部撤到汪河对面的竹山上隐蔽起来。国民党军队贴出布告，悬赏几百万元收买孙举东、查春人头。并对山上的游击队实行封锁，妄想一举扑灭刚刚兴起的革命烈火。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许多群众装扮成砍柴人，冒着生命危险，给新四军送粮食、送情报，在群众的掩护下，游击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同孙举东、曹汉清的主力会合，一同转战九华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汪河游击根据地的“清剿”。

1946 年 7、8 月间，铜贵青工委书记朱农为扩大汪河地区的游

击根据地，带领连长姚生等 32 人来到汪河，与孙举东、柯斌一起分析情况，研究群众工作，统战工作，讨论下一步如何坚持原有地区，积极开辟新区的计划。确定了向青贵边界齐村柯发展的方针。为了加强青贵边工作，铜贵青工委再派王克祥、胡爱民、张贵将原来的青阳南关、黄石溪一带的部队，转向贵池的石门高、滴水岩一带活动。先在滴水岩建起了山棚，而后积极向石门高开展工作。石门高南可进青阳的南阳湾，西可进滴水岩，北可达青贵边汪村，东可出齐村柯。而齐村柯和石门高中间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可以开辟中心游击根据地。如是，铜贵青工委决定从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入手，打开局面。朱农书记亲自对石门高在国民党省政府任职的几个人进行宣传教育，并取得一定成效。通过扎实的宣传工作，石门高当地士绅不仅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还在物质上支持新四军游击队。并送给朱农一支手枪，以示同共产党游击队友好。由于新四军游击队同石门高各阶层人民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良好的关系，游击战争迅速扩大到石门周边地区。1946 年夏，孙举东、胡爱民、高维国在石门方村召开民兵成立大会。滴水岩、低岭、张村、方村、白沙岭和石门村共 30 多人参加了民兵，任命了杨炳南（方村人）为民兵大队长、高梅林为副大队长。以后这支队伍以滴水岩为根据地，向四周发展力量。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基层政权，消灭充当耳目的特务分子，1946 年冬，孙举东率领查春、曹汉清、胡必忠分成三组，分别处决了对新四军威胁最大的渚湖、小九华、丁家冲三个保长和三个恶霸，迅速打开了局面。游击队迅速扩大，使汪河游击区同滴

水岩游击区联成一片。正当胡克南率队开辟石门、小麦岭、西冲柯根据地时，西冲柯士绅吴一飞暗地里将游击队的活动报告到国民党贵青办事处。国民党第八行政公署专员汪幼平立即率贵池、青阳县常备队 200 多人围剿刚刚创立的游击根据地。常备队一到西冲柯，就包围了村庄，四面出击搜捕新四军游击队。来不及撤退的胡克南率领一个排的游击队和地方民兵与国民党常备队交火，奋勇抗击。由于敌强我弱，胡克南抵抗到天黑，开始突围。这次西冲柯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民兵牺牲 29 人，游击队 3 人受重伤，胡克南的通讯员和一个交通员还拐走了整个部队的薪饷。后来桐贵青工委和青贵区委认真总结经验，认识到要想开展好游击工作对那些仇视共产党的乡保长决不能手软，同时还要做好情报工作，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共青贵工委成立及汪河游击根据地的发展

1946 年 6 月底，国民党悍然发动全国内战，解放区军民奋起抵抗。由于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解放区军民不但很快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而且从 1947 年 3 月开始，在挫败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同时，转入局部反攻。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揭开战略进攻序幕的大好形势下，皖南地委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抓住皖南国民党兵力相对薄弱，群众斗争情绪普遍高涨的有利时机，认真落实华中分局“七一”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展开更积极的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皖南游击战争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黄西工委的成立。1947年3月下旬，皖南地委在樵山荷花坑召开地委扩大会，胡明主持，熊兆仁、杨明、倪南山、刘奎、洪林、吕辉等参加。会议强调深入贯彻华中分局“七一”指示，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将武装斗争提到一个新高度。使皖南游击战争由“隐蔽坚持”迅速转入“大发展”。为迅速实现“大发展”，会议决定：坚持太歙黟地区斗争的刘奎游击队与坚持黄山以西地区斗争的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的部队合并；建设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根据地，将游击战争与群众性斗争结合起来。4月，将沿江中心县委改为黄西工委。中共黄西工委在秧溪汪王岭梓桐坑正式成立，杨明任书记，刘奎、王文石、朱农、陈爱羲为委员。与此同时，以刘奎部和杨明部为基础，组成黄西工委直属武装——黄西总队。刘奎任总队长，查富德任副总队长，杨明兼政委。

青贵工委的成立。1947年7月，皖南地委在太平龙门召集沿江地区干部会议。会议对各组织属辖地区作了较大的调整，决定撤销泾青南和铜青南两个工委，在桐青贵地区（包括泾县、南陵等县）由朱农、陈尚和、尹彬组建铜青贵县委，朱农任书记。归地委领导。为了便于领导，铜青贵县委决定建立铜青南工委，书记陈尚和兼；泾青南工委，书记朱农兼；泾南工委，书记王克祥，副书记吴祥；杨田区委，书记孙林；青贵工委，书记孙举东，委员史来水、曹汉清、叶光华、查春。同时成立铜青贵县政府，朱农兼县长。下辖铜青南办事处，主任尹彬；青贵办事处，主任孙举东；杨田区政府，区长孙林。青贵工委是在青贵区委的基础上组建的，同时成立了直

属部队即游击大队，由孙举东、曹汉清、史来水、叶光华、查春等同志组成。1947年9月，中共青贵工委，在贵池的齐村柯、金坑、刘街、姚街、杨街一带建立中共齐金乡支部（负责人不详）；齐金乡办事处（负责人不详）；中共新立乡支部，书记曹汉清；新立乡办事处，主任查春；中共保和乡支部（负责人不详）。青贵地区游击战争，以贵池汪河、棠溪一带周围七十华里的地方为主要活动区域，在青、石、贵三县交界地区最为活跃，总的活动范围可达全县。

汪河游击根据地的发展。青贵工委成立后，在青贵地区掀起了游击战争的高潮。一是青贵工委广泛发动群众，动员广大群众投身于游击战争。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从1947年春开始，先后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三拖”（对壮丁、税、粮拖着不交）、“三抗”（抗丁、抗税、抗粮）斗争。本是富庶的鱼米之乡的皖南沿江地区，由于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土豪地主的催租逼债，使百姓生活无着，怨声载道。在桐青贵县委和青贵工委的领导下，组织干部、战士分头行动，深入到一个个村庄去，召集群众开会，讲解老百姓为什么种粮却反而没有饭吃的原因，以激励群众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用拖延时间不出壮丁、不交税、不交粮的办法对付。同时，找一些乡保长家属做工作，晓以利害，叫其写信或口头转告逃跑在外的乡保长，不要为虎作伥；还请地方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开座谈会，要求他们站在群众一边，支持新四军的工作。这样一来，群众发动起来了，统战工作也收到了效果。因此，尽管国民党地方政府逼令交钱出粮，但结果还是落空。到了1947年青黄不接的季节，群众

反映有些人家揭不开锅了，靠野菜充饥。群众没有饭吃，是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大事。哪里有粮食呢？据了解国民党的地方粮库有粮食，地主所掌握的各地大姓祠堂里有稻谷。于是桐青贵县委在“三拖”、“三抗”斗争的基础上，大胆发动群众进行抢粮（即抢国民党仓库粮食）斗争。为保护抢粮群众的安全，在周密部署下，派县大队武装监视国民党乡自卫队，同时向群众提出“谁抢谁有”的口号。这样既解除了群众害怕心理，又使群众树立抢粮成功能够渡过饥荒的信心。抢粮斗争先从青阳刘店乡开始，将国民党刘店粮库里几万斤粮食一抢而空。刘店乡抢粮成功的经验，很快被各地吸取，青贵工委在刘街发动群众抢粮，也取得了抢粮斗争的胜利。群众在斗争中得到利益，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于是积极投身到游击战争中去。二是公开组织民兵，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在民兵建设中，青贵工委坚持从国民党武装手中夺取武器，从土豪士绅手中收缴武器武装自己，发展自己。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各项斗争，保护根据地人民的利益。为此，收缴和夺取武器成了青贵游击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次，青贵游击队从青阳盘台来的三位同志谈话中，得知金坑一带和九华山附近地区，国民党败兵留下一些枪支散落在该地区国民党乡保长和当地地主豪绅手里，便立即派精干队员赴上述地点侦察，消息得到证实后，决定用武力收缴这些枪支。同时报告铜青南县委并要求派部队支援。第二天晚上青贵游击队同铜青南县委游击大队汇集后，兵分两路，直奔金坑和九华山地区，将有枪支的乡保

长和士绅家包围起来，令其交出枪支。这次行动共收缴 83 条枪，上交县游击大队 42 支，留下 41 支装备了自己。

1946 年 9 月，青贵工委得到贵池观前一个国民党军官带几个人回家的消息，当晚派游击队摸进观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了这个军官及其随从。该军官将身上的一支手枪交了出来，还答应替游击队买 50 条枪，后来虽然没有办到，但他也不与新四军为敌。

青贵游击队从内线得知国民党黄石溪潜虎队准备外出活动，立即在他们必经之地的青贵交界处设下埋伏，当潜虎队几个人进入埋伏圈时，游击队从四面八方一起高喊：“缴枪不杀！”，潜虎队举手投降。不费一枪一弹就抓到队长许加宾和几个潜虎队员，缴了他们枪，进行教育后予以释放。青贵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不仅武装了自己，也提高了指战员的信心，更鼓舞了群众的斗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积极主动地要求参军。到 1947 年底青贵工委领导的游击队由成立时的 15 人发展到 100 多人，枪支由 7、8 条增加到 6、70 条，成立了一个大队，大队长孙举东，下辖三个小分队：一〇五小分队，队长姓名不详，指导员曹汉清；一〇七小分队，队长钱山，指导员叶光华；一〇九小分队，队长许常定，指导员史来水。在贵池汪河一片组织了 3、40 人的民兵中队，中队长杨某某后来在反清剿中牺牲，中队指导员张根富在金坑战斗中牺牲。齐村柯一片组织了 7、80 人的民兵中队。到 1947 年 9 月建立乡政权时，青贵两地民兵发展到 1000 余人，又成立了三个民兵中队：庙前乡民兵中队，指导员王松茂；黄石乡民兵中队，队长程三满；齐金乡

民兵中队，指导员陈延寿。同时成立了阳池民兵大队，大队长柯某，教导员曹汉清。青贵工委在重视民兵工作的同时，还充分注意发挥妇女及其它群众组织的作用，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三是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1947年10月，游击根据地党员发展到5、60人，建立11个党支部。汪河支部，书记张根富；石齐支部，书记胡克明；家门支部，书记陈演；王村支部，书记姓名不详；贵池边界支部，书记陈麻子；齐村柯支部，书记陈延筹；还有东堡乡、南阳乡、朱备乡、庙前、陵阳支部。四是重视统战工作。在开展其它工作的同时，青贵工委非常重视开展统战工作，原则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少数顽固分子。实践证明，搞好统战工作，为各项活动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春节，青贵工委在贵池汪河宴请了当地较进步的乡保长、士绅、参议员等，宴席上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讲全国的大好形势，希望这些国民党乡保长、士绅能审时度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多做工作。

贵池齐村柯有个姓齐的县参议员，为人老实，看不惯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欺压人民，但也不主张推翻国民党统治。经游击队对他进行多次教育后，同游击队建立了良好关系，为游击队提供经费、粮食、物资，购买枪支弹药，做了很多工作。

团结各方面力量的同时，对一些顽固不化、罪恶昭彰的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在贵池的小麦岭等地先后镇压了一些民愤极大的保长、保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群众受到鼓舞，其它反动分

子被震慑。五是重视斗争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青贵工委在开展青贵地区游击战争中，针对敌强我弱的状况，确定了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的方针。保存了力量，壮大了自己。坚持了青贵地区游击战争。

金坑遭遇战。1946年8月间，铜青南县大队长朱农率一个中队来青贵地区了解情况，检查青贵工委工作，并准备在九华山脚下的贵池齐村柯和青阳南阳湾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青贵游击队和县大队一同来到贵池金坑、曹村宿营。第一天夜间到达，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遭遇贵池县国民党常备队偷袭。由于没有准备，在朱农同志指挥下，打退了偷袭国民党常备队，就迅速撤出了战斗。

攻打杨街乡公所。1946年11月，铜青南县委派一个中队，带一挺机枪，配合青贵游击队袭击杨街乡公所。临战前，青贵游击队还动员5、60名民兵随队大造进攻声势。国民党乡公所人员见新四军人数众多，未进行抵抗，闻风逃跑。杨街方圆几十里地到处传送着新四军司令部到了汪河，并说大部队由胡司令（即孙举东，当时化名胡克南）率领。一周以后，姚街乡长，当地县参议员和几个保长主动跑到汪河村找到青贵游击队，表示拥护，支持共产党。答应向新四军游击队递送情报；游击队进村，决不向国民党军队报告。这样一来，青贵游击队活动区域得到扩大，可以机动地在青贵边广大地区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常备队。

由于青贵工委在创建游击根据地时，重视了各方面工作的协调与配合，尤其根据上级指示，制定了正确的斗争方针，贵池游击根

根据地经过了从隐蔽到公开，从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发展力量，从游击战争走向广泛的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斗争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7年9月以后，撤铜青贵县委，青贵工委划归黄西工委领导时，已建立起以汪河（今解放乡）为中心的方圆六、七十华里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活动的范围扩大到青阳县的庙前、九华、黄石溪和贵池的梅埂、观前、汪河、小麦岭、杨街、姜村、徐村柯、马牙、刘街、源溪、姚街、梅街、金坑、曹村一带。

青贵游击队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经过全体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党组织和乡民主政权，开辟了青贵地区的新局面；配合了泾青南县委武装大队的游击战争，为泾青南游击根据地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沿江总队开辟肖坑游击根据地

从1946年开始，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沿江总队派政治部主任钱秋育率部几度秘密进入贵石边区的贵池杉山、龙须坑、肖坑等地，发动和依靠群众打下了开辟游击区的基础。

1946年春夏间，政治交通员查效华从上海来到沿江中心县委所在地宋家，带来了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部长曾希圣的信件，令沿江中心县委开辟七井山的石井里、大洪岭等地区。大洪岭，悬崖绝壁，云吞雾罩。位于祁门县以北25公里处，属黄山山脉。为此，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派员到大洪岭了解情况。大洪岭树木稀疏、山上尽是岩石，山下土地不多，人烟稀少，部队在这里活动不便，更无法就地取粮和扩大部队。加上这里又是祁门经石埭到贵池殷家汇的通

道，不宜建立游击根据地。根据这种情况放弃了对大洪岭的开辟，于是沿江总队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总队副查富德率领由美溪到柯村活动；一路由政沿处主任钱秋育率领一个排，到七井和贵石边界的杉山庙活动。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石埭、太平等县建立了严密的特务网，实行法西斯统治。那时，新四军部队大部在夜间行动，狡猾的国民党特务就在小路、岔路口放上枯树枝、瓦片或撒上石灰、牵上丝线，根据“记号”的变化判断新四军行动方向。一旦发现，立即跟踪追击。有时特务在桥下放暗哨，根据过桥的脚步声，就能数出新四军人数，马上调兵袭击。国民党当局还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严密控制群众。致使部队粮食短缺，只能以野菜、竹笋充饥。特别是国民党保安队常设了望哨，专门观察新四军生火做饭的炊烟，一经发现，立即派兵前往攻击，常使新四军游击队吃不上饭。一次，新四军游击队到贵池和祁门县交界的牯牛降，那里保甲长就把住在各家的游击队人数合计上报，国民党军队迅速弄清了游击队兵力立即出动军队围剿。游击队就在这样十分险恶的环境中，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斗争。钱秋育率部刚到杉山庙，庙里当家和尚系国民党特务中心组长，他以吃斋念佛为幌子，欺压山民，糟蹋妇女，充当国民党军队耳目。一天夜晚，钱秋育等正在做群众工作，国民党保安团得到了杉山庙当家和尚的情报，寻踪而来。新四军游击队立即转移，在阻击国民党保安团的战斗中连长阮成余不幸中弹牺牲。在艰难的斗争中，沿江总队坚持贯彻发动和依靠贫苦山农。在杉山庙地区，

首先发展和培养了肖坑贫农陈太和。陈太和不顾个人安危帮游击队买米、送粮，照顾伤员，从不计个人得失，很快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陈太和的带动下，杉山群众发动起来了。钱秋育又根据群众的反映并查实山霸徐德坤很多劣迹，于是镇压了这个山霸，打开了局面。在此基础上，钱秋育率部第二次到杉山庙地区，将那个国民党特务和尚公审枪决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特务网失去了作用，群众扬眉吐气，革命热情高涨，钱秋育就在这一带站稳了脚跟。

（四）中共青石贵工委的成立及游击根据地的发展

1947年6月30日，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底进入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陈粟、陈谢大军也相继南下，将解放战争的烈火烧到了长江北岸，与皖南游击区仅一江之隔。

涌溪会议。根据这一新变化，1947年9月中旬，皖南地委在泾宁宣的涌溪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胡明、熊兆仁、杨明、孙宗溶、洪琪，唐辉、刘奎、倪南山、罗白桦等。根据涌溪会议决定，杨明率领黄西总队和黟、休、祁游击队进军贵池沿江地区，目的是打通与刘、邓大军及皖西根据地的联系，破坏国民党的江防，迎接大军渡江。在进行局部战略调整时，决定黄西工委由刘奎、杨明带领开辟沿江的青阳、贵池，力图创造大块中心根据地，并向西发展，打通与江北联系。1947年10月，经过短时间的准备工作，杨明率领两个主力连、一个警卫排，约二百多人自太平的五溪出发，到贵池肖坑。开辟以肖坑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西进杉山，威逼沿江。中共黄西工委移师贵池肖坑的第二天，杨明、马文杰、查富德决定趁国民党军队未及防备，决定攻打高坦乡公所，为创建根据地打下基础。高坦位于秋浦河中游，距贵池首镇殷家汇仅 20 公里，是国民党据守的重点。除乡公所高墙深院外，还建有两个碉堡，有一个自卫队分队约 30 多人和乡公所武装 10 多人守备。第二天，天一亮钱秋育率黄西总队两个主力连和武工队一部，包围了碉堡，四面围攻，很快碉堡被攻破，乡公所武装乡丁被缴械，自卫队被击毙多人。俘虏 20 多人，缴枪 50 多支。战斗中，国民党自卫队两个分队前来增援，被黄西游击队打垮，击毙多名。接着黄西游击队又攻打了七里乡公所、丁香乡公所、阳坑乡公所，袭击了贵池首镇殷家汇。这些战斗，在新区壮了解放军声威，鼓舞了群众斗争士气。初步打开局面后，黄西工委活动范围扩大到高坦、沟汀、七里、丁香、南坑一带。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打通与大别山的联系，还成立了西进前委，由马文杰（书记）、钱秋育领导。并以贵池、石埭的横渡、阳坑、牌楼、占坡、吴田铺、留田一带为中心，积极向前推进。西进部队长驱百里，声势浩大，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马文杰和钱秋育率部进入贵池的刘街附近时，捉到一个国民党县参议员，经教育予以释放，该参议员到处宣扬解放大军先头部队已经过江，国民党军队处于一片恐慌之中。

粉碎敌人的“清剿”。1947 年底，为了阻止黄西总队北进，驻守“江防”的国民党六十三师师长李宏达和安徽省军管区少将参谋

长龙炎武惊恐之余，慌忙调集六十三师一部，配合安庆保安团、贵池及石台两县常备队，分四路从沟汀、杉山、肖坑、留田向杉山根据地大肆“清剿”。西进部队一面沉着应战，打击国民党军队。一面为粉碎“清剿”，主动出击，攻打丁香树乡公所。丁香树是土匪洪国顺的老窝，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的地方。钱秋育率一个连攻打丁香树乡公所，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增援，黄西总队撤出了战斗，虽未攻下，但这次行动影响很大。同时为黄西部队的行动赢得了时间。国民党四路大军进攻根据地中心区肖坑、龙须坑时，其先头部队200余人到达外风崖就疯狂地开枪扫射，根据地民兵及时报告根据地部队，杨明率领的黄西工委机关很快做好了向石台方向撤退的准备。当队伍走到桐坑时，遇国民党部队阻击，黄西总队奋力发起攻击，冲出包围圈进入石台。当国民党几路大军涌入肖坑，到达白坞时，发现游击队全部撤走。就返回肖坑放火烧毁民房47家，共200余间。

在实际斗争中，黄西总队和皖南地委认识到迎接大军渡江的条件尚未成熟。于是黄西总队主力，迅速改变方向、甩掉强敌，向皖赣边的祁门、至德、浮梁地区进军，继而向赣东北发展。向皖赣边进军的先头部队，分为两支：一支由钱秋育率领，开辟祁（门）至（德）浮（梁）地区；一支由马文杰率领开辟祁（门）石（埭）贵（池）地区。然后，又派左克南率警卫连会同马、钱部经贵池占坡进入祁门、历山、至德的高山、马坑一带。杨明和查富德率主力部队一部，在贵石边区的杉山坚持斗争。

黄西总队开辟皖赣边游击根据地。黄西总队为了开辟西进的道路，付出了很大代价。向皖赣边区进军时，不仅天寒地冻、粮食不济、山路难行，更为艰难的是这一带交通闭塞，地形复杂，土匪、山霸、反动道会门等盘根错节，四处出没。部队进入这些地区，山上有土匪，山下有追兵，村里有国民党地方武装，加上遍及各地的大刀会的袭击，环境异常险恶。再加上西进部队过于分散，未能取得较大战果、建立根据地，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947年12月底，为打破国民党清乡队十二个中队对肖坑中心区的清剿，杨明率队突围，在突围中杨明同志的战友查志祥（女）和警卫员牺牲。由于杨明同志率先突围使战斗提前打响，策应了孙举东从容撤出肖坑山棚，突出重围，突围中青贵区游击副队长柯某某等三同志光荣牺牲。根据当时情况，黄西总队决定，将杉山地区的部队和后勤人员转到祁（门）石（埭）贵（池）浮（梁）至（德）等地区。集中兵力，展开较大规模的战斗，开创以牯牛降为中心的根据地。于是有了义收祁门东口乡土匪王义兴；伏击、击毙祁门东沙湾土匪吴春生；歼灭历口乡警保大队部；消灭新安王炳南的地主武装；严惩贵池县源头恶霸李钟玉（其弟李怀玉是警保队长）的诸多战绩。李钟玉系国民党贵池县参议员，依靠权势，组织保家队，构筑碉堡，私设刑堂。内战时曾杀害共产党干部，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威逼佃户，强买童男童女，为其父母殉葬，陪葬者的痛哭呼唤声惨不忍睹。杨明得知李家残害百姓，强攻了李家大庄园，全歼了地主武装，缴长短枪15支，当场处决了老二李钟玉，老三李怀玉，因老大不管家

事而且罪恶不大活捉后释放。当地群众得知后奔走相告，称颂解放军的功德。在这个地区对一般乡保长，没有多大罪恶的，捉到后便教育释放，致使许多乡保长愿意为游击队行动提供便利。游击队还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税收制度，同时组织生产。黄西总队的行动方针符合华东局 1947 年底发出的“皖南游击队目前不在调动江北之敌，配合江北反攻，而在于发展自己，发展方向在敌人不够重视和薄弱之处。”的指示精神，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牯牛降的历溪坞建立了中心游击区。1947 年 9 月“涌溪会议”对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高度集中发展主力，普遍发展地方武装，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高度集中主力，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的战略进攻和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这三大任务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会议期间，沿江地区尚未弄清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认为刘邓大军马上就要渡江，于是草率决定西进，作出了由杨明、刘奎率领黄西总队和黟休祁游击队，进军沿江地区的战略布署。西进部队长驱数百里，声势浩大，虽扰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也锻炼了部队。但当时刘邓大军只兵临长江北岸，而阳坑、高坦已靠江边，西进部队的军事活动过早地刺激了国民党江防之敌，尤其是黄西总队袭击贵池首镇殷家汇后，驻守江防的国民党调集重兵，大肆对黄西总队“清剿”堵击。使黄西总队面临巨大困难。如果不是黄西总队及时认识到迎接大军渡江的条件并未成熟，当机立断，主动、迅速地改变方向，甩掉强敌，向皖赣边地区进军，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历史的教训，应当记取。

中共皖赣边工委、皖赣工委、青石贵工委的成立及领导下的游击战争。时过不久，杨明又率部返回杉山的龙须坑根据地。1948年初，国民党第八专署专员汪幼平、大队长韩耀池率贵池常备队240余人，再次来肖坑，突袭龙须坑，国民党常备队到达龙须坑，找不到游击队，气急败坏，将龙须坑游击队驻地工棚、药品、粮食全部烧毁，修枪所、缝纫厂的机器设备被国民党掠走。在反清剿战斗中，黄西总队边打边撤，在激战中，打断了贵池第八行政公署专员汪幼平的一条腿，汪回贵池不久毙命。挫败了国民党对龙须坑的“清剿”计划。

1948年4月，国民党六十八师派出一个营进攻肖坑，中共黄西工委指挥部队利用有利地势设伏，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缴获战马二匹、枪四支。10月，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工委留下一个排在肖坑打游击，其他人员全部从杉山的龙须坑转到祁门、石埭、贵池三县交界的历山。经过开辟，很快将祁、贵、石、东、至、太、黟、休、浮、婺等小块根据地联成一片。

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皖南地委于1948年5月决定撤销皖浙赣前委，在皖赣边成立皖赣边工委。书记杨明，候补委员马文杰、查富德、钱秋育。并将皖赣边根据地重新划分为浮至祁、祁石贵、青石贵三个活动区域。分别由钱秋育、马文杰、孙举东负责。同年8月，撤销皖赣边工委，正式成立中共皖赣工委，书记杨明、委员朱农、马文杰，机关驻历溪坞一带。下辖浮至祁工委，书记钱秋育，委员孙举东、刘学鸿、方明；祁石贵工委，书记马文杰，

委员左秀东、张建南；青石贵工委，书记杨友华，委员周光斌、章贵。同时，将部队改编为皖赣总队，整编为3个主力连和1个警卫排武装。

青石贵工委在青阳西部和贵池肖坑、高坦一带以及石台七井、斗文山、重坑、杨堪口、沟汀等地进行游击战争。为迎接新的革命形势到来，皖南地委领导的部队继续向南进军，1948年秋，杨明率部进驻西蒲岭，朱农、孙举东也先后率部进入皖赣地区，在这期间，曾派史来水、曹汉清、孙林、叶光华率小股武装到贵池坚持斗争，后来这部分武装及活动区域统一划归皖浙赣工委领导，青石贵工委亦就自动撤销。在转战皖赣边的岁月里，为了振奋士气，宣扬南进意义，杨明（化名徐向南）作词，钱秋育谱曲，创作一首《沿江进行曲》。歌词为：“沿着高山，沿着平原，在这大反攻的前夜，我们要迅猛地向前发展！加速蒋贼的毁灭，遍插解放的旗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人民翻身而坚决斗争！前进，前进！前进到浙赣线。”这首歌鼓舞着战士奋勇杀敌的斗志，胜利的喜讯一个接一个地传遍四方。

三、中共皖浙赣（大）工委领导的胜利大进军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东北、中原、华东、华北各路大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国民党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至此，国民党精锐部队大部被歼灭，其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开始动摇。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8 年底，为了加强统一领导，进一步集中力量完成南进任务，皖南地委决定，将皖浙赣、皖赣、黄西三个工委合并成立皖浙赣大工委，由熊兆仁、罗百桦、余华、倪南山、杨明五人组成。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倪南山任支队司令，杨明为政委，查富德为副参谋长，钱秋育为政治处副主任，并成立皖浙赣线前委，由杨明、倪南山、朱农组成，杨明为书记。1949 年 1 月 6 日进入浙赣线，取得南进的大胜利。1949 年 3 月，接到粟裕指示，立即挥师北上，配合大军渡江，堵击南逃国民党军队。于是部队兵分两路，歼灭国民党残部。其中一路由查富德率领独立团一部，进军黟、休、祁截击由贵池向祁门逃窜的国民党军队；另一路由倪南山、余华、杨明率支队部和主力团，直插皖南山区重镇屯溪。随后，查富德又率部配合苏帅仁领导的黟休祁游击队，直向贵池江边挺进。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强渡长江，贵池全境宣告解放。

第十一章 渡江战役与贵池解放

第一节 渡江战役前的贵池时局

一、渡江战役前的形势

1949年，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为了获得喘息的时间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妄图用“和平攻势”作垂死挣扎。同时妄想凭借长江天险，构筑所谓“从天空到水底的立体防线”，集中了残余陆军的大部和海空军主力，包括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约130余艘舰艇和280多架飞机，共70多万人的兵力，分布在湖北宜昌至上海1800多公里的长江防线上。九江以西由白崇禧统领40个师约25万人驻防；湖口以东由汤恩伯统领75个师约45万人防守，企图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

二、国民党加强贵池江防

位于长江南岸有75公里江防的第八行政公署所在地的贵池，是国民党长江防线上的重要一环。京沪杭警备总部所辖第八兵团刘汝明部的三个军约4万余兵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其中五十五军军部驻贵池（军长曹福林），其二十九师（师长黄芳俊）防守贵池至牛头山地段；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军部驻殷家汇，防守大渡口东西两侧25公里地段的阵地。

国民党军在贵池地区采用一线兵力配备，防守重点是乌沙夹至大渡口段，其战役密度为每师均占17公里地段，沿江构筑的据点式阵地，由高层据点、低层土木工事和地堡三者相结合，以高层据

点为守御重点。乌沙夹的据点工事用钢筋水泥建成，低层工事多利用山腰，山脚修建。江心的大小沙洲都筑了许多地堡，组成了高、中、低交叉火力网。

为配合国民党江防部队防御，国民党贵池县政府纠集起县保安大队和第八区保安团，还在西北乡、罗城乡分别组建第四营、第五营等反动军警加强江防。同时国民党贵池县政府还举办“动员戡乱讲习会”，培训反共骨干，抓夫派丁，强迫老百姓为国民党江防部队修碉堡挖战壕，并将江边所有船只集中于内河，一律不准行驶。妄图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

三、皖浙赣支队向北进军，策应大军渡江

渡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黄西独立团，受命向黄西、贵池一带的沿江地区进逼，与屯兵江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从1947年8月开始，中共皖南地委派部队进入贵池沿江地区，破坏敌人的江防，迎接大军渡江，迅速扩大贵池游击根据地。黄西独立团直逼殷汇、牌楼、吴田、唐田等沿江地区。由于情况的变化，华东局指示皖南地委，向南发展，为大军渡江准备基地。皖浙赣支队在黄山地区开展游击，取得了一联串的胜利，使皖赣边根据地和浮至祁根据地联成一片，为大军渡江后向南进军准备了条件。自1948年下半年开始，贵池等沿江一带地区已将工作重点转入迎接大军渡江的具体准备上来。1949年元月，沿江工委落实皖南地委关于“总的任务是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迎接大军渡江。”的指示，

加强贵池沿江工作，明确指出：荻港至大通段及贵池方向由铜陵县委负责，青阳县委同时进行贵池江边工作。为了便于领导，还将泾青太地区与青贵地区合并成立青阳县委，许章法任书记并具体负责沿江工作。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皖赣支队，受命由江西婺源折回黄西、贵池一带，配合渡江大军，夹击国民党“江防”部队。此外，黄西独立团开赴贵池殷家汇地区围歼国民党南逃之军，途经横渡（今属石台）时与国民党溃军相遇，黄西独立团一鼓作气，猛打猛杀，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直指江边。

四、华东局在贵池开展统战工作，配合大军渡江

渡江前夕，党在组织武装力量打击国民党江防部队、破坏“江防”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策应大军渡江服务。

早在1948年底以前，中共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就关注处长江南岸的贵池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在上海工作组的策动下，范志农、郑汉、陶若存等人先后到贵池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章难生谈话，章难生愿意为迎接大军渡江作策应。为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共华东局还通过在国民党省政府工作的朱子帆的关系，研究安排了与中国共产党华东局有联系的当涂县县长操竹友到贵池任县长，具体负责贵池大军渡江时的内应工作。操竹友、章难生等人为策应大军渡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是利用国民党县府公职人员搜集贵池驻军布防、换防和兵力配备情况，由章难生转交给芜湖的陶若存。此情报，后因途中耽搁，大军已渡江，

未发挥作用。二是操竹友借贵池财力不支，挫败了第八专员公署专员郝照亭为加强贵池“江防”，收编桐城县枞阳镇联防队刘东雄残部，扩建反动武装的计划。三是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毁船的阴谋。专员郝照亭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强令贵池沿江各乡船只集中到九华河的观前，秋浦河的殷汇，必要时全部沉毁。操竹友借乌沙等地船只一时无法集中，终使当局沉船计划无法实施。后来，这些船只全部参加了大军渡江的运输任务。四是成功地组织贵池民主人士护城、护校，有效地保护了学校的财产和学生的安全，使存放贵池仓库的20万斤军粮滞留贵池，免遭焚毁。这批军粮，后来全部支援了渡江大军。五是在国民党专员公署、贵池县政府、国民党军队于渡江前20日向南逃窜之时，操竹友、章难生被挟持后，还交待了有关人员迎接大军进城有关事宜。

正是贵池根据地人民武装的进击与策应、国统区民主人士顺应潮流，积极配合大军渡江，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贵池城才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第二节 渡江战役与贵池解放

一、渡江战役

百万雄师过大江。为了彻底摧毁蒋家王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全部，以及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共100多万大军，实施渡江战役。并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总前委，

统一指挥作战。全军统一分东、西、中三路大军，适时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一千余里的长江上发起渡江战役。1949年3月，根据渡江总前委的决策，二野三、四、五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之间，以安庆东西段为重点横渡长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兵力布置是：第三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桂家坝段；第五兵团由安庆以西至华阳段；第四兵团由望江至马当段。为了指挥渡江的需要，二野的司令部逐时进行了南移，先抵合肥上派河，再移舒城，4月19日移至桐城。根据二野司令部的命令，3月初，三、四、五兵团分别从阜阳、漯河、沈邱等地出发，挺进长江北岸。担负西线作战集团的第三兵团（陈锡联部）司令部移至枞阳陈氏宗祠。四月初，三兵团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正式接受安庆以东地段实施强渡长江的任务，并转移到枞阳、大王庙、鸭儿沟地区用隐藏的方式进行渡江前的准备工作。十一军三十一师担任前江口至杨林洲强渡长江任务，该段为渡江重点；三十三师驻铁板洲，担任李阳河至乌沙夹地段渡江任务；三十二师为渡江预备队。各师进至江防后，三十一师九十二团于前江口构筑工事实施佯攻，而三十一师主力则选定地形开阔、平坦且凸向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大坝和新河坝之间的鸭儿沟为起渡点。并在老峰头、汪家圩、于家嘴、张家店地区隐蔽。在石塘湖、长风港进行编队、登船、登陆训练。渡江部队士气高昂，随时听从号令强渡长江。

1949年4月21日下午四时，十一军军长曾绍山等到达渡江前沿指挥所，渡江部队各梯队在石塘湖通向长江的一条水道里登船，

同时，江堤上五个高音大喇叭（20号安装并伪装好）向江南国民党军队阵地播放中共中央广播电台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议，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负责人员所以拒绝这个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内的问题。……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广播一停，各炮兵部队按照原定的射击目标，万炮齐放，猛轰南岸国民党军防线，贵池马踏石至李阳河国民党江防顷刻间灰飞烟灭。登船突击部队在“打过长江去，消灭蒋匪军！”的口号中，万帆齐发，直扑南岸，南岸江防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窜。下午六时许，十一军指挥所和三十一师、三十三师胜利地渡过长江，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向双桥、殷汇方向追击。国民党九十六军亦弃殷汇向南逃窜。晚十时，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进抵殷家汇并设立指挥所。

4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的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师由前江口、王家套起渡，亦分别突破贵池上、下江口国民党江防，横扫沿江守军。次日拂晓前，占领了隔三巷、馒头山、虎形山、六合煤厂等地。六十一师迅速攻占观前、灵芝，向青阳方向追击国民党55军残部。第六十三师主力集

结于下江口、裕记煤矿，准备攻占贵池。

追歼南逃的国民党军队和奇壮岭战斗。渡江战役前，已成为孤岛的安庆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军三面包围。渡江战役打响后，其国民党守军一七六师（副师长李祖霖）、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安徽省保安团第三团共计2万余人，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便弃安庆向贵池方向溃逃，企图走黄湓、蛟口、牌楼、渔亭到屯溪，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会合。

根据情况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军领导当即研究决定：三十三师继续追击殷汇等向南逃跑的国民党残部；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向西围歼安庆向南逃跑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安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军三十师从安庆过江，其主力直接插入牌楼、小河以西地区，堵住国民党军队西逃之路。三十一师兵分两路，一路由殷家汇、五里、吴田到牌楼；一路由殷家汇、杨桥到牌楼，以截断国民党军队南逃的去路。二路大军于牌楼济公岗会合。这时安庆国民党溃军，从蛟口到达佳山、济公岗，一场遭遇战便打响了。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拂晓，国民党军队溃逃，解放军乘胜追击。22日上午，国民党溃败的九十六军一部与贵池保安中队结合，妄图凭借牌楼奇壮岭险要山势和原已有的构筑工事负隅顽抗。渡江前卫部队二野八旅二十三团（淮海战役前的老番号）三营猛冲猛打，突破防线，国民党军溃败南逃。在奇壮岭、济公岗的战斗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解放军牺牲22人。

奇壮岭战斗后，解放军在牌楼、十字、小河经过两天一夜的围

歼战斗，除国民党一七四师师长带千余人向南逃跑之外，其余国民党军队（安庆逃跑的国民党军队、九十六军等）均被歼灭。俘获国民党军队众多官兵。至此，贵池全境解放。

二、贵池解放

1949年4月20日，贵池城内一片混乱，国民党五十五军驻贵池黄芳俊师开始向南撤退，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追击，五十五军下令炸毁贵池城南门大桥。国民党贵池县政府、县党部、县自卫队等也出南门逃窜。

4月22日清晨，二野三兵团所属杨福民部和十一军某部解放贵池。21日夜间，天降大雨，部队露宿街头，城内秩序井然。22日拂晓雨止，东方露出了曙光，贵池各界人士前往九华街热烈欢迎大军。人民解放军十一军先遣团团长赵尚祥和政委于新民接见了他们。欢迎人员陪同赵团长、于政委前往贵池中学休息，解放大军随即进城接收城防。上午九时左右，在贵池中学举行欢迎大会，赶来参加欢迎会的各界人士，挤满了礼堂和操场，欢迎大会共推桂树五主持，李辛白老先生致词。赵团长在会上讲话，并宣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宣布，上级命令由他代理贵池县长，于政委担任城防司令。群众听到这一宣布，全场一片欢腾。会后，举行了群众游行和文娱活动。贵池各界人士欢迎解放军入城大会，宣告了压在贵池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彻底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贵池人民终于盼来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时代。

第十二章 贵池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第一节 贵池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一、城区接管和接收工作

根据华东局关于“江南解放后，立即成立军事管理委员会。军管会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反革命的活动，肃清反动武装的残余势力，恢复并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正当的权利，建立革命政权，保证城市政策的正确执行与有秩序的的各种接管工作，协助工人、职员、学生及其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作为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的指示。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突破贵池江防后，于4月22日上午，正式接管贵池。

由于中共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对国民党贵池县上层人士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得到了国民党贵池县党部和政府民主人士的支持与协助。当国民党在贵池城内驻军、国民党第八行政公署和贵池县党部、政府及下属各科于1949年4月20日匆忙从南门向青阳和贵池南部山区撤退时，时任国民党县长操竹友和县党部书记章难生（重要统战对象）本应在贵池城内组织迎接大军进城等事宜，但由于20日上午被军统汪微瑞、中统张少寅、书记长吴必德和专署副司令桂超等裹挟下不得不离开贵池县城南撤。在撤离贵池时，操竹友、章难生对即将解放贵池的工作作了必要的安排。一方面通知各中学有关人员，如八中总务主任王建中、

梅林中学校长姜哲夫、县中教师王啸岩，向他们说明了情况，要他们切实注意学生安全，免遭驻军挟持虏掠。另一方面，通知杨熙之（时任国民党贵池电话管理处主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要把一切器材保管好，由杨出面联系城内进步人士，准备组织欢迎大军渡江，并要尽一切可能，在电话中与章、操保持联系。杨熙之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指派该处职工找到县政府收发室主任桂树五等民主人士，筹备组织欢迎会，积极准备欢迎事宜，赶写标语，连夜张贴，并由贵池商会会长通知各商店准备欢迎。4月22日拂晓，贵池各界人士前往贵池九华街热烈欢迎大军进城。九时，在贵池县中学举行欢迎大会。二野三兵团正式接管贵池，实行军管（1949年4月27日前）。该部先遣团团长赵尚祥兼任临时县长，政委于新民任城防司令。会后成立了支前委员会，由桂树五任主任，协助县留城部队做调拨粮草、船只等工作。

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胜利渡江后，陈毅司令员在合肥召开南下干部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命令随军南下，于是4000多干部到达枞阳。南下四支队126人组成接收贵池县的干部大队，由石克一任政委，李绍基任副政委兼大队长。负责组建贵池县人民政府。四支队于4月26日过江到达乌沙，27日进入贵池县城，即与杨福民部赵尚祥临时县长（仅5天）办理了交接手续，入驻国民党县政府，开始收拾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

二、贵池县新型人民政权诞生

南下四支队到贵池，中共贵池县委即宣告成立。书记石克一、

姚鸿志（1949.12月接任），副书记李绍基、杨友华，委员韩秉林，组织部长刘承志，宣传部长崔勇，秘书孙眉寿。1949年5月1日，在贵池城东大操场召开贵池解放庆祝大会，大会由贵池八中校长欧阳良助主持。会上宣布了中共贵池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驻地池州镇。县长：李绍基。，秘书：孙亭碧，教育科长：孙眉寿，农林科长：孙铁云，民政科长：齐祥云（先）、吴向民（后），司法科长：杨玺，财政科长：齐祥云、杨凤鸣，贵池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程文显。群团组织同时成立：贵池县工会主任：张吉山，贵池县农民协会副主席：李洛增，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贵池县筹备委员会书记：盖来山，贵池县青年联合会主任：姚鸿志（兼），副主任：盖来山，贵池县妇女联合会主任：李振荣，副主任：杨安菊。贵池县下属6个区委和区公所（即：城厢、乌沙、殷汇、小河、梅街、观前）同时成立。每个区委、区公所配备12人左右。废除保甲制，实行乡村建制。同年，撤销乡，改为区辖村。全县六个区辖291个村级政权。村级政权设村长、副村长，农会主任、副主任，武装大队长、副大队长，还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妇女委员、青年委员、生产委员、治安委员、调解委员、财粮员、民政员。全县各级新政权建立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和武装土匪的反扑，致使一部分区、乡政权一度被破坏。1949年9月，在池州地委领导下，以华东军区第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二二一团为主力的贵池军民剿匪斗争全面展开，各级政权又得以恢复和发展。

5月1日，贵池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正式办公，工、农、妇、青

组织的主要干部由南下干部担任。对接收的国民党贵池县政府的人员都作了妥善安置。

1949年9月，贵池县人民政府通过协商，在各阶层中推举第一届人民代表，并就当时全县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在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行使地方权力机构的部分职权。1949年9月25—27日贵池县在池州镇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总数253人，选举产生了九个代表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动员各阶层力量进行剿匪、反霸斗争，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完成各项征收任务，听取和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动员全县人力物力修复圩堤的决议》。贵池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标志着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到来。

1949年4月下旬，南下干部大队与在皖南坚持斗争的中共皖浙赣工委、沿江工委的杨明、陈爱曦、许章法等领导干部在贵池县城会合。为便于迅速开展工作，中共皖南区党委将研究提出的“会师后各地委委员及分工情况”于1949年5月13日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军区通知了池州军分区。同时宣布中共池州地方委员会成立。池州地委由书记杨明、副书记张斌等11人组成，隶属皖南区党委领导，地委机关驻贵池县。辖贵池、东流、至德、铜陵、青阳、石埭、太平7个县。随后，根据皖南区党委、皖南人民行政公署的决定，成立池州专员公署，专员齐维礼、副专员许章法。隶属皖南人民行政公署。池州专员公署机关驻贵池县，成立时辖贵池、东流、

至德、铜陵、青阳、石埭，太平7个县。7月增设大通市。同时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军区池州军分区，司令员金行生，政治委员杨明。机关驻贵池，隶属皖南军区和池州地委领导。池州军分区还成立了独立团（团长：查富德）。贵池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池州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顺利地进行了政权的更替，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三、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由于长期遭受兵燹之灾，解放初期贵池面临各种困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克服困难，一面建立健全各级政权组织，收拾国民党留下的残局；一面发动全县人民参加生产自救和修堤复圩，努力使人民安居乐业，并支援全国解放。

贵池县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即把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县政府发布安民告示，并层层召开会议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各界人士发展工农业生产，恢复商业经营，宣布人民政府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进入6月份以后，暴雨不断，长江洪水泛滥。沿江圩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年久失修，加之国民党军队原在江堤上搭建江防工事，使长江堤防千疮百孔，险象环生。中共贵池县委、县政府立即把工作重点放在抗洪防汛上，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由于江水太大，超过民国以来的历史水位，各圩口先后溃破，25万亩农田被淹，造成圩区颗粒无收，老百姓无家可归。9月25日，贵池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修复圩堤和发展生产。县委、县政府

及有关部门领导组成“贵池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各级干部深入灾区，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在乌沙地区组织民众将破溃的圩田围成鱼塘，捕鱼自救（当时每斤鱼可换2斤大米），使贵池解放后的第一个灾年成了鲜鱼丰收年；在殷汇地区组织1万多劳动力，开荒1100多亩，全部种上了玉米，当年就收玉米160000斤；乌沙区扩种晚稻2000亩；驻驾、乌落两村打芦苇5万7千多斤；其它山区发展经济作物也获得好收成。老百姓都说：共产党好，灾年也饿不死人。

1949年9月，刚刚解放的贵池城，一下子涌入了不少流民，许多流民靠讨饭为生。针对这种情况，贵池县人民政府派专人负责这些流民的生活，搭棚熬粥救济流民。因为有饭吃，又不要沿街行乞，结果流民越来越多，并且流民中有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怎样因势利导，变坏为好？县委、县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促进冬修。组织流民到圩区挑圩，按土方给粮食，每方土给大米三斤。每天每人通过劳动可得六、七斤粮食。布告一出，大批流民都自愿报名。沿江有圩堤的乡、镇在县委的统一布置下，为挑圩的流民安排住宿、提供便利。从而安定了流民的情绪，促进了冬修任务的顺利开展，为第二年的丰收奠定基础。

由于全县各级人民政权的努力，帮助广大灾民战胜困难，重建了家园，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得广大城乡群众安居乐业。1949年贵池全县未发生“闹粮荒”现象。未受灾群众还积极送交公粮，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共支援前线粮食1640万斤、柴

草 12 万担，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为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开展剿匪反霸斗争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贵池的剿匪斗争

土匪武装的猖狂破坏活动。贵池解放初期，国民党军队中从贵池境内溃逃的残余武装人员、特务匪徒与封建恶霸地主相互勾结，收罗城乡惯匪、反动会道门、土豪劣绅、散匪、地主武装、还乡的战俘、警察、兵痞、流氓等，组成股匪，进行武装暴动。当时活动在贵池的群匪有十几股，多则千人以上，少则数十人或十儿人。主要有以洪国顺（绰号洪张飞）为首的匪帮——“中国人民自济军池徽边区游击指挥部”，丁培鑫和杨勋为首的匪帮——“中国人民共和自卫军第十一军”以及吴一飞的刀匪，刘笃轩（又名刘德宣）的股匪，流窜在贵池沿江一带的刘东勋（绰号刘小拉子）残匪等。其中组织比较健全、人数较多、危害严重的是以洪国顺为首的土匪组织。这些土匪武装妄想颠覆人民政权，恢复反动组织，企图策应国民党部队反攻大陆。

贵池全境解放，国民党在贵池的组织潜伏计划被打破之后，敌特人员首先观望，继而积极暗中联络，发展组织，用假自首的手段争取合法的身份和地位，探底细，待机作乱。他们借收集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枪支为名大肆筹集枪支弹药武装自己。股匪还趁大军

继续南下，贵池武装力量不足之机，纷纷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进行公开暴动。1949年6、7、8月份，武装匪特在贵池活动最猖狂，活动范围遍及贵池的山地、湖沼以及县与县交界地区，继而向中心区发展。不断窜扰袭击乡政府、偷袭区乡地方干部；绑架、杀害基层干部和群众；抢劫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到处布设情报网，搜集情报；恢复和建立反动政权机构。

1949年5月，青阳西馆股匪暴动，刘街地主恶霸吴一飞为了响应西馆刀匪，率领众匪徒在贵池刘街一带暴乱。5月25日，朱鹏、吴一飞、刘作波、姜保良等匪首率两个营包围了驻殷村姚解放军山东南下民兵团，致22人牺牲，8人被俘，并袭击刘街乡政府，妄图配合青阳西馆刀匪夺取贵池、青阳、至德县城。

1949年6月30日，洪国顺趁至德县葛公区政府干部赴县开会之机，围攻区政府。当时留在区政府的仅有武装部长王平1人，王平使用多枪，顽强坚守，激战多时，众匪无法靠近。不料炊事员通匪，打开后门，匪徒一涌而入，王平腹背受敌，不幸牺牲。股匪劫去机枪1挺、手枪1支，步枪8支，子弹2箱，电话机1部。

1949年7月8日，洪国顺趁贵池县小河口区政府干部去县城参加征粮会议之机，调集大批武装匪徒，于是日下午袭击该区政府。区中队长黄小毛率领留守的6名战士顽强坚守，黄小毛头部受伤，趁夜幕掩护，突出包围圈。股匪进占后，枪杀了未及突围的电话员、通讯员3人和群众1人，抢去子弹13箱、手榴弹100枚及军衣、毛毯等物资。接着，这股土匪又占领了杨坑、灌口等乡公所。

1949年7月29日，洪国顺第七大队长黄国隆亲自率领第七大队全部匪徒攻打吴田乡政府，抢去许多物资。同日下午，在桑树店劫公粮800余斤、步枪2支，抢杀枞阳区小队战士1人，捕去小队人员1人、保长1名。

同年8月，土匪刘笃轩和刘本生将公安局在刘街乡执行侦察任务的执行股长吴建中同志捕后交给洪匪，被洪匪枪杀于坦湾。在灌口乡工作的南下干部赵俊连同志亦被土匪杀害。1949年9月2日，土匪又袭击了白洋区政府。

1949年6月开始的土匪暴乱给山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匪徒盘踞的地区，到处是一片恐怖的气氛。贵池的杨坑、丁香（现属石台）、灌口、葛公（现属东至）、小河（现属石台）、横渡（现属石台）等区、乡政府均遭土匪袭击，枪支被劫，粮食被抢，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者达20余人。刚刚解放了的贵池人民，又落到匪徒的魔掌之中。

剿匪斗争的胜利。为了消除新生革命政权受到的严重威胁，保卫胜利果实，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社会治安，针对贵池的严重匪患，在中共池州地委统一领导下，根据地委社会部长会议精神，采取了有计划地进行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清剿，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民主反霸运动，把剿匪与反霸斗争结合起来，向匪特及一切反动分子发动进攻。1949年8月，中共池州地委、军分区根据当时的匪情、社情以及池州地区的灾情，对剿匪反霸斗争以及生产、救灾等工作提出了建议，并向皖南区党委、行署、军区作了报告，

请求指示。报告迅速得到上级的批准。不久，华东军区调野战军二十五军七十四师至皖南剿匪，以一个团进驻池州地区（另一个团驻徽州），配合分区的武装，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歼灭洪国顺等匪徒，以利解放区生产、建设的开展。

吴一飞刀匪的覆灭。清剿吴一飞刀匪（注：“刀”即大刀会组织）是贵池开展剿匪斗争的序幕。吴一飞家住贵池县第八区太平村（现梅街镇），是当地的地主、恶霸，曾受训于伪总部教导队，后又当过国民党军官。1947年回乡任保长和乡长直至解放。1947年10月，吴一飞率百余名国民党士兵到源溪村杀共产党游击队战士20余人；1949年又在姚村杀革命积极分子2人。人民解放军过江后仍不肯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吴一飞先组织原乡警人员拦路抢劫，后又勾结伪保长，在青阳县西馆村建立大刀会组织，其番号为“国防部皖南人民抗敌自卫军”，任第五团团长，负责贵池方面的反革命活动。1949年5月25日夜，吴一飞公开暴乱，带领刀匪500余人，突然袭击驻双溪殷村山东随军南下的民兵团，杀死杀伤兵团战士40余人。

按照中共池州地委部署，命令查富德、陈文堃率军分区的独立团两个营共五个连约700余人，同青阳县武装共约1500余人，于5月27日开始进剿西馆刀匪。剿匪部队从贵池经过小九华开进杜村乡畈村罗家，距西馆十里，半夜以后，部队迅速进入战斗阵地港浜弄。天将亮时发起进攻，枪声激烈。这时大刀会蜂拥出村，以出击队形向港浜弄冲过来，刀匪装神弄鬼，摇旗呐喊。剿匪部队依据港

浜弄有利地形，迎头痛击匪群，匪首刘作波、刘作模当场被击毙。此次战斗毙俘刀匪 300 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千余件。除匪首吴一飞、朱鹏、朱穆宗潜逃外，猖獗一时的刀匪宣告覆灭。吴一飞逃脱后投靠匪首洪国顺。1949 年 10 月 28 日洪匪被剿灭，吴又潜逃芜湖、宣城一带继续进行反革命秘密活动。1950 年 9 月 21 日吴一飞在宁国县被抓获，1951 年 3 月被贵池县法院判处极刑。

洪国顺土匪的覆灭。土匪洪国顺，绰号洪张飞。贵池县四区莘田乡岩山嘴（现属石台）人。自幼流浪贵池丁香一带，推平板车贩卖香油为生。后参入青邦，勾结了恶霸陈鼎彝，横行乡里，结伙抢劫，当了土匪。国民党无可奈何，只得“封店招安”，任命他为贵池县第四区署联防大队长，统管占坡、大演、丁香、莘田、唐田、牌楼、高坦等乡警队。从此，他更加猖狂，积极参加镇压贵（池）秋（浦）东（至）人民的革命斗争活动，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1949 年 4 月渡江战役胜利，贵池全境解放，洪国顺玩弄反革命两手，他一方面向池州军分区投降，表示服从解放军指挥，决心立功赎罪；但另一方面却图谋不轨，把解放军渡江时国民党军队在殷家汇地区遗弃的武器，秘密收集储藏起来，并通过青邦组织，暗暗恢复乡保政权，建立情报网，组织武装，待机而动。1949 年 6 月 30 日晚上，洪匪公开暴乱，趁各区乡干部去县城参加会议之机，突然袭击并占领了小河口乡政府，接着又袭击了贵池杨坑、灌口；至德平原；石埭横渡乡政府。使上述乡政府枪支被劫、粮食被抢，干部、群众被其惨杀 20 余人。同年 7 月石台、贵池、至德 20 余乡为洪匪所控制。

他认为暴动时机已成熟，于8月份成立了所谓“中国人民自济军池徽边区游击指挥部”，洪国顺任少将总指挥，下设13个大队，6个直属中队，1个挺进支队，共2000余人，其中武装股匪860余人。为了进行破坏活动，策应国民党“反攻大陆”，专门成立“义勇队”。

为了迅速剿灭洪匪，在剿匪的第一阶段，首先以压倒优势兵力，展开猛烈的军事清剿，形成军事清剿高潮，创造开展政治攻势的良好氛围。在中共池州地委、池州军分区统一领导下，1949年9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第二二一团，池州军分区独立团及贵池县大队，在公安部门配合下，采取分兵合击的战略，进剿洪国顺大本营丁香树胡村。剿匪部队自贵池分两路开进，一路从殷家汇，奔袭灌口、牌楼，先头连在牌楼街遭洪国顺股匪伏击，经战斗，歼其第四、六大队各一部，余匪溃退丁香，进剿部队牺牲指导员1人、战士3人。另一路经青阳向高坦、留田、横船渡等地合击，抓获洪国顺股匪政治部主任费尔隐等一批骨干分子。当进剿部队进至胡村前的一座石桥附近时，遭股匪疯狂抵抗，部队前进受阻。这时，另一路进剿部队赶到，于是集中火力攻打桥头顽匪。进剿部队派出尖刀班，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强行冲过石桥，占据有利地形，压制了顽匪火力点，使进剿部队得以迅速过桥，压向胡村。与此同时，邻近县、区地方武装为配合围歼丁香树洪匪，由至德向项家街、丁香树方向搜剿，堵击。股匪见大军压境，顷刻土崩瓦解，争向龙泉、库柏山一带逃窜。丁香围歼战，历时14天，全歼洪国顺股匪建制中队、第一、七、八、十大队及挺进支队，第二、三、五、六

大队主力大部被歼，残部在逃。其盘踞的 20 余乡 12 万人民获得真正解放。

在剿匪的第二阶段派出精干部队跟踪追击，搜捕散匪。1949 年 9 月 14 日，洪国顺股匪主力大部被歼后，余部化整为零，继续在丁香一带活动。依照中共池州地委和军分区指示，进剿部队根据匪情变化，从 9 月中旬开始，组建精干武工队，深入土匪曾盘踞的老窝丁香树、牌楼、高坦一带，与驻地剿匪部队一道进行清剿。这些地区的部队既有清剿任务，又有支援附近武工队的任务，驻军和武工队互相支持，相互协助。除此之外，二二一团和军分区派出侦察小分队，积极活动于驻军与武工队之间。这样既可以达到不使股匪有空子可钻，又可以防止散匪有存身之处，得以喘息。在部队翻山越岭，日夜搜捕的同时，紧密结合反霸斗争。按照搞一村，清一村，搞一乡，清一乡的要求，发动群众提供所有恶霸、土匪、道会门等首领的线索，表示一定将匪首洪国顺捉拿归案，不留后患的决心。在匪患较为严重的地区，形成了到处皆兵，到处清剿的局面，使残匪毫无喘息之机。洪国顺残匪在遭到解放军剿匪部队连续的歼灭性打击之后，内部极度分化动摇。部分大小匪首开始考虑自己的生命家业，不愿继续跟随洪匪作绝望的流窜。下层匪众由于剿匪部队连续追击，长期在荒山野地里日夜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胆颤心惊，恐慌动摇，感到毫无出路。这样以来，给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匪众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事清剿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两者密切结合。在大力开展

政治攻势过程中，一方面广泛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一方面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及社会力量，针对土匪的思想状况，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土匪家属座谈会，通过土匪家属、亲友，规劝土匪投诚自新。令已投诚的土匪立功赎罪。同时，大量张贴标语于各地交通要道，大造剿匪舆论，大力宣传剿匪政策。表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剿匪决心，打消群众顾虑。土匪流窜地区的广大群众，对土匪非常痛恨，在内心里极盼望人民解放军解救他们，但由于土匪特务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对人民政府的政策半信半疑，有些群众当心接近解放军之后，土匪卷土重来，生命难保。根据这个情况，解放军表明不肃清土匪决不离开态度。同时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讲明政策，解除群众顾虑。并教育群众起来防匪自卫。二二一团各连分别召开群众大会 25 次，到会人数达 1500 多人，深入到户进行个别宣传共 300 多户 1000 多人。在强大政治攻势下，高塘、上明庵等匪众即纷纷投降，仅高塘一地就有 16 名土匪向剿匪部队投诚。

同时，剿匪部队和下乡干部，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提出且做到“五不走”（即所住的老乡家水缸不挑满不走，借东西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不走，不上好门板不走，不打扫干净不走）、“五不怕”（即不怕扑空，不怕夜路、不怕爬山，不怕路远、不怕日晒雨淋）及“四要”（即要服从、要沉着、要勇敢、要机智），向群众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为做好发动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干活，在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二二一团，一个多月时

间，抓紧战斗空隙帮助群众挑稻、挑水、打稻、割稻、打柴、挖地，结果群众给驻剿部队反映了好多匪情。为进一步打击土匪提供了方便。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自卫，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如贵池丁香树、灌口、崇义、牌楼等 11 个乡，在 7、8 月间都是匪患较为严重的地区，经过 9、10 两月全面清剿后，成股土匪已基本上消灭。由于同时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农协会（发展会员达 1 万多人），废除了伪保甲，建立了人民政权，群众的阶级觉悟已经初步提高，同时也有了建立武装防匪保家的要求。如崇义乡农民自动组织纠察队，日夜轮流站岗放哨，捕捉散匪；留田乡武装民兵捕获土匪 42 名，缴获步枪 3 支。由于部队剿匪、群众剿匪形成了强大合力，使得土匪无藏身之地，怎么也逃不出军民联合剿匪的天罗地网。

在迅速夺取剿匪斗争胜利的过程中，还曾得到浮梁军分区在兵力和情报方面的有力支援。如浮梁分区一次匪情通报，使池州军分区独立团能及时将从浮梁窜至东流境内的股匪（约 50 余人）全部歼灭。

在贵池剿匪斗争中，池州军分区还重视城市“反特”斗争。分区政治部曾在贵池城内，将国民党隐藏在贵池县邮局的一个特务分子清查了出来，这对切断洪国顺匪徒相互之间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多次小型战斗和政治攻势，至 10 月底，生俘其上校参谋长郝斯龙、高级参谋徐斌等 116 人（其中含汪汉股匪皖南支队仇照

田)，上校顾问陈鼎彝、第五大队大队长方可元等 423 人先后向进剿部队投诚。除匪首洪国顺及少数残余在逃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剿匪的第三阶段，追捕洪国顺。匪首洪国顺及其子洪泽江带 2、3 名亲信昼伏夜出，到处流窜。白天躲在山岭、茅棚、坑洞，利用其亲戚、徒弟为其送饭。每当夜晚转移时，采用专人在前探路，自己远距离跟随，一有情况，立即逃跑。追捕部队曾连续追捕 20 余处，均扑空而返。洪泽江被追捕部队侦察排捕获后，洪国顺采用单人行动，一夜移动多处，在豪猪垅、汪西垅、陈家塘一带躲藏，最后窜至雷岭。10 月 27 日，追捕部队根据徐少基（被争取过来的一名匪徒）的秘密报告，立即派出 20 余人秘密行动，于 10 月 28 日 21 时，将洪国顺包围于莘田乡东庄保洪家大院，洪国顺自知恶贯满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畏罪自杀（一说被击毙）。至此，皖南地区最大的股匪“人民自济军池徽边区游击指挥部”被彻底消灭。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消除群众顾虑，将洪匪被击毙的照片放大复印，散发到贵池山区及周边地区，并将洪国顺的尸体拖到殷汇镇，示众 3 天，使群众确信人民解放军已彻底肃清了匪患。歼灭洪国顺股匪标志着贵池剿匪斗争的基本胜利。。

在剿灭土匪的过程中，不仅前线部队奋力作战，而且贵池县公安局也积极配合军事清剿，为肃清潜散的武装匪特做了许多工作。第一，全力加强对潜散武装匪特的侦察、调查工作。调查潜匪线索，侦察其活动，一有证据或有把握时立即破案，迅速审讯以扩大战果，务使潜散的武装匪特在县境不能长久生存。第二，选择坚强的骨干

分子、可靠的基本群众、有控制条件和有把握的其他人员，到匪徒内部去，侦察匪特在县境的耳目、交通联络、军火物资来源、匪特活动规律等内部情况和内部矛盾。同时在匪特活动区及其周围地区建立广泛的秘密群众举报网，保证剿匪部队能及时获得土匪方面的确实情报。第三，在部队出动清剿时，公安局领导亲自带领一定数量的侦察人员随同前往，调查、审讯俘虏，打击匪特耳目。第四，县公安局组成以侦察股长张文秀为首的一支政治坚强、作战勇敢、能吃苦耐劳的便衣侦察突击队，携带短枪深入匪区侦察情况，捕捉小股土匪或零星散匪，尾追大股土匪，配合大军清剿。1949年11月初，池州侦缉队派侦审股胡永让同志率领一支精悍的侦察队到丁香一带缉捕潜散匪特。反特队员爬山涉水钻洞穿林，与以张少寅、萧庸才、何其华为首的武装匪特在深山里周旋了近1个月，终于在12月6日夜于贵池杨坑附近山林里，将这伙匪特包围了。经过激战，这股匪特被歼灭，无一漏网。但在这次战斗中，侦察队员杜杨生同志头部中弹，不幸光荣牺牲。第五，遵照上级指示，大胆地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去直接开展瓦解匪特工作。如对俘虏经过短期教育，以“放虎归山”的方法或利用匪首（首恶除外）争取部下的方法，或通过匪属劝告其亲友的方法，去争取瓦解土匪。这些做法给匪特的威胁、打击很大。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不少匪特投降，有的还有立功赎罪的表现。如洪匪被进剿部队击溃后，洪匪政工处长、政治室主任被投诚的宋长友将其诱出捕获。第六，集训

投降的土匪。1949年10月15日，进剿部队将投降的119名洪匪匪徒集中在贵池城内，配以必要的警卫看守人员，由公安干部分别担任小组长，进行集中教育和个别谈话，启发他们立功赎罪，打击个别死不改悔分子。教育转变了大多数匪徒的立场，起到了挖掘匪根，彻底肃清残匪的目的。经过20余日的集训，弄清了洪匪的上下层组织领导人员结构关系（其中上层36名，中层38名，下层119名；经清剿俘虏9名，自动或经过教育投降的62名，被迫投降的48名），打破了洪匪所谓的“同山弟兄”和“亲信学生”联盟，暴露了土匪的18个换帖的兰谱弟兄，了解到各股匪罪恶的种种材料。为进一步肃清和处理土匪奠定了基础。在立功受奖政策感召下，不少土匪坦白出不少隐藏的物资武器和潜逃人员。第七，结合清剿，发动群众揭露特务组织，对国民党党、团、特分子进行登记，使暗藏的特务组织和主要党、团、特人员暴露在政府和群众视线之内。同时发动群众管制重要的国民党党、团、特首要分子。正是在公安人员的积极配合下，剿灭洪匪、清剿其他匪特工作迅速取得了胜利。

从1949年6月30日洪国顺公开暴乱至同年10月28日被击毙，其所属的十个大队长、六大处（室）主任，除第十大队长孙干逃到江北后被打伤外，均无一漏网。在进剿中，投降和被俘的土匪有119名，挖出潜伏的匪特人员110名，被镇压的罪大恶极分子136名，被判刑的179名，被管制的68名。缴获：六0炮2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8挺、手枪22支、各种长枪210余支、各种子弹26300多发、稻谷146石、香油30斤、食盐30斤、收音机1台、棉军衣

20 套、菜籽 7 石、草纸 1 担、白土布数疋、军锅 10 多口、军毯 3 条及其它一些物资。

张少寅、丁培鑫等土匪的覆灭。1949 年 12 月 6 日，池州公安局侦察队在贵池杨坑附近山林里捕获首匪张少寅、肖庸才、何其华等 25 名匪特。收缴子弹 502 发、枪支若干支、稻谷 11 万斤及其它物资。

1950 年 6 月 23 日，公安机关一举破获“皖南华山独立大队”土匪组织，26 名匪首、匪徒全部落网。此外，盛成功股匪一百余人，在贵池沿江一带流窜骚扰的刘东勋股匪八十余人，均被歼灭。同年 12 月又破获“中国人民铲共自卫军第十一军”匪特组织。这股武装匪特，由国民党军长丁培鑫，指使副军长兼第二纵队司令杨勋于 1949 年 9、10 月在东流大渡口、贵池唐田发展组织的。先后在大渡口、唐田成立两个支队，下辖八个大队。主要活动在大渡口、唐田、牌楼、丁香等地。经过清剿，捕获其首领丁培鑫及大中小匪首 207 名，缴获长枪 16 支、短枪 2 支，子弹 500 发、刺刀 4 把、派令 38 张、关防 4 个、戳记 4 个。

至此，贵池剿匪以全面胜利而结束。

二、贵池反霸斗争

恶霸地主的反攻倒算。贵池，由于是接管区，人手不足，政治薄弱，只能用国民党留下的乡、保长维持现状，政权很不稳定。在接管地方政权和接收起义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乡村政权，表面上对人民政府服从，实质上是在掩护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党、政、军人员，

暗中储藏武器、物资等；各地的恶霸又同土匪沆瀣一气，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恶霸地主，反动土绅主动为土匪送情报，带路抓捕人民政府的干部和群众；他们还散布谣言，威胁百姓，制造混乱。如贵池第七区占坡村（现属石台县）恶霸陈上书于1949年6月间，趁占坡乡乡长查怀民赴县开会之机，将乡公所全部枪支（步枪14支、子弹一部分）和其它财物送与洪匪，并勒索百姓大量油、盐、大米和布鞋，资助洪匪。

贵池牌楼恶霸陈鼎彝一直勾结洪国顺土匪，在洪匪被消灭后，仍作垂死挣扎。陈鼎彝早在1935年，在站上杀害3名红军，1949年又活埋人民解放军两人，洪匪暴乱时任常备大队长。1949年10月的一天，殷汇区干部张福友、陆常富等人在牌楼站上祠堂召开动员剿匪反霸群众大会，陈鼎彝便亲自出马率第六大队王相涛、吴宝三兄弟等土匪冲击会场，首先开枪打死哨兵，企图抢劫枪支。这时保卫会场的六名战士奋起反击，把陈鼎彝队伍赶跑了，打散了，当天下午陈跑到长丰村横山一带（今属石台县）。傍晚时分，肖坑剿匪部队在陈慧良同志指挥下，分兵三路向竹塘、长丰、横山进攻。部队在横山发现了陈的部队，立即组织部队包围了陈匪残部，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陈鼎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手投降。这次共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冲锋枪20多支，步枪100多支，俘虏100多人。取得了民主反霸的重大胜利。陈鼎彝后被押送贵池监狱，因血债累累，民愤极大，被枪决。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联防区主任盛成功窜到高坦斗溪杨棚，

与当地恶霸任先荣相互勾结，为达到长期霸占农民曹富林之妻，让任先荣及其同伙在山脚下一个野猪棚里将曹活活卡死。

殷汇区恶霸蒋兴斋原是国民党贵池县第三大队副、联防大队长。他无恶不作，亲手杀害新四军游击队两人，并放火烧毁了殷汇街的一些住房。唐田乡恶霸江一勤，曾任过伪乡长，此人心狠手辣，反动透顶。1948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把一名解放军战士抓到后，拖到白云洞，用煤油倒在身上将其活烧死。他还采取同样的残暴手段，致十多名穷苦百姓惨死。蒋兴斋、江一勤等一些土豪、恶霸地主在人民政府开始发动群众、建立村级政权时，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方面竭力威胁破坏民主政府基层组织，杀害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以镇压刚刚抬头的群众，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控制基层民主政权。其方法是：①伪装积极，混进革命阵营，窃取领导权。如费尔隐，解放后伪装积极，骗取人民政府的信任后任高坦乡乡长，洪匪暴动时，其原形毕露，带通讯员李文耀携步枪及电话机在高坦街鸣枪叛变，任洪匪政治室主任。还派匪徒陈维新等十余人分任洪匪盘踞地区各乡乡长，恢复伪保甲，建立伪政权系统。组织政工组，印刷、散发大量标语口号进行反动宣传，煽动流氓及落后群众参加土匪；②“策反”。1949年8月上旬，洪匪派匪徒葛希儒，到东至人民政府大渡口区武装小队，煽动该区小队8人带枪8支投降洪匪。洪匪因不放心，第二天即予以缴械，并枪毙了其中四人；③秘密威胁积极分子，以身家性命为控制条件，强令其接受反动任务；④大肆进行欺骗性宣传。说什么“第三世界”大战爆发了，国民党反攻

了，共军失败了，就剩下这一块了，别的地方共军已被国军消灭了。针对政府发动群众征借粮食，就制造谣言：“共产党不行了，现在要粮食准备逃跑”、“要粮食是开头，以后什么都要。”妄图制造混乱，以煽动、欺骗群众，使群众对共产党新生政权产生怀疑，隔离新生政权与群众的关系，使群众不敢接近解放军和区乡干部。

为了彻底打垮恶霸地主的反动气焰，从1949年9月份开始，县公安局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县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控诉其剥削、压榨人民的滔天罪行。

反霸斗争的胜利。1949年9月21日，县委召开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会议阐明反霸的重要意义；明确什么是反霸和进行反霸斗争的策略与步骤。从此，反霸斗争在全县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展开。

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有重点的清查恶霸的斗争。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结束后，各区根据县委的部署，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有重点地开展清查恶霸的斗争，即先从影响恶劣、剥削手段较残酷的大恶霸入手，擒贼先擒王。由于各级党政组织积极领导和农民代表的努力，全县共有16个乡53个村14000多农民投身到反霸斗争的洪流中。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揪出恶霸37名，其中一区9名，二区7名，三区3名，四区5名，五区4名，六区4名，七区4名。他们当中的大恶霸有：城关的吴寅良，乌沙的陈维汉，殷汇的纪振之、蒋兴斋，唐田的江一勤，吴田的王洪章，栗阳的章尉华，十字路村的方克元，乌石的吴绰南、柯玉震、韩佩安，罗城的胡文华、胡开州等。

在清查恶霸的斗争中，注意总结经验，纠正偏向。从全县第一阶段反霸斗争的情况看，成果显著，但工作发展很不平衡，甚至在局部地区还出现一些错误倾向，如：有的村反霸同贪污算帐混淆起来；有的村扩大了打击面，树敌过多，把不够恶霸条件的人也当作恶霸去斗；也有的村对重大恶霸没有实行狠狠打击，如七区大演乡碧岩村只反了一个三等小恶霸等。对此，县委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检查评比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并将“有关反霸斗争的工作总结”印发全县各地，从而基本上纠正了上述例举的倾向和不妥的做法，保证了民主反霸斗争顺利、健康地向前发展。

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带战役性质的联村反霸斗争。在开展斗争的过程中，大多数恶霸不同程度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接受了群众的斗争，但也有一些恶霸不满，暗中抗争。为了打击恶霸的气焰，扫除反霸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广泛号召发扬阶级互助，宣传“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力量大”的思想。一些区如城关、殷汇、五区、七区，都召开了规模较大的联村斗争大会，让群众上台诉苦。这样做，效果显著。一些原来抗争的地主恶霸纷纷向人民政府认罪，如五区崇义乡乌石村联村斗争恶霸吴绰南，吓坏了附近中小地主恶霸，地主吴敬江等主动找干部交待罪恶。

在反霸斗争中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夺回被地主恶霸剥削去的农民物资，维护农民的利益。到一九四九年底，全县共收回稻谷186000多担，其中一部分分给农民，另一部分作为征收的公粮。还收回了一部分房屋、田地等，在房子、田地、稻谷分配上，各区都

制定了分配原则和分配方法。如一区的分配原则是照顾苦主和受害最深的诉苦人。分配方法是：依家庭贫、中、富的不同情况，分配不同数量（即：贫农多、中农少、富农无）；照顾反霸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农协会会员和军烈属。例如收回一区域关恶霸地主吴寅良的 120 担稻谷，85 人分得了粮食。收回四区地主恶霸章尉华 40 亩土地，使 79 户农民获得了利益。县城的杏村、古舜、楼山三个街道也有 270 人分得了 15000 斤果实米。这样做，调动了广大人民反霸的积极性。

把反霸斗争与减租减息、征收公粮这几个环节结合起来抓。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是反霸的目的之一，而完成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任务，反霸又是重要的手段，三者相得益彰。县委在《八个月工作总结》中指出：“减租……结合反霸，其中民主反霸又是迅速完成任务的主要环节”。事实证明，凡是很好地开展反霸斗争的村庄，征粮和减租减息工作都完成得很好。五区崇义乡召开斗争恶霸吴绰南后，原来叫穷的地主黄耀华、吴敬江主动交公粮，黄耀华一天就交公粮 30 担。全乡征收公粮任务顺利完成，减租减息也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经过努力，全县的反霸斗争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于完全没收大、中、小地主恶霸非法所得的财产，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是在后来的农村土改运动中实现的。

第三节 贵池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人民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为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贵池各机关、部队、学校及各行各业，全面展开了制国旗、学国歌、编墙报、排节目、搞卫生、组建参加庆祝大会队伍等筹备庆祝活动。

10月1日，秋高气爽，阳光灿烂，贵池县城到处红旗招展，标语满墙，主要街道张灯结彩，机关、部队和各单位彩门争艳，庆典的锣鼓响彻全城，呈现一派节日景象。中共池州地委、池州专员公署暨中共贵池县委、贵池县人民政府在城内东门大操场隆重举行了盛大空前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驻池部队、机关干部、工商业者、厂矿工人、学校师生、民兵武装和贵池城内七街（九华街、孝肃街、市心街、牌坊街、古舜街、郭西街、楼山街）三村（贵口村、齐山村、杏花村）的市民和农民数千人。人人手执各色小彩旗，整队有序入场，按划定的区域就地入坐。会场彩旗飘扬，歌声嘹亮，口号声此起彼伏。主席台上方挂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的红色大幅横标，主席台正中高挂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画像两旁是巨幅鲜艳的五星红旗，台两侧贴有大幅竖标，台上两侧插满了五色彩旗，广场中央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当贵池县县长李绍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掌声雷动、鞭炮齐鸣，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

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池州军分区武装部

队、民兵武装在前，工人、学生、工商界、农民和市民代表在后，腰鼓队、锣鼓队、链枪队、高跷队、秧歌队和各种民间歌舞表演队，每遇街头广场各种民间歌舞表演队均作即兴表演。与此同时，乌沙区、殷汇镇、观前区、梅街区、丁香区（今属石台县）、小河区（今属石台县）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从此，贵池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历史性的新的伟大征程。

附 录

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贵池区组织史

(1928 冬—1949.10)

第一章 土地革命时期

一、党的组织设置

(一) 中共贵池特支 (1928 冬—1930.8)

1928 年春, 中国共产党党员凌霄奉命回故乡贵池建立党组织, 在安庆党组织的领导下, 联系一些外地回原籍贵池的共产党员, 在这年冬天于县东郊流坡矶创建了中共贵池特支。书记凌霄 (1928 冬—1929.6)、孙佐华 (1929.6—1930.7), 副书记孙佐华 (1928 冬—1929.6), 组织委员凌霄 (兼, 1928.冬—1929.6), 宣传委员洪人英 (1928.冬—1930.8)。始属怀宁县委, 1929 年 6 月以后隶属中共安庆中心县委。

(二) 中共贵池县委 (1930.8—1930.10)

在贵池特支的基础上于 1930 年 8 月成立了首届中共贵池县委。县委机关驻地设在县城大井头, 书记洪人英, 组织委员孙佐华, 武装委员凌霄, 宣传委员刘恩选, 青年委员周孔思, 工运委员洪久儒, 农运委员农时。下辖四个活动区域, 由专人负责。即城关区: 周孔思; 馒头区: 洪久儒; 白洋区: 农时; 梅埂区: 胡宪友。县委隶属

中共安庆中心县委。

（三）中共贵池县委（1930.10—1931.底）

凌霄、洪人英、洪久儒等身份暴露，奉命转移到外地活动，首届县委机关遭破坏。1931年10月下旬在梅龙郭港金家冲，产生了新一届贵池县委。书记胡宪友，组织委员王玉成，宣传委员陈晓钟。下辖三个党组织：即中共梅埂区委，有50名党员，书记王达仁（1930.10—1931.8）、方老五（1931.9—1931.底）；中共乌冲支部，约有40名党员，书记舒景山；中共河口支部，约有9名党员，书记陈晓钟（兼）。隶属中共新桐县委。1931年底被敌人破坏。

（四）中共贵池临时县委（1932.1—1932.11）

在贵池东乡成立，负责人韩琦（1932.1—1932.2），胡连发（1932.1—1932.3），祝某（1932.1—1932.11）。隶属中共宣城特委，中途与宣城特委失去联系。

（五）中共贵池县委（1931.9—1932.下半年）

共产党员金式诚、唐德川于1931年9月在丁香树与当地组织一起，在贵池西南部李四保建立贵池县委。县委机关驻地及活动区域均属今石台县境内。书记储鹤扬。

（六）中共贵秋东县委（1932.2—1934.下半年）

潜山请水寨暴动失利后，一批共产党员转移至丁香树地区活动。1931年3月，他们在坡里建立党支部，同年年底建立中共丁香区委。后由芜湖中心县委帮助，于1932年2月在贵池西南地区郑家村成立中共贵秋东县委。县委机关驻地活动于郑家村、留田、库

山等地。除留田地区今属贵池外，其余地区现属石台、东至县。书记吴介唐。1933年7月县委机关被破坏。

（七）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1934.4—1935.1）

由闽浙赣省委派往皖南工作的夏金良等，于1934年4月在贵秋边区的留田建立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1935年1月，中心县委发动了以郑家村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的农民武装暴动。县委活动范围大都为今石台县境内。同年2月，由于国民党贵池县自卫队的血腥镇压，贵秋东中心县委及其下属党组织均遭到破坏。书记夏金良。

（八）中共贵池县委（1932.10—1934.11）

从1930年秋开始，中共党员檀炳光按照首届贵池县委的指派回故乡留田建党。同一时期，参加潜山清水寨暴动的苏管君（又名王道荣）等共产党员，也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建立了棠溪留田党支部。1932年上半年得到了徽州工委的指导，同年10月在留田操家冲轧车口（今属棠溪镇双桥村）成立中共贵池县委。1932年冬，国民党贵池县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开进留田，身份被暴露并遭敌通缉的县委书记檀炳光奉命调离留田去皖南活动。1933年2月由檀周贵主持改组了县委，隶属于中共皖南特委领导。是年下半年遭到破坏，活动处于秘密状态。1934年2月重新恢复了贵池县委，仍属于皖南特委管辖，但不久又遭到破坏。同年下半年，县委的活动也暂时停止。书记檀炳光（1932.11—1932.冬），檀周贵（1933.2—1933.下半年），李家海（1934.2—1934.下半年）。宣传委员柯天六（1933.2—1934.2），组织委员洪小牛（1933.2—1934.2），委员檀家兴（1932.11

—1932. 冬)。下辖三个区委：中共贵池第一区委（留田一带）（1933. 2—1934. 下半年），书记柯大狗；中共贵池第二区委（西山一带）（1933. 2—1934. 下半年），书记曹金狗；中共贵池第三区委（棠溪柯一带）（1933. 2—1934. 下半年），书记徐长清。

（九）中共贵池县委（1934. 11—1935. 2）

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闽浙赣省委领导下的中共皖南江边特委将大批干部陆续分派于各地工作，在特委工作的凌大英和皖赣红军独立团参谋长檀炳光等，先后从石埭游击区进入贵池县境的留田地区。并于1934年11月在此重新建立贵池县委。书记凌大英（1934. 11—1935. 2），组织委员檀家兴，宣传委员赵海波，军事部长周炳德，肃反委员会主席方茂楷。下辖五个区委。第一区委（1934. 11—1935. 2）与县委同时建立，区委机关驻留田，书记檀金斗（先），吴压庭（后），翟少坤（再后）。第二区委（1934. 11—1935. 2）也与县委同时建立，区委机关驻西山，书记方晓东。第三区委（1934. 12—1935. 2）于县委成立后建立，区委机关驻庄村姚，书记储金福（先），李家海（后）。第四区委（1934. 12—1935. 2）。在县委成立后建立，区委机关驻徐村柯，书记陈延寿。第五区委（1934. 12—1935. 4）在县委成立后建立，区委机关驻地肖坑南阳岭，书记柯天六（先）、方玉坤（后）、徐云端（再后）。县委机关驻地活动于西山望坞村、古寺庙和坑里等地。1935年2、3月间，国民党军队七十八师、八十八师及第一路军疯狂“围剿”，导致县委活动被迫往祁门方向转移。这时，江边特委指示他们返回留田建

立游击区，但在返回途中遭到反动武装的伏击，致使领导成员牺牲或失散。一部分同志坚持在肖坑等地进行秘密活动。

（十）中共江南特委在贵池西南部地区的 下属组织（1935. 6—1936. 1）

1935年6月，在秋浦高山（今属东至县）成立了以周成龙为书记的中共江南特委，接着又分别成立了中共贵秋、贵东、贵祁县委。余文先、黄天贵、江寿康（后为黄国庆）分别为上述三县的县委书记。贵秋县委下辖五个区委，其中第五区委现属贵池境内，其余均属东至、石台县。贵东县委下辖八个区委，除第三、第五、第七区委属于贵池外，其余均属东至、石台县。江南特委及所属三县在皖赣红军的支持下，于1935年9月举行了“中秋暴动”，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组建了游击武装和群团组织。贵祁县委因未公开活动，故未参加这次暴动。193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武装疯狂反扑，镇压革命，至1936年初，江南特委及其所属各级党组织被完全破坏。中共贵秋县第五区委（1935. 6—1935. 12），书记檀接根。中共贵东县委第三区委机关驻地桥头湖，书记吴吉；第五区委机关驻地一里张村，书记张炳南；第七区委机关驻地唐田，书记汪子凤。

（十一）中共贵池支部（1934. 3—1934. 7）

从1932年春开始，中共党员胡永授根据党的指示，从皖南休宁来到青阳陵阳活动，后到贵池、青阳交界处的贵池境内茅坦、刘街、海形冲等地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1934年3月成立了中共皖南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共贵池支部，直属皖南工委领导。同年7

月13日，皖南工委遭破坏，胡永授于年底携眷回湖北，贵池支部活动也随之停止。书记胡永授（1934.3—1934.7），委员杨光辉、丁少明。

二、政权组织设置

（一）贵池县苏维埃政府（1935.1—1935.2）

1934年11月成立的中共贵池县委发动和组织了“年关暴动”并在今石台县境的高宝山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县府设在苗竹柯村，主席檀炳光。

（二）贵东县苏维埃政府（1935.9—1935.12）

隶属江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士其。下辖8个区苏维埃政权。其中候家店、乌石、石坡在贵池县境。

（三）贵秋苏维埃政府（1935.9—1935.12）

隶属江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欧阳斌。下辖5个区苏维埃政府和几十个乡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权积极发展人民武装，惩办土豪劣绅，着手领导土地委员会和贫农团进行分配土地。1936年3月，国民党反动武装围剿，县境区、乡苏维埃政权先后遭破坏。

三、地方军事组织设置

（一）县驳壳枪队（1934.11—1935.1）

县驳壳枪队由红军团干部周炳德在贵秋东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组建的。全队有8人，每人配备驳壳枪一支，主要活动在本县棠溪一带。队长周炳德，指导员毕六安。

（二）县游击队（1935.1—1935.4）

为适应斗争的形势，在驳壳枪队的基础上，建立了县游击队，队长周立本、指导员朱文贵。有步枪 9 支。各区也建立了游击小队，共 100 人左右，拥有土枪 40 支及其它武器。

四、群众团体组织设置

（一）团的组织

1、贵池县共青团（1934.2—1934.下半年）

中共贵池县委在棠溪西山汪村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县委，有团员 500 余人，书记周永清。下辖三个区团委。第一区（留田一带），书记何大狗。第二区（西山一带），书记檀秋光。第三区（棠溪柯一带），书记姓名不祥。1934 年下半年中共贵池县委遭破坏，县委活动暂时停止，共青团贵池县委、区委也暂停了活动。

2、贵池县共青团（1934.12—1935.2）

“年关暴动”时组建，约有 400 名团员。后遭敌人围剿，中共贵池县委转移，贵池团县委也停止了活动。

（二）群众组织

1、农民团（1934.12—1936.7）。1934 年，中共江南特委在棠溪一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区农民在西山、汪村成立了农民团。全县三个苏区，一村建一团，每团下设若干小组，共有团员 5000 余名。县农民团团长汪理庭、胡龙其、叶受才。1936 年 7 月，农民团中武装人员随江南红军独立团赴江西，当地其它农民团员即自行解散。

2、妇女（部）会（1934 年）。1934 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棠溪

乡建立根据地。11月，成立妇女解放会，领导贫苦妇女参加革命斗争为红军战士做军鞋等。

3、儿童团（1934年）。中共贵池县委在棠溪西山组建儿童团，由8-16岁贫苦农民子女组成，其任务是站岗、放哨，防止敌特破坏，给红军送短途信件。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

一、党的组织设置

（一）中共贵东工委（1943.9—1943.10）

1942年春，中共桐庐县委派黄建华、李德安等到贵池东部地区大同、梅埂、馒头山、观前一带秘密发展党员，开展抗日宣传，并进行小股武装活动。与此同时，中共铜青南县委指示青北工委在茅坦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观前成立了中共贵东工委，书记吴文瑞，副书记黄建华。隶属中共沿江地委。

（二）中共贵东县委（1943.底）

贵东县委是在贵东工委的基础上建立的。其活动地区与贵东工委相同。书记吴文瑞，委员朱旭华、王亚中。下辖两个区委：1、中共河东区委（1943.下半年），与贵东县委同时建立，主要活动范围为观前一带。书记金光华。2、中共河西区委（1943.下半年），与贵东县委同时建立，主要活动范围为馒头山一带。书记朱旭华。隶属中共沿江地委。

(三) 中共桐贵青县委 (1944.1—1945.9)

隶属于中共桐庐县委领导的桐东区委机关转移至贵池的梅埂金家冲,并划归贵东县委管辖,这样贵东县委的范围就扩及桐(城)、贵(池)、青(阳)三县部分地区(1943年底以前)。1944年初,贵东县委更名为中共桐贵青县委。县委机关驻地观前四房包村。书记吴文瑞,委员朱旭华、王亚中、许章法。隶属沿江中心县委。下辖三个区委。1、河东区(1943.秋—1945.9)。其区域是九华河以东的观前、梅埂、茅坦一带。1945年初改为茅坦区委。书记金光华。2、河西区(1943.秋—1945.9)。其区域是九华河以西的馒头山一带。书记朱旭华(1944.1—1945.9),组织委员管其明(1944—1945)。3、太朴区(原敌前区更名)(1944—1945.9)。它的活动区域是太朴山一带。书记王亚中(兼,1944—1945.9)。

(四) 中共贵西临时工委 (1942.4—1944.4)

1942年4月,中共桐庐无县委曾派张琴(又名鲍春武)到贵西的三万圩地区发展一批党员,并建立了三万圩支部,但不久被破坏。1944年初,沿江地委抽调桐庐县委(又称湖滨县委)、桐怀潜县委和桐贵青县委一批干部到贵池西部地区开辟新区。4月组成中共贵西临时工委,书记马守一,委员张伟群、张尔庆。

(五) 中共贵西工委 (1944.5—1944.10)

1944年5月贵西临时工委改为贵西工委。书记马守一,副书记许章法,委员张尔庆、谭兆屏。下辖五个区委。1、中共贵西第一区委(1944.5—1944.10)。区址设在晏塘桥。书记何晓东(先)、

周暮樵(后),委员程希文、王南山。2、中共贵西第二区委(1944.5—1944.10)。区址设在洪铺。书记杨友华。3、中共贵西第三区委(1944.5—1944.10)。区址设在高脊岭。书记王武秀。4、中共贵西蛟口区委(1944.9—1944.10)。区址设在吴田铺。书记周南。5、中共贵西八都湖区委(1944.9—1944.10)。1944年初,马本农在八都湖(今属东至县)地区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高家嘴成立了党支部。贵西工委开辟了这个地区,并在同年9月成立了八都湖区委。书记马本农。

(六) 中共贵桐县委(1944.11—1945.9)。

1944年11月沿江中心县委决定将贵西工委(此间桐怀潜县委正将其管辖的桐南、广济圩地区划归贵西工委)改为中共贵桐县委。县址在晏塘桥附近。书记马守一,副书记陈定一,委员许章法(兼组织部长)、黄绍成、马数鸣。下辖九个区委(工委)。1、中共晏塘区委(1944.5—1945.9)。区址在晏塘桥。到1945年9月,已建立8个乡党组织和乡政权。书记周暮樵(1944.11—1945.9),副书记肖文(又名陈庆绚,女),委员路世英(女)、王南山、田国儒。2、中共洪铺区委(1944.5—1945.9)。区址在洪铺。到1945年9月,已建立5个乡民主政权。书记杨友华,副书记周燮衡(1944.11—1945.9)。3、中共高岭区委(1944.5—1945.9)。区址在高脊岭。到1945年9月已建立七个民主政权。书记王武秀(1944.11—1945.2)、马数鸣(1945.3—1945.9),副书记钱新民(1944.11—1945.9)。4、中共蛟口区委(1944.9—1945.9)。区址在吴田铺。

到1945年9月，已建立起4个乡党组织和民主政权。书记周南，副书记张福海，委员叶诗贵（1944.9—1945.9）。5、中共八都湖区委（1944.9—1945.9）。区址在高家嘴。到1945年9月，已建立起5个乡政权（今属东至县）。书记马本农（1944.9—1945.2）、王武秀（1945.3—1945.9），期间唐曙光代理一段时间书记。6、中共桐南区委（1944—1945.9）。原属桐怀潜县委领导，1944年9月划归贵西工委，同年11月隶属贵桐县委。桐南区为隐蔽的游击区，没有成立民主政权。书记叶树森，委员江一波、周军（1944—1945.9）。7、中共广济圩区委（1944.9—1945.9）。原属桐怀潜县委，同年11月改属贵桐县委管辖。广济圩为隐蔽的游击区，没有建立公开的抗日民主政权。书记储玉怀（1944.9—1945.9）。8、中共一、二、三区工作委员会。贵桐县委将贵西一（晏塘）、二（洪铺）、三（高岭）三个区合并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书记胡昌耕，委员张格、马数鸣。9、中共贵石工委（1945.3—1945.9）。1945年初，贵桐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作出了向南发展，打通皖南区域联系的部署。这年2、3月间派杨友华等率一连武装，活动于杨堪口、沟汀等地（今属石台县），正当向黄山发展之际，日本宣布投降，新四军北撤，贵石工委活动遂告停止。书记杨友华，委员米济群、钱世庆

二、政权组织设置

（一）贵东行政办事处（1943年底）

同贵东县委同时成立，主任包西树，副主任左大钧。

（二）中共桐贵青县委领导下的民主政权（1944.1—1945.9）

1、河东区政府和 8 个乡民主政权。区长金光华（1944.1—1945.9），副区长许子于（1945 初—1945.9）。①茅坦乡。乡长左炳根、左鹏程、胡畅乐（1944 年 9 月以后），指导员吴尉桥（1944 年初）、王玉彪，副乡长徐均平（1944 年 9 月以后）。②香山乡。乡长姜云汉，指导员汪玉彪、许信，副乡长许信。③大同乡。乡长周子俊（1944 年初—1945 年 4 月）、周曙东，指导员钱朗一（1944 底），副乡长徐均平（1944 年初—1944 年 8 月）。④观前乡。乡长许海波（1944 年），指导员汪玉彪（1944 年 1 月—1944 年 8 月）、吴蔚桥（1944 年 9 月）。⑤梅埂乡。乡长周曙东。⑥东湖乡。乡长周子俊（1945 年）。⑦祠堂乡。乡长，姓名不详。⑧大王庙乡。乡长周子俊（1945 年 5 月—1945 年 9 月）。

2、河西区政府和 4 个乡民主政权。区长朱旭华（1943 年底—1945 年 9 月）。①馒头山乡。乡长何义平。②江口乡。乡长姓名不详。③流坡乡。乡长姓名不详。④老屋董乡。乡长姓名不详。

3、太朴区政府和 4 个乡民主政权。区长包西树，副区长郭泽甫（1945 年初—1945 年 9 月）。①马衙乡。指导员钱根银、钱郎一。②白沙乡。乡长钱东五、刘爱杰，指导员管启明。③石琅乡。乡长郭泽甫（兼，1944 年）、郭志坚，指导员洪光烈（1944 年）、钱郎一。④太朴乡。乡长姜源达（1945 年.上半年—1945 年 9 月），指导员钱东五。

（三）沿江行政办事处（1944.10—1945.9）

在贵西风口陈成立。主任张格，副主任马数鸣，设有财经分处，

处长赵平，副处长魏放。下辖粮食科（科长史炳之）、财政科（科长朱曦）、税务科（科长宇旭南）、会计科、行政科（科长王文正）、军事科（科长吕多瑞）、公安科（科长谭兆屏）。沿江办事处的机构是管辖县的，而贵西地区是无县级政权的机构，其辖区为晏塘、洪铺、高脊岭、蛟口，八都湖等7个区29个乡民主政权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沿江行政办事处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和汪伪军三方包围下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统一战线、扩军、征粮，同时领导农民加强生产、推进减租减息。当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无固定驻地，强调干部作风要军事化，工作人员随手提一竹篮，内装公文、印鉴、手枪，人民称之为摇篮政府。1945年9月，皖南新四军奉命北撤，沿江行政办事处及区、乡政府停止了工作。详见中共贵桐县委领导下的民主政权。

（四）中共贵桐县委领导下的民主政权（1944.11—1945.9）

1、晏塘区政府（1944.11—1945.9）和8个乡民主政权。区长周暮樵（兼，1944.11—1945.9）。①三万乡。乡长张武，副乡长许某、杨文俊。②晏塘乡。乡长王中，副乡长袁少尧、桂泽民。③江店乡。乡长周全太，副乡长汪龙全。④前江乡。乡长刘永，副乡长胡书文。⑤长林乡。乡长何万盛。⑥仙姑殿乡。乡长周介，副乡长储震川。⑦杨店乡。乡长贾宏开。⑧江心洲乡。乡长钱江川。2、洪铺区政府（1944.5—1945.9）和5个乡民主政权。区长张国平（1944.11—1945.9）。①殷桂乡，②石城乡，③双桥乡，④清溪乡，⑤檀婆乡。负责人均不详。3、高脊岭区政府（1944.5—1945.9）

和 7 个乡民主政权。区长冯力群（又名唐家怀、冯一，1944.12—），副区长左大钧（1944 年底）、王渐石（1945.3）。①高岭乡。乡长杨定发。②龙江乡。负责人不详。③天城乡。负责人不详。④仰口乡。负责人不详。⑤古塔乡。乡长韩琪。⑥农民乡。乡长王自平。⑦驻驾乡。负责人不详。4、蛟口区政府（1944.9—1945.9）和 4 个乡民主政权。区长周南（兼，1944.9—1945.9）。①吴田乡。乡长钱某某。②唐田乡。乡长周忠。③五里乡。乡长王一善、指导员梅某某。④冲里乡。乡长钱某某。5、八都湖区政府（1944.9—1945.2）和 5 个乡民主政权（现属东至县）。区长马本农（1944.9，1944.12—1945.2）、何东初（1944.10—1944.12）、唐曙光（1945.3—1945.9）。①安丰乡，②河丰乡，③永丰乡，④大渡口乡。以上乡负责人均不详、⑤江坝乡。乡长张之寅。

三、地方军事组织设置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 1941 年期间，贵池虽未建立党的组织及其武装部队，但抗日活动并未停止。如 1938 年 10 月，中共皖南特委曾派中共党员董玉清、詹宗毓回家乡贵池工作；1939 年，梅埂人方瑛，自发组织起一支武装，开展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一）贵东游击大队（1943 下半年）

以沿江武工队为基础，在观前五房包村组建了贵东大队，下辖二个排，每排 3 个班共 50 余人，30 多支枪，一部分大刀，手榴弹。区、乡还建立了游击小队。黄绍臣任大队长、王亚中任副大队长。

（二）桐贵青游击大队（1944.1—1945.9）

前身为贵东游击大队。辖3个中队，有500余人，400多条枪，还拥有一小钢炮和三挺轻机枪。大队长章开如（1944年春—1945.9），政委吴文瑞（兼，1944.1—1945.9），副大队长王亚中（1944.1—1945.9），副政委左坦（1944.1—1945）。第一中队，中队长洪光烈；第二中队，中队长郭某某；第三中队，中队长刘百根、指导员汪振。北撤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此外还成立了3个区中队，每队20至50人、20支枪。

（三）贵桐游击大队（1944.11—1945.9）

大队长黄绍臣（兼），政委马守一（兼）。下辖3个中队：第四中队，中队长钱剑丰，指导员叶树森（兼），有9个班兵力；第五中队指导员向项雨，有6个班兵力；第六中队，中队长章月五，副指导员吴江，有6个班兵力。北撤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四、群众团体组织设置

（一）农救会（1945初—1945.9）

抗日战争时期贵西抗日根据地有农民自救会组织，简称农救会。1945年初，三万乡有农救会员1826人，洪铺区有4200人，高脊岭区有2000人。农救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二五”减租和组织发展生产、支前、防奸等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根据地新四军奉命北撤，农救会组织自动解散。

（二）妇女会（1943—1945）

贵池抗日游击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妇女会、妇救会、妇抗会等，开展抗日支前工作，提倡男女平等。仅1944年8—10月，就上交

军鞋 750 双。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奉命北撤，组织自动解散。

（三）儿童团（1944—1945）

贵池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普遍建立了儿童团。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

一、党的组织设置

（一）中共青贵区委（1946.4—1947.6）

1945 年 9 月贵池东部、西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内的党政军人员先后北撤。不久，杨明从北撤途中奉命返回铜陵。同年 10 月，成立了中共沿江中心县委继续领导皖南沿江地区的斗争。在青阳九华山和贵池汪河、滴水岩等南部山区，进行开辟根据地活动，成立了青贵区委。书记孙举东，委员曹汉清、柯斌、查春。隶属沿江中心县委领导下的铜青南县委。

（二）中共青贵工委（1947.7—1948.8）

1947 年 3 月，沿江中心县委改成黄西工委。祁（门）、石（台）、贵（池）、青（阳）等县党组织亦转属黄西工委管辖。7 月成立了铜贵青县委，书记朱农。下辖五个工委和区委。其中在青贵区委的基础上，于 1947 年 7 月在九华山盘台南边成立了青贵工委，书记孙举东（1947.7—1948.8），委员史来水、曹汉清、叶光华、查春。下辖三个支部：中共齐金乡支部（1947.9—），负责人不详；中共新立乡支部，书记曹汉清；中共保和乡支部，负责人不详。活动地

为贵池的南部山区、沿江和青阳东南地区。

(三) 中共青石贵工委 (1948.9—1949.4)

1948年，皖赣工委成立，下辖青石贵、祁石贵、浮至祁三个县级工委。其中青石贵工委，书记杨友华。活动区域包括青阳西部边区和贵池肖坑、高坦一带以及石台七井山、贡溪、七里等地。

(四) 中共贵池县委 (1949.4—1949.9)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2日贵池全境解放，中共贵池县委成立，隶属中共池州地委。书记石克一(1949.4—1949.7)、姚鸿志(1949.7—1949.9)，副书记李绍基(1949.4—1949.9)、杨友华(1949.4—1949.9)，委员韩秉林(1949.4—1949.9)。县委组织部长刘承志、宣传部长崔勇、秘书孙眉寿。同时成立6个区委。第一区委(城厢)，书记石坚，组织委员高春来，宣传委员崔国英、苗春芳。第二区委(乌沙)，书记王凤德(先)、康俭(后)，委员康俭，组织委员耿昙云，宣传委员王志。第三区委(殷汇)，书记李宏民，组织委员盖来山、刘福年，宣传委员马英辉。第四区委(小河，今属石台县)，书记马青山，组织委员刘福年，宣传委员黄惠忠。第五区委(梅街)，书记柴秉官。第六区委(观前)，书记李福和(先)、刘宪(后)。

二、政权组织设置

贵池全境解放后，某团团长赵善祥代理贵池县长(1949.4.23—1949.4.27)。1949年4月27日南下干部第4支队第4大队到达贵池，从国民党贵池县政府有关人员手中接收政权，并于1949年5月1日

正式宣告贵池县人民政府成立。驻地池州镇。县长李绍基（1949.5—1949.9），秘书孙亭碧，教育科长孙眉寿，农林科长孙铁云，民政科长齐祥云（先）、吴向民（后），司法科长杨玺，财政科长齐祥云、杨凤鸣。下辖六个区政府（1949.5—1949.9）。第一区（城厢），区长崔青吉。第二区（乌沙），区长康俭。第三区（殷汇），区长郭树堂（1949.5）。第四区（小河），区长杨生敏（1949.5）、刘宪（1949.7）、刘福年（1949.8—1949.9）。第五区（梅街），区长王吉来（1949.5—1949.7）、李保恒（1949.8—1949.9），副区长蒋世忠（1949.5—1949.9）。第六区（观前），区长李福和（兼，1949.5—1949.7）、芦传仁（1949.7—1949.9）。

三、地方军事组织设置

（一）贵池县人民武装部（1949.5—1949.9）

1949年5月设立。隶属县人民政府。1951年4月根据华东军区命令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贵池县人民武装部，列入军队编制，隶属池州军分区，同时受中共贵池县委领导。武装部长程文显。县辖各区设立武装大队。

（二）贵池大队（独立营，1949.4—1949.9）

贵池解放后设，负责地方防务。1952年撤销，战士复员，干部大都转入人武部工作。

四、群众团体组织设置

（一）民兵组织（1949.4—1949.9）

贵池解放后，各区乡都成立了民兵队。到1949年年底，全县有民兵6739名，配备各类枪械2215支，手榴弹107枚，刀矛1825

件。1952年12月，实行“普遍民兵制”，县内90%以上的适龄青年都参加了民兵。本县民兵多次配合解放军参加剿灭土匪洪国顺、吴一飞、丁鑫培的战斗。还积极协助公安部门维持地方治安，拘捕各类犯罪分子和特务分子。1949—1959年，本县民兵共缴获各种犯罪分子的武器167件。在防敌特空降中，截获降落伞10顶。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贵池县筹备委员会（1949.5）

书记盖来山。同期成立贵池县青年联合会，主任姚鸿志（兼），副主任盖来山。

（三）农民协会（1949.5—1949.9）

1949年4月贵池解放，5月成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县农会，主任刘现，副主任李洛增。随之县内各区、乡相应建立农会组织。9月20日至25日，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大会号召广大农民投入剿匪反霸斗争，完成各项征粮任务，支援前线。年底有271个村建立了农会，会员50180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8.8%。

（四）贵池县工会筹备委员会（1949.11）

贵池解放后，立即着手组建工会，主任张吉山。

（五）贵池县妇女联合会（1949.4—1949.9）

主任李振荣（1949.4—1949.9），副主任杨安菊（1949.7—1949.9）。贵池解放后，县、区、乡成立妇女联合会，发动广大妇女支援前线，当年送往前线军鞋1400双，还有妇女捐献了毛巾、肥皂、牙粉等日用品。

二、人物春秋

马守一

马守一 安徽安庆市人。1944年4月受党的派遣来贵池西部地区领导开辟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贵西临时工委书记、贵西工委书记、贵桐县委书记和沿江中心县委安庆城工部部长等职。解放以后，曾在我省滁县专区任副专员、专员，后调往上海，在中共闸北区委、水电部华东电力设计院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

马数鸣

马数鸣 安徽省无为县人。抗战初期即在县、区抗日动委会工作。1944年调往贵西根据地，任中共贵桐县委委员、沿江行政办事处副主任。解放后，曾任县长、区党委理论教育科科长、高等院校党委副书记、省文物局副局长兼省博物馆馆长等职。

方国华

方国华（1904—1984） 安徽省贵池人。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历任战士、宣传分队长、民运科长、团政治委员、兵团组织部长等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张家口保卫战、新保安攻坚战等。他多年从事民运工作，为开辟新区夺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任公安部干部部副部长，河北省军区

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63 年离职休息。1984 年因病逝世。

许章法

许章法 安徽青阳县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任中共铜青南县委委员兼青北工委书记期间，曾率队赴贵东地区进行活动。1944 年 1 月调任中共贵东县委委员，同年 5 月任中共贵西工委副书记，11 月任中共贵桐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9 年任沿江工委书记兼青阳县委书记。解放后，在安徽省税务局、广东省电子工业局等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林维先

林维先（1912—1985） 又名林新，安徽金寨县人。1929 年 5 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团政治委员、师长，在创建和保卫鄂东北革命根据地中屡建战功。1943 年在任中共沿江地委书记、新四军沿江支队队长期间，领导开辟池州（贵池）根据地的工作。“皖南事变”后，重新组建新四军时，任七师十九旅旅长，与全师部队共同努力赢得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华东军区第七纵队副司令员，淞沪警备区司令员。解放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于中将军衔。党的十二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著有军事回忆录《敌后三年》。主编《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等。

吴文瑞

吴文瑞(1919—1970) 安徽省歙县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时，曾化名张杨。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到1945年期间，先后任中共贵东工委书记、贵东县委书记、桐贵青县委书记。北撤以后，任新四军七师随军干部队队长，后去上海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皖南地委委员，贵东工委副书记，歙绩旌工委书记。建国后任徽州专区专员、省委常委、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秘书长等职。

杨友华

杨友华 原名曹修人，安徽省安庆市人。1943年3月奉命开辟皖江敌后游击根据地，在贵池战斗了十个春秋。1944年先后任中共贵西第二区委书记、洪铺区委书记，中共贵石工委书记。北撤后又重返贵池任青阳县宣传部长兼青石贵工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青阳县第二书记、中共贵池县委副书记。后任中共安庆地委党校副校长。

张尔庆

张尔庆 安徽省枞阳人。1944年4月到贵西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贵西临时工委委员、贵西工委委员，同时担任新四军沿江团三营

教导员。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部长、师级政委，海军上海基地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为副军级待遇。

何志远

何志远 湖南浏阳人。1930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三营副营长、五团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七师十九旅五十五团政治处主任，无为县总队副总队长，中共桐庐无县委书记，沿江支队政治处主任兼桐东大队政委，沿江支队沿江团政委。与沿江团主要领导人一道于1943年冬来到池州（贵池）战斗。早在1942年，在兼任中共桐庐无县委书记期间，就领导和指挥过开辟贵池的斗争。解放以后，曾担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济南军区人武部部长、山东省军区政委。少将军衔。

杨 明

杨明（1919.12—2003.8） 广东省大埔县人。1937年入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受组织委派，重返皖南。任皖南铜陵敌前行动委员会副书记、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副书记兼桐青南政治部主任、铜青南县委书记兼铜青南总队政委。抗战胜利后，再返皖南，先后任中共沿江中心县委书记兼皖南人民自卫军政委、黄西工委书记兼黄西总队政委、皖赣工委书记兼皖赣总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政委。解放后，先后任池州地委书记、安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1986年离

休。2003年8月病逝。著有《皖南星火》。

张 格

张格 湖北黄冈人。土地革命时期，在鄂豫皖边区参加革命。1943年任沿江团政委，1944年10月，任沿江行政办事处主任，战斗在贵池县西部地区。新四军北撤后，南征北战。全国解放后，任安庆专区副专员，后在华东局司法部门、上海政法学院等单位任过主要领导职务。

吴瑞田

吴瑞田（1927—1987年） 安徽省桐城县人，后定居贵池。1949年3月初，吴瑞田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参加渡江战役，驾驶自家13吨木船，到枞阳县白荡湖训练基地集中训练。结束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第十一军渡江船队。父子俩于4月21日下午船运25名指战员，在枞阳铁板洲冒着敌人炮火起渡，大约一小时到达长江南岸，后又往返两趟运送解放军渡江。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军三十三师签发给吴瑞田《渡江参战功绩证》。解放后，在贵池县航运公司工作。1987年病逝。

李德安

李德安 1941年任新四军挺进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桐庐无县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和桐庐无游击大队长。1942年2月任新四军

十九旅三十八团参谋长，1942年冬到1943年春，曾数次率武工队南来北往，在贵池东部的观前、茅坦等地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他是一位红军老战士，长期担任军队领导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查富德

查富德 1945年任皖南支队三团三营营长，在沿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坚持了四年的皖南游击战争。曾先后担任皖南人民自卫军副总队长、铜贵南繁副总队长、沿江总队副队长、黄西总队副队长、皖浙赣支队副参谋长兼黄西独立团团长。贵池解放后，任池州军分区独立团团长，参加青阳剿匪工作。后任铁道兵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安徽省商业厅副厅长、巢湖行署副专员。

钱秋育

钱秋育 1946年3月任沿江总队政治处主任，率领一个排的武装到贵池杉山、肖坑一带进行开辟根据地的活动。1947年任石贵工委副书记，1948年任中共皖赣边工委领导下的浮至祁工委书记。同时任皖赣总队政治处主任。在贵池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直到贵池全境解放。1949年5月任池州警卫团第五团政委。

黄 先

黄先 江西省上饶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任

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曾任新四军七师挺进团政治处主任。1943年3月至1945年任中共沿江地委副书记兼沿江中心县委书记，直接领导池州（贵池）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旅政委、师政委、支队政委。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候补书记。

董希白

董希白（1906—1974） 安徽省贵池人。1926年至1929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1929年秋，由中法大学保送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法科。在法留学期间，曾参加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回国后，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上海三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1935年5月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员。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苏皖边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太东县县长兼警备团团长，东台县县长兼独立团团长，苏中一分区副专员，华中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苏南公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1949年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先后任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国际法律研究所所长等职。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编著有《现代比利时政治》，翻译过《战后国际政治条约集》、《种族与历史》等。1974年在北京逝世。

傅绍甫

傅绍甫（1908—1993） 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立夏节起义后，任少先队队长，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9月加入中

国工农红军，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参加了长征。1940年9月在江北组建了抗日挺进团，在皖中沿江一带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沿江两岸大片游击根据地。1943年至1945年8月任新四军沿江支队副支队长兼沿江团团长，率沿江团在池州（贵池）战斗了两个春秋。解放战争初曾任副师长、师长。新中国建立后任三十一军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胜标

彭胜标 福建长汀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曾任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政治处主任、政委，七师十九旅五十八团政委，沿江军分区副政委，沿江支队独立团政委，七师兼皖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苏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江苏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少将军衔。

谭兆屏

谭兆屏 1944年4月调到贵池西部地区进行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月底，任中共贵西工委委员。同年十月，沿江行政办事处成立后，任沿办处公安局局长，长期从事公安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

注释：《人物春秋》其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列。

三、革命烈士选介

王达仁

王达仁（1906—1932） 安徽省桐城东乡人，塾师世家，自小勤奋好学。1922年，就读安庆成德中学。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梅埂区委委员兼五步沟党支部书记，中共新桐县委委员兼农运会书记。1932年秋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中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六岁。

金步蟾

金步蟾（1901—1933年） 又名金铸成、金在荣。安徽潜山县逆水乡人，出身农民家庭。1922年秋，进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家乡逆水乡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任书记。领导了逆水百姓反对地主加租、保护农民地权的斗争。并在逆水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农民团、农会、妇女会等。后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参加了王效亭领导的请水寨暴动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请水寨暴动失败后，金步蟾转移到皖南山区，在中共芜湖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在贵池与秋浦交界的南坑同李鸿鸣、汪清流一起建立了中共南坑党支部，后任中共秋浦县委组织委员，领导人民创建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同李鸿鸣一起组织贵秋东地区的“九·二〇”暴动，后因李鸿鸣旧伤复发，起义时间更改，暴动计划泄漏，国民党保安团进山捕杀革命人民，金步蟾在源头村

（今属石台）被捕，连夜被敌人押到秋浦县城关押。为防止秋浦群众保释金步蟾或劫狱救人，国民党秋浦县长夏邦济于1933年2月，密令团丁将金步蟾和李鸿鸣二人绑至县城南门岭杀害。在烈士牺牲的地方，至今还流传着一幅挽联：

先生去兮，群山呼嚎哀君功贯秦疆，
后辈来兮，万众呐喊为民挥戈复仇。

李鸿鸣

李鸿鸣（1907—1933年）又名李彦华、李晓，贵池源头李村人（今石县），祖籍在安徽潜山县黄柏乡。9岁读书，19岁辍学教书。1926年，受到了新文化的熏陶，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1926年夏，经安徽中共领导人王步文、王效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黄柏乡大隐村建立了党支部，参加了请水寨暴动，为创建潜山革命根据地多方奔走。1930年，请水寨暴动失败，奉命转移到皖南山区，同金步蟾、鲁国储、吴介唐等十余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10月李鸿鸣来到贵池、秋浦两县交界的南坑以教书、行医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农协会，1930年底建立了中共南坑党支部，任书记。接着担任秋浦县委书记。1932年9月，李鸿鸣在葛源水磨村主持了县委扩大会议，决定9月20日举行暴动。李鸿鸣为“九·二〇”暴动总指挥。不料，李鸿鸣因操劳过度，旧伤复发卧床不起，县委临时决定，将“九·二〇”暴动推迟一个月，于10月20日举行。后因交通不便，在姚黄的储

效鲁未接到通知，按原定计划举行了暴动，因而暴露了整个计划。国民党秋浦县夏邦济亲自带领几百名保安团丁和自卫队进山搜捕革命人士，血洗根据地。由于叛徒告密，李鸿鸣和金步蟾在源头村（今属石台县）被捕，关押在国民党秋浦县政府牢房里。4个多月，受尽了酷刑。在党的领导下，众多群众联名上书并到国民党秋浦县政府请愿要求保释李鸿鸣、金步蟾。国民党秋浦县夏邦济惊慌失措，恼羞成怒，便密令团丁将李鸿鸣和金步蟾两人绑至县城南门岭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陈良臣 陈宝善

陈良臣（1897—1934）陈宝善（1899—1934）兄弟 贵池乌沙联庄村小西冲人。从小家境清寒，未进过学堂门。青年时，兄弟俩双双学成裁缝手艺，为了生计，良臣带着一把剪刀，一把尺，只身赴本县南部山区棠溪留田一带，以帮人做衣服为生。后来一檀姓人家以女许之，良臣在留田成了家。1933年良臣把弟弟宝善接到棠溪，一起做裁缝。

1934年春，良臣、宝善兄弟二人在中共贵池县委书记李家海等人的启发下，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俩人都当上了二区的交通员。他们以做裁缝手艺为掩护，走村串户，一边为人做衣，一边宣传革命道理。是年2月，国民党贵池县政府派保安队100余人驻守留田，杀害了檀周贵、曹金狗、姚佐唐、张子高、柯昆祥等许多革命者。为了打击国民党保安队，为牺牲的同志报仇。4月，陈良臣、陈宝

善等人奉李家海命令，诛杀了作恶多端的保长檀孔修，于是引起国民党保安队更大的报复。不久，兄弟俩遭到棠溪八保联保主任檀金斗通缉，为了暂时隐蔽，兄弟俩返回老家，仍以上门为人做衣服为生，并将棠溪地区“遍地开红花”的革命形势向贫苦农民介绍，鼓励他们起来跟国民党和地主斗争。这时国民党保安队已接到捕捉陈良臣、陈宝善的命令，便在乌沙以壮丁点卯为名，将舞鸾乡下三保（即今乌沙镇花园、联庄、新义等村）壮丁集合在乌沙联庄董家大山点卯，点到陈良臣、陈宝善兄弟俩时，他二人不在，当即下令追查，良臣、宝善终于在下三保一甲不幸被捕。保安队严刑审讯，良臣兄弟俩面无惧色，反而嘲笑他们说：“你们不就是这么几条破枪吗？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看红军来了总要收拾你们”。保安队当天下午就将陈良臣、陈宝善兄弟俩杀害。

檀周贵

檀周贵（1895—1934） 贵池棠溪新田垄人。1905年至1920年在私塾读书。1929年在西山里坑教书期间，与在魁山韩村教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吴淡甫结识，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西山、双桥一带，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反霸斗争。1933年2月，任中共贵池县委书记。1934年3月，他在当时的地下党联络点老屋檀瓷器店遭县保安队逮捕。国民党县政府派地方绅士、族长檀和平劝降，檀周贵给予严词痛斥。4月在留田老屋檀桥头英勇就义。

柯天六

柯天六（1895—1934） 1895 年生于贵池紫棣坑（今棠溪镇双桥村）一个农民家庭。30 年代初和吴介唐结识，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红军。民国 21 年（1932 年），中共贵池县委在棠溪留田成立，柯天六任县委委员。他积极宣传红军“铲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的政治主张。经常在棠溪地区的西山、双桥、棠溪柯、金元、元坑、留田一带，张贴革命标语和传单。1934 年 10 月，由于叛徒告密，柯天六遭国民党军八十八师逮捕，解至贵池县城。他在被关押期间，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当月下旬在贵池北门英勇就义。

姚佐唐

姚佐唐（1892—1934） 贵池留田人。早年在宣城就读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20 年代初，回家乡任塾师及小学教师，乡里人尊称他为“姚四先生”。

1928 年姚佐堂在棠溪结识了从江西过来的革命者张子高等人。在张子高的影响下，秘密参加革命活动。1935 年 1 月，棠溪留田暴动失败后，姚佐堂以当地保长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清乡队”多方周旋，力求保释革命同志。后因活动和真实身份暴露，于农历腊月初九（1935 年 1 月 13 日），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在龙舒河畔与张子高、张子鹏同时就义。

吴介唐

吴介唐（1901—1935） 字耐夫，岳西县人。1926年安徽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考入湖北武昌大学。因经济拮据，辍学。在家教私塾，后任小学校长。1927年，经王步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通过安徽省教育厅县教育局招考并被中共潜山县委任命为潜山县教育局局长，他以此公开身份为后来的请水寨暴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1930年5月，吴介唐遭国民党捕押，被保释出狱后以行医为名，于1931年11月来到贵池丁香地区，找到请水寨暴动失散的同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赋诗赠勉诸友：“踏遍长淮过大江，关山处处是吾乡。世乱应忘家室虑，途长愿效犬马忙”。是年冬，任贵（池）、秋（浦）、东（流）边区县委书记。1933年先后建立了贵池、秋浦、东流、石埭、太平、泾县、宁国、宣城等10个中共县委组织，吴介唐任中心县委书记。同时建立皖南游击总队，配合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山区活动。1935年，国民党七十八师和保安大队大举扫荡，皖南游击总队损失惨重。吴介唐因患足疾，行走艰难，隐蔽于贵池棠溪滴水岩，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同年冬，被害于青阳东门外。就义前，他曾书一对联：“为政治翻身，牺牲无愧；干革命到底，流血何妨”。

凌 霄

凌霄（1905—1935） 原名志昂，贵池区里山人。幼年读私塾，

继而考入省立第七师范附小，毕业后又考入芜湖平民工读学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结业后参加北伐，曾任连指导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1928 年回到贵池，不久与中共怀宁县委接上组织关系。同年冬，中共贵池特别支部成立，凌霄任书记，领导开展学生、士兵、农民和工人运动。取得了 1929 年贵池县立中学驱逐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校长胡珩，馒头山煤矿工人两次大罢工，白洋、梅埂等地的贫苦农民抗租抗债等斗争的胜利。1930 年初，中共怀宁中心县委调他到潜山县委工作，化名严宽，任潜山红军独立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后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军三十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请水寨暴动失利后，回到贵池、铜陵等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和参与组建中共铜陵特别支部、中共徽州工委。1932 年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徽州工委转移，凌霄失去组织联系，化名胡建华，以私塾先生身份作掩护，隐蔽在泾县翟村。1934 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在泾县被捕，安徽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向乃祺曾使尽了各种伎俩，但凌霄不为所动，于 1935 年 1 月 16 日，慷慨就义。凌霄除富有军事才能外，对旧体诗词颇有造诣，留有诗作 30 余首。其中《黄花岗感怀》云：“黄花岗上吊英才，浩气长存亦异哉。棋局漫敲谁先著，潮声静听我徘徊。千重百练浮江月，一点丹心似瘦梅。快剑欲磨酬壮志，群氛扫尽嶽云开”。表达了他立志求真救国爱民的情怀。

张子高

张子高（1905—1935） 湖北浠水县人。1928年由江西经皖南泾县到贵池棠溪留田，以塾师和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他经常利用作诗和批改作文的机会对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家中精美者，不是做工人。”这是他有感于贫富不均向学生公开批解的一首古诗（按：张改动了后两句）。学生们受他的影响，常在深夜里帮他书写、张贴革命标语。

1934年秋，红军到达棠溪时，张子高等人开办的小学已由留田迁至庄村姚。他除在小学继续任教外，还兼开药铺，以此周济红军交通人员的衣物，筹送川资。棠溪留田暴动失败后，同年腊月初九（1935年1月23日），张子高遭国民党清乡队头目吴辉华逮捕，当夜壮烈牺牲于留田河滩。

檀炳光

檀炳光（1909—1935） 又名作章，贵池人。1929年在贵池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派回棠溪留田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中共贵池县委成立，任县委书记。1934年10月，在皖南苏区的太平县柯村学习政治军事后，任皖赣红军独立团参谋长，率领200多名农民赤卫队进入西馆（今青阳境内），直捣国民党武装孙开梅部的老巢，毙敌多人，缴获枪枝30余条。1935年腊月，参与发动年关棠溪留田暴动，指挥火烧杉山庙战斗，消灭了驻守杉山碉堡的国民党武装，保证了红军的联络交通和给养。同年5月，皖赣红军独立团由高山、石台方向与主力部队会师北上，檀炳光率部在祁门大山

开展游击活动中，遭国民党重兵包围，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周炳德

周炳德（1914—1935） 江西人。早年参加方志敏领导的工农红军。1934年10月，受命率驳壳枪队到达贵池留田，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农民武装。中共贵池县委成立后，任县委军事部长。

周炳德领导的驳壳枪队，开始为8人8支手枪。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屡建战功。1935年上半年，击毙了棠溪地区的联保主任檀维珍，生俘了保安团一个姓李的副官，处决了刘街长垄的劣绅余炳楼、余境吾，并瓦解了他们的壮丁队。同年冬，在红军独立团火烧杉山庙的战斗中，周炳德率领他的驳壳枪队作为突击队，炸毁了国民党军队的碉堡，对红军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春，驳壳枪队已发展成为近200人的红军游击大队。7月，周炳德率部宿营于留田大坞的一个野猪棚里，因叛徒檀涤成告密遭国民党军队逮捕，在刘街村头的大树下英勇就义。

匡龙海

匡龙海（1901—1935） 贵州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旅长、代军长、参谋长等职。1934年奉命开辟皖赣边新苏区，先后担任赣东北独立团团长、皖赣红军独立师师长。1934冬，

率红军挺进团在贵池留田一带，领导开展武装斗争。1935年初，因反“围剿”失利，皖赣边苏区丢失，遂率余部转移到贵（池）、东（流）和都（昌）、湖（口）、鄱（阳）、彭（泽）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秋牺牲。

张士其

张士其（1900—1935） 安徽秋浦县（今东至）张溪镇人。农民家庭出身，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参加了中共江南特委领导的贵秋东地区中秋暴动。暴动胜利后，担任贵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贵秋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进行层层“围剿”，张士其率领部分同志突出重围，转移至祁门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但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于1935年12月在祁门英勇牺牲。

欧阳斌

欧阳斌（1908—1937） 安徽省东至县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9月，参加贵秋东“九·二〇”暴动。暴动失败后，仍坚持斗争，保存了贵秋东革命力量。1934年3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先后派夏金良，黄天贵前来高山地区活动。不久，与欧阳斌等在贵秋东地区汇合，开创了以高山、郑村、虎山、洪水潭、青峰岭等地红色根据地，并于1934年农历12月8日举行农民暴动，史称“年关暴动”。在方圆六十多里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暴

动胜利后，在高山建立了中共江南特委和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欧阳斌被选为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农历8月15日，江南特委领导农民1800多人，在贵秋东地区再次举行暴动，取得了胜利。担任贵秋县苏维埃主席。为保卫苏区，欧阳斌率领红军独立团坚守高山各哨口，同十倍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坚持斗争20余日，保证了特委机关全体同志安全转移。1936年10月，突出重围的欧阳斌因叛徒告密，不幸在祁门被捕，三天后，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年仅二十九岁。

周成龙

周成龙（1908—1939） 江西省弋阳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弋阳县团委书记和闽浙赣省工农检查部部长等职。1934年奉命与柳真吾等同赴浮梁农村，开辟皖赣边苏区，任皖赣军分区司令员。1935年皖赣特委被破坏后，转移到秋浦县高山地区，与当地的倪南山等一起开展革命活动。领导并参加了贵秋东暴动，后任江南特委书记。1939年在延安牺牲。

王丰庆

王丰庆（1906—1940） 江西省弋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以前在赣东北苏区工作。1932年底被派往浮梁，任中共浮（梁）、东（北）、婺（源）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任皖赣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皖赣红军独立师政委。1935年任江南红军独

立团政委，参加了贵秋东中秋暴动，奔袭贵池重镇殷家汇消灭了自卫团并生擒该团团长。1936年4月任中共皖赣特委书记。1938年初，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等职。1940年冬，在江苏宜兴县吊桥一带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方 瑛

方瑛（1904—1941） 又名科堂，乳名六星、铁梅，贵池区梅龙街道办事处梅龙村人。出身于手工业家庭。方瑛20岁毕业于贵池县立中学。后入金陵大学就读，两年后因经济拮据辍学回乡，筹办宗山庙小学，并在该校任教。其时，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贵池县委成员王玉成，开始接受进步思想，投入革命宣传活动。

1938年，日军占领梅龙。驻梅龙日伪大队长吴志和曾出面劝方投靠日军，方断然拒绝。不久，方即遭吴逮捕，押解至日军营地观前祠堂包村。经方的父亲多方托人保释，始获出狱。方出狱后，公开打出“方瑛抗日武装大队”的旗号，在郭港村率领武装小分队与日伪展开斗争。是年冬，日军突然包围方瑛大队部，方部猝不及防，遭受挫折。事后，方别妻离子，带领全队赴江北无为县牛埠坚持抗日，方的队伍一到牛埠，便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无为县国民党为扩大势力，派特工人员与方接洽，以“县长”交椅的诺言笼络方瑛，被方拒绝。

1939年，方瑛部来到桐城东乡陈瑶湖地区，在沿江一带活动，队伍发展到近百人。次年5月，方瑛抗日大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桐

怀潜中心县委的领导，与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方瑛任大队长，鲁生任教导员。同年7月，林维先带领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到桐东，方瑛部编为第二大队，方瑛仍任大队长。同年8月，第二大队在新四军挺进团团团长林维先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配合，一兴歼灭国民党顽军章淦部一个中队，缴获数10支枪，又重创土顽江子龙部，缴枪70余支，战马两匹。

1942年，日伪军扫荡陈瑶湖根据地，留守桐东地区的方瑛大队接到挺进团命令，亲率六连和皖南新四军干部战士与日军浴血奋战，杀到青山嘴，天已大亮。六连正准备向周潭后山区撤退时，被日军包围。方瑛组织全部火力，三次突围，终于将皖南干部、战士护送至后山地区，转移至无为县委控制的安全地带。此时，方瑛仍未撤出战斗，不幸在陈瑶湖傍青山嘴头（今枞阳县普济圩农场龙王嘴北）中弹牺牲。

章文祥

章文祥（1904—1942） 贵池牛头山镇万生村人。1940年以教书为名，在三棵树进行革命活动，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抗日武装。并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促使三万圩公司的部分伪兵假心向敌，真心向抗日武装。1942年，他与新四军干部杨杰在晏塘主持召开会议，与迎面而来的日伪军遭遇，危险关头，他坚持要杨杰离开，自己迎上前去应付日伪军，结果被日伪军杀害。

汤松柏

汤松柏（1923—1944） 贵池涓桥人。1942年参加革命，不久，任新四军沿江支队三营七连的班长。1944年，贵池高脊岭驻有部分日军，上级决定拔除这个日伪据点，由七连担任主攻，汤松柏所在班被指定为突击队，其任务是强占日军机枪阵地。8月的一天，七连战士按预定目标挺进，当突击队快要接近日伪前沿时，突遭日伪机枪火力封锁，情况紧急。此时，汤松柏果断地将全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他自己带两名战士冒着日军弹雨冲在前头，当距敌只有几米时，他命令两名战士停下掩护，自己一跃身冲入日军据点掩体内，击毙日军一机枪手，并用右手将日军另一挺机枪紧紧抓住不放。汤松柏的英勇行为鼓舞了战友，突击队和后续部队顺利地发起了进攻，汤松柏不幸被一日军从背后用刺刀刺穿了腹部，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程谦友

程谦友（1927—1945） 贵池秋江街道办事处晓湾村人，少时在枞阳青山学校读书。18岁时，毅然报名参加新四军地方武装组织。同时发动了7名学生参加了新四军。1945年5月30日，他被派到铜山附近的安山吴收税，因保长隐瞒敌情，日伪军突然来到。这时，程自知脱身不得，便叫其他同志从速转移，自己则拔出手枪边打边退，不幸负伤被俘，当即被日军杀害。

汪传国

汪传国（1909—1945） 号尧天，贵池乌沙人。汪秉性内涵，办事细心。1940年，经汪秀璋介绍，参加新四军。1942年，同汪秀璋、吴佩江、吴沧然等在丁家庄成立“协进会”，任新四军沿江办事处秘书。1945年6月18日，汪传国与汪秀璋等人因身份暴露被日伪军逮捕，与汪秀璋同时被日伪杀害。

汪秀璋

汪秀璋（1911—1945） 贵池乌沙横塘村人。幼年读过私塾，后毕业于乌沙小学。汪秉性爽直，在地方上经常为穷苦百姓鸣不平。地主豪绅对他都有些胆怯，因此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啄木鸟”（意思是很厉害）。

1943年，汪任日伪晏塘保保长，继任晏塘乡乡长。他说：我当乡长，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给乡亲们减少点苛捐杂税，我对他们（指日伪军）能糊则糊，能拖则拖。因此，汪在任职期间，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同年，新四军沿江办事处成立。10月间，汪秀璋被任命为沿江办事处“协进会”会长。任职期间，他能准确及时地向抗日民主政府提供日伪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不拘形式的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动员了不少青年参加新四军。

1945年，沿江办事处决定，利用汪的日伪乡长的公开身份，打进三万圩公司任经理。三万圩公司原是大小地主豪绅为了垄断土地对佃户进行剥削的公司。汪任经理后，对共产党领导的减租减息

斗争，作出了贡献，使万成、万生、万宝三个圩区的农民生活稍得宽松。同年，6月18日上午9时许，汪秀璋与沿江办事处主任张格等不幸被捕。解至安庆后不久汪被押送到南京，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查根有

查根有（？—1945） 贵池殷汇碧溪村人。性格倔强，不畏强暴。1941年，因逃壮丁，打伤保长，参加了新四军，曾任新四军游击队指导员。后被党组织派至殷汇地区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5年8月，汉奸头子桂世和带领伪军数十人将查根有逮捕。押经灌口琅山崖时，查根有在五花大绑的情况下，奋力撞倒两名伪军，然后纵身跳下数十米高的悬崖，英勇献身。

钱益海

钱益海（1920—1945） 贵池秋江街道办事处驻驾村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在敌后担任税收工作。33年7、8月间，钱和另外两个同志在茅家渡收税，与两个汪伪军遭遇，他一拳一脚打倒了一个伪军，另一个伪军也被战友打倒，并缴获了两条枪。同年，钱到杜湖收税，发现秋浦河上驶来一只偷运枪支的匪船。他纵身上船，只凭一颗手榴弹便没收了船上10条枪。事后，高岭乡民主政府授予钱益海奖旗一面。1945年秋，新四军奉命北撤。钱因患眼疾，来不及跟上部队，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他受重刑不低头，在贵池西门外英勇就义。

徐天赐

徐天赐(1923—1947) 出生于贵池墩上低岭村一个贫苦农家。小时放牛，年青时操理发手艺。1946年徐在青阳庙前乡西洪岭拜识了当时的新四军游击队领导人胡克南，不久即参加了民兵。他利用理发可以走村串户的条件，宣传革命道理，组织起40多人参加了地方武装。1947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青阳县独立大队逮捕，关押在庙前乡公所。同年11月11日在施家桥上被杀害。

纪志新

纪志新(1917—1949) 原名纪建华，贵池乌沙镇人。20岁时因家境贫寒，停止学业，做小生意。后在高岭秘密地参加了革命工作。1942年，纪志新随新四军调赴江北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纪任三野二〇二师独立团团长。1948年冬徐州战役中，他负了重伤。1949年春，纪志新领导的独立团某连被编为渡江战役先遣连，准备在安庆至贵池江段参加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战斗。纪志新在医院养伤期间向该连李连长介绍了乌沙镇的地形、位置，建议减少炮击，保护乌沙镇。后由于部队掌握了地形，炮弹大多落在国民党江防军队阵地和田间，使乌沙镇免遭战火创伤。1949年底，纪志新终因伤势过重，在山东胶东医院逝世。

注释：《革命烈士选介》中的人物按牺牲年月排列。

四、贵池区革命烈士英名录

红军							
烈士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籍贯(镇街)	参加革命时间	生前所属部队及职务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批准机关
吴克振	男	不详	江口	1935	红军部队战士	在桐城县游击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孔令珍	男	不详	秋江	1934	工农红军	1934年在清平乡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夏君选	男	1912	唐田	1933	红军副班长	1934年在凤凰村水磨庵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张照明	男	1899	唐田	1932	红军区委书记	1934年在贵池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胡双贵	男	1909	唐田	1935	红军青年团团长	1935年11月在唐田店上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杨根保	男	1914	唐田	1935	红军独立团战士	1935年11月在丁香树红土岭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曾礼欢	男	1901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5年在徐坡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胡传盛	男	1914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5年在唐田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张达松	男	1893	唐田	1934	红军通讯员	1935年在吴田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汪悦贤	男	1917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5年11月8日被捕遭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汪长来	男	1902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5年11月22日被敌人活埋	中央人民政府
江美章	男	不详	唐田	1935	红军农会主席	1935年被特务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孙自寿	男	1913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5年在牌楼乡丰收村被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吕文田	男	1912	唐田	1934	红军战士	1935年11月在四南做宣传工作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张双福	男	1915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5年在贵池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张宗炳	男	1900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5年11月牺牲	贵池县人民政府
查继成	男	1909	唐田	1935	红军独立团班长	1936年元月牺牲	贵池县人民政府

江天保	男	1920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6 年在高山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郑百美	男	1912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6 年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李中发	男	1899	牌楼	1933	红军独立团联络员	1933 年在吴田被国民党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邱景华	男	1908	唐田	1932	红军农民团团长	1933 年 11 月在佳山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王旺来	男	1910	唐田	1930	红军区委委员	1934 年 11 月在铁冲被敌人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朱恩照	男	1913	唐田	1933	红军先锋队队长	1935 年在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张云山	男	1888	唐田	1935	红军战士	1935 年 9 月在店上桥被保安三团杀害	民政部
李俊轩	男	1918	唐田	1935	红军第三区文书	1937 年在吴田铺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查金来	男	1905	唐田	1935	红军独立团班长	1937 年在东至县作战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江正友	男	1895	梅村	1932	红军情报员	1935 年在沟汀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桂玉松	男	1901	梅村	1933	红军农民团团长	1935 年在高坦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杨自常	男	1888	梅村	1934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5 年 2 月在高坦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洪孔家	男	1897	梅村	1934	红军第五区营长	1935 年在乌石被敌杀害	安徽省革委会
刘观有	男	1915	棠溪	1931	红军战士	1933 年在石台七都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马树荣	男	1906	棠溪	1931	红军游击队大队长	1933 年被国民党 88 师在刘街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钱金和	男	1888	棠溪	1933	红军农民团团长	1934 年 4 月在本地张家坟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张长庆	男	1903	棠溪	1933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4 年 12 月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檀丙义	男	1902	棠溪	1931	红军战士	1934 年 5 月被保安队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柯坤祥	男	1911	棠溪	1929	红军地下工作者	1934 年腊月突围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柯逢阳	男	1901	棠溪	1934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4 年腊月 在石台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柯运荣	男	1911	棠溪	1931	红军青年团团支书	1934 年在留田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潘子剑	男	1890	棠溪	1932	红军文书	1934 年 12 月在留田与保安队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檀海子	男	1908	棠溪	1931	红军宣传组长	1934 年 10 月与敌 88 师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储万宝	男	1887	棠溪	1932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4 年在石台县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周长才	男	1910	棠溪	1932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4 年在留田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何传福	男	1908	棠溪	1933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4 年为红军送信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程开发	男	1913	棠溪	1933	红军驳壳枪队队长	1935 年 6 月被敌 88 师捕杀	中央人民政府
刘兴旺	男	1916	棠溪	1934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4 年 12 月 16 日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郑根和	男	1904	棠溪	1933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4 年 12 月 24 日在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周月松	男	1904	棠溪	1933	贵、秋、东六县交通员	1934 年 5 月在棠溪柯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何长子	男	不详	棠溪	1932	红军游击队班长	1934 年被捕遭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陶文德	男	不详	棠溪	1930	红军游击队宣传委员	1934 年 11 月 21 日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江永高	男	1907	棠溪	1931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5 年 4 月在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黄小富	男	1900	棠溪	1934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5 年 4 月在祁门大壁山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刘兴和	男	1906	棠溪	1933	红军游击队支部书记	1935 年 11 月在石台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方二生	男	1911	棠溪	1933	红军独立营炊事员	1935 年 2 月在梅村与敌 88 师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江老六	男	1890	棠溪	1934	红军战士	1935 年在江西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孙东狗	男	1914	棠溪	1934	红军通讯员	1935 年在留田被敌 88 师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孙双喜	男	1899	棠溪	1930	红军游击队队长	1935 年元月在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柯以德	男	1910	棠溪	1929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5 年 12 月在高宝山与敌作战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檀胜恩	男	1914	棠溪	1934	红军游击队队员	1935 年遭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江天林	男	1884	棠溪	1932	红军司务长	1935 年在本地被敌保安队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胡继旺	男	1911	棠溪	1932	红军战士	1935 年随部队转移时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柯大狗	男	1914	棠溪	1934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5 年 4 月在祁门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曹金狗	男	1906	棠溪	1929	红军区委组织委员	1935 年被保安队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杨春荣	男	1906	棠溪	1933	红军农民团团长	1935 年腊月 在七都龙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黄三矮子	男	1897	棠溪	1934	红军区委宣传委员	1936 年在本地被敌 88 师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陈金根	男	1881	棠溪	1931	红军区委组织委员	1934 年 12 月被敌人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章正起	男	1901	梅街	1934	红军农民先锋队队员	1935 年因执行任务被敌捕杀	中央人民政府
叶祖辉	男	1899	梅街	1934	红军独立团交通员	1935 年 1 月在长垄叶村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陈金根	男	1909	梅街	1933	红军独立团战士	1937 年随红军送军粮途中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陈金林	男	1906	梅街	1933	红军独立团战士	1935 年 2 月在泾县白家桥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柯绍楼	男	1906	梅街	1933	红军司务长	1934 年在青阳南阳湾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柯绍来	男	1909	梅街	1933	红军青年团团长	1934 年被捕杀害于刘街	中央人民政府
杨所全	男	1894	梅街	1934	红军战士	1934 年在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桂小松	男	1905	梅街	1934	红军游击队队员	1934 年 12 月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曹祚基	男	1883	梅街	1933	红军游击队队员	1934 年在栗坑被捕押至太和章水口被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柯绍尧	男	1881	梅街	1934	红军交通员	1935 年在长垄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章雪南	男	1905	梅街	1934	红军游击队炊事员	1935 年 5 月在太平作战时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方家有	男	1908	梅街	1932	红军第四区区委委员	1935 年在棠溪百安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程树枝	男	1909	梅街	1934	红军宣传员	1935 年元月 9 日在青阳五杨村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曹世全	男	1902	梅街	1934	红军游击队队长	1935 年元月在青阳庙	中央人民

						前被敌杀害	政府
叶志波	男	1906	梅街	1934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5 年在长垄叶村被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孙艮寿	男	1908	梅街	1934	红军游击队队长	1935 年 3 月在青阳杜村桥被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周念祖	男	1907	梅街	1934	红军农民团团长	1935 年元月在留田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叶祖友	男	1904	梅街	1934	红军独立团通讯员	1934 年 12 月在留田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章秀林	男	1914	梅街	1934	红军农民先锋队队长	1935 年 3 月在本地被国民党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章克耀	男	1902	梅街	1934	红军地方部队战士	1935 年 3 月在源溪被敌 88 师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汤东狗	男	1913	梅街	1934	红军游击队战士	在刘街被敌人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刘兴旺	男	1913	梅街	1933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4 年在石台七都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叶小康	男	1913	梅村	1934	红军游击队战士	1935 年在黑土岭牺牲	安徽省革委会
胡登洲	男	1889	墩上	1933	红军通讯班班长	1935 年 4 月在本地小坂被国民党军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姜宝华	男	1909	墩上	1931	红军地方游击队战士	1934 年 1 月在本地水口被国民党部队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汤东狗	男	1913	梅街	1934	红军战士	1935 年在刘街被敌 88 师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叶六世	男	1914	梅街	1934	红军战士	1935 年在叶村战死	中央人民政府
储小坤	男	1891	梅街	1934	红军战士	1934 年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新四军							
烈士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籍贯(镇街)	参加革命时间	生前所属部队及职务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批准机关
陈永庭	男	1914	池阳	1943	新四军交通员	1943 年春于枞阳被捕,在贵池被日军杀害	内务部
汤松柏	男	1923	涓桥	1942	新四军游击队班长	1944 年 8 月在高岭与日军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余松培	男	1925	涓桥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4 年 5 月在齐山与敌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陈年保	男	1924	涓桥	1945	新四军班长	1945 年 7 月在双河口作战牺牲	安徽民政厅
陈根保	男	1918	涓桥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5 年在山东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鲍银狗	男	1925	涓桥	1944	新四军 59 团战士	1947 年在山东莱阳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张贵生	男	1925	涓桥	1943	新四军战士	1947 年在山东战场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章宽玉	男	1920	涓桥	1946	新四军班长	1947 年在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汪树生	男	1923	涓桥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7 年在莱芜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周晓八	男	1919	涓桥	1938	新四军营长	1948 年在无为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赵荣奎	男	1922	涓桥	1941	新四军七师副营长	1948 年在徐州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刘羊牙	男	1920	涓桥	1945	新四军战士	1947 年在无为战斗中牺牲	贵池县人委会
刘少青	男	1916	江口	1941	新四军通讯员	1943 年在枞阳许家湾执行任务遭日军袭击牺牲	内务部
王文有	男	1920	江口	1940	新四军战士	1942 年在桐庐交界观音洞与匪作战牺牲	二十五军政治部
陈克宏	男	1916	江口	1938	新四军排长	1942 年在山东作战牺牲	皖北行署
周甄伯	男	1920	江口	1944	新四军副连长	在枞阳横埠河被伪军枪杀	中央人民政府
刘开应	男	1906	江口	1942	新四军税务所税务员	1944 年在流坡执行任务被日军杀害	安徽省革委会
鲁成林	男	1920	江口	1943	新四军战士	1945 年在里山作战牺牲	安徽省革委会
陶德义	男	1920	江口	1944	新四军七纵队战士	1947 年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陶炳南	男	1924	里山	1943	新四军战士	1945 年北上在泗水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汪传国	男	1908	乌沙	1942	新四军通讯员	1944 年 5 月被捕送安庆途中被敌人抛入江中淹死	中央人民政府
陈中华	男	1914	乌沙	1945	新四军崇石乡情报员	1945 年在高坦被敌军枪杀	安徽省革委会
胡大源	男	1930	乌沙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5 年北上失踪	地区民政局

周海友	男	1921	乌沙	1942	新四军战士	1943年7月在江西彭泽县失踪	贵池县民政局
程双圣	男	1925	乌沙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4年6月在贵池鸡金山战斗中牺牲	安徽省革委会
王晓德	男	1925	乌沙	1944	新四军税务所所长	1945年在喻楼被捕于贵池杀害	安徽省革委会
钱士应	男	1922	乌沙	1943	新四军了望哨哨长	1945年在仙姑庙被敌杀害	安徽省革委会
方云先	男	1920	乌沙	1945	新四军游击队队长	1945年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钱益海	男	1920	乌沙	1941	新四军税务所所长	1945年在贵池被敌杀害	安徽省革委会
王九根	男	不详	乌沙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5年北上无为，抢渡焦河时失踪	贵池县人委会
周荣贵	男	不详	乌沙	1943	新四军战士	1943年在贵池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沈清波	男	1913	乌沙	1943	新四军通讯员	1944年8月在晏塘桥被日军伪军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章文祥	男	1904	乌沙	1940	新四军7师战士	1942年在贵池三万公司被日军枪杀	中央人民政府
张小害	男	1923	乌沙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4年在殷汇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唐礼清	男	1920	乌沙	1942	新四军战士	1945年在乌沙大圩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纪瑾居	男	1923	乌沙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4年在江苏高邮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唐达杨	男	1914	乌沙	1941	新四军枞阳游击队战士	1943年在枞阳牺牲	内务部
陈登翔	男	1912	乌沙	1944	新四军七纵队排长	在九华山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周先义	男	1926	乌沙	1944	新四军副排长	1946年在对敌作战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赵合如	男	1922	乌沙	1940	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副乡长	1944年5月在当地被日军杀害	贵池县人民政府
刘厚生	男	1908	乌沙	1935	新四军地方游击队乡长	1945年5月在本地被日军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张凤汉	男	1910	殷汇	1943	新四军沿江支队侦察组长	1943年5月在殷汇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杀害	安徽省革委会

方炳南	男	1920	殷汇	1944	新四军沿江支队班长	1944年9月在白屋章村与敌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朱德宝	男	1917	殷汇	1943	新四军皖南支队班长	1945年1月在贵池读山被日军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戴大毛	男	1930	殷汇	1945	新四军排长	1945年10月在无为县对敌作战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张华根	男	1922	殷汇	1944	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乡长	在龙山乡防汛因公牺牲	贵池县民政局
胡有根	男	1921	牛头山	1942	新四军战士	1942年在贵池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倪学桃	男	1924	牛头山	1942	新四军沿江团战士	1944年7月在东流县燕窝战斗中牺牲	安徽省革委会
方润泽	男	1918	牛头山	1944	新四军七师62团战士	1944年失踪	内务部
杨三羊	男	1919	牛头山	1933	新四军独立团战士	1945年2月向井岗山转移时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李福初	男	1905	牌楼	1942	新四军游击队班长	1943年在吴田战斗中被俘后被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杨小云	男	1926	牌楼	1941	新四军通讯员	1943年送机密文件途中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曹礼传	男	1920	牌楼	1943	新四军58团班长	1947年在莱阳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储长寿	男	1925	牌楼	1942	新四军战士	1943年在吴田被敌人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程学德	男	1919	梅村	1943	新四军情报员	1947年在肖坑被捕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周念元	男	1914	梅街	1943	新四军游击队副队长	1944年3月在许桥村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詹玉根	男	1924	梅街	1947	新四军游击队战士	1947年在源溪与敌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桂树清	男	1921	梅街	1947	新四军游击队战士	1949年在新龙被敌捕杀	中央人民政府
柯国华	男	1924	梅街	1947	新四军游击队战士	1949年7月在天垄大庙被叛徒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张开文	男	1914	里山	1936	新四军连长	1943年在开胜桥战斗中牺牲	华东军区
杨维德	男	1921	里山	1946	皖南游击队黄山支队队长	1947年在棠溪柯战斗中被捕遭国民党枪杀	中央人民政府
焦云来	男	1912	里山	1943	地方民兵班长	1948年在杨街被国民党乡政府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张继富	男	1921	里山	1946	皖南游击队黄山支队队长	1948年在俞村被国民党乡政府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包玉坤	男	1910	马衙	1942	新四军贵东税务所所长	1945年北撤在江苏淮阴牺牲	贵池县人委会
方大职	男	不详	马衙	不详	新四军沿江支队班长	在淮阴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何长生	男	1924	马衙	1939	新四军闽江挺进团战士	1941年2月在普济圩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吴希民	男	1919	马衙	1937	新四军河西区委副书记	1944年6月在朱家咀被捕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方再角	男	1923	马衙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4年5月在灵芝塔战斗牺牲	贵池县民政局
赵英杰	男	1924	马衙	1944	新四军战士	1946年5月与敌83师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徐天锡	男	1923	墩上	1946	新四军中队长	1947年10月在青阳庙前桥头被敌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丰万盛	男	1914	墩上	1945	新四军排长	1947年10月在童溪桥被敌军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周冬涛	男	1928	墩上	1945	新四军班长	1947年12月在余河村与敌147师作战牺牲	贵池县民政局
黄孝毛	男	1925	墩上	1947	新四军战士	1948年10月在岳西作战牺牲	西南军区政治部
吴保财	男	1921	梅龙	1942	新四军沿江游击队队长	1943年元月在马衙执行任务时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方明卿	男	1923	梅龙	1942	新四军沿江游击队战士	1944年6月在枞阳被敌机轰炸时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高来甫	男	1915	梅龙	1940	新四军沿江游击队战士	1944年在无为土桥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钱七八	男	1920	梅龙	1943	新四军游击队税务员	1945年2月在枞阳遭敌杀害	内务部
邢志普	男	1894	梅龙	1933	新四军联络员	1945年10月在贵池被敌杀害	池州地区
王雨生	男	1920	梅龙	1939	新四军一支队文工队员	1941年在荻港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郝良壁	男	1924	梅龙	1940	新四军沿江支队战士	1942年9月在桐庐水圩作战牺牲	华东军区政治部
吴三乐	男	1909	梅龙	1940	地方民兵	1942年在流潭王楼被日军杀害	安徽省人民政府
陈 征	女	1923	区直机关	1938	新四军一支队通讯员	1939年在丹阳延陵地区被捕牺牲	丹阳县烈属协会

鲍大奕	男	1914	区直机关	1942	新四军沿江支队战士	1943年在茅坦乡香山被日军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韩青林	男	1917	市直机关	1940	新四军战士	1943年在河北完县同罗店战斗中牺牲	晋察冀专区
黄立	男	1915	市直机关	1944	新四军武工队队长	1948年5月在繁昌与国民党军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解放军							
烈士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籍贯(镇街)	参加革命时间	生前所属部队及职务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批准机关
刘五九	男	1923	池阳	1942	解放军团长	1948年在徐州反击战中牺牲	枞阳县人民政府
包尚士	男	1927	里山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7年在莱阳战役中牺牲	25军政治部
许金水	男	1908	里山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8年12月在济南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吴建中	男	1908	里山	1943	贵池县公安大队股长	1949年7月在丁香剿匪时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吴小狗	男	不详	涓桥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7年8月在南麻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吴扁头	男	1921	涓桥	1944	解放军排长	1946年5月在山东莱芜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洪安乐	男	1927	涓桥	1944	解放军通讯员	1947年2月在山东莱芜战役中牺牲	59团政治部
吴福庭	男	不详	涓桥	1945	解放军战士	1947年3月在山东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陈德儒	男	1918	江口	1941	解放军连长	1948年在济南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唐杜可	男	1922	乌沙	1944	解放军副指导员	1946年春在山东枣庄战斗中牺牲	内务部
方文宜	男	1919	乌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6年元月在江苏泗阳牺牲	安徽省革委会
唐伯胜	男	1921	乌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	内务部
朱河海	男	1928	乌沙	1943	解放军战士	1947年6月在山东墨子沟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沈合年	男	1926	乌沙	1943	解放军战士	1947年10月在山东牺	中央人民

						牲	政府
吴自有	男	1921	乌沙	1943	解放军战士	1947 年在徐州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钱少云	男	1921	乌沙	1943	解放军战士	1947 年在山东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李破留	男	1925	乌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8 年在山东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陈龙五	男	1914	乌沙	1943	解放军班长	1948 年在山东百合山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徐福寿	男	1925	乌沙	1947	解放军班长	1947 年在山东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方树森	男	1927	乌沙	1938	解放军排长	1947 年南麻战斗中牺牲	皖北行署
鲍成九	男	1918	乌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7 年在山东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朱纪才	男	1926	乌沙	1945	解放军副班长	1947 年山东临沂与敌作战牺牲	安徽省革委会
姜文年	男	1919	乌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7 年在攻打来安县城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江占国	男	1918	乌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7 年后失踪	内务部
朱富才	男	1923	乌沙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9 年渡江后在郎溪战斗中牺牲	华东军区政治部
程谦友	男	1928	乌沙	1943	解放军战士	1945 年 5 月在蛟口战斗中牺牲	三野政治部
何传福	男	1923	乌沙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6 年在山东征集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夏长安	男	1923	乌沙	1940	解放军班长	1947 年 1 月在滨海战役中牺牲	华东军区政治部
夏长乐	男	1924	乌沙	1944	解放军副排长	1947 年 6 月在山东战场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杨根午	男	1930	乌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7 年 6 月在山东战场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朱元昌	男	1924	乌沙	1946	解放军班长	1949 年渡江后在郎溪战斗中牺牲	25 军政治部
羊华才	男	不详	乌沙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7 年在山东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朱永全	男	1925	乌沙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8 年在山东莱芜战斗中牺牲	皖北行署
杨根乐	男	1923	秋江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7 年在山东济南遭敌机扫射时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许成年	男	不详	秋江	1940	解放军排长	1947年8月在山东战场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时其华	男	不详	秋江	1944	解放军副连长	1947年8月在山东战场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张义来	男	1924	秋江	1944	解放军副班长	1948年7月在大别山作战牺牲	102师政治部
丁文志	男	不详	秋江	不详	解放军炊事班长	在山东牺牲	山东惠民地区民政局
赵根宝	男	1928	牛头山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6年6月在山东西集子作战牺牲	安徽省民政厅
赵小云	男	1924	牛头山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6年6月在山东西集子作战牺牲	安徽省民政厅
董本启	男	1921	牛头山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6年8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童洪福	男	1915	牛头山	1945	解放军副排长	1948年在山东战场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胡志成	男	1921	马衙	1945	解放军战士	1946年8月在山东战场牺牲	池州地区
金江水	男	1925	马衙	1945	解放军战士	1947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黄店兰	男	1889	马衙		解放军战士	1947年在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张道昌	男	1920	马衙	1946	解放军战士	1948年11月在青阳柏家桥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方再福	男	1917	马衙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25军政治部
刘双连	男	1925	马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9年7月在南京作战牺牲	皖北行署
徐事平	男	1915	马衙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8年在徐州作战时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查金旺	男	1923	殷汇	1944	解放军班长	1946年在山东沙河作战牺牲	安徽省革委会
王志德	男	1918	殷汇	1947	解放军司务处	1948年在山东莱阳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曹沛泽	男	1918	殷汇	1947	解放军干部	1949年7月在本地被土匪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朱先高	男	1928	殷汇	1945	解放军班长	1949年1月于舒城县田圩战斗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汪明发	男	1892	梅村	1949	梅村乡新村村长	1949年在本地被土匪杀害	安徽省革委会
彭世模	男	1929	梅村	1949	解放军战士	1949年8月后失踪	内务部
吴自伦	男	1926	马衙	1942	解放军班长	1947年在山东枣庄牺	二野政治

						牲	部
潘福如	男	1922	马衙	1942	解放军排长	1949年2月在桐城小李庄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刘龙珠	男	1925	墩上	1943	解放军某部副排长	1948年解放宿县战斗中牺牲	总政治部
吴洪连	男	1893	墩上	1949	渡江船工	1949年4月在江口渡江作战中中弹牺牲	湖东县人民政府
王英发	男	1923	墩上	1942	解放军排长	1949年4月在荻港渡江中牺牲	华东军区政治部
朱伯海	男	1924	梅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7年4月在庐江县庐家河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胡少臣	男	1918	梅龙	1941	解放军班长	1947年6月在苏北战场上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吴兰生	男	1922	梅龙	1944	解放军战士	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姜文汉	男	1901	梅龙	1944	淮阴县委副书记	1946年在淮阴大军撤退时被捕遭国民党杀害	中央人民政府
胡自昌	男	1922	梅龙	1943	解放军战士	1947年在山东枣庄作战牺牲	中央人民政府
刘香圣	男	1924	梅龙	1943	解放军班长	1947年在山东莱阳战役中牺牲	华东军区政治部
雷银元	男	1916	墩上	1946	解放军排长	1947年在青阳被敌85团杀害	池州地区
刘龙珠	男	1925	墩上	1943	解放军副排长	1948年解放宿县战斗中牺牲	总政治部

说明：①《革命烈士英名录》摘自1994年《贵池县志》。②凡解放前（1949.10.1）牺牲者，皆录其上。③各“革命时期烈士”划分以生前所在部队为划分界线。

八、抗日战争时期贵池流行的黄梅小戏《难民自叹》

《难民自叹》一剧，作者杜含芳，字若衡，贵池县茅坦乡杜村人，兄弟排行第二，故人们都称之为杜二先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攻贵池，当地村民被迫逃难，流离失所。杜二先生耳闻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人民的苦难，满腔悲愤，奋笔疾书，编写了《难民自叹》剧本，在城乡演唱。

生唱（快板）：

心中只把鬼子来恨，苦害中华为何因，九一八夺去了东北三省，七月七卢沟桥战争发生，占天津、取北平，侵略太狠。八一三攻上海，又夺江阴，取南京、攻芜湖，又炸安庆，打苏杭、攻广德，又破宣城。上有飞机来掩护，下有兵舰纵横江心。一阵来到大通镇，男女老少都着惊。眼见鬼子心肠太狠，也只得带儿女远方逃生。急慌忙来走慌忙，点点珠泪洒胸膛。鱼儿逃出千层网，虎口逃出一对肥羊。（转平板）表我家住之在龙山大坂，离观前七八里，有我的家乡。曾记得七月里，敌人登岸。失去了梅埂镇，胆战心寒。有汽艇和兵舰，直到荻港，有飞机和大炮。扫射机枪。那时间破公路，命令有限，黑夜里征民夫，忙上加忙。十家就有九家干，背锄头和畚箕，自带口粮。有县长和区长把工督上，保甲长、联保主任都站在路旁。路未破，又要修上。炮二旅奉命令驻守炭山（即馒头山）。此时间，加民夫，路要修缮。用汽车，拖大炮，保守江防。这都是男为国，女为家，不惜血汗。又谁知，到如今，做难民，流落在他乡。

旦唱：

八月里是中秋，月色光华。想起来，做难民，心如刀剐。曾记得，我的夫，

征工事大。家庭中大小事，里里外外，都是奴家。翻场晒谷，搬上搬下。剥芝麻，摘豆角，带拣棉花。清早起，烧茶水，忙碌无暇。梳过头，忙洗衣，又要去剥麻。刹时间，保甲长对我讲下。他要我，做军米，送到公家。那时候，公路上，到处轰炸。又恐怕，我的夫，有点差错。这都是，叫奴家，放心不下。到晚来，儿和女，口叫爹妈。男为国，女为家，不空一下。到如今，想起来，做难民毫无塌飒。咬牙切齿把鬼子来恨，可怜我好家财，一旦丧尽。

生唱：

九月里，菊花黄，螃蟹正肥。想起来，做难民，好不悲伤。曾记得馒头山，敌人打退。退之在，黄家山，又被我军包围。这都是我国军，忠勇可佩。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山堆。刹时间，不却失了殷家汇。那飞机，沿公路，炸弹如雷；十里岗，池州府，我军撤退；上清溪，黎家店，紧急失危；大路孙，马牙桥，同时炸毁。也只得，守吊桥，免受敌人包围。有钱的，逃难时，早有准备；可怜我，无钱的，把命来舍。可恨那，鬼子们，偏要与老子作对。逼得我，做难民，有何滋味。

旦唱：

十月里，芙蓉开，节届小阳。想起来，做难民，好不惨然！曾记得，破脊岭，大路失陷；攻下洲，侵童埠，占住陈家大山；老屋唐，石村许，同时沦亡；进西畈，打观前，又占茅坦；老鼠咀，架大炮，对准低岭刘、张。鬼子们，到我家，烧杀掳抢。可怜我，老百姓，一个个纷纷逃难。携儿女，担箩担，慌里慌张。有多少，过江北，把船叫喊；有多少，过公路，把岭来翻。一路上，防不尽，飞机炸弹。眼见得，六泉口，尸骨堆山。全家人，为躲反，五离四散。到晚来，三更后，不见米汤。夫妻们，在难中，凄凄惨惨。可怜我，妇女们，

脚又小，鞋又尖，是一步一颠。

生唱：

冬月里，天气冷，雪花飘飘。想起来，做难民，好不心焦；没有絮被，睡稻草；没有粮食，怎把锅烧？一日两餐食不饱，莫奈何偷警戒，把稻来挑。遇到天阴，就不好，逼得我，小难民，个个拿瓢。有多少，好人家，随多给少；可恨那，恶人，不给分毫。为熬粥，打柴火，与人争吵。他骂我，小难民，应该受遭。看起来，这些人，太无人道。同情心，难道是无有分毫。我在家中，也是衣食暖饱。手围炉，脚踏火桶，何等逍遥！一不是趿皮鞋，好吃好喝；二不是当流氓，好赌好嫖。转面来，劝诸位，不要耻笑。想我等，做难民，都是同胞。

旦唱：

腊月里，北风紧，地冻天寒。想起我，做难民，好不怨伤！有多少，逃在外，缺衣缺粮；有多少，逃在外，无吃无穿。有些人，靠亲友，微薄助赞；可怜我，苦难民，只好住破庙祠堂。天寒地冻，大雪下降，冻得我儿和女，哭喊爹娘；眼见得，有钱人，年货置上。杀年猪，磨豆腐，做年糕，又熬年糖。惹得我小娇儿，心嘶哭喊。见人家，吃糖果，总有点吞馋！曾记得，在家中，哪缺一样。腌干鱼和腊肉，还灌香肠。香烛纸马，样样写上。有瓜子和花生，另买几色糕糖。有三鲜和五味，挂面鸡汤。年初一开大门，要放千红炮仗。烧香纸，敬天地，灯烛辉煌。到如今，这些事，一概不讲。又无东，又无西，空手一双。忍气吞声，忧愁恼闷。但愿得，一家人，无损无伤。

生唱：

正月里，是新年，梅花正放。想起来，做难民，好不遭难。可怜那，汪精

卫，卖国求荣，与秦桧是同样奸臣。助日军，在中国搞“三光”，烧杀淫掳，百姓遭殃。曾记得，在家中，元宵美景来赏。有龙灯和马灯，好不爱人，男和女，老和少，多么齐整。穿红来，着绿去，大放花灯。有多少办春酒，亲朋来请，有多少庆佳节，达旦通宵。想起来，以往事，实在可恼。到如今只落得，人贫受惊。我本当，帮工去，无人过问；我心想，做生意，身无分文。住祠堂，歇古庙，清静得很，逼得我做难民，无路逃生。

旦唱：

二月里，是花朝，杏花正开。想起来，做难民，好不伤怀。拖儿带女，逃之在外。男不耕女不织，怎样安排！莫奈何，找亲友，把债来贷。买点货，我的夫，货郎担，生意做起来，黄烟草纸样样多带。针和线，洋肥皂，外带火柴。一天到晚，沿村叫卖。卖不到几文钱，生活何来？这都是，避难人，真情实在。但不知，做难民，何日回归。

生唱：

三月里，是清明，桃花开放。想起来，做难民，好不愁哀！眼见得，有许多，好青年，为祖国，把命捐献。有多少，无辜的，遇难在前线。可怜地哭一声儿，哭一声爹娘。恼恨那鬼子心肠毒狠，把我们中国人，当做牛马畜牲。听说是国共两党合作，同打日本，杀尽倭奴，算清血债，来把冤伸。我虽然脱虎口，逃出性命。等来年，赶走鬼子，再重整家园。

旦唱：

七月里，乡村忙，农活正多。想起来，做难民，无可奈何！见人家抽蚕丝，心如烈火，见人家孵小鸡，畜鸭养鹅。一家人老和少，七八口，靠丈夫卖散工，割麦插禾。日收入，钞票贰角，怎够得，我全家，几人吃喝。我心想，摘茶叶，

与夫帮贴。背孩儿，进茶园，烈日如火。岂料到，晴天霹雳，一声春雷响。国共合作，新四军来到家乡。神出鬼没，游击战士，人人勇敢。打得那鬼子兵，昏头转向。放下枪杆，与百姓共同生产。鱼水情，同甘苦，其乐洋洋。劝同胞，齐协力，定叫鬼子灭亡。

生唱：

五月里，是端阳，石榴花红。想起来，做难民，好不心痛！曾记得，在家中，过端午，雄黄酒，饮上几盅。夫妻们谈家事，喜笑盈盈。饮罢端阳数盅酒，随带儿女观赏龙舟。岂知这好节令，那得享受。流落在异乡地，泪洒心胸。想起来，我的家，有陆路通青阳，有水路直达大通。丝茧棉麻，家乡土产，还有农副渔业，人寿年丰。可恨那小倭奴，猖狂得狠。家沦陷，人遭殃，称霸逞凶。在陷区，施毒计，诱惑拉拢。有多少，好青年，陷落其中。敌人的“以华制华”手段毒辣，劝同胞，切莫要，受它骗，听它愚弄。

旦唱：

六月里是天贶（音“况”，每年六月六日为天贶节），家家户户上田庄。想起来，做难民，痛苦不堪！空喜欢禾苗壮，丰收在望。只觉得身无主，也是望洋兴叹。酷热天，衣褴褛，夜无蚊帐。住祠堂，蚊虫叮，遍体鳞伤。忆往日，在家中，晚上乘凉，摇风打扇，神怡心旷。又谁知，好家园，被鬼子侵占。逼得我携儿女，逃避他乡。劝同胞，休耻笑，现在模样，救同胞，出水火，都有一片心肠。保国家，收失地，军民同干。为救亡，图生存，莫说无关。要知道，巢已破，定无完卵。同胞们，快起来，积极救亡！

参 考 书 目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三卷),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会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安徽省志》(军事志),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光荣与辉煌——中国共产党大典》,德辰主编,红旗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安徽省志》(人物志),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安徽革命史辞典》,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中国近代史词典》,陈旭麓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

《安徽近现代史辞典》,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近现代史辞典》编委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皖南星火》，杨明著，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出版。

《贵池县志》，贵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山书社 1994 年出版。

《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池州卷），方兆详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 月出版。

《贵池党史通讯》（1983-1996.12），中共贵池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内部资料，1983 年 6 月出版。

《贵池现代革命史初稿》（上、下册），中共贵池县革命斗争史资料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60 年出版。

《贵池东至两县革命斗争史协作调查资料（1-7 号）》，中共贵池县革命斗争史资料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60 年出版。

《贵池县革命历史资料综合报告（初稿）》，中共贵池县革命斗争史资料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60 年出版。

《热土颂歌》，池州市新四年历史研究会、中共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5 年 8 月出版。

《贵池军事志》，贵池县人民武装部（军事志）编写组编，内部资料，1984 年 8 月出版。

《中共贵池党史大事记（1919—1990）》，中共贵池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95 年 9 月出版。

《贵池抗日资料汇编（1937—1945）》，中共贵池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85 年 8 月出版。

《贵池解放战争史料选（1945.9—1949.9）》，中共贵池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87年10月出版。

《贵池党史资料选编（1919—1937）》，中共贵池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86年10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贵池县组织史资料（1928冬—1988.12）》，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中共贵池市委党史办公室、贵池市档案馆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池州地区组织史资料》（1928—1991.12），中共池州地委组织部、中共池州地委党史办公室、池州地区档案馆，内部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

《皖江烽火》，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办公室，安庆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内部资料，1995年10月出版。

《安庆地区近代革命史稿》，鲁尧贤编著，内部资料，1985年11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黄山区简史（1921—1949）》，中共黄山区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内部资料，2001年6月出版。

《安徽省中共党史资料丛书：黄山风云》，中共黄山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安庆地方史》（上卷），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

党史出版社 2001 年 6 月出版。

《中共铜陵地方史》，中共铜陵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6 月出版。

《新四军在枞阳》，枞阳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枞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内部资料，2006 年 11 月出版。

《东至革命史》，中共东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东至英烈》，中共东至县委党史办公室，东至县民政局编，内部资料，1991 年 5 月出版。

《石台风云》，中共石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91 年出版。

《中共东至党史大事记（1919—2000）》，中共东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资料，2001 年 5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桐城地方史》（第一卷），中共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著，新华出版社 2005 年 6 月出版。

《中共青阳党史大事记（1919—1999）》，中共青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资料，1999 年 11 月出版。

《中共青阳党史》，中共青阳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芜湖历史》（第一卷），中共芜湖市委党史研究室著，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贵池地方史》编著委员会

2008年4月22日

主任：刘礼生

第一副主任：张权发

副主任：李国建 王德柱 王正武 操礼旺
施春风

委员：王德龙 杜荣来 吴波 杜德友
李梅峰 陈燕 张合友 宁世斌
余建国 章丹心 查加赋 韩华
汪忠新 方锡友 包国标 胡胜利
刘至平

《中国共产党贵池地方史》编著委员会

2011年3月25日

主任：张权发

第一副主任：樊泽明

副主任：李国建 王德柱 操礼旺 王枏红
程菲菲

委员：李应启 杜荣来 梅灏 戴爱军

李梅峰 柯 胜 汪 漪 宁世斌
余建国 章丹心 查加赋 韩 华
董玉龙 施勤来 刘丽华 胡胜利
刘至平

后 记

在贵池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共产党贵池地方史》第一卷终于出版了。这是 50 多年来贵池区党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从 1960 年 4 月，中共贵池县委成立革命斗争史资料小组，到 2001 年中共贵池区委成立党史研究室，多年来，党史工作机构虽几经更名，但机构健全，队伍稳定，工作与时俱进。原贵池县（市）党史工作机构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的考证、研究，编写了大量专题资料、论文、人物传记、大事记、组织史资料，还出版了一批党史专题资料丛书。这些，为编写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这些材料，我们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进行分析、研究、甄别，充分吸收近年来池州市及贵池周边市、县党史研究的成果，使本书成为贵池正史和信史。

根据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要求，报经区委常委会批准，我们从 2008 年开始着手编著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贵池地方史》工作。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为主任的高规格编著委员会。区史志办公室主任查加赋同志兼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并担任主编。汪春才同志担任常务主编，负责全书的撰稿、统稿工作。在编著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著工作于 2008 年 4 月全面启动，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全书终告完成。

在编著过程中，我们按照区委、区政府领导的要求，力图使本

书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民主革命时期贵池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以发挥以史育人，以史为鉴、立史存查的作用。唤起众多的贵池儿女，继承先烈遗志，为振兴桑梓，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编著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池州市有关领导、同行和池州学院有关党史专家以及关心党史事业的同志们、朋友们的帮助。特别是原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李银德主任、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李剑军主任、原池州市党史办公室胡大源主任、中共池州市委党校程世宁常务副校长、池州学院操国胜教授对编著工作所给予了关怀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著这样一部政治性、学术性很强的党史著作，对我们来说，这是首次。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由于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及所掌握的史料有限，难免存在疏漏、偏颇之处。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专家、学者、老同志、党史工作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编 者